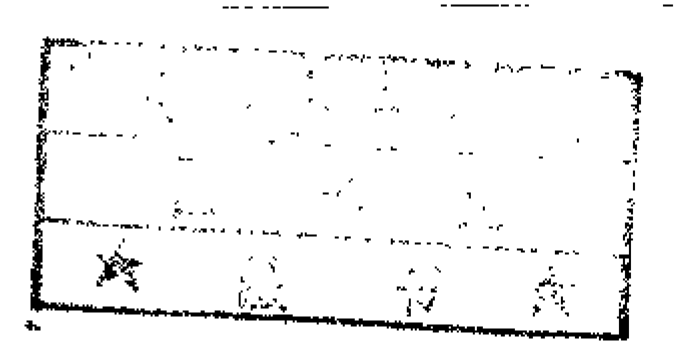

历史铁幕之开之合　高层人物之升之沉
重大决策之得之失　锋火疆场之血之祭
名流写真
周恩来的另一个世界
薄一波与我们一家
帅府家事
蒋介石抹去的婚恋日记
我丁玲就是丁玲
民国五大总统后裔今何在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名流写真

杜导正　廖盖隆　主编





南海出版公司



MINGLIU XIEZHEN

名流写真

主　　编　杜导正　廖盖隆

责任编辑　杨　雯

策　　划　袁杰伟　徐庆全

封面设计　康笑宇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一二〇一工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069－3/I·174

定　　价　23.50 元

目　录

与伟人之交

与伟人之交，本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曾经与伟人交往过，或者对伟人的交往有过研究的人，他们所留下的文字，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伟人的胸怀、风貌。

元帅府家事写真

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元帅只有叱咤风云的人生足迹，事实并非如此。朱老总的厚道、叶帅的重情……，使人们看到了真实的元帅。

政治姻缘与人生挚情

政治与姻缘本是两个不相关的词，但在现实中却往往联系在一起，因为姻缘往往成为为政治服务的手段。但是，政治姻缘虽然一时红火，但终究会像蒋介石抹去婚恋日记一样，无法有郭沫若与安娜、许光达与娃娃亲的人生挚情……

文人墨客的悠悠岁月情

抒发情怀是文人墨客的特点，因而在悠悠岁月中，文人墨客就有了可资把玩的情怀：夏衍与潘汉年的友情、一代名士林语堂的人生情怀……

名门之后的命运

历史造就了名人，因而名人后代的命运也更多地与历史交织在一起：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随其功过而沉浮；宋家姐弟依政见而分合；张家兄弟虽手足情深，但也为一条海峡所阻隔……

与伟人之交

与伟人之交，本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曾经与伟人交往过，或者对伟人的交往有过研究的人，他们所留下的文字，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伟人的胸怀、风貌。

“激进派教师”作客中南海

李漱清，是曾对毛泽东生活方式青少年时代有过影响的“激进派教师”，毛主席多次提到他，怀念他。建国后，为重温昔日情谊、叙叙家常，“借此了解乡间情况”，毛主席邀他进京作客。李漱清在京的两个月，毛主席见了他12次，引来了不少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师长、朋友，大家促膝畅谈，其乐无穷……本文作者是李漱清的外孙子，所知甚详，且纠正了不少书刊中失实的“荒唐话”……

最近几年，在相继刊行的讲毛泽东人际交往和语言艺术的一批书稿里，如《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湘魂——毛泽东的家世》（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毛泽东和他的亲友们》（河北人民出版社），反复记述了1952年9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邀请李漱清、邹普勋、罗元鲲、张干四人在中南海作客一些情节，多与事实不符。是日，本是李漱清进京后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却被作者们虚构出初次会面的对话，进而编造了李漱清局促不安，甚至说了“见了皇帝老子我心里就慌”的荒唐话。这全然是对李漱清风貌谈吐的歪曲描写。

李漱清何许人也？他与毛泽东到底交往有多深？他此次应毛泽东邀请来京，一住两月余，12次与毛泽东会谈，他们又谈了些什么？

我作为李漱清的外孙，有责任根据家藏的李漱清日记和家

书，以及我当时在北京的耳闻目睹，参阅作家周立波 1957 年拜会李漱清后发表的访谈录，把李漱清 1952 年秋作客中南海的若干情况整理出来，公之于世。

被毛泽东称为"激进派"的李漱清

李漱清，生于 1874 年，卒于 1957 年，是韶山韶右山庄人。他胸襟开阔，忧国忧民，有骨鲠之气，是一位雅善诗文的饱学之士。他早年宣扬"新学"，曾执鞭于湘乡驻省中学，并把韶山莲花寺、湘乡十四都常乐庵等庙宇办成学堂，被毛泽东称为"激进派教师"。

五四运动前后，李漱清接受工农大众民主革命思想，后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应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电召到广州，和沈雁冰一起，在东山庙前西街 38 号寓所，协助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

1927 年马日事变，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革命者到处人头落地，其中包括李漱清的妻子蒋悌空，被敌人枭首如意亭。此时李漱清早过大衍之数，回到家乡，愤然自号"韶山不出子"，眼望着毛泽东和他自己的儿孙们踏上漫漫征途。

毛泽东总也惦念着李漱清。

1936 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我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县，毛泽东谈到少年时代所受的影响时曾说："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见《西行漫记》1979 年三联书店版）这里指的便是李漱清。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还曾与来延安国共谈判的国民

党代表周励武谈到李漱清并请周回湖南后转达对李的问候。周励武将军是湘乡人，家距韶山只有20华里，毕业于长沙岳云中学，曾加入中国共产党，能文能武，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中任湘乡县农会委员长，是毛泽东的“旧相识”。尔后，周被国民党抓获，押解南京后自首，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45年底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三人执行小组”，多次赴延安，有时与毛泽东彻夜长谈。1946年春，周励武受毛泽东委托，专程到韶山陈家桥看望李漱清，转达毛泽东的问候：“深望清大公好生保重身体，我愿意他健康长寿——好看世界。”过后，自号“韶山不出子”的李漱清回顾这一往事时曾说：从此“我才彻底从疾痛惨怛中解脱出来”，由“年年月月沉醉诗酒”，转向了朝朝暮暮期待天晴。

精心安排，李漱清应邀晋京

1952年7月，毛泽东给堂兄毛宇居写信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请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这里提到的邹普勋，是毛泽东读南岸私塾时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儿子，乳名亨二，时年59岁，以石匠为业，文字通畅，为人憨厚。少年时与毛泽东同学，又是住上下屋场的邻居。

李漱清和邹普勋得悉后喜出望外，由李漱清致函毛泽东，殷切表示晋京求见的愿望。毛泽东收到来信，约见李漱清的三子李介侯，商量接人的事。当时任外贸部高级工程师的李介侯，建议由我去接，毛主席却怕耽误我在校的功课，由他再次给堂兄毛宇居写信作出安排。信中说：

宇居兄：来信收到，李漱清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

二位说清楚:(一)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二)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九月动身北来。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致李邹二位。顺致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廿一日

函中所提"介绍信一件",是主席写给湖南政府主席王首道的。内容是:"今邀请李漱清先生和邹普勋君来京作调查研究,因李先生年事已高,希派人护送。"

主席考虑得如此周密,安排得如此精心,李漱清等一行怎能不一路顺风!

且看他们的行程记录:

9月14日动身,在韶山招待所巧遇省交际处招待科长朱文典陪苏联友人来主席故居参观,有轿车返省城,邹普勋先随车前往;李漱清有事于湘潭稍事逗留。16日搭早班船到长沙,科长朱文典出面慰问,礼意殷勤;17日下午8时有列车发汉口,省公安厅派优秀青年丁绍宁护送;18日拂晓到汉口,住万国旅社,与先期到此等车晋京的前湖南第一师范历史教员罗元鲲、校长张干不期而会,得知都是奉主席函召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非常高兴,更增添了同行的乐趣;19日中南交际处处长张健之陪大家渡江游览武昌,登黄鹤楼;20日上午8时乘车北上,21日下午抵京,国务院交际处招待科长高易之接站,下榻前门远东饭店。李介侯电话报告中央秘书室转达主席。



毛泽东与李漱清(左2)、邹普勋(左1)、张干(右2)、罗元鲲(右1)

一进中南海，饭后叙家常

9月25日清晨，毛泽东和李漱清通了电话，李漱清兴奋不已。"我马上派人去接你和邹普勋二位来吃饭"的声音还在脑际萦绕，毛主席的生活秘书王鹤滨已经来接。轿车开到中南海丰泽园，主席出门笑语相迎，握手惊呼："李漱老好健啊！"在同邹普勋热情招呼后，互相搀扶进入客厅。主客双方感叹三十余年的阔别。

李漱清、邹普勋把从家乡带的腊肉、酱油敬赠主席，主席欣然接受，看看时间不早，招呼秘书田家英找介侯来，一同进餐。回话说介侯因事外出，大家才一一入席：尊李漱清为上座，田秘书作陪。

饭后，江青穿着一件天蓝色呢短大衣，从深院款款而出，与李、邹二位老人见面。寒暄时，李漱清说："翻起老谱来，我和江青同志原本是一家人呢！"江青笑答："李老真细心，知道我也姓李，常有人叫我'江先生'哩！我认您是我族上的老伯伯，感到不

胜荣幸,平素主席来客,我轻易不出面,您可是我们全家的客人啊!”江青的一句应酬话使李漱清感到宾至如归,呼唤出他和主席一家人50年间的深厚友谊。李漱清由于过去和开慧之间情同父女,进而生发出眼前对江青的一片关心。他听主席说江青前不久在国外动过一次的手术,十分念虑地叮咛她:“还望你好生保重身体,没有健康,一切无所附丽,你可是有福气的啊!”江青笑着告诉李漱清:“我们一家人生活倒挺愉快,平日主席工作实在太累,我总是叫他跟我唱几段京剧,所以我爱管主席叫‘老板’哩!有时我还拉着他到西厢有声有色地玩一阵游戏呢!”说到此,江青略略停顿又自问自答道:“您知道玩什么吗?用主席给我们出的谜语来揭个底吧:‘洗不用水,吃不用嘴,砍不用刀,碰不起包。’”顿时,李漱清会心地大笑起来。叙谈良久,江青起身,抚着老人的左手,以慰语相嘱,又叫他在北京多住些日子,然后退出。主席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人到海边散步。穿过一座小巧玲珑的庭院,逶迤来到南海,可能主席忽然想到李老年迈,便说:“风大,不在这里坐了。”转至一片坪上,这里奇花烂漫,佳木葱茏,几个人坐在椅上,饮茶,晒太阳,谈论湘粤旧事,以及别后人世沧桑。

许久,才回到菊香书屋客厅,继续坐话家常。

李漱清记起今早来时,还曾接受一件相托之事,就是从长沙护送他来京的省公安厅丁绍宁交给他一个本子,要他转请主席签名。李于是谈到:“这次北上有老年文人同伴,且多亏青年同志丁绍宁一路招扶,毫无困难……”说着,从内兜掏出本子递给主席。主席拿进书房,用紫毫一笔书就“毛泽东”三个字。

这里一并谈到,后来在京两个月,李漱清受孙辈托请主席签过五个名,且都是一次一次办的。邹普勋请主席题过一回字。邹在西河沿坊间买了一本讲“猴子变人”的书,要送给家乡一位

青年,在国庆节期间办的一桌宴席上递请主席命笔——“这个角色姓唐,‘唐故左街僧’那个‘唐’……”——主席当即从毛式上装的左胸口袋里抽出那支派克钢笔,在扉页上写了两行字(纯蓝):“邹普勋购赠唐煦存/嘱毛泽东书”。

时近晌午,李漱清二人告辞,说下次再谈。

二进中南海,席间话读书

9月26日上午,李漱清、邹普勋、罗元鲲、张干四人游览紫禁城。余兴未尽,毛泽东派车来接去共进午餐。

11时,到了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下阶迎接,引人客厅,说李漱清和邹普勋是“一聋一聘”,招之并坐。

因为昨天主席刚同李、邹二人见面畅谈,李漱清心想让主席同一师二位教员叙旧,主席先来把李漱清介绍给罗元鲲和张干。毛泽东说:“瀚溟(罗元鲲字)、次仑(张干字)二位先生和李漱老这些天已经处得很熟了吧,他是我的老师。”说完就和两位先生寒暄起来。李漱清暗想:“我从未教过主席的书,他却这样说,我更要努力自爱才成。”不妨提到,我外祖父谈当时的想法时还告诉我,长沙、湘潭许多人都误认他是主席少年时代的老师。当今许多著作中延用此说,显然是不确的。

刚刚入座,应邀作陪的王季范、李介侯相继莅临。王季范,湘乡龙潭人,时年69岁,任政务院参事,住王府井红霞公寓;他是主席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教务长,与罗、张多年共事;又是李漱清的女婿王浑俊本家的九阿公,彼此过从甚密。亲友们在主席家里聚会,气氛格外欢快、轻松、活跃。李漱清年已八十,耳朵聋了,人家讲话,他听不见,他总是有好多话讲,主席笑他:“李漱老只有播音机,没有收音机。”

李漱清座旁的一张圆桌上叠放着好些本“二十四史”,有一

本《晋书》翻开摆在上面，大家谈话间，李漱清信手来浏览。主席转过身来对他说："中国书不多，主要一部'二十四史'，战争年代没有读过，现在准备通读一遍。"接着问他："李漱老，你对'二十四史'怎么样啊?"李漱清沉思片刻，把《晋书》翻到一处递给主席。主席一面耳聆其语，一面目视其文："对吾饮者，唯有明月，入吾室者，唯有清风……"看过，一迭连声叹息说："李漱老，今日个是哪一天啊?! 我毛泽东陪你痛饮，一浇平生块垒。"

论及第一师范50年间迁流转递、人才辈出，说到主席在一师读书时的各种特色。主席娓娓而谈、不时发出笑声："我在一师读书，偏废自然学科，只看重社会学科，那时只能这样，现在还得补课才行。那时，我在定王台(笔者注：省图书馆所在地，位于长沙浏正街)读了几句。书不能不读，又不能读到腿肚子里去，否则害死人。我读书跟牛吃草一样，吞下去慢慢反刍，反刍还怕是一辈子的事。现在提出来改造宇宙观，特别是读书人，其实就是叫读书人做些反刍工夫，去年文艺界、知识界搞过一场反刍。"主席接着说："一师的先生值得怀念的很多，徐老是活到老学到老。书要讲有用，还是后来读的。田秘书的书也是延安读出来的，他小时候在成都当钱庄店员，少年失修，如今成了我们的理论家，我的选集由他在编。"接着，主席一面平举左掌朝高处一托又往下一翻，一面诙谐地说道："我对田秘书的'书'啊是又捧又拍：才有八斗富，字无百日功。"顿时，主席大笑，众口喧腾。

午刻，过厅里八仙桌上摆下了丰盛的酒菜。在田家英秘书的招呼下，主席尊坐，罗元鲲、张干以李漱清年长请坐首席，李漱清则以与主席同乡为由坐次席，王季范、李介侯陪坐。

席间，宾主敬酒敬菜，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饭后先在客厅饮茶，尔后主席起身邀各位出游。逶迤来到万字曲廊，见石桥横卧，碧波荡漾，巍巍亭阁坐落在一派郁郁葱

葱的景色之中。南海边闲坐，中海畔散步，直到下午 4 时，又到含和堂电影厅观剧。剧终，主席送大家出来，握手而别。

国庆欢度，主人事事从客愿

国庆节将至，决定邀李漱清等人参加国庆观礼后，在主席和有关部门安排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9 月 27 日晚，由于李漱清当日游颐园受了风寒，卫生部长傅连璋和内科专家力不畏女士，来寓所诊治。

9 月 28 日，因与来华演出的捷克斯洛伐克歌舞团同住一层，政务院交际处派车，请李漱清等人由前门远东饭店迁寓西河沿永安饭店，以免喧哗干扰。

9 月 29 日上午，到沂园理发、洗澡。

9 月 30 日中午，国庆筹委会送来观礼柬帖、观礼证及观礼须知；下午，主席秘书叶子龙特地送来棉制服和呢大衣，以备翌日观礼之用。这是主席预先叮嘱秘书带师傅来量好尺寸订制的。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大庆。是日晴空朗朗、彩云栉栉，城楼左右六个观礼台上，站满了来自全国各界民族的代表，还有 37 个国家的外宾。李漱清等位列东 2 台。

10 时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登上天安门城楼，周围簇拥着一批开国元勋。英姿飒爽的陆海空三军接受检阅后，是学生和各界队伍的游行，十里长街变成了旗的海洋、人的海洋，蔚为壮观。晚上又来天安门广场看放焰火，此刻，俯视人潮花海，仰望星簇光束，天上人间交相辉映，斗艳争奇。李漱清恭逢盛典，想到自有儿孙妻侄四人前仆后继为革命牺牲，感到无比欣慰。

国庆期间连夜看文艺演出，都是主席安排的。2 日到军委礼堂观赏杂技和京剧；3 日又逢中秋节，李漱清单独应邀在丰泽

园与主席共进晚餐，同去政务院大礼堂看越剧。李与主席并坐，田家英秘书坐在身旁解说。李漱老刚进礼堂时女服务员招呼他脱掉大衣，他怕冷不肯脱，而室内温度很高，久坐燥热难堪，主席笑他“自作自受”。剧完返丰泽园赏月，临别主席送李上车时，从床上取来自用的羊毛毯盖在他的身上。



李漱清与他在北京的家属合影

其间，作家萧三、茅盾和徐特立老人曾先后来寓所看望李漱清，萧三、茅盾还将自己的诗选或文集赠送李漱老。

国庆后，政务院交际处安排李漱清等人游览北京名胜。22日李漱清忽发奇想，投邮短柬一封给主席：“余年八十，欲试航空，是否可行，拟请主席批示。”结果是主从客愿，24日下午，李漱清等人在秘书罗光禄安排下，在西郊机场乘坐飞机，鸟瞰京畿风光和长城内外大好山河。

互问子女事，句句溢亲情

李漱清在京近两个月，同毛泽东会见12次。谈话范围极为广泛，互问子女情况当然是话题之一了。

9月26日叙谈中，李漱清坐在主席那张铜架木板床上抽烟，忽然想起1926年冬在广州同岸英、岸青两小兄弟天天见，不

禁询问主席孩子们的情况。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询问，而是起身把一个女儿招呼出来。只见她身段修长，举止大方，面含笑靥地依在主席身旁，那亲女之情全在语言无法表达的神态之中。经介绍，知道她叫姣姣，16岁，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平日住校，这天是星期五，身体不舒服，上完课就回家了。她会说一口流利的俄罗斯语，原来是建国初期特地请二姨妈接回北京的。应客人要求，她用俄语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大家报以掌声。敌她回院后，几位客人还在议论，李漱清说的眉眼脸颊酷似当年爱穿绸长袍的乃翁毛泽东。毛泽东笑而不语，微微吮着嘴唇。

10月12日星期天，李漱清按主席安排，到中南海与他在总后勤部工作的一家人聚会。李漱清兴奋之余，又不免想到自己为革命牺牲的儿孙——儿子耿侯、贡侯，孙子德深。主席深情地说："耿侯在1928年率队到井冈山，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宋乔生团的党代表，这个团是由水口山工人组成的，战斗力强。宋乔生我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他是外交部耿飙的舅舅，耿飙是醴陵人，当年在水口山做工人运动，熟悉耿侯他们。"为李漱老牺牲的儿孙，毛泽东曾经回过两封信，一封给介侯，一封给李漱老，证明耿侯这段历史，对李漱老表示慰问。湘潭县县长曾亲临抚恤，送上"烈属荣府""烈士光荣""烈属光荣"三块门匾。

再次谈到毛泽东子女时，主席这才正面回答说，岸青从事列宁著作翻译，两个女儿一个读北师大女附中，一个读育英学校。不知为什么，偏偏未提及1950年11月25日牺牲在朝鲜前线的爱子毛岸英。主席倒是原原本本讲述了毛远新来到身边的原委。

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1938年由中央派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主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1940年和朱丹华结婚，1941年生下远新。第二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下狱，1943年9

月遭杀害。丹华年纪轻轻，寡母孤儿熬了三年，后改嫁方志纯，建国初决意把远新交给主席。主席不肯接受，说："你的儿子交给我做什么。"丹华诉说了自己的难处，言词恳切，但主席态度坚决，始终不予接受。朱丹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把远新带到韶山，托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转送主席。王淑兰，湘乡团田人，时年54岁，乡亲们管她叫润莲四娭毑，是个热心肠，便一口答应下来，马上领着远新奔北京进中南海。主席想不到她会这样做，数落了四娭毑几句，说她"是个滥好人，爱探闲事，乐得做个顺人人情。"

谈及李漱清的女婿王浑俊，毛泽东的兴致又高了起来。他回忆说："记得浑俊戴副近视镜，人好瘦啊，知道他中国书也读得好，他做的古体诗我还哼起，尽是味在这里。"

这王浑俊名承光，1905年生，系西晋太原王浑之后，早年与毛泽东有交往。1951年湖南一代儒将程潜作客中南海，毛主席祝贺他70岁生日。程潜津津乐道地谈起1941年60岁生日时一件韵事：宴会上宾僚以赋诗相贺，才思奔放的王浑俊即席写成一首七言歌行，气势雄壮，格调高昂，曾传诵一时，交口称誉。应毛泽东要求，程潜令春把诗集过录送阅，主席又复吟咏过这首古风，所以才有了上面说的几句话。

亲友相托，主席处理自有原则

10月19日又是一个星期天。主席又派鹤滨接李漱清到中南海共进午餐，继续了解乡间情形，并询问湖南文化界老人如李贡人、王端明、何炳麟、赵东樵诸家解放后的境况，还讨论了诗文历史和哲学方面一些问题。

当天受罗元鲲之托，李漱清交给主席一封信，附文稿两篇，一篇是罗元鲲的自传，另一篇是罗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

席》。呈请主席对两稿予以斧正,并考虑发表。信中还烦请主席为1932年去世的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员袁吉六(即袁仲谦)题写墓文。三天后,主席的复函即寄到西河沿永安饭店。

对于罗元鲲所提请求,题写袁先生墓文一事,毛泽东爽快地答复了,随函寄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字,并说"遵嘱书就,烦为转致";而两件书稿,则悉数奉还;对罗元鲲所书自传,主席褒之为"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对罗元鲲所写《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一文,主席说"得之传闻,诸多不实",明确表示"请勿公表"。

前面提到,这天在中南海作客,主席询问湖南文化界老人时,首先谈及李贡人。李湘乡人,时年78岁,前清拔贡生,湖南诗坛耆宿,主席读一师时的国文教员。解放后,李贡人曾写信请主席荐为湖南省文史馆(当时称文物保护委员会)馆员,主席将"嘱件"转"程颂云主席酌处"。主席后来说过:"我不愿意为亲友形读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贡人是毛泽东特为斡旋示以殊典的寥寥数人之一。

李漱清由李贡人想到自己能否当文史馆员的事,主席说:"连毛宇居都是,那李漱老更应该是。"李漱清顺势提出:"那就请主席推荐一下。"毛泽东却说:"推荐我就不推荐了"。毛泽东1954年3月31日给彭石麟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李漱清先生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的问题(指任文史馆馆员)是他自己托人解决的。"

摄影留念,苹果对虾送别

11月8日是周末,毛泽东得闲,下午邀李漱清、邹普勋、罗元鲲、张干四位到中南海,落座在毛主席的办公住所春藕斋的客厅。看得出主席刚刚洗了个热水澡,分外精神,又跟往常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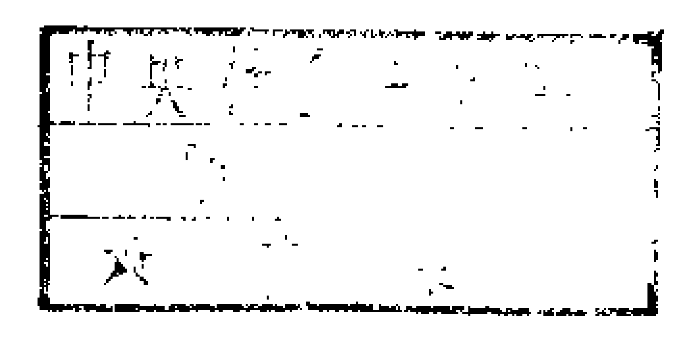
穿了一双皮鞋，潇洒出迎。

叙谈间，在田家英秘书招呼下，主席起身穿上一件轻便的大衣，伸手说："来，我们一起照张像吧！"于是，陪同大家来到厅外石桥边。当时还是薄寒气节，只有耄耋之年的李漱清穿上冬大衣，其余三位都着棉制服。拍照时，主席居中，按例故乡人居左，第一师范教员居右。这两位究竟谁挨着主席站，态度上让与未让，差别只在些微之间。主席发了话："翰溟先生耳朵背，谈话挨我坐，照像就不能说话啦，次仑先生挨着我来吧！"合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位"秀才"拍摄出来的。饮茶畅谈约有半个时辰，田家英秘书就笑呵呵地拿来照片，给四位客人每人一张。李漱清惊呼："一阵工夫就洗出来了，真是不亦快哉！"大家仔细端详照片，荣誉感，离别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这位性格极其复杂的巨人生发出强烈的共感，兴致勃勃地谈起来："我平素照像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里有一对秀才夫妇，往往偷着我拍照。记得 1949 年 4 月底南京解放，当时我住在香山双溪，拿着报纸坐在亭子里看这条消息，那位女秀才灵感来了，抢走这个镜头，我一生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弄得夜里睡不着觉，以至于冒出一首歪诗（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笔者注），章太炎说，虎踞龙盘是古人讲的假话，我说，南京如今是个好地方，我不听洋八股的屁话，几下就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了。"大家看他眉飞色舞，打出手势，又听他笑着继续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人家主动提出来要和我照像。前年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藻真专门找我照像来了，喔唷，偏偏照坏了，他又要求再照一次。第三种情况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合个影，这种情况罕见。"大家听了感到莫大荣幸。

11 月 15 日李漱清动身返湘。毛泽东为他饯行。临别送给他一箱金日成赠主席的朝鲜苹果，一箱青岛运来的对虾。主席

说："苹果是借花献佛；我没有什么东西打发，就打发一点花公子。"主席把对虾称之为"花公子"，是因为在湖南话里"花""虾"谐音。李漱清也风趣地答道："这些花公子不一般呢，是在龙背上的哩！"主席爽朗地笑起来。分手时，李漱清深情地对毛泽东说："人一辈子有些事就一次，生一次，死一次，中国妇女嫁一次——'隆表节孝'挂了两千年——我在北京和主席会面也就这一次啦！告诉主席听，我这一辈子是两句话归总，一是这一辈子做了我所应做的事情，如今老了，时代也不同了；再是这一辈子值当，总算看到了主席的世界。"主席紧紧地攥住老人的手，叮嘱了保重身体，目送轿车远远驶去。

（王先睿）



蒋介石与周恩来同游南岳

1938年11月,巍巍衡山,菊花吐艳,枫叶摇红,尽管大半个中国遭到日寇铁蹄的野蛮蹂躏,但五岳独秀的湖南南岳依然秋色无限,风光如画。

一个全国性的抗战会议即将在这座名山举行。国共两党要人蒋介石、陈诚、白崇禧、汤恩伯、周恩来、叶剑英、边章武等风尘仆仆分别从重庆和武汉赶来南岳,下榻在风景秀丽的磨镜台宾馆。正式开会的前两天,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蒋介石心情舒畅,雅兴忽发,叫来两乘竹轿,邀请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同游祝融峰。

随行侍卫副官奉命来到周恩来的住地,见他正与一位力主抗日的地方名流侃侃而谈,兴味正浓,不忍打断。等了10来分钟,副官深恐蒋介石不耐烦,便故意干咳了两声。

周恩来听到声侧过身子一看,见是蒋介石的随行侍卫副官立在门边,站起身来客气地说:"副官先生,你有何贵干?"

这个副官跟随蒋介石的左右已有7年了,他早就听说共产党里的大人物周恩来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待人谦和,几天的接触,名不虚传,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他连忙脚跟一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周恩来先生,委员长有请!"

周恩来还了个礼道:"请转告委员长先生,我即刻就到。"随即将副官送出门外。

蒋介石忙于政务,平日难得有闲,五岳独秀,到此天下名山,

岂能不作一游？他脱下戎装，换上绅士礼服，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一根文明棍，早在屋里等候，见侍卫副官一人前来，忙问："噢，周恩来先生呢？"

"正在与一个地方名流谈话，即刻就到。"副官报道。

蒋介石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在屋内踱了几步，正待出门，却见周恩来大步跨了进来，说："委员长先生，晚来了一步，恕罪恕罪。"

蒋介石迎了上来，微笑道："周先生，难得今日有闲，天气又好，特邀你去祝融峰观景，不会拒绝吧。"



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张冲在杭州

周恩来望着蒋介石，深沉地说道："多谢委员长，如今遍地烽火，金瓯半缺，生灵涂炭，游兴早已殆尽。不过委员长既有这个雅兴，岂有不陪之礼？"正说着，副官已叫轿夫把油布竹轿抬了进来。周恩来见是坐轿，便委婉地说："委员长先生，坐着轿子观赏风景，不太自由，再说山路陡峭，人苦我乐，心中也不自在，我看还是不坐为好。古人说'安步当车，捷足先登'，我们就来个'安步当轿'吧。"

蒋介石平素喜坐轿，被周恩来一番话顶了回来，心中顿时颇感不快。但想到在共产党人面前，思想要开明进步一点，大度地苦笑了一下："周先生说得对，我等遵循总理教诲，为民众效劳，如今坐轿游览，必为天下人笑矣。"说完向轿夫摆摆手，叫他回去。

周恩来却叫住一个轿夫，拿出4块银元放在他的手里，说：

"老乡,对不起,耽误了你们的时间,我给你们每人一块工钱。"

"不,先生,您又没有坐轿,怎能要你的工钱?"轿夫慌了,连连后退。

"老乡,拿去吧,过日子不容易啊!"

轿夫捧着银元,怔怔地望着周恩来,双目湿润润的。

蒋介石面孔微微发红,他装着没看见,在侍卫副官的陪同下,与周恩来一道向祝融峰攀登。

投龙潭寻古

在抗战会议上,国共双方的气氛比较融洽,而且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具体培训对象是全国各部队的营长以上,师长以下和各地方县长以上,专员兼保安司令以下的干部。

在此之前,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曾代表共产党向蒋介石提出,日寇的战略战术是速战速决,我们则要打持久战,战术以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为主,正规战为辅的一套战胜敌人的方法,因而建议两党联合举办济南干部训练班。蒋介石面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广泛开展游击战克敌制胜的事实,以及国民党军队都不懂游击战术的弱点,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天下午,山风不大,气候暖和,是南岳山区初冬难得的好天气。蒋介石同周恩来离开磨镜台住所,边走边谈,不觉来到水帘洞。这水帘洞又叫"紫盖仙洞",是南岳"四绝"之一,向有"名山洞府"之称,经过历代道家羽扇玄虚地张扬,更是神乎其神。

"南岳真美!祖国的河山真美!"周恩来仰望着瀑布飞流,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是呀,周先生,到下面的投龙潭去看看,那里真有趣呢!"蒋

介石撇开副官，拉着周恩来的手往下走，边走边说："这个投龙潭，原叫湃水坑，传说唐代天宝年间，李隆基派钦差大臣千里迢迢，赶来南岳祭奠，投下金龙玉简，祈求长生不老……"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历代的皇帝都想长生不老，寿如松鹤，但适得其反，他们都是短命的，唐朝从德宗到文宗，6个皇帝平均寿命不到39岁。"

衡山历来石刻多，蒋介石边走边看，从这一块石头跃到那一块石头上，寻寻觅觅，指指点点，兴致极高。这时，他似乎成了一个与世无争、超凡脱俗的闲客。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一块高平如台的大石上，上面刻着两尺见方的4个大字："醉眠观瀑"，下面自题一行小字："次青仿陶"，蒋介石瞧了好一阵子，嘴里喃喃念着"醉眠观瀑"，神情似有不解。

周恩来说："委员长先生，这字的功力不错，遒劲如虬，坚质浩然。"

"对，对，见字度人，看到它，我的脑海里便立刻出现了一个烂醉的狂人，躺在这石头上边刻有'冲退醉石'的题解呢。"

周恩来笑了笑说："委员长，'次青'就是清末湖南平江的李元度嘛，元度字次青，晚年自号醉壶老人。他曾辅佐曾国藩、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官居高位。我们在水帘洞石蹬上看到的'夏雪晴雷'4个字，也是他题的。你读过他的《水帘洞新建雪浪亭记》吧？他在那文章中自称仿效陶渊明，当冲退居士。这冲退居士就是宋代成都人章察，他不愿做官，整日酗酒，高傲狂妄，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去，宋神宗还算开明，没有要他的脑袋，还赐了他'冲退居士'、'冲退醉石'的雅号呢。"

蒋介石一听，连连顿首，对周恩来的博闻强记内心深深叹服。其实，来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就这些知识向颜友民了问个清清楚楚。颜友民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是个

老学究，也是一个"南岳通"。他之所以故作不知，为的是摸摸周恩来的"底"。

哀悼宋哲元

1939年春深时节，蒋介石与周恩来再度来到南岳。这一次，蒋介石是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班主任，周恩来是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国际问题讲师的身分，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当晚，游击干部训练班副班主任陈诚和白崇禧设宴为蒋、周二位洗尘，出席宴会的还有教育长汤恩伯、副教育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陈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梁寒操以及八路军派来的总教官边章武、李涛等。

这天，刚吃过早饭，蒋介石派副官把周恩来请到会客室。周恩来见蒋介石面容悲戚，呆若木雕，便问："委员长先生，什么事？"

蒋介石从沉思中醒来，忙叫周恩来坐下，告诉他刚刚收到来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宋哲元将军在四川绵阳病逝。宋哲元是一位抗日名将，久经沙场，屡败敌寇。因此，他的死，使蒋介石的心情颇觉沉重。另外1938年8月至10月，宋哲元得到他的获准，曾因病在南岳磨镜台宾馆休养两个月，住113号楼。而今在南岳得知宋哲元逝世的噩耗，蒋介石尤其有些触景生情。

对于这位国民党抗战将领的不幸逝世，周恩来也深表哀悼，他向蒋介石提议道："宋将军曾一度息影南岳，虽身患沉疴，仍念念不忘抗日救国，是中华民国的楷模。他在麻姑桥留有遗迹，我们去那儿瞻仰，以寄托哀思吧。"

蒋介石点了点头，向侍卫副官招招手，与周恩来一道离开磨镜台。麻姑桥距磨镜台不过两华里，一条石板曲径，盘旋而上。

此处风景异常幽雅秀丽，林木苍苍，流泉潺潺。据传麻姑是古代一位侍女，随其主魏夫人到南岳黄庭观修道，经常出外采药，曾在天蜂下的小溪洗手，后人便在溪上架设石板桥，并以“麻姑”命名。宋哲元在磨镜台养病时，常来这里登临送目，怀古忧今。

不一会儿，蒋介石与周恩来步行到了麻姑桥，映入他们眼帘的是石壁上一行径大3尺的大字：“不教胡马度衡山。”旁边书刻“卧虎”，字体刚键，气势酣畅，深情禹韵。这是宋哲元将军对日寇疯狂侵略，野蛮的兽行无比愤慨，挥毫留下的遗笔。他自比“卧虎”，寓意卧虎藏林，养精蓄锐，盼望重上战场，逞威有日。

蒋介石默默地看了一阵，继续前行。过了麻姑桥，寺旁有一块巨大的青石，上刻宋哲元手书的“诚、真、正、平”4个大字。这是宋哲元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时教育官兵的“四要”：“诚以修身，真以究理，正以处事，平以待人。”

蒋介石双目闪光，伫立良久，而后边走边对周恩来道：“明轩（宋哲元字）治军有方，这4个字就是军队的灵魂。”

周恩来说：“正因为如此，二十九军将士同仇敌忾，面对武器质量、数量十倍于自己的日寇，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寸土必争，以至在南苑战役中，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双双为民族壮烈殉难。”

两人轻脚缓步来到斗拱飞檐、碧瓦琉璃的“双忠亭”。宋哲元养病期间，除了游览名山古刹，看书练字外，还常缅怀以身殉国的战友，他为佟麟阁、赵登禹在麻姑仙境修建了双忠亭。亭内正中的汉白玉碑文上，镌刻着宋哲元自撰写的碑文：“哲元患难夙共，国事萦怀，闻鼓鼙而思将帅，赋袍泽以念国殇，出师未捷，干城遽殒，人亡国瘁之感，岂能已乎！……”

周恩来朗诵完碑文，与蒋介石毕恭毕敬地向石碑鞠了三鞠躬。他接着道：“宋将军悼念战友，忧国心瘁，心怀椎其沉痛，哀

思常聚胸间，当然这种心情对他的病体是很不利的。”

蒋介石叹道：“大千世界，生生死死，本为常事，只是明轩谢世过早，我失去了一只‘卧虎’，令人痛切心肺。”说毕，吩咐副官摆上笔墨宣纸，为哀悼宋哲元题写挽联。他懂得佛学，便以佛教的角度撰了一联：



蒋介石(左二)在南岳军事会议上

佛日方中，忽痛阴云遮护法；

倭奴未灭，为怜民族失干城。

接着，周恩来也写了一联：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卢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青。

彼此生分歧

1939年春，江西南昌失守，日寇向中国南方的军事要塞长沙逼进，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连南岳山上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们也静坐不住了，再也无心奉佛、学道。在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救亡指示的影响下，从前线奔来的宣传队，在南岳街头演唱、宣传，抗日的歌声响彻山峦，救亡的活动遍及各处。僧道们也不愿意当亡国奴，以上封寺的知客演文，福严寺华严研究社讲师巨赞、暮笳为首，准备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因此他们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颜友民为佛教救国协会向上级申请备案。颜友民信奉佛教，与巨赞等人交往颇深，常有诗词唱和，他本人又有几分爱国思想，于是满口答应。通过他的介绍，巨赞、演文会见了游

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汤恩伯、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军长陈烈。二位将军对巨赞、演文的抗日爱国行动,给予肯定和鼓励,他们表示呈报蒋介石批准。

不料此事久久没有答复,弄得汤恩伯和陈烈十分尴尬。原来,蒋介石对南岳的僧侣并无好感。他第一次来南岳时,读了韩愈老夫子的《谒衡庙遂宿南岳寺题门楼》中的诗句"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很想去观赏一番南岳庙的雄姿,同时蒋介石还很信迷信,他早就听说南岳庙灵光百里,香客络绎不绝,便于第二天上午脱下戎装,换了一件丝质长袍,扮作富商模样,侍卫副官也化了装,一同步入南岳庙,兴趣盎然地欣赏着墙上释迦牟尼、阿难迦叶的优美的壁画。蒋介石看到许多人在岳神面前三跪九叩,虔心供奉,也买了线香纸钱,走上前去,纳头便拜。旁边一位老僧缺乏眼力,错把蒋介石当做求财的商人,迎上前来,先是诉说岳神如何灵验,求财得财,求子得子,接着递上一副竹卦,蒋介石正中心怀,拿那副卦往地上一掷,卦音未落,老僧就眉开眼笑地对他说:"恭贺老爷,您得了个最难求的'上上卦',大福大吉,财通三江,不求自来。"蒋介石一听,顿觉不快,心想:连我求的什么都不知道,就信口雌黄。遂吩咐侍卫副官丢给老僧几个香火钱,飘然离去。此后便对此地的僧侣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颜友民知道蒋介石不同意僧侣抗日的原委后,只好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当即答应去找蒋介石商量。当蒋介石听到周恩来说起南岳的僧尼道人要求成立佛教救国协会,为抗日救国出力时,他一脸不高兴,瓮声瓮气地说:"佛门弟子,抗什么日啰。"

周恩来毫不相让,理直气壮地说:"国将灭亡,如何保身?身将不保,如何学佛?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佛门弟子只有走出禅房道观,投身到抗日救国烽火中去。再说搞民族救亡,团结

的人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嘛。”

在颜友民的引荐下，周恩来及叶剑英接见了巨赞和演文。周恩来不顾诸事繁忙，认真地看完了佛教救国协会的宣言和简章，并鼓励道：“各位大师，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但要讲究策略，去坚定僧众们保卫祖国的决心，另一方面要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教义去感化一些信佛教的日本侵略军，使他们懂得教义上所指出的侵略、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是犯了戒律，犯了天规，促使他们厌战、反战，动摇日军的军心，攻心为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并不亚于冲锋陷阵，手刃顽敌。”

巨赞和演文听了，连连颔首。接着他们谈了佛教救国协会的打算，准备向全国佛、道教界发出倡议，动员佛道教徒立即行动起来，投身战斗，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贡献。周恩来听了，称赞他们这个举动好极了。谈话快要结束时，巨赞拿出一本纪念册，双手递给周恩来，请他题词，以志纪念。周恩来高兴地答应了，他接过纪念册默想片刻，欣然命笔，在纪念册上写了8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周恩来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南岳山上数百名僧侣。不久，巨赞、演文和暮笳在大庙里召开了动员大会，众僧道无一人缺席，连尼姑也参加了。会上，陈烈带领大家在孙中山遗像前敬一尊佛像，烧一炉檀香。接着，巨赞传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的号召，作了题为《僧道走出寺观，投身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讲话，僧、道、尼听了，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叶剑英应邀出席了会议，并根据佛、道教“救苦救难”的传统观念和宗教的特殊原因以及不宜上战场的实际情况，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为“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国民党中央执委梁寒操受蒋介石的委托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佛道教救难协会

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工作，首先将青壮年僧道集中训练，称“战时知识训练班”，讲解佛学道教、政治常识、军事常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和抗日歌曲6门科目。周恩来还把八路军高级参谋薛子正调来南岳任战时知识训练班军事教官，自己也常抽空去训练班讲话。1939年6月，战时知识训练班结业，佛道教救难协会将这些学员组成“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由巨赞、演文分别率领，他们牢记周恩来“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分赴湘潭、长沙、江西、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梁贤之）

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

田家英自 26 岁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18 年。

他热爱毛泽东。

在胡宗南进攻延安，田家英随毛泽东撤离延安时，写过一首表示对于敬爱的领袖尽全力爱戴保护的诗。这首诗田家英曾书赠给好友杨述。此后，在相伴毛泽东的日子里，田家英是一直按照这首诗的要求去做的。

一、田家英热爱毛泽东的诗、文、字

他热爱毛泽东著作。

建国前，他从当时能够找到的毛泽东著作中，摘录大量成段的论述，按编排，整整齐齐地编了五大厚本，并一直带在自己身边。建国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印成内部读物出版，这是第一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他参加并负责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与注释工作，有几篇重要讲话，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都是他根据记录稿整理的。每一卷出版时，田家英都写评介文章或代新华社起草篇目介绍。1964 年，田家英觉得"毛选"的分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分

别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

他热爱毛泽东手迹。

毛泽东爱好书法，平时工作、看书累了，总要提起笔来练一阵子，作为一种休息；有时情绪特别好，也要泼墨挥毫。毛泽东的书法，轻若寒烟，重如崩云，点像苍海，划似银河，气势磅礴，堪称古往今来书法艺术中的珍品，田家英喜欢欣赏书法艺术，收藏了上千件清代学者的墨迹。他常将自己收到的书法价值高的草书送毛泽东欣赏。毛泽东也让田家英代找各种草书字帖。1958年10月16日，毛曾为此致信田："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在田家英的收藏中，最受珍视的是毛泽东的手迹。哪怕是片纸只字，他都从不放弃。他把毛泽东练字或为人题词选剩下的废页零张收集起来，拓裱整齐，收集了一大本。那些拓裱在单页纸上的毛泽东手迹，田家英将其存放在一个蓝色布面的长方形盒子里。对这些毛泽东手迹，田家英视为"国宝"。只有亲朋好友来，方肯拿出观赏。有一次，他到杨述处，看见杨述保存的毛泽东给新华社写的原手迹没有裱，他就要求裱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田家英

他热爱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练字时常常书写自己过去的诗词。田家英收藏的毛泽东手迹也以毛的诗词为多。现存中央档案馆田家英收藏的《毛泽东诗词手稿》，是1964年装裱成册的。共10首：《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会昌》、《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忆秦娥·娄山关》、《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田家英不仅在亲朋好友面前而且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不时发出对毛泽东诗词的赞美之声。一次，田家英在杭州雪夜访史莽，看到史莽正在翻读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木刻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不禁动情地说："当代人中间，学识称得上博大精深的首推两个人，一是毛主席，一是鲁迅。"1963年，毛泽东读了上海市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报道后，于建军节那天题写了《八连颂》，是用铅笔写在十六开白纸上的。毛将这首新作先送给几个熟悉的人传阅。田家英看到后拿给自己上小学和上初中的孩子们读，并要求孩子们背下来。他欣喜地对孩子们说："这是毛主席亲笔手书的一首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诗，是采用中国古代三字经的形式和民族风格写成的，是一种新的尝试。"

二、田家英对毛泽东诗词的贡献

1958年和1968年，田家英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和《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两个诗词选本。他不仅对搜集、整理毛泽东诗词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毛泽东诗词写作提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诗刊》1957年创刊号上，由于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出现了排队买《诗刊》的热烈场面。1958年1月，《蝶恋花·答李淑一》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上公开发表。在田家英参加下，经过对

以上19首诗词的编辑,文物出版社于1958年9月出版了刻印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12月,毛泽东在广州看到这个刊本,在书眉上写了说明和十二条批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送瘟神》七律二首。至此,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已有21首。

1961年初,《人民文学》编辑部周明等在邓拓那里看到邓拓保存的毛泽东1929年至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词六首。他们抄录下来带回编辑部。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读后,击节称赞,很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遂呈送毛泽东审阅,请示并要求准予发表。这年,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田家英在毛泽东布置与安排下率一个调查组于1月下旬去了浙江。4月下旬,在杭州,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浙江调查的情况,毛泽东要田家英将《人民文学》编辑送来的他的词六首填上词牌,并查找"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田家英很快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在田家英查出的"共工怒触不周山"典故的基础,为"不周山下红旗乱"句作了一条长达400多字的注。《词六首》和作者原注在《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上发表。为便于读者理解《词六首》,《人民文学》还配发了约请郭沫若写的《喜读毛泽东的〈词六首〉》一文。郭沫若在高度评价《词六首》的同时,指出:"主席这一注的重要性不亚于词的重要性。""鲁迅的《补天》作于1922年11月,我的《女神之再生》作于1920年11月,我们的认识和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还大有距离,故我们当时还不能体会到共工神话中人类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潜在意义,经主席这一点出,就好像在中国的神话世界中高擎起一只火炬。"读了郭沫若对作者原注的评价,使人很自然地想到:田家英为作者原注的写成所做的查找资料的贡献是不应忽略的。

1963年12月,文物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

《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其中首次公开发表的有10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在出版之前,先出了个征求意见本。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了一个有20余人参加的会议,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文艺方面的领导人都出席了。毛泽东用大粗铅笔写了张条子:"请同志们一议。"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诗是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诗人臧克家托田家英代转了23条意见,其中有13处为毛泽东所采纳。在编辑过程中,田家英还经常同诗家交换意见,共同探讨毛泽东诗词的用典及含义。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告诉臧克家:毛泽东同志有首词的起头,是有意仿照辛稼轩(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在唐诗中,毛泽东最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在宋词中,毛泽东最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词,《稼轩长短句》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田家英的话对帮助理解毛泽东诗词有着重要意义。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田家英就注意收集毛泽东诗词。这次新发表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由于田家英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的。1949年春天,党中央、毛泽东由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4月23日晚上,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总统府",结束了蒋介石22年的统治。消息传来,毛泽东感到衷心的喜悦,焕发了浓郁的诗兴,当即吟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一首。田家英抄录收集了这首诗。

这次编辑毛泽东诗词,田家英把这首诗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忘了还有这一首。于是,毛泽东根据田家英提供的抄本,经过核对,随即书写了这首诗。中央档案馆张景堂同志说,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诗词手稿,有田家英保存的,有从江青处交来

的，每首诗词都有重件，有的诗词毛泽东多次书写，唯独《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首只有田家英的一件。这次新发表的《卜算子·咏梅》词，毛泽东作于 1961 年 11 月至 12 月之间。在这之前，毛泽东不仅读过陆游的《咏梅》词，也读过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关于写梅的诗词。11 月 6 日上午 6 时至 8 时 30 分，毛泽东接连三次写信给田家英，要田帮助查找一首咏梅诗。

其一：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

毛泽东

其二：田家英同志：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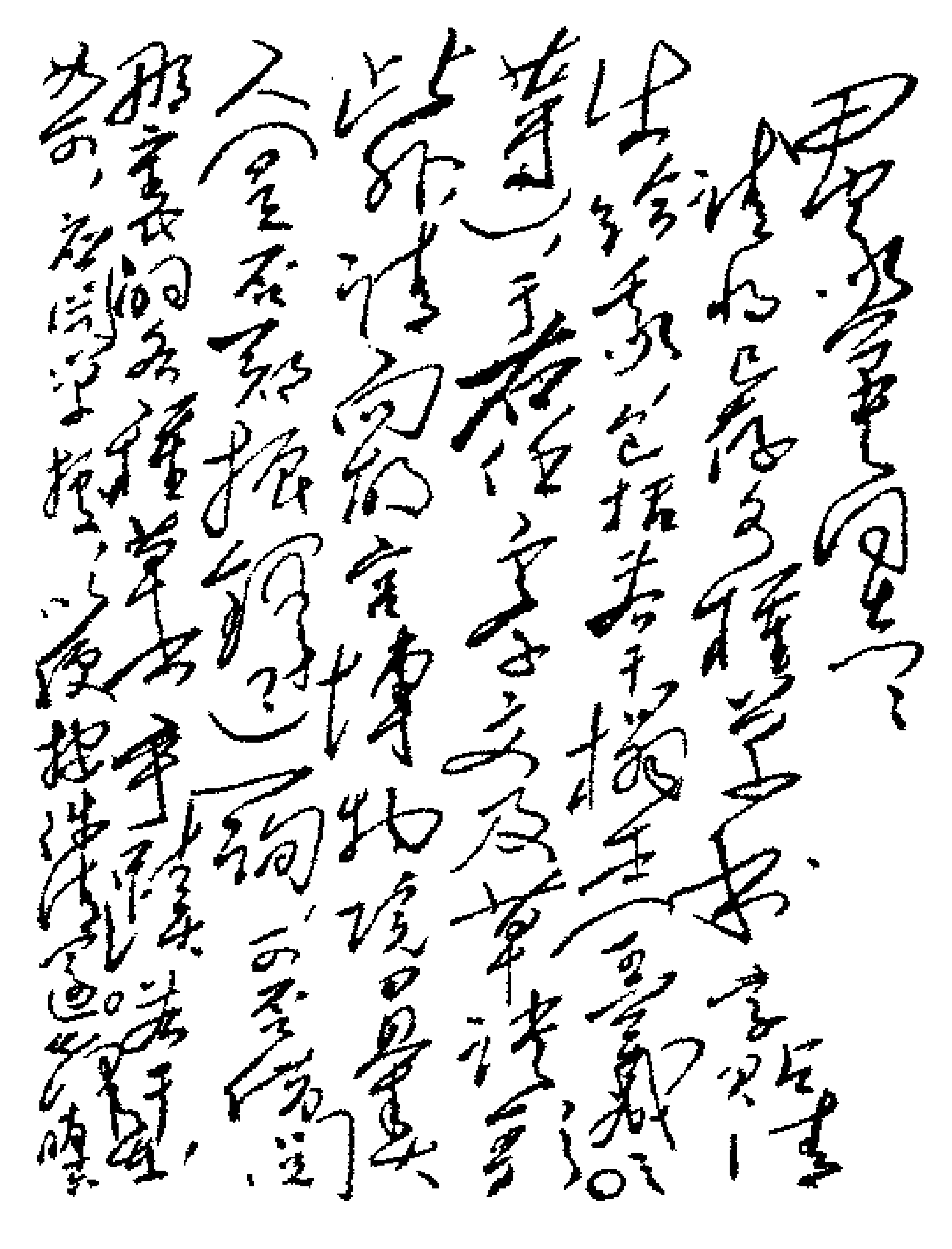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其三：家英同志：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

毛泽东要田家英查找的咏梅的那首七言律诗是明代诗人高启作的《梅花九首》的第一首：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信

诗中"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两句，以高士和美人形容梅花的高雅和美丽，是万口流传的咏梅名句。对于这首诗的作者，毛为什么首先想到林逋？第一，林逋是宋代著名诗人，终身布衣、淡于荣利，在杭州西湖孤山隐居，不娶妻，无子女，

屋畔遍种梅花，在湖边饲养白鹤，人称“梅妻鹤子”。无怪“雪满山中高士卧”一句，使毛泽东想到林逋。第二，林逋是咏梅高手，现存咏梅诗有六首，词一首。其中《山园上梅》诗被历代诗家誉为咏梅千古绝唱。这首诗毛泽东不仅读过，且十分喜欢。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就有这首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的墨迹。第三，半年前毛泽东在杭州曾让田家英借阅林逋诗集。田向在杭州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好友史莽处寻书，借到了涵芬楼影印、双鉴楼藏的明抄本《林和靖先生诗集》和清代吴调元校刊的《和靖诗集》。毛对林逋的诗和为人是熟悉的。第四，高启诗《梅花九首》深受林逋的影响。其第一首“寒依疏影萧萧竹”是从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脱胎而来的。第三首“放鹤人归雪满舟”，则是以梅比人，直接写林逋的。毛泽东查林逋诗集发现没有这首诗，他又想起“是否清人高士奇的”。高士奇与高启，有一个字相同，两个字音同。这可能是毛泽东由此而造成的记忆错误。田家英接读毛泽东几个小时之内连续三封来信后，于当天就帮助毛泽东查到了这首诗的全文、作者及作者所处的朝代。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有篇墨迹正是1961年11月6日写高启那首诗的，前面还写了“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段话。可以肯定，毛泽东读到了高启的诗集特别是其中的《梅花九首》。不久，毛泽东写出《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首词主要是从反面受到了陆游咏梅词的影响，诚如作者在小序中所说：“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但是，他也受到其他咏梅诗词，特别是林逋、高启咏梅诗词的影响。如“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则直接受到高启梅花诗第五首中“春风未动枝先觉”的影响。

毛泽东《咏梅》词写出后，先在党内传阅。其用意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经得起困难的考验，首先成为毫不动摇、不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国人民做出好榜样。田家英同其他党员一样，从《咏梅》词中受到了巨大鼓舞。另一方面，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咏梅》词的创作搜集资料，提供历史素材，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毛泽东创作的成功。《诗刊》1976 年 1 月号发表毛泽东词两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同年，《毛泽东诗词》再版时，加了这两首，成 39 首。这是毛泽东生前公开发表的 39 首诗词。毛泽东诗词还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多种原因，生前没有发表过。在这些诗词中，田家英保存的有两首：

其一《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上看，桃花岭上闻。
冷来寻扇子，热去唱东风；
韬光庵畔树，一片是苍鹰。

其二《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过钱塘。

田家英保存的这两首毛泽东诗的手稿，与林克回忆的有所不同，林笔录如下：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种不同，记录了毛泽东对自己这两首诗认真修改的过程。它为后人编辑、研究毛泽东的这些诗提供了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三、毛泽东、田家英对古诗词的共同爱好与交流

中国向来有“诗国”之称，诗词艺术传统深厚，源远流长，数千年间，作者如云，名家辈出。毛泽东和田家英都酷爱中国古代诗词。毛泽东对《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读得最多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他能全文背诵的诗词不计其数。田家英也读过很多古诗词，且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许多古诗词，工作疲倦时，他常以背诵古诗词为娱乐，既换脑筋，又陶冶情操。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他凭记忆写下来附上，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最后，他还注明："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这首诗是清代人严遂成所作。毛泽东默写的与原诗对照改了两个字：将"且"字改作"犹"字，将"畔"字改作"下"字，但却与袁枚的《随园诗话》所引的《三垂冈》诗一字不差。有人认为有可能毛泽东本来就是从《随园诗话》中读到并记下这首诗的。无论怎样，毛泽东对古诗词熟读的功夫，由此可见一斑。无独有偶，田家英对古诗词的熟悉也非一般。他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很快就查出了《三垂冈》诗的作者及所处的朝代。

如前所述，毛泽东凭记忆能默写出"雪满山中高士卧"咏梅的前四句。毛让田查找全诗、诗的作者及朝代，田当天就查到了。

毛泽东在杭州，要看浙江古人的诗集，田家英帮助借过来林逋的诗文集。毛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史莽，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百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毛泽东在成都，在田家英协助下，挑选编印了《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明朝诗人有关四川的诗》两册。毛泽东为这两册诗词写了标题和批语。其中有一条批语是："送田家英同志，用后退毛。"这些诗词曾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参加成都会议的人员。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长达600多字。毛泽东非常喜爱这首长诗，曾写过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同等的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寥寥数语，道出他对诗人情怀和意境的深刻见解。毛泽东多次手书《琵琶行》，几乎每一次都是龙飞凤舞，一气呵成。田家英同毛泽东一样喜爱《琵琶行》，但他更喜欢毛

泽东的字。在他看来《琵琶行》与毛泽东的书法相结合，诗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堪称艺术瑰宝。

有一次，田家英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谈论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收藏，王说："可惜没有收藏一幅毛主席的墨迹。"田家英大有同感地说："堂堂国家最高级博物院，没有毛主席墨迹不应该。"田家英选择了自己珍藏的毛泽东手书《琵琶行》送给王冶秋，存于故宫博物院。"文革"后，根据中央有关精神，故宫将这件毛泽东墨宝移交中央档案馆。1983 年中央档案馆编辑了《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其中毛泽东手书《琵琶行》就是根据这一件刊印的。

田家英对历代诗词的品味和鉴赏能力很高。无疑，他受到毛泽东的巨大影响。1949 年 5 月 10 日，柳亚子在日记中写道："田家英来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与?"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在他们对历代诗词、书法欣赏的交流中，田家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毛泽东。田家英常把自己喜欢的对联、中堂挂在毛泽东卧室供其品味。60 年代初，田家英从杭州购到一幅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写的行草体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字体笔酣气畅，磊落不羁。田认为邓石如以篆隶著名，其行草书能写得这么好，实不多见。他将这副对联送到毛泽东处，毛果真也很喜欢，挂在墙上欣赏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现代中国的诗坛上，郭沫若称颂毛泽东"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泽东诗词家传户诵，有口皆碑，无论是思想的崇高、气魄的雄伟还是语言的光彩都是前无古人的。田家英在古诗词上的成就不可能与毛泽东相比。田没有留下一本旧体诗词选，但也写过一些很有影响的旧体诗。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田常常为国家的境遇和人民的困难忧心忡忡，以十分内疚的心情写过

这样一首诗：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这首诗不仅显示了作者对旧体诗的深厚功底，而且饱含着作者的心声、志向和追求。毛泽东曾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介，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还认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的诗歌。"田家英曾写过信天游体民歌长诗。他在晋绥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时，搜集真实素材，写下了长篇民歌体新诗《不吞儿》。该诗通篇倾注着他和人民群众共患难、同命运的阶级感情，体现着他对土改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可以说田家英在诗创作上做过十分有益的尝试。

四、田家英没有辜负毛泽东要他读《贾谊传》

毛泽东和田家英不仅对中国古诗词有共同的爱好，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也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博览中国古籍，从传统的知识与智慧的海洋中获取精神食粮，都喜欢以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为榜样，鉴古察今，致力于治国安邦的伟大事业。

50年代，田家英常常在晚上被毛泽东叫去，交办完工作之后，就说古论今地谈起来，从历史、文学到典故、人物，从正传到野史轶闻，每次都有新的话题。一次，谈得畅快，毛泽东对田家英戏言："将来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好不好？"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使

他们的关系融洽无拘。

田家英敬佩毛泽东的学识博大精深，同样，毛泽东也很器重田家英的才华。早在1942年，田家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侯方域说起》的文章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毛还特地叫田去谈了一次话，说田的文章写得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有气魄，有锋芒。当年田家英才20岁。1948年10月，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12月，毛还要田担任毛岸英的语文教员。后来，毛又让田家英担任毛岸青的语文、历史教员。1956年，田家英代毛泽东起草"八大"开幕词，写得十分出色，尤其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毛泽东非常满意。毛致开幕词后，在休息室里大家都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毛泽东器重田家英，但又十分重视引导这位"读书人"、"年轻的秀才"。这可以从毛泽东要田家英读班固《贾谊传》的信中看出一二。这封信是1958年4月27日写的，全文如下：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鲁迅曾高度赞扬过贾谊的《治安策》是"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毛泽东与鲁迅的评价可谓异口同声。毛泽

东赞扬贾谊，在其早年诗句"年少峥嵘屈贾才"中已见端倪。后来在评价初唐诗人王勃时曾说："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引导他的年轻的秘书像贾谊那样文必切于时用，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像贾谊那样做一个有骨气、有创见的人。

田家英敬佩毛泽东，但又敢于犯颜直谏，从不迷信盲从。对毛泽东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田认为是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犯了"左"的错误。在庐山会议上，田直抒胸臆，险些被划到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面去。60年代初，田对毛泽东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到严重的地步，一直持保留态度；而毛对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要罪状。

"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以此为座右铭。他没有对毛泽东"左"的错误采取迎奉拍马的态度，他没有向包围着毛泽东并受到毛泽东重用的陈伯达、江青这伙丑类们低头，而是尽其全力直谏、抗争，直到1966年5月23日含冤离世。

惊悉田家英去世后，他的好友曾彦修作诗一首：侦骑汹汹威

耗传，锦城风雨忽凄然。贾生地下迎新客，世上如今革命难？

田家英确实像贾谊。他没有辜负毛泽东让他读《贾谊传》。

（曾 自 曾应旺）

周恩来的另一个世界

作者是中共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她与老一辈革命家有较多往来，本文记叙了周恩来总理生活中鲜为人知以至不为人知的一面。

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国际事务活动家，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世界地图的第一种色块上。在我和总理的多次接触中，觉得他是一个幽默随和、兴趣广泛、人情味极浓的人，他没有什么领导人的"架式"和"气派"。似乎他一走出会场、一离开正式场合，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老大哥。他跟谁都谈得来，无论工农士商，无论大人小孩。他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自己业余爱好和嗜好，而且非常精通。

他的交谊舞艺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对于文艺，总理不仅爱好，还是行家。据我所知，中央在北京或外地召集会议时，以及在庐山会议期间，只要不是国事缠身，他一定会参加晚上的文娱活动。

总理对江西的几个剧团都很熟悉。他曾为江西省歌舞团指挥排练《洪湖水，浪打浪》；看了江西省京剧团创作的革命现代京戏《大渡河》，并为这个戏的修改作了具体设计：要掌握好"过彝区"、"安顺场"和"夺桥"三个环节，要加重分量，改成一出大戏，等等。赣剧是具有江西地方特色的古朴高雅的剧种，更受到总

理的青睐。他喜欢它的音乐，喜欢它的表演，喜欢它的演员，给予了“美、秀、娇、甜”的高度的评价，并欣然为省赣剧团题写了团名。此外，他还在北京接见过江西省话剧团的演员，给他们创作的《八一风暴》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对每一剧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并且总是循循善诱地告诉演员们，如何提高上演节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是文艺的出色的领导者，而且把这种领导融化在亲切平和的交谈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所以每次陪总理看戏或看望剧团，都有许多“分外”的收获。



周 恩 来

懂音乐、懂舞蹈、懂戏剧的周总理，还喜欢跳交谊舞，而且跳得极好。舞姿潇洒自然，优雅大方，你可以看到一种英美之风，随着他的舞步飘逸开来。即使一个舞池里几十对舞伴同时起舞，你一眼就可以把他找到。他那种特殊的魅力，是内在素质的外延。

那时，佳娟、余叔和我经常一起参加舞会，总理知道我们跳舞，我们也很喜欢跟他跳。因为和他跳舞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你的双脚会感到十分自由，无论节拍的徐疾，无论步法的宽窄，都像是走在广阔的绿草地上一样的悠然自得。你的身体似乎轻若鸿毛，不管你

朝什么方向转动，也不管角度多大，都飘然如风，身随意飞。随着轻巧的舞步，悠扬的乐曲，使你进入一个美妙的境地，如置身在四月的花径，八月的桂丛，听鸟语，闻花香，心旷神怡。乐队要是奏起快三步的乐曲——这是总理最喜欢的——他跳得更为精彩。如果你是在一旁欣赏，那就会看到一个风柱绕舞池而疾走。如果你跟他一起跳，就像是随着那“抟扶摇而直上”的鹏鸟，跃向无尽的苍穹；又像踩着他的神奇的冲浪板，滑过一个又一个浪尖。在似乎有些眩晕、甚至有些失重感的状态下，不觉步入一种超尘脱俗、忘物无我的愉悦之中。

我无法理解，从中学时代开始就为中国革命夙兴夜寐的总理，怎么会有时间去掌握那么广泛而丰富的知识，除了天赋的才干之外，还能作什么解释呢？他决不会浪费时间去刻意地学习跳舞的，他的交谊舞之所以有此精湛的造诣，是因为他拥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殊的艺术素质。

很少有人具有像他那样的领导魅力和领导艺术

总理的艺术天才，还在于把工作也艺术化了。他的领导魅力、领导艺术，连敌人也不能不钦佩。即使最棘手的事，到了他手里，也会办得十分得体、十分圆满、十分出色。这常使我想起一些陷入窘境的同志，他们把易办的事办难了，把难办的事办砸了，更不用说把好事办成坏事了。究其原因，自然各有不同，但缺乏平等待人的态度，以职位压人，靠命令行事，缺乏领导艺术，则是共同的弊病。总理是党的副主席，政府的首脑，他的领导地位和权力，除了毛主席之外，谁也不能相比。但是从他和尚奎的生活接触到工作接触中，我感觉到他的喜悦和忧虑，唯独感觉不到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对人总是那么诚挚、尊重，那么有商量，可是却没有一件事情没办成。这里我只说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

事。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家庭最操心的莫过于粮食。当时，全国有好些省灾情非常严重，饥荒到处横行，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到1960年，这种悲剧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而且还有继续发展之势。作为全国几万人的总当家的周总理，思想是如何沉重，心情是如何焦急，那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听说总理和主席一样，几个月不吃肉，饭吃得很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年四五月间，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就感到总理心事重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忧郁之色。星期天休息，我们打算去看看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的几位书记个别地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出去。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或者是增产而减收，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去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尚奎说。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总理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10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

尚奎的声音哽咽了。农民吃不饱饭，他感到不安，有愧，不

管这场饥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管谁该负主要责任。

“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总理很难过地说，“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尚奎说，“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

“你们干部定量多少？”总理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24斤。”尚奎说，“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他的眼眶又潮湿了。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总理说，“都是好同志。”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尚奎继续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全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总理高兴地笑了，说：“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接着又扶着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了！”他知道尚奎的肩头压力，体贴尚奎的困难。

临走前，总理又说，尚奎谈的情况很有价值，对中央今后研究有关问题很有帮助。

作为尚奎的秘书，谈话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场。我认真地听着，重要处还作了记录。我想，总理日理万机，紧张繁忙，像这类重大问题，召开各有关省委书记会议进行布置，或者以中央或国

务院的名义,下一道文件,谁敢不遵从?总理却要花那么多时间,一个一个省地谈。为什么呢?这是对地方领导人的尊重;同时,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工作气氛,使人敢于说话和便于说话,从而才能得到真实情况,把工作做得更完美,更符合客观实际。这需要道德力量,需要领导艺术,而总理正是兼而有之。

一次喝了那么多酒,兴犹未尽,然后还要去参加晚会

我们经常从新闻媒介中看到总理宴请国外来宾并举杯致意的报道。大家闲谈起来,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总理左一杯右一杯的,难道不会醉吗?后来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说:“唉,你们不懂。服务员给外宾倒的是酒,给总理倒的是水呀!”我将信将疑,因为这可以解释总理为什么不会醉,但我认为,服务员拿的应该是同一个酒瓶倒酒的。

后来我渐渐进入交际场合,的确看到国内同志闹酒的时候,常玩这类把戏,但很容易被发现。至于和外宾间的相互敬酒,是一种通常的礼节,一种良好的祝愿,说“干杯”并不需真干,可以喝一点,也可以像中国传统那样“沾唇为意”,不会喝醉的。而且也不允许醉,任何因酒多而失态,都是违反外事纪律的行为,是要受到批评以至处分的。那么总理到底能不能喝酒呢?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莫衷一是。直到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我才弄明白了。

一天下午,尚奎一开会回来便告诉我:“刚才李富春同志说,离开江西苏区之后,就没有吃过老表的饭了。他说,要到我们家吃一餐有江西风味的饭菜。”

“请他来就是了。”我说,“他想吃什么,我就准备什么,那还

不简单。”

“哎，不只他一个人，他还邀了十几位同志哩。”尚奎说，“周总理、小平同志、柯庆施、李井泉，还有华东局的几位书记：曾希圣、江华、江渭清……他们都会来。”

听说这么多中央的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要来，我就不敢夸口了。钱倒花不了多少，可是谋齐那些土特产得花时间呀。我默算了一下，便说：“可以，不过要等我准备好了，再去请他们。”

经过两天的准备，第三天傍晚，开完会后他们都陆续来了，可就是不见总理。于是大家一边品尝我给他们沏的云雾茶，一边说笑。等了好久，总理还没来。我有些着急，忙摇电话去问，原来总理被毛主席找去了。又等了一会儿，一位同志说：“我看我们先吃吧！总理到了主席那里，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来。”于是我立刻摆上酒菜，让大家边吃边等。

这顿饭准备得很有特色，连我自己都很满意。总体上是以尚奎家乡兴国的“四星望月”为主。这个颇为雅致的名字还是主席取的哩。据说在中华苏维埃时期，毛主席到兴国搞调查，有天突然到一位农民家吃饭。这个老表没有任何准备，一时也买不到东西，便把剩下的一点肉用米粉蒸了，又炒了青菜、辣椒等四样蔬菜。老表很过意不去地说：“毛主席，对不起你了，实在没有菜。”毛主席很高兴地指着中间一架小蒸笼和周围的四个碟子说：“好得很嘛，同志，你看，这是‘四星望月’。”所以“四星望月”，主要的就是粉蒸菜，是兴国老传统、老手艺。我准备的就有粉蒸肉、粉蒸鸡、粉蒸鱼、粉蒸豆腐泡等好几样。至于“星星”，那就多了几颗了，把江西主要几种有特色的菜都拿了出来，三杯鸡、鳙鱼头、炒鳝丝以及庐山的名产“三石”：石鸡、石鱼、石耳等等。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说是几十年没尝到这些具有地道的江西风味的菜肴了。

从兴国菜谈到兴国,从兴国谈到中央苏区。这些领导人很多都在中央苏区工作过。小平同志担任过瑞金、会昌等地的中心县委书记;富春是江西省委书记、尚奎是省委宣传部长;江华曾是井冈山前委秘书、后来和红四军一道到达赣南……所以说说笑笑,话题很多,直到九点多钟才尽兴而散。

可是总理还没有来。

"你就在家里等着。"尚奎对我说,"总理一向重诺守信,说了一定会来的,总是什么事情耽搁了。"说着,便陪小平、富春等同志出去了。

果然,没过半小时,总理就兴致勃勃地来了。

"水静,我迟到了。"总理笑嘻嘻地说。

"真对不起,总理,他们等你很久了。"我说,"听说毛主席找你,知道一下来不了,就先吃了起来。"

"好嘛,不用等。"他随和地说,"我答应了就会来的。"

"现在他们吃完都走了。"我继续表示自己的歉意,"尚奎也陪他们去了。"

"不要紧的。"他一边在桌边坐下,一边又问道:"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总理,我给你留了菜。"我说。

"那我就吃吧。"他说。

我立即收拾好桌子,摆上饭菜。

"有茅台吗,水静?"他问道。

"有。"我说着,便拿来一瓶茅台。

"还有吗?"他又问,"有就再拿一瓶来。"

我一边应着,一边把另一瓶茅台放到桌上,双眼直看着总理,不知他要两瓶茅台是什么意思。

"好了,水静。"他指指桌边说道,"来,你也吃一点。"

我说:"总理,我刚吃过了。"



周 恩 来

"吃过了就随便吃一点嘛。"总理说。

我想，请客人吃饭，哪有让客人独酌独饮的道理？尚奎不在家，作为女主人，我理应陪的。于是，我着人取来餐具，也坐了下来。

总理这才将一瓶茅台推到我的面前，说："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俩个人一人一瓶，怎么样？"

我急忙说："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喝吧，喝吧。"他说，"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总理很喜欢粉蒸菜，他说，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而以兴国的最具特色。于是他斟满一杯酒喝干了。接着我回敬了一杯，感谢总理的光临。我一干，总理也痛快地干了。

“这次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过一会儿，总理又举杯说，“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稍稍一仰脖便干了。

我没有理由不喝，而且也不能不回敬。

他对我说：他代表小超大姐敬我一杯。我当时一愣，呵，小超是总理对邓大姐的爱称。我一高兴，也代表尚奎敬他一杯……

“还有酒吗？”总理似乎酒兴正酣，“你还能喝吗？”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我说，“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总理说，“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什么酒量呀，总理？”我不解地问。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总理笑道，“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同志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我说，“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总理于是哈哈一笑说，“今天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是不多见的。”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我解释说，“刚才是总理让我喝，才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没有醉，没有醉，我看得出来。”总理说，“舞会还没有散，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吧。”我摸摸额头说，“我有点头昏，休息一下再到。”

他笑了笑说：“好吧，我就先走了。”

我送他到门口，看他步子非常稳健，喝下这么多酒，一点事都没有。似乎再喝个半斤八两的，他也不在乎。如此海量，着实令人吃惊。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不但能喝酒，而且很懂酒，对中国的酒文化，颇有研究。江西名产四特酒，就是在总理品尝后作了“清、香、醇、纯”高度评价之后，才蜚声海内的。人们都知道贵州茅台是国宴用酒，但很少有人知道国宴上茅台是1950年国庆节前总理亲自决定的。茅台虽然早已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国内却不过尔尔，50年代，每瓶不过2元多，和汾酒、竹叶青等属同一等级。1950年国庆节时，整个北京城没有一瓶茅台，可见它的知名度有限。而总理却深知，茅台是国中第一佳酿，此后才名声大振，身价百倍。

“人怕出名猪怕壮”，酒出名了也一样，需要的多了，供不应求，竞争的也就多了，盯着那“酒皇”宝座的大有人在。全国第二次评酒时，五粮液跃居第一，茅台未能卫冕。总理刚从国外回来，便调来样品，亲自品尝，并肯定这是新酒，而不是老窖，不能代表茅台参赛。他还指出，茅台之美，不仅在于它的工艺独特，气候、水质更是不可替代的条件。所以他多次指示要保护好赤水河一带的自然环境，上游不得建设工厂，以确保水质的自然成分不受污染。今天茅台酒的地位以及它能继续保持良好的质量，是和总理的知识、远见和关切分不开的。

能喝酒，酒量再大，如果对祖国的传统酒文化一无了解，充其量不过是个酒徒。总理喝酒，才是真正的知酒，懂酒，才可谓之为善饮。

他赠给魔术师一只手表，同时留给江西一个魔术团

江西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并不轻松，但和重灾区相比，我们的粮食状况的确要好些，所以被之为"富农"。因为"病"势较轻，恢复起来也较快，到1961年秋，中央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江西已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经济已开始回升。而且江西省委具有全局观念，在自己最困难的三年里，每年仍调出10多亿斤粮食支援国家。作为中国当家人的总理，对这点是非常满意的，加之这次庐山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进行得很顺利，当然令人高兴。所以全国形势趋向好转、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良好的心境，乃是这次总理庐山豪饮、和随后来南昌痛饮的根本原因。会议结束之后，9月17日，我和尚奎同总理从庐山出发，经观音桥、海会寺返回南昌。一路上边走边看，直到傍晚才下榻江西宾馆。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和华东局的几位书记，也住在这里。当晚，省委举行便宴，招待总理、总长和其他领导人。

尽管经过一天的跋涉，没有很好休息，总理的精神仍然极好，兴致极高。他说："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说着，举起酒杯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喝几杯。"

他率先干了杯，继而便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起来助兴。尚奎、刘俊秀也代表江西省委相继敬酒。他都痛快地一一干了。接着又为江西粮食丰收、晚稻增产而频频举杯。这样一杯又一杯，的确喝了不少。

行前受邓大姐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

治平有些慌了。“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我的手，悄悄说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这里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吗？”我说。

“要劝他少喝一点就好。”她着急地说，“可又怎么好劝呢？”

“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我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很不踏实，因为他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总理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动都没有失控现象。而且饭后还在罗瑞卿、柯庆施、尚奎和其他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当时，担任这次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这个团在南昌演出多场，很受群众欢迎。有关部门向尚奎反映，江西没有魔术表演团体，要从头培养，花钱不说，还得很长时间。如果通过组织出面，把这个团留下来，那就太好了。尚奎早就同意这个想法，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而今晚这个机会再好没有。柯庆施是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总理又在。所以看演出时，尚奎便当着总理的面，向柯庆施提出了这个要求。

“把这个团送给江西，就填补了我们的缺门。”尚奎说，“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魔术团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

见柯庆施没有吭声，总理便主动帮忙说话，“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上海应该支援江西嘛！大方一点，划给他们吧。”

柯庆施只是笑笑，仍没有表态。

总理和尚奎两一唱一和，边开玩笑边说服，最后柯庆施才笑

着说："待会儿我和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演出效果不错，总理几乎为每一个节目鼓掌。当"表箱遁表"节目开始，魔术师一出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魔术师伸出右手，向观众深深一躬。

"我这块表借给你！"总理立即站了起来，满面春风地扬起了自己的手表。

卫士将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表，向总理鞠躬致谢，台下掌声雷动。

当时，这是个很精彩的节目，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总理也很喜欢。表演结束，魔术师将手表还给总理的时候，总理的右手朝前一挥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又是热烈响亮的掌声，此起彼伏。

"糟了，糟了，总理真的有些醉了。"郝治平又轻声对我说，"一块表倒不紧，只是总理还到外地去，目前不回北京，手上没有表怎么行呢？"

"没事！总理清醒得很，不过很兴奋就是了。"我说，"表的事好办，难得的是总理这么高兴。"

晚会终了，总理便去看望演员，和他们亲切地交谈。询问他们来了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等。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又问。

"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说。

"是的，江西是好。"总理说道，"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大家静静地听着总理说话，显得非常激动。他们也谈到江西的观众非常热情，江西有关部门对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也

十分周到。

“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总理问道。

“好!”

这个团随即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江西,又并入了南昌市的一个小杂技团,成为“江西省魔术杂技团”,后来又改称“江西省杂技团”,在江西生根、开花、结果了。他们不忘总理的教诲,勤学苦练,技术精湛,演艺认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1986年开始,他们先后到非洲、南亚、西欧的十几个国家访问演出,而且非常成功。每当看到他们的节目获奖,或者从国外载誉归来,我的眼前就会出现总理亲切的身影,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

“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到他家里作客,才知道他常吃剩菜

1964年初夏,尚奎到北京打肝蛭虫的一个多月里,总理两次请尚奎和我到他家吃饭。

我和尚奎是取道上海去北京的。在上海,恰好遇到了罗瑞卿夫妇,罗总长热情地邀请我们搭乘他的“伊尔——18”专机进京,我们当然从命了。一到南苑机场,就看到了受总理之托来接罗总长的邓颖超大姐。我们很高兴地问候了邓大姐,邓大姐也询问了尚奎的身体,并且记下了我们在京的住址。

过了几天,尚奎刚住进北京友谊医院,我就接到总理家中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和邓大姐明晚请我到他家吃饭,要我届时在住处等候。

次日傍晚,我便乘邓大姐派来的车,到达总理在钓鱼台的临时寓所。这时,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已经在座。

邓大姐笑嘻嘻地接待了我,又问了一下尚奎的治疗情况,然

后便陪我们聊起天来。她告诉我们，因为中南海的西华厅正在修缮，所以暂时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待房子一修好就搬回去。

"总理听说你们到了北京，就让我安排一下，请你们吃餐便饭。"邓大姐一边招呼我们喝茶，一边说道。

我们对总理和大姐的邀请，表示了谢意。

"你们就别客气了，实际上没有什么好东西请你们的。"邓大姐笑道，"昨天宋庆龄同志从上海托人捎来几条鲥鱼，挺新鲜的。恩来说，'鲥鱼就是吃个鲜嘛，快把陈郁和水静找来'……"

我说，宋庆龄同志是送给总理和大姐吃的，没想到被我们赶上了，我们的口福真不错呀！

"在北京吃新鲜鲥鱼的确不容易。"大姐说，"可是在你们南方，特别是长江边上，那就不稀罕了。"

我们边聊边等，过了很久，仍不见总理回来。邓大姐说："上午恩来还在家，下午是毛主席把他找去了。"一直到了八点多钟，邓大姐说："算了，不用等了，我们先吃吧。"

几道菜之后，鲥鱼也上桌了。我忽然想到总理，便对邓大姐说："大姐，给总理留了菜吗？"

"不用留。"邓大姐笑道，"我们吃剩的，厨师会给他留下。"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不理解，怎么能让总理吃我们的剩菜？

邓大姐可能发现了我的疑问，便解释说："水静，你不知道，恩来有一副天生的好肠胃。他经常不能按时吃饭，也不要我给他留菜，他说：'剩下的菜热一热就行了'。"

这哪里是他肠胃好，这是他的品德高！做的是领袖的工作，却又像老百姓一样勤俭过日子。

快到10点钟，我们吃完很久了，总理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他匆匆吃过饭，就到客厅陪我们说话。他和陈郁同志谈了几句

之后，就对我说，今天有事耽误了，没有和我一起喝酒，说下一回一定陪我喝。又问我："你是安徽人，有没有到过黄山?"我说："一直没有机会去。"他便开玩笑说："没有到过黄山呐，那你算不得是安徽人。"直到我们告辞时，总理和大姐还一再要我代他们向尚奎问好。

尚奎出院后，也住进北京饭店。没多久，我便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是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两家邀请尚奎和我吃饭。我们如约来到总理住处，总理、邓大姐、陈老总和张茜同志都在。在吃饭前，张茜提议，我们一起到钓鱼台园中散步，回来再吃饭。邓大姐和张茜还边走边向我介绍这里的建筑特点和园林布局。总理、陈老总则和尚奎谈江西情况，偶尔还扭转头来和我开几句玩笑。

吃饭的时候，总理没忘记和我斗酒。

因为陈老总在场，谈笑风生，妙语如珠，总理也非常高兴。小小的聚会，显得热闹非凡。

有了他的暗中保护，我们才渡过了那场浩劫

"文革"开始后，我就没有见到过周总理了，但是，如果没有总理的关心和照顾，尚奎和我真不知道如何渡过那场浩劫。

1967 年初，继所谓"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并且贴出海报：定于 2 月 21 日在人民广场揪斗刘俊秀。届时尚奎和省委其他书记都得"陪斗"。谁都知道，这种揪斗通常就是武斗，最"文明"的造反派也得搞搞"喷气式"，否则便缺乏"革命性"。这对于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乃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我非常担心，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即 2 月 18 日，总理办公室来了电

话，传达了总理指示：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十日前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安全送到北京。造反派开始不相信；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厅核实之后，又讨价还价，要求推迟几天再送去。回答明确而干脆：按时送来，不得推迟。他们这才无计可施，立即派出2人，于2月19日乘飞机将杨、刘两书记"押送"北京。一到北京机场，已在那里等候的总理办公厅的同志，立即将杨、刘二书记扶上轿车，并对这两名造反派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接着，小车一发动，便扬长而去。

当时我就想到，这一定是周总理将他们保护起来的，因为总理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是几十年来为革命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一代革命忠臣，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好党员、好干部。后来我才知道，总理当时不顾自身的安危，保护了一大批省委主要领导以及党政军负责干部和党外知名人士。他在"文革"中，遭受了多少磨难、压力、诽谤、甚至攻击和污蔑呀。"四人帮"一开始就把矛头对着敬爱的周总理。而总理迎着狂风巨浪，毫不畏惧，坚韧不拔，运用着自己的智慧、才能、威望，方寸丝毫不乱地对付着这一伙发了疯的野心家。不知熬过了多少艰难苦涩的日日夜夜，终于积劳成疾，身患绝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实际上总理是将自己的生命送给了一切被保护的同志，送给了他苦心孤诣所维护的浩劫中的祖国和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善良的人。

尚奎被总理接走之后，解除了我心里一个最大的负担。但我自己就惨了，没完没了地挨批斗，无休无止的写"交代"，一些人似乎把尚奎"该受"的那份灾难，加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咬紧牙关，坚强地活着。我必须在受批挨斗、"检查"、"交代"之余，照顾好尚奎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一共4位老人，使他们健康长寿；我必须抚育好一大堆未成年的孩子，使他们在这个混乱不

堪、无教育可言的年头，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够健康地成长，不致于被社会上那种腥风恶浪吹上歧途。否则，我将来如何向尚奎交待呢？

磨难似乎没有尽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朋友们为我担心，怕我承受不了这多方面的重压。有时我也怀疑自己，能不能支持到明天。我常常觉得自己的牙根似乎咬碎了，全身的骨架经络，就像暴风雨中的小屋的梁柱，摇摇晃晃，吱嘎作响，随时都可能倒下来。次日起来，我又觉得这一天可以支撑下去。在我实在无力站起来的时候，便想给总理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切。但我最终没有写，因为我认为总理是了解情况的，所以才把尚奎接到北京；同时这也是明确地告诉我："水静同志，尚奎很好，你可要坚持下去呀！"

于是我又有了坚持的勇气，有了坚持的信心。

和尚奎分开两三年了，1969 年 9 月，当时的省革委突然通知我说："中央办公厅来过电话，让你到北京探望杨尚奎。"这意味着，尚奎没事了，我也"解放"了。我喜出望外，稍作收拾，便匆匆忙忙地赶到北京。我想，这肯定又是总理的安排。

我被接到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尚奎和许多被保护起来的老干部都住在这里。可是尚奎不在，他到北京新华印刷厂体验生活去了。蓦地卸去重压，突如其来的兴奋，使我一住下来便病倒在床。招待所的同志见我病情严重，立即将我送到部队的 301 医院。我全身瘫软，疲惫无力，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我知道，这几年来，我的心力和体力都消耗殆尽，全靠一点精神勉强支撑。现在，我把四位老人、五个小孩如数地、健康地、端端正正地交给了尚奎，任务完成了，我累了，累极了。趁我头脑还能思索、手脚还能动弹的时候，我要给总理写封信，把尚奎和我以及一家老小的近况告诉他，向他表示我的深深的谢意。我写了，写得很

吃力。

没过两天,一位陌生的同志来找我。

"你就是水静同志吗?"他问。

"是的。"我带着几分怀疑地回答说:"你是……"

"我是周总理的联络员,"他自我介绍说,"总理委托我来看看你。"

我从病床上陡然坐起,也不知哪里来的这股劲。"啊!谢谢你呀,同志。"我精神也好了许多,兴奋地说,"总理和大姐好吗?"

"很好,但总理特别忙。"他说,"总理看了你的信,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特地派我来一趟,要你不要着急,好好养病,同时叫我交代医院领导,替你全面检查一下身体,认真地给你治疗。你放心,我已经向院领导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泪水夺眶而出。我从小参加新四军,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并且受到这个大家庭的宠爱。"文革"一来,使我生活急转直下,变成了一个无人理睬的孤儿,一个被遭白眼的路人。我像独自驾着一叶扁舟,载着一船老小,在苦海里漂流,任风浪捶打。大海没有边际,苦难没有尽头。现在,突然看到绿色的大地了,听到亲人的呼唤了,我怎么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呢?

在总理的关怀下,一个多月之后,我便病愈出院了。

他回归了大自然,但还领导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

1976年4月5日,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清明节。这天上午,我和尚奎不顾被"四人帮"进一步迫害的危险,坐着小车,缓缓地行驶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首都数十万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实际上,这也是一次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示威。

总理逝世的时候,我们都在南昌。当尚奎听到总理去世的噩耗时,正在穿的衣服滑落在地,呆了半天没有说话,泪水纵横于脸;我则悲痛得哭出声来。

随即,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发来电报:不准各地设周总理的灵堂,不准各地召开追悼会。从组织原则上说,这个电报通知还是应该执行的。尚奎闷闷不乐,踱来踱去。最后他拿起电话,找到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负责人,说:“既然不能在南昌设总理灵堂,又不让我们去北京,我到八一纪念馆去看看总可以吧?”那位负责人说:“杨老,你最好不要去,你是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免得人家说你不执行中央指示。”尚奎没法,气得整日铁青着脸。我只好忍着悲痛,极力劝慰。第二天,他把我叫到身边说:“水静,听说群众自发地为周总理设了好几处灵堂。我的行动不得自由,你可以不受约束。你代我悼念、去奠祭周总理。”

于是我带着几个孩子,还有尚奎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了一辆吉普车,先后到了八一纪念馆,工人文化宫和其它三处总理灵堂。灵堂都布置得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重,悲痛哀伤,有的流泪,有的抽泣,有的失声痛哭。我的泪水扑扑而下,我为自己,也为尚奎,默默地献上了一瓣心香,还有不尽的思念……

在那段日子里,我对于周总理的去世,特别伤心悲痛,又不敢在尚奎面前吐露,免得使他更伤心,只能暗暗地哭泣。我们的党、国家、人民怎么能失去总理呢?他是党和国家的顶梁柱哇!我想得很多很多,又无处说去,总是闷在心里,我的心脏哪能承受得了,以致2月上旬,我的心脏病突发,严重心律失常、心绞痛。一次使我失去了知觉,休克了,虽然经医生抢救过来,但从此我便带上了冠心病的帽子至今。那时我才48岁呀!不久,尚奎在忧伤中也病倒了。当中央批准他前去北京治病时,我便同

去北京,他住进北京医院,我则到阜外医院治疗。这已是 1976 年的 2 月中旬了。我先尚奎而出院,住京西宾馆,但每天都要乘车到医院陪陪他。清明前两天,我看到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密,花圈越来越多。有人告诉我,北京人民要在清明节这一天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尚奎时,他立即说:“我没有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明天就参加这个大追悼会吧。”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你向医生请个假,就说这里的水不热,想回京西宾馆洗个澡。”

当时“四人帮”极力阻挠和破坏这次活动,但群众都嗤之以鼻,我们也不予理睬。4 月 5 日上午 9 点多钟,我和尚奎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尽管天气很冷,还飘着小雪,但广场上已是沸沸扬扬的一片人海,和一座座小山般的花圈。尚奎几次提出要下车,要和群众一起参加悼念。我考虑他已经年逾古稀,病又没有好,身体又很虚弱,如何经得起人流的冲撞?一旦卷入群众当中,三两个小时是出不来的,他不可能在拥挤中坚持这么久。我极力劝慰他,要量力而行,心意到了就可以了,总理有知,也会高兴的。同时请司机把车慢慢开,让尚奎看得清楚些。

我们看到,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在发表悼念周总理、诅咒“四人帮”的演说,在他们的周围,都分别围着大片大片热情的听众。半导体扩音喇叭的声音,时起时伏的掌声,不断地传进车内。以花圈为先导的人潮,继续拥进广场,各色各样花圈,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直摆到长安街大道的边上。花圈上还贴有许多诗词,有的在抄写,有的在朗诵,我看到朗诵者和听众的泪花,在寒风中闪烁。我和尚奎都无声地哭了,被人民群众的真挚的感情和恢宏的力量感动得哭了,被总理的崇高的品德和伟大的精神激励得哭了。总理活着的时候,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是正义的象征;他不在了,仍然是人民团结起来以正义反对邪恶的思想凝聚

剂。他还在领导人民为真理而斗争，他和人民在一起，敲响了“四人帮”倒台的丧钟。

回来之后，几位朋友听说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转了很久，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因为他们得到可靠消息，说是有人下令：从上午8时开始，凡是经过天安门的车辆都有人监视并且登记了车牌号码。因此，尚奎坐的车肯定被登记了。当“四人帮”镇压了“四·五”运动并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之后，朋友们的担心更甚了。尚奎却毫不在乎，说：“登记就登记吧，纪念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笑话，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怕！”

他不怕，就使我更不怕了，我当时想，如果还有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还要参加！“四人帮”总不能把全中国人民都镇压了吧？！人们心中的悼念你镇压得了吗？

（水　静）

章士钊寻踪三格格
毛泽东感慨赞御妹

1955年元旦，中共中央办公厅像往常一样，收到了由各处呈送毛泽东主席批阅的文件。在众多的公文里，有一份材料显得与众不同，十分显眼。它是由当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送来的，其中除章士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及章士钊题《满宫残照记》两首诗外，还有一年轻女子19岁时的西洋婚纱照和一张26岁时的满族旗装照。随后是这个女子用笔恭恭正正写了十几页的自述。照片上的女子十分漂亮，字也写得清秀端庄。两张照片背后，章士钊早有二首题诗：

寿阳公主正华年，头拂宫纱薄似蝉。
拂到额黄成八字，已含幽怨在眉先。

初见云仙婀娜姿，芙蓉头上挽青丝。
只今宋玉虽无恙，未预高唐梦觉时。

在白底素花，十分雅致的信笺上，章士钊对毛泽东说：

“润公主席座右，今日是乙未元旦，物转星移，无所致祝，特献一满洲女子自述册子，备公作太平广记观，为几余涤虑之助，并媵一诗于后；入春春意满江湖，举国喁喁望汉酺（指解放台

湾),谁是旧时王谢燕,衔书献作朝发图。按此册为该女子自撰自书,以文字论似亦女知识分子中之佼佼者。况益以身为满人零落,不偶之境遇乎唯。公优予提振,不胜大愿之肃敬,敬春礼。章士钊蓬呈。汉铜洗文,丁未元春"。

章士钊和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昌济是至交。经杨先生介绍,毛泽东在1919年就认识了章士钊。建国后,两人交往仍多,关系甚为深厚,或互通书信,谈古论今,或题诗赠诗,每遇可读之书,也往往彼此赠阅,如老友一般,这次章士钊又给毛泽东写信,推荐可读之物,自是情理之中。但这位美丽的满洲女子,被章士钊称为"女知识分子中之佼佼者"、却"身为满人零落",要毛泽东考虑"优予提振"的是谁呢?章士钊为什么会在《满宫残照记》上题诗?这个女子的自述又为什么会到章士钊手中,由章士钊送交毛泽东呢?

闲逛书摊,章士钊偶得《满宫残照记》

身为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对清代宫廷历史尤感兴趣,从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到《苏报》主编,他一直注意收集珍藏各种晚清历史记本。1954年的一日,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到旧书摊上买书,偶然见到一本名叫《满宫残照记》的书,把所能收集的一切大小残余伪满宫廷材料编辑成册,形成一本伪满宫廷笔记,其中所收大多是皇室家庭信件及生活实录。章士钊以前从未见过此书,这次见了,真是如获至宝。他浏览了一遍,内里一个叫金韫颖写的信,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些信都发自日本,是寄给她的哥哥,当时在伪满洲国做"皇帝"的溥仪的。写信人并未因为对方的特殊身份而诚惶诚恐,相反,信写得天真顽皮,流畅轻松,很是优美,在满篇晚清遗老遗少们的八股之中,这十几封信读来别有一番情趣。

章士钊见其文采，很是欣赏这位有才的女子。欣赏之余，又有好奇。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满宫残照记》。回到家来随即题诗两首：

“虏廷琐屑出天伦，小别腾意戏谑影，风趣略同杨妹子，文才差逊性情真。”

“白山残照掠影京，密记金銮有恨声，天意不怜三格格，思令飞弹打流莺。”

题词完毕，章士钊决意访求其人。溥仪是否有一个人称“三格格”的妹妹？现在又身在何处？状况如何？这些都无从知晓。于是章士钊就去找溥仪的七叔载涛询问。载涛说，溥仪确实有一亲胞妹妹姓金名韫颖，人称“三格格”，最后才从东北迁回北京，和她的婆母住在北京兵马司10号，生活情况甚为恶劣。

章士钊闻言，执意要见一见三格格。不几天，载涛就带着金韫颖来到了章士钊的寓所。只见这位三格格，却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妇女，衣着简朴，风华已失。言谈举止中虽平和谦逊，却神采可言。章士钊深深感到，眼前的这位妇女已然失去了三格格在《满宫残照记》的书信中流露的那一份神采！世事变迁，几十年的磨难与困苦，早已使她英华销蚀残尽。章士钊感叹不已，想到国家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各族人民正团结建设国家，各项政策理应落实。“满洲国”虽已消亡，但其族类犹存，妇女恭弱，实在可悯。国家应该给他们以一定的安置。章士钊对金韫颖说，你写一份自述吧，由我呈送给毛主席看看。过了些日子，金韫颖真的写好了自述，又送到章士钊家。章士钊马上转呈了毛泽东。此时，已是1955年元旦了。于是，这位昔日御妹的少女英姿和今日的生活就这样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

昔日御妹的风华岁月

金韫颖,1913年出生于北京紫禁城,由于爱新觉罗家族自醇亲王载沣起就改姓金,所以韫颖还有两个字号,一个是其父载沣为她取的蕊秀,一个是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为其题赠的莉莉,由于她排行第三,所以宫里人通称她为“三格格”。

三格格出生时已是民国二年(1913),虽然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已建立起来,但在高墙围绕的紫禁城,清朝皇室依在,封建体统依存。皇帝的尊号不仅没有废,中华民国还需以对待外国君主之礼对待清朝皇室,每年还要拨给清皇400万两黄金供其使用。清皇室仍旧拥有各种办事机构,宗人府、内务府、护卫军等一一应俱全,遗老遗少们也每日进朝,从宫中领取奉禄。三格格天性娇柔温文,而且生得美丽聪颖,生在深宫,身边虽有成群的宫女和奶妈照料,童年却非常的落寞,宫门不让出,更不知上学是怎样一回事,她曾回忆说:“我幼年的时候,在王府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憋气,那真是不幸的童年,寂寞的童年啊!”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包围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溥仪只得迁居天津张园,十多岁的三格格也走出了紫禁城来到了天津。走出宫门,她天真的性格显露了出来,每日和溥仪及兄弟姊妹学习日语,其它时间则打网球游戏,她和溥仪同为瓜尔佳氏所生,深得溥仪喜欢。

19岁那年由溥仪指定亲事,三格格与前清大臣荣源的二儿子、也就是婉蓉皇后的弟弟润麒订亲。润麒与溥仪私交很密,由于姐姐婉蓉皇后的原因,润麒很小就进宫与溥仪一起读书玩耍。他性格开朗,敢做敢当,是溥仪的心腹之人。溥仪把他几个姊妹中最漂亮贤淑,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嫁给润麒,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31年,在天津闲居6年的溥仪在日本军警的秘密保

护下出逃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三格格和润麒的婚礼也就迁到长春举行。婚后不到一月，溥仪便派溥杰和润麒去日本学习军事，三格格韫颖也随之来到日本。三格格一到日本，日本皇室上下便把她包围起来，极力拉拢，不仅要她担任妇女会的名誉会长，而且裕仁天皇的弟媳也特邀她去寓所让她教中文，一教就是半年多。对此，韫颖初时还可以应酬，后来就越来越感到束缚和压抑，便时常提笔写信给溥仪，一来一往，信件便逐日增多起来。溥仪很喜欢读韫颖的信，这是因为韫颖不仅文笔出色，而且她的信与别的兄妹不同，时时流露出她天真直爽的个性，很能使在日本人和清朝遗老包围中的溥仪得到片刻欢乐。溥仪把这些信件装订成册保存起来，章士钊看到的《满宫残照记》中的十余封信，就是韫颖在这一段时期写的。

在日本生活的不快与所受的束缚，终使韫颖感到厌倦，两年后，韫颖回长春探亲，就再也不肯回日本去了，润麒也从日本回国，在伪满高等军事学校任中校教官，他们便在长春住了下来。但日本人并未因此而放弃拉拢，韫颖又被推荐为“日满妇女会”的名誉总裁，每日依旧被一群日本及“满清”妇人包围，嬉戏玩乐，她的享乐日子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直到溥仪的复辟美梦终于彻底破灭。

1945年，日本战败，韫颖在惊慌中随着皇族家眷仓惶逃至大栗子沟躲藏，不几日，东北解放。作为三格格的韫颖，对解放军心存疑惑，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将是什么？政治上她以往从不过问，只知玩乐和哺养三个孩子，现在丈夫逃亡途中下落不明，自己又该如何支撑今后的生活呢？这一年，韫颖32岁。

从御妹到平民

金韫颖还年轻，她感到清皇室的垂败已是定局。只有重新

做人一条路,在新的社会中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普通平民。历经内心的几番斗争和思虑,她在与解放军的交往当中,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感受说了出来。为表达她的决心,她又把随身携带的十几箱金银珠宝全部上交,只留下随身的几件换洗衣服,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通化。

过惯了一掷千金生活的皇族御妹,虽决心自食其力,可是谈何容易。她会做什么?又从何做起?韫颖脑海中一片茫然,但生活总要继续下去。丈夫随溥仪逃走的时候,连面都没来得及见,便更不要说把她们托付给谁了,一家几口要糊口,只有依靠自己。韫颖脱下她穿了几十年的华贵旗袍,摘下了金银首饰,换上了普通的蓝布短衫,在街上支起一个香烟摊,兼收一些穷户人家的破衣破鞋,开始了她坦然却是艰苦的生活。

开头几日,这位皇家御妹总也张不开口叫卖,就连跟她在一起的老妈子也觉得脸上不好看,不肯跟她一起上街。她脸面毕竟拗不过吃穿的需求,她终于张开口,喊出了第一声。但这种温饱的日子并没过多久。谁让她在日本人手下做过妇女会的会长呢?一日,临江来了两个民兵找到韫颖,叫她们全家速到临江报到。韫颖心中诧异,但还是拉家带口地去了,她猜想自己很可能是作为斗争对象被叫来的。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为她们安排住处,准备菜饭,但韫颖的心里七上八下,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她表面平静,却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难道刚刚开始的平民生活也要成为一种奢望吗?果然,轰轰烈烈的批斗会,经过几天的准备,终于开始了,批斗大会上,在人山人海的震天口号声中,每日提心吊胆的金韫颖反到平静了许多。大会主席要她讲述自己以前的经历,她便本着不说谎的本性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从紫禁城讲到天津、日本和东北的生活……,她尽可能讲得详细而具体,也就自己所能认识到的觉悟对自己进行了批判。在讲述的

过程中，她发现会场逐渐地安静了下来，没有了喧闹和嘈杂，人们也不像当初那样磨拳擦掌，情绪激昂了。当她讲完，等待别人批判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质问，也没有人反驳她。会场一片沉默，大会也在沉默中结束了。

经过了几天的焦虑和不安，此时的韫颖真是惊喜交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的坦诚会使众人在平静中慢慢离去，她对未来的生活增添了一分信心。会一结束，农会主席便留韫颖吃了一顿饭，虽然还是没有让韫颖一家回通化的意思，但韫颖终归放下了提着的心。半个月后，她们一家重又回到了通化，接着过她艰苦却又平凡的生活。

生活的磨练使韫颖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三格格，变成为一个沿街叫卖香烟的粗壮女人。这其中的酸甜苦辣除了自己又有谁知呢？丈夫无下落，小儿子宗光在外兜售香烟时偏偏又被一架冰床撞倒在地，腰骨受了重伤，无钱看医生也无钱买足够的营养品，宗光的病就此拖了下来，年复一年，儿子的腰骨伤转成了骨结核，卧床不起。韫颖受到如此打击，心如刀绞，但每日还得和平时一样沿街卖烟以支撑全家的生活。

正在此时，有一个姓孙的男人出现在韫颖身边，他自称是伪满政府孙大臣的儿子，对韫颖一家深表同情，时常送大米给韫颖及孩子。韫颖过意不去，劝他不要再送大米，如有可能，给她们一家几口一点粗食，她倒是愿意接受。孙某却说，不要客气，他还要带韫颖去沈阳找她的丈夫润麒，只是不能带孩子去。韫颖大为惊奇。她对孙某说她不能离开孩子，况且一人与他出去实不方便，即使润麒身在沈阳狱中，也不一定会被允许见家属。两人争来争去，最后不欢而散。万没想到事情过去不久，孙某的面目便被识破，原来他是国民党潜藏下来的特务。如果韫颖那时稍有犹豫，真不知会落人怎样的圈套，回想起来，她且惧且喜，心

中懔然。

1949年，北京解放了。四年通化的流离生活终于结束了，她被政府告之迁回北京。韫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几年艰苦生活的磨练，已使她对生活有了一些勇气和感情，现在孤独的生活即将结束，她又可以回到北京和亲人团聚，终于可以看见父亲、叔叔、兄弟姐妹了。

旧地重游，亲人相见已是两鬓斑白。每个人都有相见不相识的感觉。拉扯着三个孩子的韫颖，同婆母住在一起，像往常一样辛勤地操劳着。婆母年老体衰，经济上也不充裕，她不仅要照顾卧床不起的孩子，又承担起照顾婆母生活起居的重负。

1951年，韫颖的父亲载沣去世，韫颖分得了一点遗产，靠几间旧房的租金勉强度日，从那时起，她开始参加街道工作，由于她识文断字，大家便推举她当了居民组长，治保主任。当她给大家读报，看到大家投来信任的目光时，她感到非常的充实。金韫颖的觉悟提高了，思想进步了。她说："我着手工作时，止于随着大众，屡进屡退，并不知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意义，对于群众，不晓得从何处接触，更是缺乏联系。1952年，我的思想开始有了些转变，我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和任务的重大，我并认识到党和毛主席对老百姓的深切关怀，国家大事也来和老百姓商量。在旧社会里，政府抱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一切政事，都唯恐老百姓知道。我们妇女，更加一层被人歧视，不用说国家大事，即在家庭里面也没什么地位。若就我们满洲特权封建家庭来说，女孩子更什么都谈不上。如今真是人民做主当家了，男女也平权了，少数民族，都随之而翻身了，我虽十年转徙，未老先衰，深自庆幸，终得参入追求幸福的行列中了。"

一次一个早年和韫颖很要好的女伴来北京看她，见她生活如此窘困，很为她惋惜。韫颖却表示：今日所苦，是工作做得不

好，决不是房子住的欠佳。依我看来，我睡在北兵马司的腌臜寓巢中比摄政王府里的千金绣阁来得香甜，我在街上仆仆奔驰，比听王府老妈子娓娓讲述鬼怪故事来得有味，我无颓废之思，一息尚存，此身不容稍懈。

这就是金韫颖在自述里对毛泽东讲述的自己的曲折经历。金韫颖由一个奢侈浮华的三格格，在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迹迁与磨难中，终于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斗转星移，毛泽东感慨赞御妹

金韫颖的自述，叙说的是怎样不同凡响的一段经历！从御妹到平民，其中的艰辛远非文字所能尽说。章士钊呈送金韫颖的自述，说是"略公作太平广记观"，实际上，毛泽东的感慨又何止于此。

1913年，正当清朝皇室上下为皇族新添了一个三格格而额手称庆的时候，毛泽东，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正在千里之外的湘江之畔苦苦求学，农家孩子是无法想象皇室的奢华的，朝廷的没落也是迟迟才被那边的农民知道。然而，历史的潮流奔腾向前，大浪淘沙，没落了皇帝，没落了改良派梁启超、康有为，却把中国共产党人推上了峰顶浪尖。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提笔在金韫颖的自述后写道："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他批示送周恩来阅，考虑是否酌情处理。

在金韫颖之后，毛泽东又和末代皇族人员多有接触。1962年，溥仪出狱后，毛泽东在丰泽园设家宴宴请他。他对陪同的章士钊、程潜、仇鳌说到这"宣统皇帝"："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席间他又指着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

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由章士钊呈送毛泽东的金韫颖的材料,也许是毛泽东接触清朝末代皇室人员最早的一次。毛泽东批文后不久,金韫颖就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1956年,经毛泽东批准,金韫颖还和七叔载涛等人到战犯管理所去看望溥仪。

1961年旧历除夕,周恩来在中南海也进行了一次家宴。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准确地称呼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溥仪、载涛、溥杰、溥任、韫和、韫颖、韫娴、韫馨、韫娱、韫欢。席间,周总理询问起韫颖那个有病的孩子的身体情况,韫颖说:“孩子到北京后,睡了四年石膏床,最后戴上了正骨架,已经可以站立,以后还是可以上学的。”周总理对她提起:“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一事,当时是毛主席交给我,由我交给下边办的。”韫颖听说心中不胜感激,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她的哥哥溥仪在旁说:“谁能料到,这个娇慵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原来,溥仪刚出狱时去看她,竟见韫颖在区政协办起了京剧组,唱起《凤还巢》《四郎探母》等传统剧目,已经十分在行。这是他难以想象的,却是他能够理解的。

毛泽东对金韫颖和溥仪兄妹二人的改造是满意的。他说过,从此中可以见得,人是可以改变的。

(刘　莲)

周恩来在颐和园的足迹

引而不发的哲理

一次，周恩来向人们分析颐和园的得与失时说，这座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在清漪园的遗址上恢复起来的。如果当时她不用这些钱修建颐和园，而是让海军衙门为北洋水师购买军舰，继续和日本军队进行海战，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依我看难以逃脱葬入海底成为一堆破铜烂铁的下场。

还有一次周恩来表示过如下意见，现在我们接收的中国版图，是清政府为我们创下业的，如果不是清朝而是明朝，中国的版图会怎么样呢？总理引而不发，任凭听者自己去想象引申。

在解放战争后期，为防止颐和园再次遭到破坏，人民解放军以果断迅速的动作，在解放北京以前就首先控制了颐和园，并以此向城里发起和平攻势。当叶剑英把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用电波传到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时，他们当机立断作出向颐和园迁移的决定。也正是在颐和园这座充满民族文化气息的环境，他们运筹了新中国的未来。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凡有较大影响的外事活动，如：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以及1949年的国共两党最后一次和平谈判，都是周恩来代表国家在颐和园进行的。那时，一些国内外的新闻机构，为了能及时报导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的活动，他们的视线始终关注着颐和园。就连周恩来生前进行的最后一次中美外交活动，也没有离开这座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古典园林。

石碑前的沉思

在颐和园长廊中部北侧，有一个叫"清华轩"的院子，在本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曾数次来到这里。给人们印象较深的是他观看"平定准噶尔"碑文的那一次。

1960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发生逆转，"老大哥"实施经济制裁，加上别的原因，中国出现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建设项目下马，发展计划搁置，人民生活和国家财政都处在灾难的境地。接着"老大哥"在边界陈兵数十万，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政府针对这一系列的蛮横行径，针锋相对，和苏联举行了边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主持了这场艰苦的谈判。

为了在谈判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方查询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用确凿的事实来证明，我方坚持的边界走向是有充分根据的。

竖立在颐和园清华轩院内的一块体积巨大稍有残破的石碑上，刻满了乾隆皇帝的御笔碑文。在中苏边界谈判正紧张地进行中的一天，周恩来来到这座石碑前伫立良久。他全神贯注阅读完碑文后，郑重地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块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石碑，一定要好好保存，这里有中苏西部边界走向的有力证据。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石碑呢？

早在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趁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机，用政治欺骗和武力要挟等强盗手段，把我国东部约100万平方公

里的地区强行吞并了。这块地区的面积，超过了法国和德国面积的总和。把原来属于我国的一条内河——黑龙江，变成了中俄共管的国际河流。他们在东段得手之后，接着就把黑手伸向了西段地区。

中国在新疆的中俄边界走向，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其北界是在巴尔喀什湖（现为哈萨克斯坦境内）以东约300公里的"斋桑泊"和以南约400公里的伊塞克湖划界，作为中俄两国西部边界的起点。不久，沙俄派兵不仅把巴尔喀什湖抢去了，还把相当于一个瑞典全部国土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了俄国领土。

这个地区，原来一直处在清王朝的管辖之下，在清朝的一些档案里，把这里统称为准噶尔地区。这个地区由于民族混杂，加上沙俄的挑拨，经常引起内部战乱。清王朝在这个地区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745年（乾隆十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去世，为争夺王位，内部开始了动乱。1755年和1757年乾隆两次派大军出征平叛。使这一地区秩序恢复了正常。乾隆对这两次出兵极为重视，出兵前写了碑文，平叛后又写了一块碑文。在平叛过程中，他还写了不少首诗，其内容都刻在了清华轩内的那块大石碑上。这块石碑，已有200多年了，碑文完整，它像一位记忆犹新的老人，在向人们叙述那一页一页以往的坎坷历史。

周恩来阅读清华轩的这块碑文时，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动情。他联想到沙皇用武力抢占的这块领土，中国历代未曾确认，今天的苏联又想用武力强压中国就范，从石碑上涌现出来的好像已不是镌刻的文字，而是一把把利剑。周恩来从颐和园的碑文中又获得了知识和力量，他指示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中国政府绝不承认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苏边界走向，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来划定。对中国的武力威胁是

徒劳的。

我画不了长廊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似山洪爆发冲击着北京城。一些人数次跑到颐和园,扬言要"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在这场大风暴中,这颗东方园林明珠是否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关心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们,都把希望的眼光集中投向周恩来。

1966年下半年,北京城突然刮起一股砸牌楼破"四旧"的邪风。因为当时有一位"要人"说:"牌楼是镇压劳动人民的象征"。为保持古城风貌,特意保存下来的颐和园东宫门外过街牌楼,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在陶然亭等处的牌楼被全部拆毁后,颐和园东宫门牌楼也搭起了脚手架,准备把它从上至下全部拆除。此情况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他立即通知有关人员:"颐和园的牌楼必须保护,不准拆除。"谁都明白,在那个因一言不慎而遭殃的年代,拆与不拆曾被说成是"路线斗争"。要顶住这股势如洪水般的冲击,不仅领导人要有胆略,一般群众也要有巨大的勇气。最后还是"必须保护"占了上风,脚手架立即被拆除。从此,这座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一直屹立在颐和园门外,后来,它的影响不仅超出了北京城,而且冲破了国界。到了80年代,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曾出巨资在其国内仿造这座牌楼。

颐和园后山有一座"香岩宗印之阁",阁内的佛像是乾隆时期的作品。当社会上砸佛像的风刮到颐和园时,这些佛像也被立即送往废品收购站,准备砸烂溶化冶炼。此事又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他要求工作人员立即将佛像追回。当人们赶到现场时铜像已成了碎铜,大家只好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如实地告诉了周恩来。从此,他就更加注意颐和园的动态了。

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又是处在那种混乱的年月,一座颐和园究竟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多大位置呢?文化大革命初的一天,周恩来突然来到颐和园,他走得很快,边走边了解情况。当他走到长廊时,被群众围住了,人们向自己的总理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位女青年突然向周恩来发难:"总理,长廊上的彩画内容都是旧的,应该把它改一改。"周恩来立即把目光移向这位发难者:"你说怎么改?"那位女青年说:"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迹画在上边,都是革命内容。"周恩来看了看周围的人立即反问道:"让谁来画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700多米的长廊上,共有各式各样的大小彩画14000多幅,包括山水、人物、风景建筑和花卉翎毛等,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民族风格和很高的艺术价值。要毁掉这些彩画,在周恩来看来是不堪设想的。而对这位感情纯朴的女青年和在场的群众,他没有做正面回答。只是含蓄地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是亲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都画不了,请谁来画?"

几句言简意赅的话,使在场的人们立即意识到,周恩来不同意改变长廊彩画内容,颐和园一定要按原貌保护下来。机灵的颐和园职工们略施小计,在长廊彩画上刷了一层很厚的大白,把彩画盖在了下面。大家心里明白,一旦这股风过后,将大白洗掉,长廊彩画还会重见天日。结果没过多久,长廊彩画又以引人的姿容展现在人们面前。1979年,为庆祝建国30周年对长廊重新油饰彩绘时,一些老油工师傅深有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周总理,长廊在哪里?长廊彩画又在哪里?"1978年,美国国务卿万斯来到颐和园参观。在他的想象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劫,颐和园这样的皇家宫殿不知道被破坏成什么样了。但是,当他走在被吉尼斯大全定为世界之最的这条长长的画廊上时,他脱口说出:"中国能把这样美的建筑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在不容易。"

小中见大的宏论

颐和园内有一个德和园，其中的大戏楼，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体积最大的古戏楼。这座结构复杂的大型建筑，不仅代表了我国建筑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因为京剧最后形成在这里，还被称作京剧的摇篮。1968 年，一些怀着朴素的政治热情的人们，将八个样板戏的场景人物制作成模型，摆在大戏台上供人参观。他们以为用这种方法，既体现了让工农兵占领所有舞台的政治要求，又完整地保护了这座重要的历史建筑，是个一举两得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化是难以用朴素的感情对待的，八个样板戏所包括的政治内容，在当时远比它本身的故事情节更复杂、更深刻。就在这时，周恩来又来到了颐和园。当他看到德和园这种不伦不类的展览后，用非常深沉的语调说了八个字："热情可嘉，考虑不周。"

1969 年夏天，周恩来来到颐和园，发现荷花长势不好。后来他了解到水位忽高忽低是由于密云水库供水原因影响荷花的正常生长。他多次提醒我们："保护昆明湖，河湖要分流。"

河湖分流大型水利工程动工了。这项工程，从 1974 年动工，历经五年全部按设计要求完成。从此，昆明湖的水源有保证了，水位也稳定了，千万株荷花，又重新在昆明湖中争奇斗艳。

1971 年，以搞秘密外交轰动世界的风云人物基辛格来华，周恩来选择了颐和园与其会晤。当时美国的尼克松总统，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又因台湾问题而有些左右不定。周恩来用什么来形容美国的这一外交状况呢？就是在这次会见时，周恩来把美国的对华政策比作"小脚女人"。当翻译把这一比喻形象的告诉基辛格后，这位秘密使者开始笑了。周恩来就是借助颐和园这个独特的环境里，用中国优秀的园林文化精华为衬托，

巧妙地借用"小脚女人"这一风趣的比喻，使这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外交行动，变得更富于东方民族的戏剧化风格。后来，不少西方报纸以头号新闻报导说："周恩来在北京郊区一座风景迷人的皇宫里会见了基辛格，他们面对这座饱含着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豪华宫殿，谈笑风生，纵论天下。"

"谁不说俺家乡好"

1975年夏天，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从医院又一次来到颐和园。他们先在园内慢步行走，后来又乘坐画舫在湖上浏览。被病魔和"四人帮"折磨的周恩来，面容憔悴，脸色苍白。他已感到此次昆明湖乘舟可能是他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了，面对美丽的湖光山色，他陷人了沉思。

"小张，你给我们唱支歌好么？"

周恩来对陪同上船游览的颐和园的女服务员，突然提出了这一要求。

小张是颐和园普通的女职工，从50年代以来，曾多次在颐和园为周恩来作过导游，她对周恩来既熟悉也随便。她很少唱歌，她发现总理的眼睛一直深情地望着她，她立时不由自主站起来说：

"好吧，我今天给总理唱一支电影《红日》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说完张口就唱起来了。

"一道道青山紧相连，一道道白云绕云间，……谁不说俺家乡好哇……"

歌声和桨声在昆明湖上飘荡，仿佛把他带回那过去的岁月……

这时，邓颖超把从医院带来的食品拿出来，提醒周恩来该吃东西了。他把邓颖超削好的梨接过来递给了小张。接着他又拿

了一个水果，很吃力地站起来向正在摇桨划船的颐和园的船工走去。周恩来记得很清楚，他每次来颐和园，在昆明湖上乘船，几乎都是这位船工师傅划船，他们在这个水面上，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有一次周恩来在船上会见地质部、石油部等单位的一些负责人和专家，就加快开发大庆油田一事进行研究决策，就是这位船工师傅，很机智地把船划向后湖一个既僻静又安全的地方，使周恩来顺利地召开了这次小型会议。现在，在这位多年为他撑船的师傅面前，想到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他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是让邓颖超把带来的食品，分给这位船工师傅吃。

黄昏时分的颐和园，夕阳余辉下碧水似镜，青山如黛。只有周恩来夫妇等几个人乘坐的小画舫，在两只长桨划动下，从知春亭一带的水面向十七孔桥划去，绕南湖岛一圈之后，又向西堤的玉带桥方向驶去。他是在最后领略这如诗似画般的景色。

（徐凤桐）

薄一波一家和我们一家

薄一波和他的夫人胡明要来南昌了，尚奎和我都非常兴奋。一波作为国务院副总理是来视察工作的，胡明则是来了解江西的轻工业，而他俩同时访赣，则显然有与我们一聚之意。所以尚奎在忙着组织党政部门汇报江西的工业、交通、运输工作的同时，也让我好好安排一下他们的业余生活，使他们尽可能过得愉快一些。

笑结“亲家”

我们两家已经交往多年，友谊很深。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尚奎和他们早就熟悉了。

还是在延安的时候，尚奎就认识了胡明，而且是上下窑洞的邻居。未见胡明之前，尚奎就跟我说过，她懂文艺，善书法，是个富于才华而又热情的女同志。所以，我早已对她产生好感了，人未识、神交久矣。见面之后，我们便亲如姊妹，好像很久以前就结识了。写信时，她称我“静妹”，我称她为“明姐”，亲热极了。尽管她比我大几岁，且不喜欢跳舞、游泳，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寄情山水，欣赏书画，参观展览会，访问艺术家，以及浏览商场，挑选工艺品等等。因为工作的关系，她认识了许多著名的艺术家，还先后给我介绍了吴作人、黄胄、肖淑芳等国画大师，使我有幸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和最新佳作。他们也曾赠我

以书画。黄胄来南昌时，还给我捎来了他给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中的一张很有影响的插图——《春兰》。我很喜欢这张画，喜欢它的格调和韵味。他还在我家当场作了一幅《海岛女民兵》送给我。画完之后，我的4岁小女儿小莉又缠着他，要给她画张画。黄胄笑嘻嘻潇洒挥毫，画了个新疆老人骑在毛驴上，后面还坐了个小姑娘。一直扒在沙发上看绘画的小莉，指着小姑娘说："给她戴朵花好吗？"黄胄笑着，立刻给小姑娘头上加上一朵花。小莉连连向黄叔叔道谢……

看到这幅画，我就会想起胡明。



杨尚奎一家在上海和谭一波夫妇偶遇

聪明伶俐的小莉，也为我们两家的友谊增加了新的色彩。小莉天赋聪颖，俊美可爱，是我和尚奎的掌上明珠；胡明也非常喜欢她。胡明和一波生了6个孩子，最小的男孩比小莉大两岁，活泼天真，资质喜人，是他们两口子的宝贝疙瘩，我也很喜欢。去年，胡明被小莉逗得大笑不已，说道："水静，我们两家这么好，为什么不结个亲家呢？把小莉给我做个小儿媳妇吧！"

我笑道："有我们这样的情谊，那还用说吗？"

尚奎和一波在旁边只是笑。

胡明说："你们在笑，说明也是同意的。我们就说定了，一起'包办'了这桩婚姻——小莉快叫我婆婆呀！"

当然，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干涉儿女婚姻的，更不用说什么"包办"了。不过，后来胡明经常提起这桩事，送给小莉小玩具、小首饰时，就说："这是给我小儿媳妇的。"她还要我把小莉的嫩黄柔软的胎发剃了，"得让我儿媳妇长一头又黑又亮的漂亮的头发。"她说。谁知3岁的小丫头就懂得爱美了，开始怎么也不愿意剃，剃了之后就一直闹情绪。当时，正赶上我们带她到无锡；太湖风光美不胜收，自然拍了不少照片。可是一照像，她就赶紧躲起来，生怕照着了她的像男孩的小光头。尚奎一路直乐，说这孩子点点大就如此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当我把这些告诉胡明的时候，她眼泪都笑出来了，抱着小莉亲了又亲，说："小莉呀，是婆婆不好，害得你几个月不开心……"

胡明对这桩"婚事"似乎是很"认真"的。谁也无法预测20年之后的事，反正我们已经成为"亲家"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这样，上一代人友谊深厚，总希望下一代继续下去，成为"世交"。这种良好的愿望，看来是无可非议的。

我觉得，一波也有这个想法。

布鞋史话

我早就知道了薄一波的名字，尚奎和来自山西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常常谈到他的功劳和业绩。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在敌人监狱中从未被威胁利诱、残酷折磨所动摇的铁骨铮铮的硬汉；一位在国民党顽固派面前"好插野鸡翎"(有气势，敢斗争，压倒敌人而不被对方所压倒)的性格倔强的猛士。

第一次见到一波时，他的高大魁梧的形象，是在我的想象之

中的，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一个知名度那么高的人物，竟是如此敦厚，如此谦和，像一位心地慈善又有个好脾气的老大哥。

然而，使我完全不曾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那次我随尚奎回访一波夫妇，行前没有打招呼，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宾馆，不会上别处去，又是头天约好了的。当我们走进会客室时，只见一波一手扶着洗手间的门框，两眼盯着地下，不知在干什么。循着他的视线寻去，更使我大惑不解了：他穿着一双青布帮、千层底崭新的圆口布鞋，在泼了一层浅水的水磨地面上反复地踏着蹭着；随着他双脚踩动的节奏，不断发出鞋水离合时的“叽呱、叽呱”的声音。

奇怪，好好的一双新鞋，干嘛一个劲地往水里踩呢？

后来，当我单独与胡明呆在一起时，便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

“嘻嘻，你问这个呀？”她笑道，“这是他薄家祖传的艰苦节俭的‘基本功’呢。”

胡明告诉我，一波自幼家境清寒，主要靠父母劳动所得维持生计，供他读书。这是极不容易的。穿件新衣，着双新鞋，自然特别爱惜，尽量使它能多用一些时间。他母亲告诉他，鞋底是细麻绳纳的，鞋做好后麻绳也干透了，脆得很；新鞋初穿，脚一使劲，麻绳就容易断，鞋就不禁穿。所以穿新鞋时先在水里踩踩，让麻绳吸点水，就韧得多了，耐穿多了。几十年来，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如今当上了副总理，仍像当年在母亲身边一样。当然，他现在这样做，其意义已不在防止鞋绳的脆断，而是为着一种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的宝贵传统和优秀品德的不断延续。

“原来是这样。”我说，“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一波虽然是个大知识分子，可出身也是很苦的。”

“正因为家庭贫困，才和马克思主义结缘了。”胡明说。她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自豪感对我说，一波自幼天分很高，学习又勤奋，是个有名的高材生。大革命时期，他才十几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工作。二十年代末，即在顺直省委(中共北方局前身)从事秘密军运，是个崭露头角的人物。1931年到1936年头尾6年的铁窗生涯，又充分显示他的高尚的人品和坚贞的气节。当时阎锡山之所以对一波敬重有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品德与才华深孚众望。当他一跨出监狱大门，阎锡山便派人拿着自己的电报请他回山西“共谋保晋大业”。

一波当然不会随便接受一个军阀的聘请，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决定任命他为公开的山西工委会书记，派他去山西做统战工作，这才立即回到山西。他根据党的决策，与具有联共、反共、抗日、降日两面性的阎老西巧于周旋，成功地拽着这个老军阀一道抗日。他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身份，作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务秘书而主持该会的工作，而且，很快掌握了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盟会的领导权，把它改造成了我党领导下的深入山西各地的抗日群众组织；又利用阎锡山扩大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心理，创建了相当于50个团的建制的新军，用阎锡山的枪支把它们武装起来，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在1939年晋西事变后，这些部队都分别纳入了八路军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的战斗行列。

这是一大奇功。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30年代中期，红军长征结束不久，刚刚在陕北立足，力量还很小。一波等同志在山西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而取得的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就，为我们党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就成了陕北的一个有力屏障，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对于捍卫陕北、坚持和推动华北的抗日斗争，

起了重要的、光辉的作用。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和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对一波的牺盟会的工作极为满意。1943年春,毛主席曾和一波连续谈了8个小时,当面称赞一波"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创造性地实行了党的统战政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评价。

一双布鞋,便牵出了一串历史,真使我获益匪浅。我忽然觉得他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封面平常而却十分丰富、十分精彩的力作。只是还没有结尾,还在继续写下去。

我几乎立刻就肯定,我会是个热心的读者。后来证明,我的确从中所得颇多。这也是我高兴地期待他们夫妇到来的一个原因。

烹调比赛

当我和尚奎一切准备就绪,一波、胡明也如期到达了。在尚奎的陪同下,一波到处参观工厂、召集会议、研究工作,很忙了一阵。他在实地调查了江西的经济状况之后,解决了不少问题,对江西工交运输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我所知,仅钢材就先后批给了好几千吨。原来从南昌到赣州要过几次渡,对工农业生产影响极大;涨水和枯水季节尤为麻烦。一波首先解决了兴建赣州西河大桥的问题,后来又连续建了几座公路桥,才使直贯南北的昌赣公路畅通无阻。

我也陪着胡明办完了她要办的公事。业余时间呢,就一切听我们安排了。南昌地方不大,名胜古迹不多,用不了两天就全看完了。第二天是星期日,得把一波和尚奎从工作中拽出来,松一松大脑。还是胡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明天我们进行一次烹调比赛,我们4个人,每人做一个自己认为是最拿手的菜肴,吃完后再评出名次,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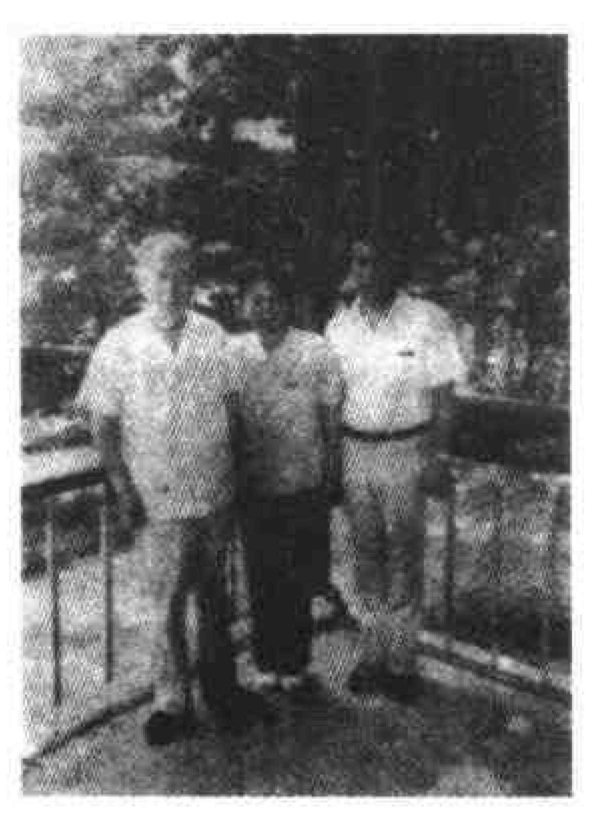
"行，我来个安徽名菜：蒜子烧子鸡。"我首先响应说。

"我选生炒肚尖。"胡明接着报了菜名。

一波想了一下说："我就来了酱爆牛肉吧！"

尚奎从来就没有做过菜，他笑了笑说："我来做个嫩豆腐，行吗？"

次日早上一起来，尚奎便对我说："你先陪一波、胡明玩玩，我今天安排了一个会，会很快就开完的。"



水静和她儿子纬力在北戴河看望薄老时合影

我说："可别忘了，你还得做个菜呢！"

他说："我晓得，我昨天不是选了个烧豆腐吗？豆腐一烧就烂，快得很的。"

我点着他的鼻子说："好哇！你不声不响的，原来早就计算好了的！"

他微微一笑，便径自开会去了。

用过早餐，我和一波、胡明都忙起来了，都想"露"一手，评个"第一"。要数我那个菜最难做了，一只斤把重的小鸡，要配上一大饭碗大蒜子。这大蒜子要粒粒完整光滑，不能拍烂，也不能弄破，所以得一粒一粒地剥，得花不少时间。

快吃午饭时，我们3个人的菜都做好了，可尚奎的会还没有开完，左等右等，等得我们不耐烦了，他才不慌不忙，姗姗而来。

我说："算了算了，不要你那个什么烧豆腐了，快吃饭吧！"

胡明不饶他："不行不行，要罚他做三个菜。"

尚奎说："是该罚。你们等着，我去做。"说着就要转身。

我把他一把拉住，对胡明说："他干什么都不着急，动作又慢，等他做完三个菜，那干脆吃晚饭得了。"

"看在水静的份上，饶了你这一回。"胡明笑着对尚奎说，"不过，我说老杨呀，你老实讲，是不是你不会做菜，才故意在星期天安排一个会，好躲过这份差事？"

于是大家笑了一阵。

这时，我们3人做的菜都已端上了桌。品尝的结果，我的蒜子烧子鸡受到普遍的欢迎，尤其是很对一波这个北方人的味。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说："不错！这是怎么做的，水静？"胡明也挺爱吃，又见一波那么喜欢，便说："快告诉我这道菜的做法，下回我一定要试试。"

"这可是祖传绝技呀！"我开玩笑说，"不过，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我也只好把它无偿地贡献出来啰。"接着我告诉他们，关键是掌握好两条：一是选好料，鸡要嫩，个儿要合适；大蒜的粒儿大小也不能相差太远。二是要掌握好火候，要等鸡烧得差不多了，再放大蒜子，大蒜子既要烂，个儿又要完整，如果变成一锅蒜泥那就砸锅了。这样，一只烧得红里透黄的嫩鸡，配上许多雪白均匀的蒜子，不但香味扑鼻，鲜嫩可口，而且看起来色彩很美，添人食欲。色、香、味俱全了，能不受欢迎？

胡明说："没想到我们水静还有这一手！"

一波说："她讲得很有道理。"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绝密，那是谁也不能传的。"我装作煞有介事的样子说："就是对你们，我也不能讲。"

他们看我一副正经的样子，都停下筷子盯着我。胡明说："怎么？还留了一手呀？"

“那是当然。”我说，“要不然，这世界上天天要发生徒弟打倒师傅的悲剧。”我偷眼瞧这几个人也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哈哈，这坏丫头在骗我们哩！”胡明摁着我的胳膊威吓说：“你要不说出个道道，我可不饶你！”

一波也笑道：“对，非说不可。”

尚奎也嘿嘿地笑着。我笑得前俯后仰，半天才停。

“要说呢，还真有一条，不过是属于心理学上的就是了。”我说：“我们四个人吃饭，尚奎的口味我是知道的，主要的要对你俩的口味。胡明和一波生活这么久，肯定是习惯于北方的菜肴。可是我是南方人，尚奎也是南方人，不会做北方菜，怎么办呢？我掌握了北方人的一个嗜好，就是好吃大蒜。那么，我得做一个有大蒜的菜，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蒜子烧子鸡就最能突出大蒜的特点。所以你们一吃起来，就赞不绝口啰！”

一波连连点头，尚奎一直微笑着，胡明却叹了一口气说：“水静呀水静，我早跟你说了，别给老杨当秘书。你要是做领导工作呀，至少要比那些糊涂官强十倍！”

我说：“你别发感慨了，胡明，我老实交待了吧，我也就是这一两个菜烧得好点。”

大家又大笑了起来。

评比的结果，我的蒜子烧子鸡公认为第一；经胡明提名，一波的酱爆牛肉名列第二，这显然有照顾一波“情绪”的意思；胡明的生炒肚尖只好屈居第三了。

胡明说：“老杨，这回你可是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啰！”

尚奎笑道：“贡献总还是有嘛。”

我说：“你一个菜没有做，还有贡献呀？”

尚奎说：“要是我的烧嫩豆腐拿出来了，你还能拿第一吗？”

我们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一波"求饶"

一波和胡明是一对理想的恩爱夫妻。一波喜欢重工业，看到钢、铁、煤、炭就流连忘返；胡明搞轻工业，只要谈起工艺美术就会废寝忘食。我常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两口子一重一轻，中国的工业在你们家算是全了。胡明多次跟我说，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主管文化艺术的副部长李定坤，曾根据我的资历和经历，要我去当文艺处长，但我考虑尚奎担子重，身体差，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胡明对于我所作的事业上的牺牲很理解，也很尊重。我们成了人生难得的知己，可谓是无话不说的。她尽管有自己的事业，但对一波照顾还是无微不至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想着法子让各自的丈夫从紧张的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一波和尚奎也很乐意听我们的"摆布"，所以我们两家在一起时，总是过得那么和谐愉快，趣味盎然。在北京，我们一起到香山看红叶；在北戴河，我们一块儿早起看海上日出；在庐山，同赏奇峰异景，飞瀑流泉；在上海，共乘舰艇，出吴淞、观沧海……我们还常常逗他们开心，要他们做一些他们不大愿做的事情，以抑制一下经常处于兴奋状态的那一边大脑。

在两家交往中，经常会有这种愉快的节目。

有年秋天，我陪尚奎到上海检查身体，恰好一波和胡明也在那里，不期而遇，自然高兴非凡。我们约了一个星期天，到虹桥俱乐部去玩玩。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个大花园，里面树木成荫，空气如洗；奇花异卉，常年不断；其中还有个大草坪，显得空寂而幽静。在这儿散散步，聊聊天，是最好的休息了。我们和胡明到处走了走之后，便坐在俱乐部门前的台阶上，请工作人员摄影留念。这时一波正好从里面出来，看到我们亲热的样子，便蹑手蹑

脚地走到我们背后,把我们两人的头突然往拢一靠。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咔嚓"一声,这张照片已经拍下了。待冲洗出来呀,大家可乐坏了。拍照的时候,我和胡明没有防备一波的"偷袭",吓了一跳,那样子自然好看不了;一波呢,因为要"害"人,装作一幅龇牙咧嘴的神态,尤其难看。于是他一再求饶,要我们别把这张照片给别人看。胡明说:"不行,这叫自食其果。"我也笑道:"堂堂的副总理,搞得这副模样,看你怎么交待得了。"最后经过"谈判",我们作出"让步",就是用废弃这张照片来换取一个承诺。

"你说什么条件吧,我答应。"一波说。

我说:"陪我们去逛一次商店,买买东西!"

我们知道,这是一波最不愿意的事。但有言在先,他皱皱眉头,只好答应了。

于是我们抚掌大笑。我们当然不会真的要他陪我们上街,不过开开玩笑罢了。

直到 1965 年初夏,尚奎到友谊医院治病,在北京住了 40 多天,又多次与一波、胡明聚会。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空前的灾难,就在我们两家的欢笑声中,悄悄地朝我们头顶压来。

祸从天降

"文革"开始后,尚奎和我都遭到残酷迫害。我被关在"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对外界的消息一无所知。我很担心胡明和一波,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情。不久之后,二轻工业部和国家轻委的造反派多次到江西来找我,要我交待和"大叛徒薄一波夫妇"的关系,揭发他们的"问题"。任造反派们怎么威吓利诱、软硬兼施,我一字也不写,气得那些人暴跳如雷。后来又来了一伙人,知道我态度强硬,便企图从精神上击垮我。他们对我吼叫

着："老实告诉你，薄一波是个大叛徒，中央已经定成铁案了，他也被抓起来了，永世别想翻身！他的老婆胡明，早死了，畏罪自杀了！你还不交待揭发，难道要为他们殉葬吗？"

听说胡明已不在人世，有如晴天霹雳，我顿时感到天昏地转，坐椅倾斜，心头猛烈地一阵抽搐，接着失声痛哭起来。哭了好大一阵子，当我突然意识到有造反派在面前时，便强忍眼泪，一语未发，甩手便走。造反派把我拦截回来，对我狠批狠斗了一顿，还狂喊打倒一波、尚奎、胡明、水静的口号。我咬紧牙关，就是不开口，心里想：到头来还不知道谁会被打倒哩！

这个坏消息，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处在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睁开眼睛就想着，一波虽说经过多年监狱生活的磨练，但现在终不是20多岁的青年时期，他如何能忍受那种折磨呢？胡明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思想敏锐，精明强干，又有这么好的丈夫，那么多可爱的孩子和那么好的家，怎么会自杀呢？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一波和胡明，看到他们往日的欢欣和今日的痛苦，听到他们昨天的笑声和眼下的呻吟……于是一惊而醒，暗暗垂泪，继而又想到尚奎和孩子们，不知他们怎么样了，经常是彻夜不得安枕。

我常常想，要是这一切都是假的，是造反派造谣才好哩。可理智告诫我，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1969年，我被从牛棚里放出来，有了一些自由，便到处打听，寻找材料，希望能证明一波不曾被抓，胡明仍然健在。而事实却是那么残酷，我找到几份有关的小报，尽管上面一派假话，满纸谣言，但它们足以证明，早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悲剧便已发生了。我哀伤已极，那颗惯于装载欢乐的心，无法承纳如此之多的悲愤，它要碎裂了。1969年，当我赶到北京探望几年不见的尚奎时，便突然病倒。尽管如此，即使在住院期间，我也极力打听一波夫妇和他们

的孩子的下落。不等我得到任何结果，我便被迫返回江西，因为我没有更多一点的自由。

不过，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通过种种途径，我终于了解到他们一些情况。原来，在 1966 年 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大奸臣康生就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所谓“61 个叛徒集团案”，并且和陈伯达、江青之流一道，指使和支持不了解历史的红卫兵们，到处揪斗这批久经考验、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薄一波位列这 61 人之首，是那帮家伙追猎的主要目标。当时，适逢一波患梅尼尔氏综合症，在盥洗室摔了一跤，导致尾骨移位，秘书便代他写了一张请病假的条子，直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作了“拟同意薄休养 6 个月”的批示。显然，了解一波的历史又洞察了康生之流阴谋的周总理，是要将一波保护起来。因为，这时 61 人之中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已经被当做叛徒揪斗。于是，一波便同胡明一道去了广州。可是，他们并没有躲过这场灾难。1967 年元旦，一伙红卫兵和造反派冲进一波房间，把他揪回北京，关了起来。尽管周总理多次出面说话，告诉那些红卫兵造反派，薄一波等 61 位同志的出狱问题是组织决定的，中央是知道的；叫他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可是，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那伙人不但置之不理，而且赤膊上阵，将这个问题抛向社会，制造混乱。戚本禹、关锋多次在公开讲话中，点一波等同志的名，诬陷他们是“叛徒”。1967 年 3 月 16 日，中央文革小组盗用中共中央名义，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61 人的自首变节材料》，以欺骗群众，定成死案。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呢？说穿了，完全是康生、江青那班贼子制造的大骗局、大阴谋、大冤狱。他们以此把一批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家、老干部置于死地，同时又可以给刘少奇同志罗

织莫须有的罪名。因为这事和少奇同志有直接的关系。原来，在1931年4月和6月，由于叛徒告密，顺直省委连续两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一波和几百名领导干部、党团员一道被逋。除了少数获释外，后来也有不少人因为自愿或家属动员，以发表“反共启事”换取自由。一波同其他大批党的优秀分子，坚持不在敌人搞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提出要“红旗出狱”，因而许多人满了刑期也未获释放。他们还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狱中建立了党支部，和敌人进行了形式多样、不屈不挠的斗争，有一次竟绝食七天七夜，以至敌人在文件中称他们“是以宁死狱中亦不愿反省”的最坚强的共产党人。1935年4月间，控制监狱的特务头目以所谓“带头煽动闹监”为名，向南京的主子写了一份报告，要判处12名共产党人死刑。其中对薄一波的指控是：在狱中秘密组织共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一直领导“犯人”闹监，应予枪决，等等。后因形势急骤变化而作罢。一波他们在狱中还建立了党校，经常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研究局势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旺盛的革命意志。对于这一切，狱外的党组织了解得一清二楚。

1935年底，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指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由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干部被捕，工作几乎无法开展。于是柯庆施建议，让尚在监狱坚持狱中斗争的共产党员履行个手续出狱，以解决干部问题。少奇觉得很有道理，同意这个意见，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很快批准了少奇的报告，准许那些同志履行手续出狱。这样，柯庆施便通过徐冰找到曾担任过反省院支书的孔祥祯，让他把这一精神告诉狱中支部。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回音，他又将中央决定抄送狱中。狱中支部和一波等同志不信，因而拒绝执行。3个月后，少奇再次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写信，并强调是中央指示，主要

的内容是：你们过去不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是完全正确的，但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争取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必须履行出狱手续。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党向你们保证，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不歧视，不以叛徒论。如果是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等等。狱中支部对这封信进行反复研究，又根据其它渠道的消息一并分析，经过全体党员讨论，一致认定是中央的指示，这才决定执行。

这批出狱的同志一共有61个，一波是其中之一。组织上及时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历史已经证明这批同志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在组织华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尔后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对党对人民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一波的功绩，是毛主席在和他8小时谈话中充分肯定了的，同时还赞扬他的狱中斗争。这一切，当时的中央领导都一清二楚，怎么事过30年又成了问题呢？在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内，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竟然出现这种怪事，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一波被送进我们“自己”监狱时，已年近花甲了，他的身体状况如何？能够承受那种疯狂的迫害吗？这是尚奎和我所十分焦虑的事。

至于胡明，除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她不在人世之外，谁也说不清她是怎么死的。这使我连夜噩梦不断，梦见她的惨死情景，梦见她含泪的诉说……醒来后，往往泪湿衾枕。

为死者哀，为生者忧，我和尚奎经常提到这些事，每次都是以长叹告终。

破碎的家

1972年，让我出来做点工作了，我立即找到一个出差机会前往北京。尚奎一再叮嘱，这次一定要去看看那些大难不死的

老朋友,看看那些不幸逝世的朋友的遗属和遗孤。又特别交待,一定要打听一波的下落和他的孩子的情况。其实他知道,他不说我也要做的,他是在强烈地表示他对朋友们的思念。

到了北京,我三下五除二地把工作干完了,随即先后看望了陈毅的夫人张茜和陈正人的夫人彭儒。这时,我已知道一波还在监狱里。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波和明姐的大女儿安安。安安告诉我,几个弟弟妹妹,有的在工厂当工人,有的到外省插队,小七则下放在大西北……听着听着,我的心都碎了。好端端的一个幸福家庭,被“四人帮”搞得家破人亡;孩子们星流云散,无家可归。

我强忍眼泪,又问一波的情况:“这些年你去看过你的爸爸没有?”

安安摇摇头说:“自从他被关起来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他们不准我去呀。”

“你去找过他们没有?”我又说,“你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国民党的大狱还允许家人去探监哩!”

安安愁苦地对我说:“水静阿姨,前些时他们找过我一回,把爸爸的手表给了我。”安安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爸爸被他们害死了? 也没办法打听。”

“不会的。”我说,“如果你爸爸不在了,一定要注销户口的。”

安安说:“你不知道,阿姨,爸爸从坐牢那天起,户口就没了。”

她这么一说,我也有点着急了。可仔细一想呢,又不像。因为一波真有不幸,造反派会幸灾乐祸;而且要交遗物,也不光是一只手表呀,总还有点衣服什么的。一波是个富于智慧的政治上极为机敏的人,他肯定知道了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以及由此带来的形势上的变化。他送出一块表,是让孩子们放心,他出

狱有望了。我把这些想法说了,又对她说:"你现在要千方百计和你爸爸联系上。去找上面那些人,写报告,天天去缠他们,就说你一定要见爸爸,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们还能把你怎么样?有从牢里放出的叔叔阿姨,也要去打听,好知道爸爸的下落。"

可怜的孩子,一直在温暖幸福中生活成长,何曾经历过如此劫难?碰到这种变异,自然束手无策了。听了我的话,总算是得到一点安慰,有了一些主意。我回来对尚奎讲了上述情况,他很感叹!但和我一样坚信一波还活着。

水牢春秋

自从林彪摔死之后,老干部的艰难处境有了一些好转。到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我和尚奎对一波的担心,稍稍缓解了一点,可是仍然为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而不安。

1975年的春天,我再次出差到北京,很快就打听到一波已经出狱,住在国务院西直门外第一招待所。于是我立即和安安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和刘勇(原炮兵司令员邱创成的夫人,是胡明那个局的一位处长)马上就看他。

"爸爸虽然放出来了,但还在受监视。"安安说,"去看他的人都要详细登记,不知搞的什么名堂。"

"登记就登记好了,我不怕!"我说,"死都死过了,生个病也就是那么大的事!"

"还是少点麻烦好,水静阿姨。"安安这孩子成熟多了,她说,"我看你们不要去'一招',明天上午我把爸爸接到我们单位上来,你和刘勇阿姨9点钟来就行了。他没有什么事,时间我可以定。"

我觉得安安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了她的安排。次日上午,刘勇带上火腿,我提上水果,准时赶到安安工作的首都医院,找到

她那间小得可怜的房子。才坐下谈了一会儿话，一波那魁梧的身形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劫后余生，恍若隔世，我和刘勇一人抓住他一只大手，泪眼汪汪地望着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刹那间，眼前浮现着他在狱中所受的磨难，胡明的被害，以及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别夫离子，十几个"女犯人"住一张通铺，失眠之夜的种种回忆……我已经无法控制积在眼眶中的热泪了。

还是一波心胸开阔，意志坚强，他微笑着，让我和刘勇坐下，慢慢说话。看着他的笑容，我的心像被刺了一刀似地流着血，在他的微笑里，含着多少悲愤，多少哀伤啊！他失去了一生中最最珍贵的夫人，我最亲密的明姐。

"这么些年了，你们都好吗？家里人怎么样？"他关切地问道。

我和刘勇都简要地说了一下各自的遭遇，我还代尚奎问候了他。

"也活下来了，算是幸运的。"我说，"你可受罪了，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也活下来，不过活得很艰难。"他苦笑着说。

我说："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折磨你的。"

"开头是些红卫兵娃娃对我搞逼供，那还好对付。"他说，"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当'叛徒'，我说娃娃们，我做白区工作时你们还没出娘胎，怎么会知道那时的事呢？我没有当叛徒，倒是杀过叛徒。于是我给他们讲故事，上政治课，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告诉他们，我的历史毛主席最清楚，问问他就行。"

我说："是呀，真要去问毛主席倒好了。"

"后来换了些年纪大的造反派头头来，可把我整惨了。"他叹口气说，"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学来的那套办法，就像历史上一

班残忍的酷吏折磨屈打成招的老百姓一样。"

一波说，那些人成天要他写所谓的"交待材料"，他当然不会去写，没事就在房里来回踱步，锻炼身体，或者倒在床上睡会儿觉。他们火了，把他关到一间一个多平方的小杂物间里，床撤了，只有一桌一凳，供他写"交待"用。他有什么可写的？困了，伏在桌上一样可以睡大觉。他们咬牙切齿，把凳子也拿走了，要他站着"写"，他更不会写了。白天，他在原地踏步，活动筋骨，地方小，也不能捆住他的胳膊腿呀！累了，他就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呼呼大睡。造反派暴跳如雷，大骂他"顽固不化""死不悔改"，挖空心思来计算他。那些家伙把小桌放在房子中间，四边不靠墙，而地上又放了一尺多深的水。使他既不能下地踏步，又不能倚墙而睡。但他还可以坐在上面闭目养神，或者打个瞌睡。不过，这的确把他搞得疲惫不堪。有一回累极了，身子失控，竟从小桌上摔了下来，倒在水中。他那么大的块头，摔得青一块，紫一块，造反派们便哈哈大笑。这事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他立即指示：不准变相刑讯，必须改善被关押者的生活环境。

"这以后，我的日子总算'好过'一点了。"一波苦笑一下说，"他们没完没了地要我写'交待'，我还是老办法：一字不写。他们变着花样审讯我，我就是一句话，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你们问他去！他们没招儿了，狠狠地说：'好吧，你就坐牢吧！'我想，坐就坐吧，坐牢我还有点经验。"

其实，哪像他说的那么轻松！他遭到的无止无休的批斗、殴打、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在二七车辆厂，他被用橡皮上的铁条、木棍打坏脊椎骨，腰都伸不起来。有一回，因为理直词严驳斥了造反派的诬陷，被康生派去的20多个打手拳来脚往，打得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拖回牢房。他还曾被四条彪形大汉分别抓住四肢，用力向上抛去，然后落在水

泥地上，当即昏死过去，一天一夜不省人事。醒来时，发现自己竟躺在冰凉的冷水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东揪西斗，一天被整数次；有时"疲劳"轰炸，几十个小时不得合眼……

这只是我零零碎碎听人说的一星半点，谁知道他受了几多苦难，咽下几多悲愤呀！然而，他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坚毅倔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正气凛然！

他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他是为其他60名战友的政治生命，为着马列主义真理，为着共产党人的信念而活着！

他不是简单地活着，他还在作殊死的斗争。他在每天看过的报纸上，都要记上所受的批斗和遭到的折磨。他知道，专案组会把这些收集起来，作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证据，但总会有一天，它们会成为那些历史罪人的犯罪铁证！如果说这是他的准确的预见，倒不如说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他还把对他的批斗会，当做一个揭露林彪、"四人帮"可耻阴谋的讲坛。专案组在一份向康生的报告中说："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而且"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显然这使他饱受了皮开肉绽、筋断骨折之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真理并非俯拾即是的草芥！他还忍着残酷的折磨给他带来的痛苦，写了一份近3万言的材料，详细描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61位同志在狱中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以及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一斗争的肯定与赞赏。这就给"四人帮"一伙一记响亮的耳光，揭穿了他们制造这一旷古奇冤的阴谋，并宣告了这一阴谋的彻底破产！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着，由悲伤而气愤，由气愤而慨叹。什么铮铮铁骨呀，什么忠心赤胆呀，这些赞誉之词在一波面前显得如此平淡无奇，是远远不足以形容一波风骨与肝胆的。

"真没有想到，你坐了国民党的牢，又坐林彪、'四人帮'的

牢。"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吃足了苦,受够了罪了。"

"坐牢嘛,还能舒服得了?"他嘿嘿一笑说,"不过嘛,坐国民党的牢,每天还可以放一次风,他们也允许亲友探监,送点吃的、用的。我们在狱中还办党校,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学习,开展讨论;还进行支部选举,定期改选,过组织生活,作自我批评和帮助同志,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可是,这次坐牢,全都没了。起初还能通过接受批斗了解一些形势,这点'享受'也不给。几年不让见亲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的身体被他们搞得衰弱不堪,要不是周总理把我送进医院,治疗保护,我早就被那些人迫害死了。"

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哪能说完呢?不过这回我总算放心了,他虽然比过去苍老多了,但精神很好,调养一段时间,会很快恢复的。只是我不敢提胡明的事,免得几年不见,一见面就要伤心。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之后,即 1978 年 12 月 16 日,薄一波等 61 位同志才得以彻底平反。在随后的 18 日至 22 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重新肯定了一波对党对人民的贡献,纠正了"四人帮"强加的错误结论。

1979 年,一波恢复了工作。

爱的伟人

这年秋天,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一到北京,我们就带着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孩子去看望一波。这时他已搬到万寿园居住了。据说张学良将军曾在这里住过,园子不大,但布局很好,收拾得也很干净,几栋古色古香的房子,坐落在花木浓荫之中,还有一口较大的鱼塘,水清见底,游鱼可数,显得恬适而静谧。尚奎和一波是文革后头次见面,激动兴奋,自不必说。一波见了小

莉，更是高兴，他把孩子拉到身边，说：这就是小莉呀？你看，十多年不见，长得越发漂亮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你该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了。现在小七已经结婚，你就做我的女儿吧！"说得悲怆凄凉，我心都酸了。

小莉看在眼里，赶紧调调情绪，她对一波说："伯伯，我以后就是你的小女儿了。"

大家这才开心地笑了。

可是我的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胡明不在了，少了大半热闹。一波的孤寂，又显而易见的；我也觉得知音已逝，落寞空虚，不是滋味。当然，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抑制心底的悲伤，以免引起一波对明姐的思念。

我们在这里呆了整整一天，才乘车离去。当我回头看到形影单只的一波为我们挥手送行时，鼻子又是一酸，在他旁边，原是有个喜笑颜开的胡明的，她现在到哪儿去了？

"小莉，你看薄伯伯多么寂寞呀！"我对女儿说，"我和你爸爸难得上一次北京，你在这里工作，要常常去看看他。"

小莉很喜欢薄伯伯的热情幽默，也知道胡明阿姨生前对她的疼爱，所以常去看望一波，为他驱赶一些寂寞。有一回，小莉被一个新来的警卫人员挡在门外，说："首长不在家。"其实他就在隔壁看电影。小莉留下张条子，转身走了。一波回来看了那条子，把警卫员好训了一顿："你知道我和杨家的友谊吗？你为什么不把她送过来看电影？她就是我的小女儿，你知道吗？"下回小莉再去时，警卫赶快过来道歉，说："上次首长对我发一顿脾气。很对不起，小公主！"小莉说："不认识嘛，哪能怪你呢？我要事先打个电话来就好了。"

当然，任何其他安慰都无法阻止一波对胡明的思念。尽管他口里不说什么，但胡明死得那么蹊跷，他心里怎能安宁呢？而

且孩子们也大了，他们多次要求有关部门弄清母亲的死因。上级机关也多次派人调查，最后只能确认胡明是被害而死，但谁害的？怎么害的？却没有具体结果。再查也查不出个明白来，薄家只好同意单位意见，给胡明平反昭雪，了却这桩惨案。

1979年4月，我们接到为胡明开追悼会的通知，本来尚奎也要去京的，正赶上省委召开会议，他无法离开，只好由我全权代表了。于是我乘飞机直达北京。薄家的六儿贝贝前来机场接我。在机场到市内的汽车上，我问贝贝，你妈妈究竟怎么去世的，现在查清楚了吗？贝贝告诉我，那年一波在广州被抓走之后，胡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幸免，迟早是要被揪的，不但思想上有了准备，而且还将换洗衣服、盥洗用具和常用药物放进一个提包里，以便随时提着进"牛棚"。没过几天，几个貌似谦恭客气的干部模样的人，开了一部面包车，到广州小岛招待所来找胡明，说是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请她去一趟，胡明信以为真，那个准备好的提包都没有带，便随来人走了。孩子们还以为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没有在意。谁知道这竟是一个骗局。胡明一上汽车，便被那几个人拉往火车站，架上从广州直开北京的火车，还没到株州，她就已奄奄一息。造反派在株州车站把胡明拖下车，说是送去抢救，可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她就含恨而逝了。医院对胡明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说是发现了她食道里有几片安眠药。于是造反派们便给她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而草草火葬。真是荒唐透顶！胡明何罪之有？干吗要自杀？她是被骗走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哪来的安眠药？这显然是被谋害而死的，为什么不查出凶手？如此草菅人命，着实骇人听闻，国何以堪，民何以堪啊！

他还谈到自己和兄弟姐姐们这些年的悲惨遭遇，桩桩伤心事，催人阵阵泪下。

4月25日上午开追悼会的那天，我和林佳楣、余叔坐一辆

车同去八宝山公墓。胡明的灵堂布置得很好,四面摆满了花圈。正面墙上,挂着为胡明平反昭雪暨追悼大会的横幅;横幅之下、墙的正中,是胡明的大幅遗照。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有好几位副总理、部长和他们的夫人,有胡明生前的同事好友,以及其他许多同志挤了满满一礼堂。其中有不少是我认识的,可是我顾不上和他们打招呼了,因为我一看到明姐的照片,就想到她活着时坦率、乐观,笑口常开的样子,想到我们在一起亲亲热热,窃窃私语的情景,我的眼泪便从心头一涌而出。待主持者宣布开会、哀乐声起,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不知道谁在致悼词,更不知道悼词里说些什么,只觉得明姐从那照片里走出来,走到我前,流着泪说:"永别了,静妹,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于是我痛哭失声。一条手帕被泪水湿透了,拧干了再擦,又湿透了。旁边有人塞给我一条手帕,我也没抬头看看是谁,接过来便用,一会儿又能拧出泪水来。十多年了,积在心的对明姐的情感、哀伤,在一波和他们的孩子面前强压下来的悲痛与追念,今日全化作泪水,一下迸发而出。我真不知道,一个人竟有这么多眼泪。

追悼会开完了,我仍止不住哭泣。抬头看看给我手帕的人,原来是王光美同志。

我疲乏极了,虚弱极了,不得不在北京休息几天。

这日上午,一位我和胡明的共同朋友来看我,我们从胡明谈到一波,发了不少感慨。

"哎,水静,我有个想法。"她说,"胡明去世十几年了,你去问问一波,看他要不要找个老伴。如果有这个想法,我们帮他物色一个怎么样?"

"我这几天还是总想着胡明,感情还没转过来。我不忍心。"我说,"恐怕一波也还处在对逝者的思念中没有清醒,现在去问

他这些事，他会不高兴的。”

她想了想，也就罢了。

又过了一年多，我同尚奎因事去京时，那位朋友又旧事重提。我了解一波对胡姐的感情，了解他情操的高尚和爱情的专一，估计他是不会再娶的。不过，“少年夫妻老来伴”，年纪大了，有个老伴照顾生活的确是一种需要。因为孩子们再好，也不会像老伴那么体贴入微，他们不懂老年人的心理与身体的变化；何况他们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有一堆家务事，工作又忙，能有多少时间花在老人身上？所以，许多丧偶的老人重找老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支持的。

于是，有一次与一波闲谈时，我便趁机说：“有人要我来打听一下，问你需不需要再找个老伴……”

不等我说完，他就摇摇头。“我出来工作之后，别人介绍的也有，毛遂自荐的也有，信件和照片都一大堆哩，我全都拒绝了。”他很坦诚地说，“这倒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挑剔。不是的。我只是想，老来找伴，为的是彼此照顾，相濡以沫，这首先就需要感情。我看找上门来的，谁对我有感情呢？看上的是我的头衔，而不是薄一波。再说，任怎么找，也找不到胡明呀！”

我又追问一句：“那你真的不再结婚了？”

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决地回答说：“当然！”

我敬重他的纯正的、始终不渝的情感，钦佩他的明智的选择。他家有7个孩子，男孩子都结了婚，有妻子儿女，这么大一个家，除了明姐，谁能操持？我看到过一些重新组合的家，因为子女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闹得矛盾重重、鸡犬不宁，老人不但不能安享晚年，反而整日陷于烦恼之中，结果懊悔不已。所以我点点头说：“那也好。”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苦笑了一下。

此后，我再没有向他提这件事。我知道，他的不再续弦，主要是出于对明姐不变的爱。有一次，他出访欧美几个国家后回到北京，尚奎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为他道乏，并询问他的身体如何。

他回答说："一切都好，就是身边少了一个胡明……"

身边少了一个胡明，那是因为他心里永远藏着一个胡明。一个永远不亵渎这种感情、永远珍重这种感情的人，无疑是个高尚的人。

我更加敬重一波了，我也更为明姐而庆幸，有了这样一位丈夫，有了这么一份情感，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可以含笑瞑目了。

（水　静）

元帅府家事写真

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元帅只有叱宅风云的人生足迹，事实并非如此。朱老总的厚道、叶帅的重情……，使人们看到了真实的元帅。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

"水静,这几天你把东西收拾下,我们得搬家了。"尚奎对我说,"要抓紧时间,国庆节前一定要把房子腾出来。"

"好好的搬什么家嘛。"我说,"要搬,等秋凉以后再搬也不迟呀。"

"朱老总要在南昌住一段时间,我想,住我们这幢房子比较合适。"他解释说。

听说是腾给朱老总住,我立时就高兴起来。要知道,对这位名震中外的总司令,我还不曾见过哩。

朱老总是解放后最早来南昌的中央领导人。当时,滨江招待所还没有修缮好,江西宾馆也还没有动工,的确很难找到一幢适合他住的房子。我们住的原是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公馆,房子一般,只是院子较大,花木很多,且不乏名贵的品种。那时候,就算是南昌最好的房子了。朱老总要来,安排他住在这儿是理所当然的。

我立即动手,只带走一些日常用品和换洗衣服,其它东西都锁在不用的房间里。然后,又进行了彻底的打扫和必要的修理。待一切就绪,离"十·一"只差两天。

过国庆节不久,朱德委员长和康克清大姐便来到南昌,住进我们腾出的房子里。我们事先作了交代,不让他们知道是特地给他们腾出的房子,否则,他们是不会住的。

当天下午,尚奎便领我一道去看望朱老总夫妇。康大姐一

把将我拉住,坐在她身边,亲热地跟我说话。尚奎表示了省委热忱欢迎之意,并希望他们注意身体,因为十月初的南昌有时是蛮热的。朱老总非常高兴,他说他早就想到这里来,只是一直脱不开身。“八一起义之后,这是头一次来南昌。”他说:“旧地重游,感慨很多。南昌这几年的变化很大吧?”

尚奎简要地说了一下南昌的现状,然后对他们说:“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旅途疲劳了,休息几天之后,再慢慢地看,希望总司令对我们工作多指示。”说完我们便告辞了。

回家后,我对尚奎说,康大姐和我第一次见面,就那么热情、亲切,说话轻声细语,使我一下就感到她的关心和体贴,老革命、老大姐的特点,在她身上再明显不过了。尚奎笑道,算是你有点眼力。她是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是党内最为勇敢顽强的著名女战士之一。

“你看过毛主席1928年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没有?”尚奎问我。

“当然看过!”我说。

“里面有一段话你不一定记得。”尚奎说:“这段话是:‘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有八十个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

“你是说,康大姐就是那八十个革命农民里的一个?”我忽然想到康大姐是万安人,便脱口而出。

“对啰!”尚奎说,“井冈山时期的女战士现在已屈指可数了。”

于是,我对康大姐便多了一份敬爱。

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朱老总。我是在革命军队里长大的,可以说,朱德的名字和毛泽东的名字同时刻在我的脑子里。对于这位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中的名将,这位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和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这位驰骋沙场、戎马一生的伟大统帅，在我的想象中，一直以为是个高大魁梧、威武严厉的人物；一见面一交谈，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他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慈祥宽厚，分明是一位最愿接触人，而又使人极易亲近的长者。仔细一想呢，又觉得这是必然的，他使敌人闻风丧胆，却受到人民的钦敬、爱戴，这正是一位人民军队总司令的独具特色。

朱老总在南昌逗留期间，我和尚奎曾多次去看他。以前也听说过，朱老总喜欢兰花，却不知他爱兰爱得如此之深。在他下榻的我们院子里有片宽阔的草坪，草坪上长着几株很大的桂花树，这时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绿叶金花，有如夜空缀满了团团簇簇的繁星；那浓郁的芬芳，使人闻之欲醉。树下有一组石桌石凳，系青石凿成，清凉如水。往日这个时候，每到夜晚，常有朋友前来赏花品茗，纳凉消夏，直到深夜才带着浑身芳香缓缓散去。有时省里领导同志来访，也喜欢在这里和尚奎一道切磋政治，研讨生产，似乎这一块荫凉，几树馨香，能给人情思，予人启迪。

我发现，朱老总也挺爱个地方。他把几十盆品种不同的兰花从专列上搬了下来，分散在桂花树的四周，形成十分自然的点线组合。他经常坐在石凳上，时而仰视金桂的挺拔、凝重，时而俯看幽兰的潇洒、飘逸，恬静安适，怡然自得，像一个在辛勤劳累之余，欣赏自己的成功作品的老园丁。我们真不愿打扰他的雅兴。

有一回尚奎和我去看朱老总时，正碰上他和几个卫士、秘书在桂花树下摆弄兰花。他见到我们很高兴，拍拍手上的泥便来欢迎我们。康大姐听到声音，也从房子里出来了。于是，我们便坐在石凳上谈了起来。我对朱老总说，我很喜欢兰花的绰约风姿和淡雅清香，可是不管我怎么细心侍弄，总也养不好。他平时是沉默寡言的，听说我也是一个爱兰的同道，便慢条斯理、兴致

颇浓地对我谈起了兰花经。他说，兰花是一种很娇贵的花卉，既怕烈日，也怕强光，水、肥、土都要恰到好处，多了少了都不行，所以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有“春不入，夏不出，秋不干，冬不湿”的四大戒律。而且每年这个季节必须换一次土，否则它是不会开花的。

“来吧，水静！”他站了起来，说道，“我来教你怎么给兰花换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跟着他走到兰花旁边，蹲了下来。他拿起一盆兰花连土从盆中倒出，清除盆内残存的老土，仔细垫盆，换上已准备好的腐殖质土壤；然后是分株，剪掉烂根和病根，理直肉根，再植入新土。他一会儿就做好了，自始至终从容不迫，娴熟得像个经验丰富的老花工。我都看得入迷了。



朱德在成都驻地修整兰花

“兰花的品种很多，你喜欢哪一种呢？”他说着，一边搓搓手上的泥，缓缓走向石凳。

“我喜欢墨兰。”我说，“它叶美、花香，而且花上还有条形纹采，花上有花。”

“不错，只是比较难养。”他说，“兰花生长在深山幽谷里，它有自己的脾气、个性，一定要顺着它。否则，轻则不开花，重则枯

黄而死。"

"我种兰花,就是很难摸准它的脾气。"我说,"肥呀,水呀都没少给,松土、洗叶,时间也没有少花,可总是不称它的心。"

"兰花的生性是高洁、倔犟的,它讨厌浓肥大水,讨厌狎昵拨弄,讨厌喧嚣烟尘的纠缠。"他像以赞扬的口气谈论一个人的性格似地说,"所以它的香味清雅幽远,无与伦比,古人称它为'香祖','王者之香'。"

"喜欢兰花的不少,善于植兰的却不多。"我说。

"你要是喜欢它的香味,首先得尊重它的个性。"他说,"你要像朋友那样,而不是像主人那样对待它。否则,它就不会给你吐芳吁芬。"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觉得朱老总不仅是教我如何种花,而且是教我怎样做人。

朱老总跟我说兰花的时候,康大姐和尚奎在谈着她的家乡万安的事情。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当1959年夏天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时,我又见到了朱老总夫妇。尚奎把他们安排在"359"号。这是熊式辉在庐山的别墅。这幢房子虽然不像毛主席住的"180"那么有名气,在当时也是堪称一流的了。它的特点也是院子大,花木多,且品种都很名贵。尚奎认为,爱好恬静、喜欢花木的朱老总住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但是,还有些不放心,因为朱老总这时已年过古稀,不知能否适应庐山气候;房前台阶又很陡,恐不便于老人上下。所以一住下来,尚奎就领我前去看望。且喜朱老总身体硬朗,腿脚灵便,毫无不适之处。看来,这次到庐山来,他的心情颇为愉快。

"我这是第二次上庐山。"他兴致勃勃地说,"第一次是八一起义之前。当时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但汪精卫还没有公开与蒋介石合流。朱培德便采用'礼送共产党人出境'

的方式,把共产党员从军队中、从省会赶走了之。我这时只好离开南昌,准备到武汉去找党组织。可是一出南昌,就被敌人盯住了。所以一到九江,我便找了一个朋友,要他陪我上庐山住几天,借以摆脱那条'尾巴'。"

这是1927年的事。对那段历史我知道一个概略。当时朱培德对共产党这么"客气",是和朱总司令密切相关的,因为朱老总在滇军中威望很高,朱培德害怕过火的行动会导致军队离心。朱老总到九江时,滇军军长金汉鼎还召集部队列队欢迎,吹军号致礼,这是一种很高的礼遇。朱老总到武汉后,又根据党的指示,秘密返回南昌,和周恩来同志一道,筹划南昌八一武装起义,打响了向反动派进攻的第一枪。

"那一次形势紧张,肯定游兴不浓。"我对朱老总说,"这回可以从从容容地到处走走。"

他微笑着,点点头。

尚奎一再请朱老总好好休息,我们会常来看看的。康大姐则说:"你们客人多,不要为我们多操心了。"

非常遗憾的是,朱老总的良好心境不久就因彭德怀同志的挨整而搅得不能宁静……

朱老总对江西、对南昌很有感情。1961年冬,他和康大姐又一次来到南昌,这次住在滨江招待所的一幢平房里。他们住的时间比较长,尚奎和我还陪他们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那时南昌的春节很热闹,各个剧团都要上演崭新的节目或优秀的传统戏剧。朱老总特别喜欢江西的地方剧种,我和尚奎陪他看了好几次赣剧和采茶戏,如《秧麦》、《双拜月》等。因为心情很好,所以他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他还亲笔以正楷书写了两首给尚奎和我。

第一首只有四句:

南昌起义诞新军，
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
终归胜利属人民。

第二首长--些，写的是：

南昌过春节，镇日飞瑞雪。
预兆大丰年，人人皆喜悦。
春雨到田间，积水连阡陌。
三年大跃进，多建新工业；
满城气象新，十年大改革。
晚看采茶戏，夫妇同秧麦；
农家遗古调，姐妹双拜月。
军民互拜年，庆祝大团结。

总司令把《秧麦》、《双拜月》两出戏也嵌进诗里了。

得到朱老的赠诗，我和尚奎都十分高兴，并且立即送往北京荣宝斋装裱妥当，珍藏起来。可惜"文革"中被抄走，至今没有下落。

3月间，气候渐渐转暖，已是76岁的总司令不辞辛劳，又到临川、大茅山和井冈山视察。在井冈山期间，他攀山越岭，亲手挖了不少野生兰花，带回北京，打算驯养后把这些井冈山兰分送给国内外友人。

朱老总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嗜好是种兰。听说他早期在滇军中就酷爱兰花；革命胜利后，他年纪也大了，这便成了他的

一种高尚的志趣。他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种了3000多株品种不同的兰花，都是他长时间搜集来的，并且经常亲自侍弄。他的客厅、办公室、卧室，常有兰香飘逸。他到外地视察，专列上也要带着兰花。"文革"前夕，中央办公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全党发了一个通知，大意是养鸟种花，玩物丧志，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云云。于是朱老总把几千盆名贵兰花，一盆不留地给了北京各大公园，有的还送给了外省的有关单位。这充分地说明了朱老总的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他时时把自己看做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不过，我们听了之后，为此深深惋惜，硬让他与朝夕相处的兰花分手，他心里一定不是滋味。

我觉得，朱老总种兰花，既是一种业余爱好，也是一种健身活动，无论对自己、对社会都是有益无害、无可指摘的。

不养兰花了，对朱老总来说，只有一样活动可以松动松动筋骨，那就是参加舞会。他只跳慢四步，一、二、三、四，有如散步一般，舒缓均匀，而且准时而来准时而去。他德高望重，我们这些女同志都敬重他，只要在舞会上出现了，我和余叔、佳楣等人就一定要请他跳舞。他对我们也十分慈爱，经常主动邀请我们；有时因时间不够，他一支曲子要请好几位女同志跳，直到找遍为止。这是他对女同志的尊重。

总司令待人热情诚恳，爱护同志，德高望重，宽厚坦诚，尚奎和我到北京，总喜欢到他们家去看望，加上康大姐又是尚奎的同乡，所以来往也就多了。朱总司令、康大姐感情真挚，对我们非常关心。有一回日本在北京办了一个展览会，康大姐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可以降血压的内衣，便立即买了两套，托人捎到南昌，送给尚奎。她知道尚奎的血压高。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说明这种内衣的作用，并且告诉尚奎说："老总已穿过了，好像效果还可

以。”另外还送了一把小梳子给我，它非常漂亮，以致我一直舍不得用它，保留至今，以示纪念。

我们去北京，是必定要去看朱老总和康大姐的。他们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朱老总平常说话很少，但满脸堆笑，饭后又是水果招待。有一次给我们端了一盘印度尼西亚产的水果。那时我国跟印尼关系挺好，苏加诺总统和我国领导人来往频繁，经常会送来一些热带水果，以表示他的友谊。这回碰巧被我们赶上了，所以朱老总拿来招待我们。我从来没看见过这种水果，样子很怪，外壳很硬，紫红色的，比梨要小一点。我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不知怎么个吃法。朱老总看我，笑了笑，便叫康大姐为我们示范。我如法炮制，把壳敲开了。谁知这种外貌不扬的东西，里面的果肉却雪白鲜嫩，吃起来味美可口，满嘴生香。我问朱老总，为什么这种水果的外壳又厚又硬，而里面的肉却又水嫩嫩的呢？他轻声细语地告诉我，这是一种热带水果。热带有许多植物的果实都有硬而厚的外壳，因为它们要生存，要繁衍后代，就必须使果实里的水分不被蒸发，果实里的肉质不致腐烂，果实里的种子得以成熟，这就需要有一个外壳，一个硬度和厚度足以抵抗热带烈日曝晒的外壳。否则，它就不能生存，就要死去。我国海南岛的椰子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这是自然界的一种生存斗争，挂这种果的树显然是一个胜利者。

一个小小的果子都有许多学问，大千世界实在太繁杂了。

“文革”之后，我们再没有见到朱老总了。1976 年总理逝世不久，我和尚奎便到北京治病。8 月初，尚奎在北京医院动手术时，听说朱老总患感冒也在这里住院，我们打算过几天便去看他。可是 8 月 9 日清晨广播便宣布了我们所敬爱的朱总司令于头一天去世的消息。哀乐声声，催人泪下，尚奎和我悲痛不已，眼泪不止地流着。尚奎半天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心里很悲痛。



朱德和康克清

朱老总的后事被"四人帮"办得非常草率，他的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很小的礼堂里，举行一个范围极为有限的遗体告别仪式。尚奎脸都气青了，对我说："你去告诉医生，我要去向总司令的遗体告别，和总司令见最后一面。"

"到小礼堂还有很长一段路，你怎么能去呢？"我说，"你的伤口刚刚拆线，走多了路会重新裂开的，还是让我代表你去吧。"

"不，我一定要亲自去！"他坚持说。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找医生了。医生曾反复说过，杨老年纪大了，刀口恢复得慢，一定要小心照顾。可是我又不能拗了尚奎。他对朱老总感情如此之深，硬不让他去见这最后一面，他是决然不依的。我找到了吴慰然院长，把这层意思跟他说了；吴院长很理解老同志的心情，略一思考，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尚奎

坐在轮椅上,从电梯下到地下室,经地下室的通道推到小礼堂。就这样,他一步路没走就到了小礼堂了。

我搀着尚奎,在朱总司令遗体前深深一鞠躬,眼泪随之滚滚而落。总司令躺在鲜花翠绿之中,那么沉静,那么安详,似乎是工作疲劳后的一次小憩;又似乎他马上就要醒来,用那缓慢而亲切的轻声细语,跟我聊天,给我教诲,耐心地对我讲热带水果,手把手地教我种兰花,我的心如绞如割,眼泪滴湿了我的衣裳。我推着尚奎走到康大姐面前,互相悲痛地流着热泪,默默无言,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互相紧紧地握着手……

将尚奎送回病房之后,我说:"我得回京西宾馆去,我要为朱老总送行。"尚奎点点头,声音哽咽地说:"去吧,去吧。"

从北京医院出口到京西宾馆的马路两侧,挤满了臂缠黑纱、胸戴白兰的悲痛的人群。当我赶到宾馆的顶楼平台时,总司令的灵车已从远处徐徐开来。灵车四周,饰有用黄、黑两色绸带扎着的花球,垂着长长的丝穗。丝穗随着灵车的行进和哀乐的节拍而飘动,把人们的心都搅动碎了。有人在抹泪,有人在抽泣。我的眼泪在涌动,眼前一切都模糊了。我似乎觉得马路旁边摆满了兰花,总司令从兰花丛中走来。微笑着说:"兰花的生性是高洁的,倔犟的……你要喜欢它的香味,首先得尊重它的个性……"

于是,兰香拂拂,兰风卷起,护着总司令徐步而前……

(水 静)

叶剑英和马万祺谊深情笃

惊闻叶帅驾归天，痛失元勋意黯然。
赤胆忠心酬党国，鞠躬尽瘁效先贤。
安邦定国传千载，厚德真诚载万年。
有幸亲情垂四代，长江浪盼后推前。

这是1986年10月马万祺先生悼念叶剑英同志的祭诗。

马先生，广东省南海人，曾获澳门东亚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他是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他在企业界、文化界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有益于祖国的工作。他和叶剑英有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交往。马先生酷爱诗文，更喜爱叶帅的诗词，两位可说心曲相通。

早在30年年代，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初期，马万祺从要好的朋友柯麟医生那里知道叶帅其人。柯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叶帅大革命时期的战友，和叶帅一直保持着联系，相知甚深。他常常向马先生谈起叶剑英许多传奇般的革命故事，使马先生听得人迷，从此便十分敬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1944年以后，柯麟出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负责党的地下联络工作。马万祺先后任该医院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不久，广州解放。

叶剑英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华南军区、广东军区司令员，集党政军领导重任于一身。当时解放军在向广西进军和海南岛战役中，迫切需要从港澳向大陆输送一些急用物资，而当时从香港是较难，叶帅便指示侧重从澳门进口。柯麟医生及其弟弟柯平与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马先生商议。马先生听说是叶帅嘱办的事，立即行动竭诚协助南光公司积极筹办，并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大批粮食和五金、器材、汽油等应用物资，支援大军解放广西和海南。

1950年5月，欣欣向荣的祖国首次邀请中华教育会理事长马万祺和黄长水先生共同组织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回内地观光。全团由港澳工商界及文化、新闻、医务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组成，黄长水任团长，马先生任副团长。东风做伴好还乡，他们一行抵广州后，首先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叶剑英主席、方方、古大存副主席的热情接待。万马祺第一次见到叶帅就好像见到家乡亲人一样，无拘无束，倾吐衷肠。他虽然尚未见过叶帅，当他的老朋友方方和统战部长饶彰风等作介绍时，一见如故。叶剑英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嘘寒问暖，微笑着说："你为祖国做了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叶剑英身居要职，却平易近人，对海外侨胞和民主人士礼遇有加，不但设宴款待，还单独接见，亲到迎宾馆畅叙家常。他那时雄姿英发，谈笑风生，一派儒将风度。在交谈中，他敞开心扉，对港澳的爱国工作非常支持，勉励马万祺立足当地，团结大多数同胞，热爱祖国，支援祖国建设，并警惕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

马万祺这次回国观光，从广州到武汉、北京、天津、沈阳、旅大、长春、哈尔滨、南京、上海等十多个城市，并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李先念、李富春等同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

在离开广州，将去东北观光之际，马万祺欣然命笔，作诗一

首。“序”云：“余将赴东北观光，首途广州，蒙叶剑英主席热诚款待，亲如家人，作此志感。”诗曰：

北国观光万里行，广东首长意真诚。
迎宾馆叙家常话，赢得侨胞仰慕情。



1977年冬，叶剑英在广州与港澳知名人士马万祺（左一）、何贤（右二）在一起

港澳工商界观光团从东北观光回到广州，马先生和董事长倡议组织广东省政府和港澳海外侨胞合资经营实业公司，以推动海外侨胞投资，促进广东和国内的工业建设，发展经济。这个倡议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从此以后，马先生在叶帅的鼓励下，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内地参加祖国各类工业建设投资，参加物资交流会、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活动。1952年至1953年间，他经常应邀到广州出席会议，多次有幸直接聆听叶剑英讲话。他的演讲，或谈形势，或讲建设，或忆往事，或叙乡情，既实在又风趣，款款说来，娓娓动听。常常是讲今比古，妙语珠玑，引起会场上时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使马万祺激动不已。那时叶

帅工作极忙，在会议休息时间，特意和港澳人士联系，找机会和马万祺等交谈。每次会见，都使大家感到温暖，很受教育和鼓舞。他向大家介绍清匪反霸和工农业建设成就，时常询问澳门局势，并一再嘱咐马万祺要适应当地情况，与当地群众结合，树立长期观念。他还虚心征求各方面意见，凡是马先生和港澳人士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只要合理的，又能办到的，他都亲自料理。即使办不到的，也向他们解释清楚。那时马万祺听到中山县在土改中落实归侨政策有些问题，曾向叶帅反映，叶非常重视，当即答应调查，慎重处理，不久便落实了政策。

1954年以后，叶剑英从广东调回北京，与马万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马先生，经常捎信问候。尤其使人难以忘怀的是十年浩劫的那些岁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一伙即对叶剑英进行迫害。马万祺在澳门陆陆续续听到一些不好的传闻，听说老帅被打成“二月逆流”，孩子们也被投入监狱，感到十分不安。那时马先生的两个大孩子，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作，次子马有恒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林彪党羽得知马与叶帅的关系，便指使造反派拘禁马家的孩子，企图逼供“黑材料”，制造攻击叶帅的“炮弹”，孩子们断然拒绝了。叶剑英知道后，非常气愤，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仍排除困难，设法搭救保护马万祺的儿子，把他们接到住处，留在身边。他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亲自给他们讲革命历史，教他们读书学诗，嘱咐他们不要乱跑，还同他们一起游泳、打乒乓球，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马先生和他的全家每念及此，都感激叶帅的大恩大德。更令马氏夫妇和孩子们感激不尽的是，次子在叶帅身边滞留期间，叶帅十分关心他的婚姻大事，经与廖承志商量，为他介绍对象，后来与荣毅仁的娇女荣智婉订婚，结为秦晋之好。

1969年至1970年，马万祺的肺病发作，时好时坏。叶帅知

道后，特别关心，要他将病历从澳门寄来，并请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钟惠澜和在京的著名肺科大夫为马诊断。后来，叶剑英特邀他到京，又请了吴垣兴、钟惠澜、吴应凯及首都几家医院、北京结核研究所的著名专家教授为他会诊。马先生因为沉疴在身，心情急燥，提出只要可以做，就不如彻底将肺切除，剪除后患。而六家医院有五家主张做手术，一家认为可做可不做。最后报请叶帅裁定。叶帅询问病情，又仔细看了病历，劝马用医治肺结核的新药治疗，不赞成手术。马先生遵照他的意见用药，果然奏效。马万祺感动地说："这多亏叶帅的关怀帮助，使我战胜疾病，幸福地活下来。"

"文革"期间，只要条件允许，马万祺每年都要争取回内地一两次，只要有机会，每次回来总要去探望叶剑英。那时群魔乱舞，人妖颠倒，全国陷入极度动乱之中，他总是担心叶帅的安全，但马万祺没有料想，他每次看到叶剑英，叶帅都是那样没哲乐观，稳若泰山，即使在受到监视、"审查"那一段时间也是如此。从叶帅身上马万祺得到不少启示和力量。有一次他去看望叶帅，老人家身体欠安，他祝叶帅健康长寿。叶剑英点头致谢，小声默诵曹操的《龟虽寿》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叶剑英怕马万祺听不清，特意拉过他的手，在手掌上写了"老骥伏枥"四个字。马万祺心领神会，暗自想到年逾古稀的老帅，虽然不得已"韬光养晦"，但他对国家大事依然耿耿于怀，志在千里。

在十年动乱期间，叶剑英身处逆境，遭到迫害，但他逆流而进，勇敢搏击，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各种方式的斗争。

林彪"自我爆炸"后，叶剑英的处境稍有好转，仍在与"四人帮"苦苦周旋。征途坎坷，重任在肩。1973 年春，马万祺又去看

他,叙谈甚欢,马先生向老人家表示,以后每年至少看望他一次,祝福他“寿比南山”。叶帅听了微笑点头,表示谢意。这一年,马万祺写了《再祝叶帅寿辰》的诗。诗曰:

京华几度同欢叙,领益良多仰劲松。
大树堆风天可柱,将军怀抱海能容。
平生肝胆追红日,一片丹心透九重。
唐代汾阳功不匱,位高名显半儒庸。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北京人民为了悼念周总理,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纷纷走上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白花,发表演讲,朗诵诗篇,愤怒声讨了罪恶滔天的“四人帮”。“四人帮”慌了手脚,导演血腥镇压的“四·五”惨剧,扬言要抓天安门悼念活动的后台邓小平和叶剑英。其时,担任澳门乒乓协会会长的马万祺正率领澳门乒乓球队访问朝鲜,归途路过北京,又适逢叶帅寿辰,遂偕夫人罗柏心女士向正在“养病”的老帅祝寿。叶剑英此时此刻,见老朋友来访格外高兴,招待他们夫妇共进晚餐,暗示自己并无大病。“老骥伏枥”,依然故我。此次虽未多谈,但马先生伉俪看到叶帅依然那样稳健达观,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默默祝福他老人家劲松常青。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之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此危急时刻,叶剑英不负重望,挺身而出,精心筹划,在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马万祺在澳门欣闻这个喜讯,当即挥毫,作诗为贺:

电闪鬼狐警,将军一怒平。

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德厚人歌颂，风调物阜生。
鞠躬饮尽瘁，济济庆功成。

清除“四害”，举国欢庆。马先生当时喜不自禁，赋诗之余，又填《沁园春》一首，词曰：

锦绣神州，云驱雾散，一片光明。看红旗漫卷，妖氛扫尽，人心大快，举国欢腾。

启后承先，指挥若定，除“四害”深庆得人。兴中国，有宏才伟略，八亿同心。

工农秣马厉兵，树雄心壮志把天擎。
喜老帅安康，胸怀浩荡，狂澜屡挽，竭尽股肱。
放眼江山，恩情万种，八十年华盛誉享。
最难得，是忠心党国，社稷苍生。

打倒“四人帮”，人心大快，祖国山河，阳光普照。

叶剑英以耄耋之年，身负重任，全国扭转局势，拨乱反正，清除流毒，为振兴国民经济，健全民主与法制，实行改革开放而呕心沥血，尤其注重团结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开展侨务工作，推动祖国和平统一。1977 年 4 月 17 日，叶剑英以人大委员长身份邀请港澳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特设宴招待何贤、马万祺先生。马先生欢快异常，诗兴大发，写《欢乐宴》一首，回敬叶帅：

欢乐宴，
举酒千杯欢欣遍，
万众同心愿；

恭祝老帅长寿，
再颂国家强盛，
三愿宏图早实现，
壮志如虹练。

粉碎"四人帮"后，百业待兴。八秩高龄的叶剑英犹然风尘仆仆，巡视大江南北，研究解决四化建设问题。马万祺出于对叶老帅的爱心，陪同他到广州、珠海、深圳等地视察。马先生从叶帅甘冒酷暑，为国事辛勤奔波的实践榜样中受到教育和鼓舞，自己也处处关心祖国四化大业，献上一片赤子之心。

1978年3月，为了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欣起一个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高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来自全国各条战线上的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学者，济济一堂，研究制定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在这样一个我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会上，邓小平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叶剑英填《忆秦娥》词，特致祝贺。马万祺在澳门闻此盛会，依叶帅词韵亦填《忆秦娥》一首，为之祝贺。词曰：

赶科学，神州俊杰争飞跃。
争飞跃，必然王国，自由王国。
攻关勇向尖端索，雕弓敢把苍龙缚。
苍龙缚，卫星交响，红旗绰烁。

"人生贵相知"。马万祺在同叶剑英长期相处过程中，相知默契。他感到，叶帅待人处事，真诚厚道，廉恭和蔼。他常向身边的人员和子女说，叶帅兼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适应性这两种高贵的品格。人们都愿接近他，向他坦露心怀，"无事不可

对他言”。凡是和叶帅打过交道的国内外同胞都有同感，有口皆碑。

马万祺与叶剑英的友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血与火的考验，患难铸真情。他虽然远在澳门，但是一颗赤心是永向北京，向着叶帅的。每逢叶帅的寿辰，他总不忘记前去祝贺，即使因故不能亲自拜谒，也写诗属文，以为慰藉。

1980年作《咏老帅》：“指点江山情未已，叮咛后继倍依依。”1982年4月20日写诗一首：《恭祝叶委员长八十五寿辰》。

1985年，马万祺得悉叶帅卧病，极为忧虑，夜不成寐，书《怀念老帅》，以表达思念叶剑英的深情：

北望京华思老帅，平安喜讯慰心田。
气功谱就黄昏颂，温暖人间十五年。

叶剑英病情恶化，长卧不起，终于在1986年10月22日凌晨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举国志哀。“惊闻叶帅驾归天，痛失元勋意黯然”。马万祺立即发出唁电并与夫人罗柏心携子女离澳，赴京奔丧，痛悼这位由衷敬爱的一国元勋和良师益友。

叶剑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由邓小平题字的叶剑英半身石雕像、墓碑的揭幕和灵骨安放仪式，马万祺特地从澳门赶来参加凭吊，并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感怀叶帅同胞情》。文中写道：“敬爱的叶剑英元帅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追忆与叶帅相处的那些日子，想到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诲，不禁潸然泪下。”马万祺回忆往事，不胜留恋瞻望祖国建设形势和美好前景，由衷喜悦。他在文章最后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完全适合我们的国情，受到全国各族人

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拥护。祖国的建设成就辉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声誉日隆。1985 年和 1987 年间,先后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为台湾的回归、早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叶帅在天之灵,亦将感欣慰。这是他老人家多年的夙愿。叶帅对祖国对人民立下的伟绩,随着岁月的迁移,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的心中。"

为了缅怀叶剑英,这些年马万祺每年到北京开会,总是以深切怀念的心情去叶帅故居瞻仰,在他过去晤面叙谈的屋子里坐一坐,而且每每利用节假日邀请老帅的子女与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聚一聚,忆叙往事,启示未来。由此也可以看到,马先生对叶老帅的一片赤诚和爱慕之深。

(范　硕)

刘伯承少年时期的轶闻趣事

一、塾师是石达开遗将

100年前，刘伯承元帅出生在四川开县赵家场一个普通的农家。小时候，他叫孝生。

孝生的祖籍原是离此百里外云阳的姜子山。多年前，那里发了一场山洪，房田被毁，孝生祖父刘正富只好携老带幼，流落到开县赵家场，以租种田地为生，同时凭一手铁匠好手艺赚些补贴，故人称刘四铁匠。

刘四铁匠还是个多面手，通晓木瓦泥篾各行，他识字不多，却背得下好多圣贤诗文，自已也能随口编唱一些四言八句，尤为出色的是吹唢呐，遇远近人户有红白喜事都去吹打一盘。正是由于他勤耕苦作，心灵手巧，落户几年，便创下了一份家业，买了田地，扩大了铁匠铺面，还开办了制粉酿酒两座作坊，成了本地很叫人眼热的殷实人家。

孝生的父亲刘文炳，正是在这样家道兴旺的时候降生的。

刘文炳4岁时，刘正富便请来一位落第老秀才为他专设家塾，10年后又把他送到开县县城出名的大学问家熊老举人学馆里就读。又几年后，老举人向刘正富拍了胸口，断言文炳只要科场应考，必定大展青云之志。在老师与父亲一再促使下，刘文炳到27岁时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第一次参加了开县的县试。

他居然出手不凡，在数百名考生中名列第三，获得了贡生的学衔！

红榜公布当日，刘正富立刻在开县有名的酒楼大摆宴席，向熊老举人敬谢师恩，也请来不少亲朋同喜共庆。之后，刘正富又雇来了一匹高头大马，给儿子披红挂彩，由亲朋们一路簇拥着回赵家场。

一路上鞭炮锣鼓齐鸣，好不热闹。快到赵家场摆渡时，便见对岸站着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欢叫，刘正富得意地拂须道："文炳，看，乡亲们为你荣光，向你道喜来了！"

刘正富大错特错了，那里等着的，不是一支道喜的队伍，而是一支报丧的队伍，它不但报了刘文炳锦锈前程的丧，也报了刘正富的命丧，报了刘家从此败落的丧！

渡船刚靠岸，这伙"贺喜"队便拥上来。竟全是当地出名的地痞无赖，大约二三十人。他们头戴草编凸形"乌纱"帽，脖子上插两根笋草，敲打着瓦片石块，吹着骟匠的牛角，也簇拥一个骑瘦毛驴的"状元郎"——一个痴傻的披红袍的哑巴。等刘文炳下了船再次骑上高头大马时，他们也让那驮载着哑巴的毛驴与他并排而行，一路怪笑怪叫着走上了岸坡。

刘正富早已气得脸色铁青，肺鼓欲裂。他看明白了，今天这场合是当年曾与他争过地界，结下了冤仇的黄家所主使。他打定了主意不予理会。可文炳的5个哥哥平时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于是，刘家兄弟几位年青气盛的亲朋便放开了手脚，拳头耳光雨点般飞向无赖们！谁知，无赖们竟无一人还手，只抱头"唉哟唉哟"地叫。

刘家人中计了，竟然以为对手只是一群胡闹的耙蛋。殊不知，他们背后的主使者早有言在先：打不还手！事后验证，凡见一处红赏钱一吊，见一处血赏大洋一圆，无赖们哪还会怕挨打？

怕的只是挨得不重,见不到血。

于是这场官司使得家道中兴的刘家败落了!1892年中秋后,刘正富百病缠身,撒手而去。

两个月后,刘文炳的妻子周寅香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为纪念祖父,孩子取名孝生,这便是后来的刘伯承元帅。按公历算,刘帅生于1892年12月4日。到1992年正是他的一百周年诞辰。

孝生才到4岁时,父亲刘文炳便开始教他识文断字。头一课便是祖父的临终遗言:

读书知礼义,如礼万事明;
既读且耕种,田亩定康兴;
再莫应官试,无欲心方静;
但求人品贵,休问枯与荣!

刘文炳自己也是按父亲的遗言身体力行的。从此,他设在堂屋一角的两竹架书堆上方,出现了"泥脚人书角"的几个大字。他写得一手好字,常有亲朋来登门求字。刘文炳总是欣然应从。自那日后,他也总是落上名,盖上印章,用的也是妻子所赠别号:"泥脚书角主人"!

孝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小儿经》《千字文》。只要教过一遍,第二天晚上他准能一字不差背下来,儿子很乖又很要强。倘若不能按时完成父亲的要求,或见父亲稍稍表现不悦时,不待父亲说一句重话,自己的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掉,以表示他知错的羞惭与改错的决心。

刘文炳从附近的一座先主庙那里,请来一位正浪迹天涯的道士模样的人,给孝生当家塾先生,他叫任贤书,又叫老道公。

孝生启蒙之日，刘文炳按惯例请来了亲朋，门前张灯结彩，堂屋两侧，他亲手撰写了副对联：

打扫一片光明地，囊古旷今，研读经史，未可动功名之念；
休问四方兵戈事，修身笃行，唯求忠信，只欲望学问有成。

原来的柴草屋也修葺一新，另置了一大一小两张木床，两张课桌。两面墙上，一面是祖父刘正富的临终遗训，一面是刘文炳自己专为儿子启蒙日而作的箴铭诗文：

有儿意足，
一把茅遮屋，
虽使薄田耕不熟，
添个新生黄犊。
读书不为功名，
勤耕非求家富，
思忍、思退、思静，
甘作世间有识闲户！

落款是：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冬日，书于明昭儿启蒙日。泥脚书角主人刘文炳。”

这对联与箴铭已充分表达了他对儿子的希望，同时也是给任老先生的嘱托，按今天的话说，就是规定了一个“教育方针”！但刘文炳犹怕老先生领会不足，又一再殷切告诫：“我绝无令我儿青史留名的奢望，只是遵家父遗言尽我孝道，也使后人于乡党中立一人品，不欺人害人，更无半点伤天逆上之言行。当今世变

日多，政争兵斗纷繁莫测。望老伯切勿对他言及非圣上皇纲、礼义法纪所相容的朋党言论政见。所教均以礼义待人、勤俭养家、保身安命为要旨。三复斯言，望老伯体察我苦口艰心！”也就是说，刘文炳要用读书将儿子培养成为自己一样的一个泥脚夫子。



刘　伯　承

任贤书老人全都爽朗诵、痛快快地应承下了！

刘文炳又怕儿子不落教，专削了一块竹板，上写“格打勿论”四字。如今还置于拜堂的讲席之上。

其实这一切都与任贤书老先生的观念与教法，以及他留下来执教的目的全然相反。

这位任贤书却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他浑身都有赚钱的本事，就是创下一个大家业在他也并非难事。那么，他在这个穷家留居了七八年之久，到底为什么呢？为解开这个谜，只有先说清楚他的来历根底了。

任贤书何许人也？年青时赴过考，打过考官，愤而离家出走，后来投军、打仗，可他投的不是一般的清朝官军，而是洪秀全领导的目的在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军，而且不是一般的士卒，是天国大将翼王石达开手下一员统军之将。在他来到刘家的30多年前，石达开因不满天国内部将领们争权夺利，发展到互相残杀，便率领了自己麾下几十万人马离开了天王，想另找地地

方再建天朝霸业。经过万里转战到达四川西部大渡河边时，只剩下了万余人马，遭清军包围聚歼。石达开本人也被俘凌迟，只有任贤书等少数将士突围逃脱。

任贤书这番经历当年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人就是刘文炳。那也是他在家住了多年，与刘文炳虽称呼依旧，但已结下了亲如父子的情谊之后，又是在他已暗中决定回归洞庭故里之前。其间多年他守口如瓶，滴水不漏，这并非信不过文炳，而是不想给这个胆小怕事的人徒增心理负担。刘文炳也不负所嘱，从未对家人露过一字，只是在他临终前才告诉妻子。时任老先生已离去一年。刘文炳说出任老先生的这番来历，目的在他临终时给妻子留下的一句话："告诉孝生，世世代代勿忘任爷爷深恩大德！"

刘文炳妻子谢世时，清王朝已被"民国"取代30多年，她当然不隐瞒了，故赵家场的老人们几乎无人不晓："刘伯承元帅的翅膀，是任老道公插上的！"

不过，要说任老先生当初便料定了刘伯承元帅后来的伟大道路与辉煌功业，那就太"先验论"了！但不必讳言：任老的特殊经历，使他具有能从6岁的孝生身上看出他的某些特殊素质的慧眼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也才能说清楚他留下来的真正原因。

他为着这样的目的——把自己毕生的追求、学识与经验传授给一位后人，不一定是期望他再次举起天国的大旗，总也会怀着某种希冀的！但刘文炳却给他规定了一个只能造就一个书呆子、老好人的教育方针，他怎又违心地应承了？不，他只是暂时敷衍地应承了，心中却已经想好一个说服他改变这个方针的妙计，不过要等几年才行使。目前，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打好文化知识的基础，所以这应承又不是违心的。

仪式之后，由老师设堂开教，蒙师与学生上下坐定，其余人

则按尊卑长幼各就其位，静听老师讲课，等于是今天的教学观摩，以察看老师的教学能力。

老先生走上高高讲坛时，先举起戒尺，威严地喊道："刘明昭。"这是刘伯承刚取的学名。

坛下的孝生好生紧张，慌忙应道："嗯。"

任老先生一板打在讲席上："要立起来答：学生在！""学生在！"孝生连忙立起，低头轻声应答。

"要抬起头！记住，今后无论坐立行走，都是长者先，幼者后，长者呼，即刻应，如有问，先鞠躬。懂吗？

"懂。"

任老先生接着给学生领读《论语·学而篇》：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他以浅近、切实、亲切的语言把这段课文讲解得清清楚楚，使得在座亲朋都听懂了。

喜宴之后，送走了亲朋，一老一小的师生回到他们的居室小屋，孝生回身闩上门，一头倒在铺上："我的妈呀，今天把我的魂儿都吓脱了！"

任老先生则静静地站在屋子中间，看着新筑的粉白四壁，铺上软柔柔、齐崭崭的被褥，明亮亮的灯光，暖融融的炭火盆，香喷喷的一碗茶正置于他的书桌上。一切都好似孝生父母向他捧呈的一颗热腾的心，这是敬师的心，又是爱子的心！老公想着看着，禁不住满腔热泪滚滚而下。

孝生骇然从铺上挺身而起："爷爷，你咋个哭啦？"

老道公坐在他身旁，将他紧紧搂在怀里："爷爷高兴，是我有一肚子快憋爆了的话终找着一个人说了呀！孝生呵孝生，爷爷一天不死，就给你讲一天！"

6年后，12岁的孝生已成了一个肩宽臂粗的大小伙子，比同龄人要高大些，壮实些。他变得更不爱说话，嘴总抿得很紧，脸上总带着温雅、沉稳的微笑。

6年来，他一直与任老道公朝夕相处，就像他的影子一样形影不离。在小室内一道学习不用说了，如今孝生还要负担田地上的一半农活，因为母亲接连生了几个弟妹，家事就够她忙的，父亲近年又得了咳病，天寒时气都喘不过来。一应的农事重活凡孝生能替代的都不等父母支派便主动承担下来，老道公则总是与他同出同归。劝阻是无用的，"我一人在家闲得慌。"他说。此后，一家人只好随由他。不过，道公也日见衰老，只能给孝生当个帮手。两人也常去深山采来竹石，孝生不但跟爷爷学得了刻笔筒制石砚的功夫，而且在技艺上还略胜一筹。每隔十天半月，爷孙便一起到赵家场赶集，卖了东西买回油盐杂品，再同饮一碗茶，共分一块油饼，彼此都视为这是最快活的享受。

越到后来，刘文炳越不大过问儿子学习上的事，对自己原先规定的教育方针，更是忘到了九天云外。不是对儿子不关心，也不全是他精力上顾不过来，而是对老道公的无比信赖。经过几年来的接触观察，他已充分认识到老人的学问见识比自己高强得多，人品上更令他高山仰止，把儿子交给他完全放得下心。何况儿子的成绩无可挑剔。他写得一手好字，偶尔看过他的诗文也还词达意顺，颇见笔底波澜；农事上样样在行，肩上压的是他这样的年龄本来不应担也担不动的重担，真可谓耕读并重，文武都还来得。他时时默默望着儿子的目光，不仅是心满意足的，还带着感动与怜惜之情。

一天，刘文炳向老道公提起，父亲死后分家，几个兄长占尽好田好屋，却将他分在这半山之上的茅屋里，又是那样几亩费力大收成低的荒田旱土，不免心中便忿忿不平，但还是遵循了"兄

弟分家，含糊相让”的古训，忍下了这口气。如今膝下添人进口，自己又落下了病痛，眼见温饱已难以为继，便萌发了想邀约几位亲朋与诸兄长理论一番，讨回一个公平的念头，问老道公意下如何。

不想，道公却发出了大不以为然的“怪”谈：“文炳呀，你自己好生看看，你占的一个什么样的钟灵宝地呀！你的屋基背靠华山，山形如一把圈椅靠背，这草房是不是坐落在椅垫当间？你再看，前头下方台地岂不正好如同踏脚，那绕成半圆、波光闪闪的浦里河，像不像蔚然天成的黄金护链？你再放眼远望，接山连天的稻田里无数谷草垛，多么像一齐向你静肃待命的军帐，其间赵家场连肩靠臂的屋宇，又多像翘首回立的庞大战马阵群？”

刘文炳举目望去，也不由得一阵开怀大笑：“哟——，真是的！这些年原来我坐在一把金交椅上哩！”

“不单是金交椅，还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帅席宝座呢！”

刘文炳信鬼神但不信风水，他以为道公这话只是一句笑谈戏语。道公却仍一本正经慨然道来：“老夫看了几十年风水了，却还从未见过如此大好气象由一家占据的佳地！实实对你说吧，那年我一脚踏上你的门前，心里着实吓了一大跳哩！这儿，将是一个出将入相之地呀！还似有神灵在冥冥中昭示于我，这华盖宝运，大概就应在我一见就觉得气宇不凡、当时正拉着我手的小人孝生头上！也就在那时，我就打定了留下不走的主意！当时没说出来，怕的是你误解我这流浪老汉想赖在你家里呵！”

刘文炳还是不信，却又觉得这话十分中意入耳。

“可惜，他不该生在一个吹鼓手之家，连老子进了县科也被除名，还敢指望他出将入相？”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自古来英雄豪杰起于艰难竭蹶之家，苍天松柏长于风摧雪覆之地！文炳呀，你可不要误了儿子的天

道好运,挡住他的追风腾云之路呵!"道公这时不但更加严肃认真,而且有点气哼哼的批评刘文炳的意思。

"爷爷,你老今日咋个,生这大的气?"

"我生你的气!孩子发蒙之日,你就用铁链把我手脚捆得死死的,动都动不得。我怎不生气?"

道公拉着他一一看了依然留在墙上的对联与书幅,"你自己看看,又是'休问四方兵戈事'',又是'甘当世间闲户'……你,不单把我捆死了,还在自己掌心划了一个圈,让一世千里马只能在这个圈里跑。你呀,气得我当时就想不辞而别。"

"爷爷,这些,都是娃儿他爷爷临终时训言再三的呀!"

"令堂大人,你,都是善良本分、谨遵先贤圣哲教诲、秉承了我炎黄祖先美德的好心之人,今日,我既然挑明了,泄露了天机,你能不能相信我?总不至于把你儿子往邪路上指引吧!能不能允我按天道所示,让你的千里之驹任其意志、竭其全力往前奔驰?"

"爷爷,我悉听尊意!但愿天佑神护,果能如你老所言,那才是万幸万福啊!"

老道公与刘文炳这段对话,是真有其事,还是后来的文人墨客根据刘帅已经成为名震中外的伟大军事家的事实所杜撰?据开县几位长期研究刘帅生平事迹且著述很多的同志说,家乡父老中所有关于刘帅的传说数这个传说是一致也最广泛。但他们一直不敢把它写进书里,怕把老道公写成了一个先知的神灵,更怕被疑为宣扬封建迷信。但他们确信这段对话千真万确!是老道公真是个神,世上真有风水之说?不,不是!是老道公为了打破刘文炳给他规定的"教育方针",取得对少年刘帅的教育自主权才说出这样一番话的!至于他自己是否真相信风水之说则又当别论了。笔者深以为然!

老道公虽蛰居于这深山小镇，但对于当时国内外大事还是颇有了解的。他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窗口便是赵家场新近设立的一个书报邮传行，每逢赶集卖得笔筒之后，常到这里浏览一下贴在墙头的《京报》《国粹学报》《申报》《渝报》等等，时或也花三五文钱买几张带回来。老道公眼花看不清，便叫明昭朗读。久之，明昭对这些时闻报纸也发生了莫大兴趣。

老道公由这些报上得知，当今列强勃兴，得益于科学之逐日发达，赖此方得制造出尖利兵器，而后方有其国富兵强之今日。近来使老道公寝食不安的是，他愈来愈明白，欲使明昭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栋梁之才，仅凭古籍书本与自己的经验常识，是不能使他获得必要的充分知识的。唯一的途径是适时送他去就读新学，始能懂得当今科学的根基学问，也便是报上所说的测算、物理、化学等各门学科。但刘文炳目前的家境是决计做不到这一点的，老迈无力的他更只有望洋兴叹！

殊不知吉人天相，一位贵客适时到来，带来了老道公认为是天从人愿的好音。

这是一个晴和的冬日晌午，一乘小轿停在竹篱外，走下一位着青贡呢长衫、团花马褂，戴软边礼帽，架一副金丝眼镜的人。

刘文炳端详良久，才激动地大呼："华英大哥！"连忙捋下泥裤管，抹了下并不存在的马蹄袖管，一腿前伸，一手触地，行着见面的大礼。来客也适时躬身从地上将他拉起来："都什么年头了，老弟咋还讲这种腐败的礼仪？"

来客与刘家老少一一拱手见面时，当见蹲在竹篾中慌慌地立起、手里还拿着刻刀的老道公，不等文炳介绍，便一个长揖到地："想这位便是任老世伯了！"又不待对方说话，便说："老伯，我一到家，逢人便听到你老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真是慈颜仙貌……幸会幸会！"

刘文炳忙向老道公介绍客人。

来客刘华英，是早年刘文炳在开县熊老举人学馆读书时一位同窗，本县灯草坝人氏，世家出身。两人本不同宗祠，但因彼此敬重，意气相投，多年相处莫逆，后又从各自家谱上查得同宗渊源，其后更是亲密无间，胜如兄弟。刘华英去过日本、南洋，现时弃商回乡办了一所的汉西学堂。

“听说大哥的生意正红火着，咋又想起办学来？这不是丢下金饭碗，端起泥钵钵么？”

刘华英便由这话题纵论天下大事，由此而言及他此次回乡办学的抱负。

他说，据他对当今世界多方深研细察，凡列强之崛起，无不发端于变法维新。尤其东瀛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以区区三岛，勃然而兴，而今竟能称霸东亚。我们老大帝国，若要精励图强，只有以力学日本维新为方法、为目的！而维新之举，百端待兴，首端又在于兴办教育，开启民智，使国家英才辈出，而后方可进而兴办实业，以科学手段促物产丰富，兵器先进，使得国富兵强……

刘华英正谈得兴致勃勃，坐在矮板凳上刻竹筒的明昭突然抬头问道：“大伯，这回皇太后也出来讲维新，会不会又像前几个那样，到出拐的时候又把底下几个承头的维新人士抓来杀头呵！”

刘文炳对儿子这番话本身已吃惊不小，更对他居然斗胆插言，且带着质询口吻，便怒不可遏道：“你算哪把夜壶！嗯？……”

刘华英却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呀——不用说，你就是人人道及的我们任老伯为我家文炳培养出的那个少年才人？好，好！端的是出口不凡！叫什么来？”

赤脚的明昭慌慌从竹篾中立起，讪讪答道："刘明昭！"

"说说，你从何得知皇太后圣上如今也力倡维新，得知前几年维新失败之事？"

明昭说了他所以得知一星半点时闻，是爷爷常从赵家场书报邮传行买回报纸，叫他代读而来。

"讲维新的也不过是一些想救国救民的天真汉子，其实是办不成什么事的。中国之弱，外有列强，内有腐败，当朝对列强卑躬屈膝，对百姓苛政如虎……大伯，我对你不生疏哩，我看过你在《渝报》上的文章……所以才敢给你说，我不……不大赞成维新哩！我赞成'欲御外侮，先驱家贼'的主张……"

"依我之见，维新也罢，革命也罢，办教育则是两边都赞成的，开启民智对中华古国之复兴总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你吧，明昭，如不是有任老爷爷循循善诱，哪得如此通达世情，你说是吗？"

刘华英的到来，老道公喜出望外，如能让刘华英答应收下明昭这个学生，并资助他的学习与生活费用，岂不是明昭从此插上直搏九霄的翅膀？

老道公心里还有个想法，如明昭今后的学习有了着落，他也该乘时归了！这些年在外头飘零，对于故乡的思念无时稍释。前几年怕官府追究罪责，如今老了，眼看来日无多，纵有什么不测之事也无所谓了，只要死前还能看一看别来50年的故土与亲人就行。主意已定，他子饭后对刘华英说："他大伯，老夫有一事想单独与你说说……"将刘华英拉进了他与明昭所住的偏房。

刘华英一脚跨人小室时，便由这简朴的斗室内浓烈的书卷气氛吸引了。几架竹柜井然有序分类置放着经史诗文各类书籍，正欲细看书目时，墙上一则笔增龙蛇的书幅更醒目地扑人眼来：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霄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
光绪三十年秋，刘明昭书录唐人李贺诗以自勉

"这是明昭写的？这娃儿，何来一手大人的笔功？"

"你先不忙看他这支大人的笔，看他这颗大人的心吧！"老道公从一个藤条箱里取出一本抄写得工整的诗本，题名为《少年征夫刘明昭习作》。

刘华英打开诗本，便迫不及待站起吟哦道：

昨日听客议，中原烽火急；
狼兵去复来，路尸相枕藉；
城廓毁炮火，千村化尘灰；
议罢复长叹，恨无龙城将；
仗剑救黎元，挥师卫帝乡；
窃惦私谓客，勿乃太悲伤；
但看三五载，杀敌有刘郎！

刘华英举本高叫："好，好！此李杜再生之才耶！"复又吟道：

运煤去山北，窑工面皆黑；
矿主颜如珠，非是吸人血？
……

"大伯呀！此子可畏呵，乃文炳之幸，我刘氏宗亲之幸！我真想给你老磕头谢恩哩！"刘华英两眼闪烁，激动不已。

"他大伯，我有句要紧话直言相告吧，文炳身患顽疾，这个家的杠辘我看他是再拖不动了，再拖怕是哪天会一蹶不起。……你莫如将明昭带去你的学馆就读，一为不让孩子断了深造的机缘，二也能给这个家松松担子，学费、食宿上的花销，只好由你这位大伯担承了……"

"这毫无问题！老伯，刚才我就想说这话了。转念一想，我的学堂新办，师资虽有，但谁有你老伯的学识与教力？将孩子从你老身边带走，只怕会误了他，大伯，我看还是……"

"不行，不行，老汉自知，当今西洋人赖以建造邮电、舟船、铁辙之车与新兵器的诸门学问，我都是个白丁，如再以我之所知施教，至多成一个志大才疏的清谈客，而与世界进步相去万里之遥。大伯学堂之兴办，乃明昭前生修来的洪福，枯苗逢雨之佳音。况老夫今年70已过，快入土的人了，还能陪他几时？只有将孩子托付给你了。此后来日之成未可料定，但他决非忘恩负义之人，必将对你大伯结草衔环以图报……"老道公当然不会把他将离此归乡的意图说出来。

"好好，既如此，就包在我身上了！"刘华英爽快地应承了。"过了年就叫他去应考。"

老道公欣喜得两眼泪雨纷纷，仰头对天喊道："上苍呵！你还是有眼的呵！以千载难逢之天时、地利、人和赐予明昭一身，莫非你欲降他以大任么？"说完，又向刘华英长揖一礼。

刘华英捧着老道公的双手，早已热泪盈眶："老伯，有你这番话，我更得竭尽全力，决不负老伯重托！"

这年，开县县衙将举行第一次新学堂优秀的免费保送开县高等小学堂或夔府学堂。刘明昭以五名优秀学生中的第一名去

参加会考。

刘华英又特地赶来告诉刘文炳说："各学堂同时可推选年龄45岁以下的教师去应试，对其中优秀授予贡生学衔。汉西学堂推举了三名教师，其中有你刘文炳。"

刘文炳不加思索，便断然一挥手："大哥，你饶了我吧！打死我也不得去！"

"去不去由你，但你得听进我的几条理由：第一，名正言顺，名单上有你，不是现写上去的，早有呈文在案；第二，本学堂原推荐的三名应考教师中有一人父亲新丧，循例于服孝期不能应考，评议会首席判卷还是我们刘老山长，有他玉成，录取当是不在话下，这又并不是他欲弃权舞弊，而是他深信你的才智学识必能写出令众评议与考生心悦诚服文章来！你以为如何？"

刘文炳一时只觉得脑子里轰轰然，又是怦然心动又是疑惑重重，刘华英突然向他敞开的这道门，无疑是出自他和老山长深情的关切，但到了这个年纪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贻笑大方……

"好，你自己细细思量后才回我的话吧！"

刘文炳细细思量的结果，还是父亲的遗言占了上风——"再莫应官试，无欲心方静，但求人品贵，休问枯与荣！"

"大哥，我还是决计不去！土埋半截的人，要它功名何用？再说，我不信当真是皇上新政牌子亮出，端的便世道大变？"

刘华英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摞报章，指点着念着：

"'变法之行，宜以材兴学为第一要务！科举为外人诟病，学堂乃为新政之大端，亟待毅然决然，舍旧而谋新，必风声所树，士人观听一倾，推诚相与……'这是张之洞、袁世凯等政要大员向皇太后的联名奏章。故皇太后才有此废止科举、改由学堂选拔人才，授学衔补仕林的诏文。御批可是毫不含糊的，按照所陈，择要举办，宜以办学举材为先！文炳，你那番顾虑实实是不了解

世情而生偏狭之见呀!"

刘文炳终于将这番话听进去了,点头应允了!

却没想到,这一次应考比他十几年前的那次,招来的是一场更大的惨剧!

考场仍是十几年前刘文炳参应县上科试的文庙,如今也改为一座学堂了。建筑颇为雄伟,庭院间松柏成荫,三面都是大敞厅,厅内已特为这次会考用屏风隔了一间间考座。

考试时间未到,考生们都聚集在松柏下闲谈。

刘华英将刘文炳父子特意打扮了一番,服装是连夜赶做的,颇华贵而高雅。刘文炳着一件竹青色锻面夹袍,外罩一件高领对襟黑条纹呢背心,脚下是黑色牛皮的朝元鞋。论装束可说是在考生中最阔气最新式的。但现在这身打扮实实把他害了。下得轿来(轿子自然也是刘华英执意安排的),跨入大门,一见这众多陌生的面孔,他就觉得浑身刺挠!加之过于华丽的服饰使他显得不伦不类,一下子便引得别人投来专注而异样的目光,成为众"视"之的!人们都好像无声地在相互发问:这是个什么人?是当官的老瘾犯了么?他没认得的人,只好形单孤干站着,手脚怎么放置都觉得不对头。

只有儿子一直立在他身旁,也只有儿子一眼便看出他内心的紧张与惶悸,却又找不出适当的话对他说,只是眼巴巴看着如芒刺背的他,目光是意味深长的,像是怨责他不该如此羞愧,又像是在鼓励他应当挺起腰杆来,落落大方些。

好在,铃声响了,他跟在人后进了考场,按自己的编号找到了考座。一接到考卷,他便顿时地轻松自在了,今天是第一堂考试,试题是《人间闲话之琐记并随感》。试题试卷都是夔州府衙发下,当堂才开启火漆封泥的。但这题目却早被当过县上教谕的刘华英猜到了:无非以民声皇德再颂新政之亟待施行。也如

当年熊老举人在他第一次上考场之前一样，告诫再三，捡朝廷诏谕中的话，不惜“膝头”苦，笔下三跪九叩，多喊万岁，未有不成好卷之理。况是文炳久居乡间，熟悉民情，深爱田园之美，于这笔上极富古人的现成溢美之词，写起来竟是不费吹灰之力，且声情并茂，一挥而就。更因他想考后再不受人侧目，在有的人还刚刚下笔时，便第一个交了卷，匆匆走出考场，钻进了停在大门外候着的轿子里。

次日，刘华英还不等复考名单公布，便从内部得到消息，刘文炳的初考试卷，在应考教师中名列第一，刘明昭的名字也在复考学生名单上。

由于在初考中一显身手，刘文炳自己也隐约有了一点宝刀不老的自信感，到复考之日，他一大早便起来了，洗漱停当之后，换了一身朴素合身的衣着，又焚了一炷香，暗自对天祈祷，保佑他这回如愿以偿，只求得一学衔，决不做官为宦……

谁知，在他临起身欲赴考场时，刘华英匆匆赶来，在门口将他堵住，说：“兄弟，且不忙上轿，我有话同你说。”

两人回客房坐定之后，刘文炳不免大吃一惊！这位华英大哥全无往天那种春风得意、笑口常开的神色，现时却沮丧、委屈。

“咋啦？大哥……”

“兄弟，你……今天不去考了吧。我……我没想到……没想到……上头查出，你……你并未到我的学堂报到上任，所以……所以是不能作数的……”刘华英声声哀叹。

刘文炳虽感扫兴，但以他说的原由并不怀疑，更不想令他难过，便说：“这也是实情中事，大哥，这回我总算了却你的帐，也解了我一身的绑索。有明昭参加考试，或能得个免费外学，我就阿弥陀佛了。”

正说着，明昭跑来了：“大伯，我……我也不考了！”

刘华英不待他说话，拉着他就往外走。不料，明昭就势坐在地板上，掩面大哭："不，我不考，不考……"

"明昭，大伯不叫我考，是人家说我在学堂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你是汉西学堂正经推举来会考的学生，为何也不考了？"

明昭哭得声咽泪噎，断续道："爸，一伙人今日一早在考场门口贴出了白头帽子说：倡优皂隶人的子弟不许应考，今日再有欲图混珠鱼目，他们就拒考……"

刘文炳一听，登时便身子剧烈摇晃起来，刘华英忙上前将他撑扶住，他的两腿已僵直得提举不动。刘华英又拉过近旁圈椅让他坐下，却听得"扑通"一声，他像一柱枯柴似的倒下了，口里涌出大股大股殷红的鲜血……

明昭此刻唯有天塌地陷般的悲哭与呼号。对父亲在他出生前曾在县考中得第三名而后因是吹鼓手出身被除名的事，他是从父亲口中听说过的，但略而不详，后来又听华英大伯说了十几年前那桩案的始末，他才完全明白过来，却已是后悔莫及了……

刘文炳在县上客栈睡了几日，才雇了一乘布轿，由明昭陪同着回到赵家场来。

到家后，明昭母亲似也早得了信息，并不惊惶也不怨恨，更未哭泣，将丈夫迎入了她早已熏了檀木香、洒了石粉、铺好干净被褥的屋子里。

明昭早已在心里纳闷，为何不见道公爷爷身影呢？等把病人安顿妥帖后，母亲才对他说：

"你们走后第二天，爷爷说他要去一趟开县给你爸买几味药，不知为啥还不见回来……"

明昭不等母亲说完，心里便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连忙跑回自己的小屋。发现在自己的枕头下留有一张字条，上写：

明昭：

吾之来，已告汝父，吾之去唯茫茫天地可知！未敢告此去何方，实吾自身也未卜来日凶吉，唯有以此残命委之于天而已矣，更不欲汝今日时常记挂，来日徒劳奔波。有生之日，吾与汝两心为一，非万重关山所能阻隔也。

明昭，吾之爱孙，爱弟子，爱传人，临行千呼万唤，唯有一愿，望牢记吾平日所教所望，吾纵将丧之沟渠，葬身荒野，亦将笑而无憾矣！

任贤书叩拜谢汝父母

光绪三十二年清明前夕

明昭读完此信，顿觉小屋内凄风四起，寒气透骨，室中所有物件都令他想起往日的一切，都令他意识到这一切从此都一去不复返。他不敢哭，怕父亲知道老道公悄离去，再添悲痛，加剧病情，唯有两行热泪涌泉般向下迸流。

直到这日午夜，当家人都已熟睡，他才奔至浦里河畔，面对滚滚江流，哭倒在地，撕心裂肺般呼喊着："爷爷——我的爷爷！……"

刘文炳自那日被背回家后，再也没离过床。一年之后（即1907年初春，明昭还不足15岁时），便怀着对面前这个世界的满腔愤恨，对妻女的无限疚愧，对一大群儿女如焚的焦愁与深情眷恋，大睁着双眼离开了人世。

他只活了45岁。其中竟有20多年是在寒窗苦读中度过的。他熟悉中国经典古书的每章每页，能背诵下其中的每篇为历代公认的范文，能写一手好诗好字，最后却只能将这一切遗憾地带入了坟墓。

但他决非毫无意义地白白活了一世，什么也不曾留下。不，他留下了也许是对于中国后来的历史具有非同小可影响的遗产。这便是他用自己一生的足迹，用自己的血给儿子明昭写下了一条教训：圣贤书里找不到穷人的道路，封建科场不是他们的进身之处；他也倾尽心血，同时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在儿子身上灌注了一个上等人品的人所应具有的一切美德。他所遭逢的不幸又从反面向儿子证明：与世无争，只求自己当个好人并不能使自己从此便得以安宁清静，退隐田园为一家温饱勤耕苦作也终于不能如愿以偿！儿子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有智有才、善良勤劳的父亲的教育，又有他的悲惨经历的借鉴，才有他自己后来所选择的伟大道路，并创立下与日月同辉的不朽功业。

当然，还应当看到，刘明昭最初的觉悟与成长，不止得益于父亲，更得益于他有幸与一个太平天国将领朝夕相处七八年之久，将他毕生拼搏与思索的成果于数千个日夜不息的传授中点滴不漏地接受下来，在文武韬略上奠定下最早也最坚固的基础。刘伯承元帅，这个盖世英雄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有着奇特的天赋与良好的启蒙环境，而是与他后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父亲死后，刘明昭在刘华英与岳父程昌华资助与强行促使下，在汉西学堂、开县高等小学堂、夔府中学堂又读了三四年书。

其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的革命浪潮已在各地风起云涌，各地群众自发性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发生。刘明昭早已在教室里坐不住了。在他16岁时赠同学的一首诗写道：

少年狂夫吞声哭，
泪眼望断巫山雾；

脚底波涛头顶雨，
难浇心中恨与辱；
惜无双翅御大风，
觅我赤心报国途。
……

又过了二年之后，刘明昭终于走出课堂，告别故园，走上了投笔从戎的报国之途。

二、元配夫人程宜芝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节期间，13岁的刘明昭参加了开县灯草坝汉西学堂的入学考试。

汉西学堂将开设各类新学科，以培育皇上诏书所示之维新政体所需的各项人才。由于主办的监学是当地素有文名且家资富厚的刘华英，堂长与教员都是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故而吸引了数百名学子前来应考。

学堂分甲乙丙丁不同等级班次，相当于今天的重点小学。

明昭虽中了该学堂甲等一班第一名，令所有考师颇为难的是，他的成绩似乎应直接上中级学堂更合适些。但刘华英还是决定收下他。私下打定的主意是请几位老师在測算、自然等课业上给他另开"小灶"，来年再作打算。

正当明昭欢欢喜喜准备着行装，等开春之后便去入学时，又突然冒出了一件使他很意外的事来。

明昭早听妈当笑话说起过：他出生时便定了一门亲事，女方姓程。此事还是爷爷丢下担子，将他一气背了几十里送回他家，救了那人一命。此后两人换了兰谱，结兄弟，还言明日后两家孙辈有年龄相当之男女，再结生死之缘。程女先明昭两年出世。

等明昭下地，程家爷爷便将她的庚帖送来了。其后，程家爷爷去世。本来就有多代人得过文武功名的程家一直比刘家富裕，近年又越发兴旺了。女父程昌华考中过武秀才，又捐得了一个什么官衔，家有上百亩良田，场镇上还开得有砖瓦窑和匹头铺，日子很是红火。相反，刘文炳在父亲去世后处境每况愈下。到近年，两家的往来已完全断绝。刘文炳更是自惭形秽，哪怕在场镇上碰上程家的人，也故作不认识。至于程家爷爷当年送来的孙女庚帖，早已不知丢哪个旮旮角角去了。即或找到，刘文炳也决不会把它当一回事的。

怪事便出在汉西学堂张榜公布刘明昭考中甲班第一名之后，刘文炳虽心中欣喜万分，却因那年自己得中县榜，获贡生学衔，竟因当过吹鼓手的卑微家世被除名，受尽屈辱的往事记忆犹新，再不敢丝毫张扬。只妻子周氏煮了一碗荔枝圆蛋强压着儿子吃下(按旧习俗，这是儿子来日状元及第的意思)，别无表示。但事过不几日，竟有一位稀客来登门祝贺："亲家，恭喜恭喜啦!"此人便是程之父程昌华。

程昌华坦诚说出自己此来的根由与用意："令郎年幼志高，我想请你父子明日到寒舍一叙，也让小女见见她的换帖人，你看如何?"

"岂敢岂敢，不瞒义兄，文炳尚不无自知之明，实在是不敢高攀!"刘文炳称义兄，意在使对方明白，他不因父辈前言而令程家勉为其难。

程昌华当然听明白了。面虽有尴尬之色，却仍能体谅刘文炳内心的苦衷，便耿直道来："文炳兄弟，我不仰你的学问人品，这几年，你是觉得自己艰难些，怕我家嫌弃，生了些隔阂。我程昌华不是见利忘义的人，何况家父生前告诫，不要忘了老世伯的救命之恩。今日，我把话留在这了，明日，二月初八，观音娘娘生

日,好日子,请你父子光临寒舍作客。来不来,则在你了。告辞!"

程昌华说完便向夫妻二人连连拱手,扬长走出院门。

刘文炳最终觉得这无疑又是一个意外佳音,兴奋得久久站在原地,搓着两手泥。脸上挂着他多日未有的喜洋洋神色。

次日,明昭去了程家。

他身着母亲给他特意换上的青布长衫,圆头面布鞋,黑呢瓜皮小帽。当他走到程家的高门楼前,看门的老家人怎么也不相信来的是未来的姑少爷。他那副尊容实实不是他想象中新近中了汉西学堂"头榜"的学生。

只见他青布长衫之外,脖颈下竟围着一块类似奶娃子口挟的圆兜。这东西又并非多余。因他的鼻孔下确实如龙出洞吊着长长的鼻涕。模样倒也不丑,不知为何嘴角鼻尖却是红红的。

来到程家厅堂后,以程昌华为首的全家老少或坐或立早就围了一圈,等着与这少年才子见面,一睹他的风采,也为给同时躲在帘后窥视的小姐事后提供各种观感。

面对这样一个怪头怪脑、怪模怪样的相亲者,人群里顿时发出噗哧哧的窃笑声。程昌华本人顿时也心寒如冰,只为不失礼节,还是客客气气招呼着来客:

"明昭坚侄,快请坐,请坐!"

他坐下了。坐姿也怪,将屁股挂了一个椅角,身子像搔痒地扭动。

"昨日未见到你。想请你来叙谈叙谈,你别拘谨,随便一些,随便一些,嗯?"程昌华只以为他脸皮儿薄,太紧张了。

"不咋个,不咋个!'呼——'"明昭抽搐了一下鼻腔,吸进两条"龙",又用袖管横着擦了下鼻孔。

"你……听说读了很多书,练得了一身好功夫?"

"不咋个,不咋个!'呼——"明昭又来了那么一下。

全堂轰然笑起来了。

"听说你自己还写得有诗,背一首来听听如何?"

他又摇头又摆手。"我……不咋个,不咋个!"

"你屋里墙上的字,'男儿何不带吴钩'总是你写的,没假吧?"

"是……,写得不咋个,不咋个!'呼——'"又是一个横揩鼻子的动作——当地人称"打横棰"。

又问了些题目,回答都是"不咋个"!程昌华失望了。

"以后,有空常来走走。家父与你爷爷是八拜之交,我们也是世交了嘛,好不好?"

"好,好,我……我告辞了!"

他站起来,行过礼,没忘了又打了一个"横棰",便走出程家门楼。

读者,此事是不是笔者胆大妄为,对伟大人物居然敢于胡编乱造,对少年刘帅的形象竟恣意歪曲?

笔者不敢说此事千真万确,只能将材料来源如实写在下面:

程家女名叫程宜芝,是刘帅18岁时与之结发的妻子。两人在一起时聚时别生活过十几年。后刘帅因革命需要,浴血疆场数十年,有家不能归。到全国解放时,程宜芝已60岁。自刘帅离家后的二三十年间,她一直孤守在刘家的几间草屋里,与她和刘帅所生的独儿刘俊泰相依为命;由于刘俊泰早年中了鸦片烟毒,一直不能劳动,时常犯病发疯。一家生计除了从刘家分得几亩薄田的租入之外,主要靠着程氏的勤耕苦织,将男人女人的担子挑在一肩,才勉强过上了半温饱的生活。也正因为这样一个普通农家妇守着一个疯病儿苦度岁月,国民党才放过了他不共戴天的共党"头子"、在战场上一次次席卷成万精锐"国军"的刘

伯承将军留在他们统治区的亲属,总算熬过了漫长寒夜盼来了黎明。时将军正在重庆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之职,也曾托人带口信,希望与程氏一见,妥为解决所有她希望解决的困难。程宜芝知道将军已在长征途中与他志同道合的一位女战友结婚。不用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更不用说,将军的家庭十分美满幸福。便也捎去口信:“你不要回来,我也不去你那里,我对你毫无怨言,也无大困难需要你帮助解决,只望你勤勉国事,挑好老百姓给的千斤重担。我母子已得到政府照顾,成分评了红军家属,每月有五斗米补贴,不劳你分心了。”

程宜芝死于1957年。她的儿子刘俊泰则饿死在1961年困难年间。

刘俊泰膝下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刘天俭,一直在四川奉节县当小学教师,现已退休。刘天俭曾多次被省、地、县评为模范教师,获得过先进称号与荣誉奖状。但当地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刘伯承元帅亲孙女。

刘天俭一直伴着祖母程宜芝长大。程去世时,天俭已27岁,是孤独的祖母“翻古”怀旧的忠实听众。天俭记得,祖母常把祖父称为“打横捶的不咋个”爷爷,每说起爷爷上门相亲的事,都笑得气喘泪落。

“奶奶,爷爷是咋整好的,好好一个人,咋会成了红嘴红鼻子,鼻涕眼泪跟倒流?”天俭曾问。

“我想,他是临时出门抹的海椒面吧!你爷爷小时候‘烦’得很哩,鬼板眼多得很。谁知他咋个装得那么像,硬是把我一家蒙倒了!”

“奶奶,你家又咋个相中了!”

程宜芝给孙女留下一段故事:

程家在赵家场外松林湾,与刘家相距不过20公里。明昭用

那装傻的办法"麻"过了程家一时，但程家很快便由各种渠道了解了真相。程昌华深明大义又善解人意，他当然已经猜出了娃儿的心思，不过在委婉地表示不愿意。为什么呢？是年幼无知，还是如乃父一样有股贫而无谄的傲气？他并不深究，仍主动来刘家走动。与刘文炳兄弟相称，不再喊亲家，也不再提亲事，每次来都用真诚的劝说，让文炳夫妇收下他的金钱或物品的馈赠，并嘱：别告诉娃儿，他心气高，让他专心读书吧！

明昭在汉西学堂读了一年书后，春节前回到家，因年节家境更加拮据，靠刘文炳在镇上摆上红纸摊为各家书写春联，赚几个钱好办年货。这时刘文炳咳病刚好转，受不得风寒，此事只好由明昭替代了。

刘明昭往年也是父亲卖字的帮手，对此并不生分，老式春联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记得很多，挥笔而就，比父亲写得还快还好。

这一年，在汉西学堂功课都考第一名的明昭，在镇上更是小有名气了，字也写得比往年刚劲秀丽，更何况，他还不专写老式的现成春联，只要买主提出要求，如期望儿子发奋读书，新媳妇生个娃娃之类，他都能于一皱眉之间编出对仗工整，合辙押韵的新楹联来，令许多老学究都来围观，赞叹不绝！因而生意特别的好！

这日，已到腊月二十九，直到黄昏将临还在忙活。

正是这时，又来了一个40开外的老孃，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孃，你老要对子么?"

"是的，是的。我家小姐，她的如意郎君呀，跑了，不见了，她想去找他，又怕羞又怕找不着，不去找么，心里又总念着，都快憋出病来了。所以，叫我来求一副对子，祝他郎君在外头清静平安，就这么个意思。"

明昭听说那郎君从军去了，略一思索，便挥笔写下：

剑胆行远，当家国倾危，血性男合当身许；
芳心念友，祈天护佑，有情人终成眷属。

写完，默想片刻，怀着歉意道："大嬢，写得不咋个，请你老将就着拿回去吧。"

"要得要得，我们小姐要的就是这话。不过，你还得在边边上落上你的大名。"

"大嬢，春联不兴落名字的。"

"哪里话，我们小姐闺房里的字画咋都有名字？"

"你家小姐识字？"

"她呀，是今日也来过场镇上，偶然见到你相公字写得好，她都站这儿看了好半天，只是她不好意思当面求字，不好说得，才叫我来。"

"哦——"明昭今日确见到几个女子在看他写字，都是有了点岁数了，再不疑有他。便只好在对联下方落笔写了一行小字：

"开县贫子刘明昭敬书"。

老嬢子把对联夹在怀里，才掏出一个红纸包来，塞在明昭掌心里，乐哈哈笑颠颠地跑了。

明昭感到纸包好沉，连忙撕开，竟是亮晃晃的10块龙头大洋！

他如梦初醒，猛然猜出她家小姐是谁了，抬头又见那老嬢翻动着两只小脚，奔逃似的身影已到镇街尽头。

16岁的程宜芝送上这10个银圆，其实是送上一片心意，送上她遵奉自小所受的礼教所倡导的女子德行的坚恒不移的决心，也送上了她终生的不幸！

这不幸当然不能怪罪她的丈夫无情，而是他将自己如火的情和爱，全都付诸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20岁时，她与18岁的刘明昭结婚之后，从此便是离别、等待、贫困、操劳、国民党统治下的恐怖惶悸、一个被烟毒伤害了又患精神病儿子的疯子，伴随着她度过一生；正如他们的孙女刘天俭所说："我的可怜的奶奶呀，一天好日子没过过，凡是女人该享的福她都没享过，凡是女人的不幸她都受够了！"

但刘天俭也说了："我骄傲，不但因为我有一个称誉于国于世的、为国家民族舍弃一切的伟大爷爷，也因为我有一个虽然一生默默无闻，却集中国妇女忠贞、坚忍、勤劳的美德于一身的伟大奶奶！"

（丁隆炎）

帅府家事

——记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和子女们

百姓们常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实际上，地位显赫的将门帅府亦然。君不见，有的将军能指挥千军万马，却理不清家长里短。谁家倘若有位善理家事的女主人，实乃全家之大幸。在中国的将帅夫人中，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即是善理家事、善念“家经”的一位。这里不讲她早年如何参加红军，长征路上、抗日前线、东北战场如何历经千难万险的传奇，只介绍她作为一个母亲——二男四女的生母，一个罗帅前妻女儿的继母，如何处理家事和教育子女的故事。



罗荣桓与夫人林月琴在东北

1937年春，林月琴在延安同罗荣桓相识、相爱、结婚。在战争年代，林月琴先后生过四个孩子。因部队作战频繁，缺乏稳定的生活环境，孩子生下不久即寄养在老乡家里。由于生活条件太差，大儿子罗北屯、二女儿罗林只活了一两岁，便离开了人间。二儿子罗东进、大女儿罗南下，在妈妈的怀抱里、在小毛驴驮载的箩筐里，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福”大“命”大，迎来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1949年10月，林月琴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因怀这个女儿时正值平津战役取得胜利的时候，罗荣桓便给她取名北捷，小名巧巧则是林月琴起的。因为此时东进、南下都上学了，新中国也诞生了，她来得正是时候。隔了两年，林月琴又生育了最小的女儿——娜娜，学名罗宁。

罗荣桓元帅青年时代离开家乡投身革命时，为了不连累妻孥，曾写了一纸离婚书，劝前妻颜月娥改嫁，此后十几年与家里中断了联系。但颜月娥仍然生活在罗家，不肯再婚，依靠一手好针线活，含辛茹苦，将女儿罗玉英抚育成人。1949年初，由母亲做主，23岁的罗玉英嫁给了小学教师陈卓。

湖南解放后，罗荣桓得悉这些情况，便写信给罗玉英，让她到北京来读书。学一点文化，将来好为人民服务。同时，林月琴托部队捎去了一个包裹，里面有给颜月娥和罗玉英的几套四季服装，有她亲手编织的毛衣，还特意给颜月娥准备了一件新皮袄；给罗玉英即将分娩的孩子捎去了全套婴儿服装以及尿布等各种用品。

1950年1月，罗玉英带着刚满月的儿子猛猛。乘火车赴京。她刚下火车就见到了林妈妈，是这样的亲切，这样的慈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哽咽着喊了声“妈妈”，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旁边的东进亲切地喊了声“大姐”，急忙帮着提行李出站。

一路上，林月琴帮着玉英抱孩子，问长问短，关怀备至。罗荣桓见到离别20多年的女儿，非常高兴。玉英本有一肚子话要对爸爸倾诉，此时却只喊了一声“爸爸”，便泣不成声了。罗荣桓用手抚摸着女儿的头，深情地说：“这么多年，你在家也受苦了吧？现在革命胜利了，全家在北京团聚了，这里的妈妈很好的，应该高兴才是啊！”听了爸爸的话，罗玉英又望了望正在忙着准备晚饭的妈妈，她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

在此前后，罗玉英的丈夫陈卓，以及罗荣桓的侄子、侄女侄孙等，也都来到北京。罗帅家顿时成了一个有十几个孩子的大家庭。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女主人，林月琴不仅疼爱自己亲生子女，对其他孩子也同样关怀体贴，悉心照顾他(她)们的衣食住行，为他(她)们的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罗荣桓、林月琴将文化基础较好的陈卓和两个侄子介绍进了华北军政大学，一些年龄小的侄儿、侄女、侄孙则送到军队办的子弟学校读书。而比较难办的罗玉英，她文化水平低，年龄又比较大，还有小孩拖累，罗荣桓、林月琴给予她更多的关怀体贴。

林月琴首先动员她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尔后找人帮她补习文化，准备考速成中学。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罗玉英考入速成中学预备班。从此，她格外刻苦地学习文化，进步很快。

孩子们平时都在校寄宿，寒暑假都回来了。罗荣桓、林月琴便让孩子们组成一个家庭学习小姐，由年龄最大的罗玉英当组长，组织弟弟、妹妹们按时作息，认真复习功课，并参加一些劳动，孩子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东进、南下寄宿的小学，离家很远，每周星期六下午回家，罗荣桓、林月琴从不派小车去接，而是让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有一次，学校放学晚了，家里人派车去接了一次。罗荣桓知道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

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

林月琴作为母亲，对孩子们的生活关照得多一些，尽可能满足孩子们的一些要求，但也注意到了孩子的思想上有一些不好的苗头。有一次，她给东进买了顶棉帽，东进嫌样子不好看，不愿戴，要求妈妈给买一顶皮的。林月琴没有答应他，给他耐心讲了些要艰苦朴素、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的道理。

这件事，罗荣桓后来知道了，把东进狠狠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他和林月琴专门商讨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决定在思想作风上更加严格地要求，培养孩子们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怕苦累的精神。

一次，东进、南下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便步行20多里，天很黑了才赶回家。全家人正在担心、着急，见东进带着妹妹满头大汗走进门来，问清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这样做很好！你们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

林月琴为东进、南下扫着满身的尘土，既心疼，又高兴。她想，罗荣桓要求她对孩子的生活不要过多操心，而要在政治思想上多关心一点的意见是很正确的。现在，孩子们确实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父母的旧衣服改一改都愿意穿；破了打上补丁也不嫌难看了。

由于荣罗桓、林月琴的严格教育，几个孩子在学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没有高干子弟的那种优越感，而乐意和普通干部及工农的子弟接近。东进、南下和其他孩子，都有不少工农家庭出身的好伙伴，有时还领他们到家里玩，罗荣桓、林月琴都热情欢迎。罗荣桓夫妇还鼓励孩子常到同学家里走一走，看看人家是怎样生活的，特别要和那些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同学接

近,多帮助他们。

1955 年初夏,一向充满欢乐、和谐气氛的罗帅家里,突然笼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刚满 15 岁的女儿南下,腿部长了恶性骨瘤,住进了医院。

南下长得很漂亮,两个大眼睛水灵灵的,特别像母亲。她很聪明,生性活泼,功课总是班里拔尖的,罗帅非常喜欢她。悉知女儿患了不治之症,林月琴十分悲伤,但又怕罗荣桓难过,一开始没有告诉他。南下的恶性骨瘤发展很快,要做截肢手术,再也瞒不住了。手术后,南下拄着拐,行动不便,什么人也不愿见。罗荣桓、林月琴鼓励她同疾病做斗争,顽强地活下去。但时过不久,癌细胞又扩散到肺部,病势危重的南下再次住进了医院,林月琴整天守在女儿身边。尽管医生用尽了各种办法医治,病魔还是夺去了南下年轻的生命。

这是林月琴第三次失去孩子了,她陷入极大悲痛之中。同时,她又为如何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孩子的父亲而焦虑不安。荣桓不久前病了一场,现在刚刚恢复,怎么能让他再遭受如此强烈的刺激呢!她决定自己留在医院料理孩子的后事,并且想稍微把悲痛抑制一下再回家。于是,她和参与抢救南下的卫生部保健局黄树则局长商量,希望他今天能去陪伴一下罗荣桓,并说:"南下是荣桓最喜欢的孩子,如果他不问,你看是不是先不要告诉他?"

"你也不要太难过,我先去罗主任那里看一看。"黄树则安慰了林月琴几句,答应按她的吩咐办。

黄树则来到罗家,像往常一样先问候罗帅的饮食起居,尔后两个人在院子里边散步边闲谈。快到中午了,罗帅说:"今天你在我这里吃午饭。你是从医院里来吧?"

"是。"黄树则只能如实回答。

“你来的意思我晓得。是不是南下这孩子不行了?”

罗帅终于打破了僵局。

黄树则点了点头,不得不把南下已于今天黎明病故的事告诉了他。

罗荣桓听了很镇定,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看着庭院内的落花,慢慢地说:“在战争年代,养活一个娃娃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干部把娃娃丢了。南下是战争年代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后,已经是不容易了,她妈妈为带东进、南下吃了很多苦啊!”

随后,罗帅又问起林月琴在医院的情况,感叹地说:

“林月琴这些天可是熬坏了,饭吃不下,觉睡不安。母亲终归是母亲,为了孩子,她自己做得再多也还觉得不够。”

黄树则没再说什么。他后来回忆道:“对南下的死,罗帅无疑是很悲痛的,但是我知道,他不希望同志们对他表示慰问。在这时就愈益使人感到他那坚强的精神力量。”

吃午饭的时间,罗帅对黄树则谈起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战场上的一件事:

“在那困难的环境里,小孩子牺牲是常有的事。有一次,部队正在紧张转移的时候,一个干部接到了他的孩子死亡的消息。这个干部平常是很坚强的,是在炮火里经过长期考验的,可是一接到这个消息,他抱头大哭起来。当时战情紧急,可是他为了孩子的死抱头大哭!我怎么办?我去安慰他吗?我不!我严肃地批评了他。第二天,他冷静下来,说我批评得对。这时候我才安慰了他。”

下午,林月琴从医院回来了。开始她还努力让自己显得若无其事似的。

“都料理好了吗?”罗帅说话的声音很平静。

林月琴无言地点头,随即问他的身体情况。见丈夫情绪平

稳，也就安下心来。

其他几个子女中，东进、巧巧、腊腊的身体和学习都很好，而玉英生病最多，学习中也遇到不少困难，林月琴则给予她更多的母爱。

速成中学的功课特别紧张，罗玉英白天学、晚上背，仍感到比较吃力，每逢考试手就哆嗦。林月琴常去学校看望她，教她一个方法：考试前口中含块糖。这个方法果然灵验，罗玉英心里不再发慌，考试成绩有了进步。

由于学习压力过大，加上身体底子不佳，罗玉英先后得了精神衰弱、肺炎、肝炎等疾病，每次都是林月琴送她去医院检查、治疗。开始，罗玉英还挺"封建"，不肯让男医生检查。林月琴便耐心地给她讲妇女解放了、时代进步了的道理。是啊，一个在封闭的小山村生活了20多年的青年女子，要适应大都市的一切，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刚进北京时，罗玉英不懂得吃香蕉要剥皮，不懂得怎样乘坐公共汽车……这个适应过程，全靠妈妈手把手的"传、帮、带"。在速成中学的几年，当她感到冷的时候，妈妈及时送来了"列宁式"新棉衣；当她生病住院的时候，妈妈常陪在她的身边，还送她到青岛海军疗养院疗养。疗养期间，当她思念儿子时，妈妈又寄来了猛猛最近的照片……

"妈妈怎么这么好哇，什么事都为我想得这么周到！"罗玉英不只一次地对笔者说："我真是太幸福了，有这样一位和亲生母亲一样亲的好妈妈！"

由于学习压力太大，罗玉英要求提前分配工作。考虑到女儿的身体状况，罗荣桓、林月琴表示支持。1954年，罗玉英被分配到北京南郊的一个农场，搞人事工作。罗荣桓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为女儿在城里机关找一个舒适的岗位，而是希望她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罗玉英从农村出来，听说安排

她到农场,也很高兴。但怎么做人事工作,她却心中没数。

“你妈妈过去搞过组织工作人事工作,她可是行家啊!”罗荣桓对即将参加工作的女儿提了一些希望和要求,把“传经”、“辅导”的责任赋予了妻子。

临行前那些天,林月琴边为玉英准备行装,边对她讲应该怎样做好工作:

“做人事工作的,首先自己要大公无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再就是要善于团结同志,走群众路线,同工人们打成一片,讲话、做事要注意影响……”

在南郊农场,单纯、朴实的罗玉英时时把爸爸、妈妈的教诲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她常和农场工人一起劳动,一块聊天,相处得很融洽。领导交给的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她还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身体也有明显好转。第二年,罗玉英光荣地入了党,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

罗玉英对笔者讲:“爸爸、妈妈的一言一行对我影响很大,为我树立了榜样,成为我奋斗的目标。参加工作后,我实际上是以妈妈作为榜样,像她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打心眼里佩服妈妈,你看她,粗活细活,文的武的,家里家外,样样都行,真够能干的,真是了不起!”

如今,年过六旬的罗玉英已经退休。离开农场后,她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科院工作。丈夫陈卓从军政大学毕业后,留在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宫等单位任职。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是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罗玉英、陈卓常去看望年迈的妈妈,孩子们同姥姥也特别亲。笔者前往采访时,陈卓因有事外出,他特意打来电话,从“女婿”的角度谈了对妈妈的亲切感受。他说:“这样一个大家庭,血缘关系有亲有疏,几十年来,却能够这样的团结和睦,这样的亲密无间,从来没闹过什么矛盾,在元



1963 年，罗荣桓全家合影

帅家中传为佳话。妈妈不仅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在治家方面她堪称老一辈中的典范。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真是很幸福！"

罗荣桓、林月琴的其他几个子女也都很争气，他们都没有辜负爸爸、妈妈的一番苦心，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奉献着智慧和力量。

罗东进从北京二十六中学毕业后，于 1959 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罗帅夫妇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东进也特别努力，成为又红又专的优秀学生。毕业后罗东进分配在七机部，从事国防科技的研究工作。后又调到军委炮兵科研处、第二炮兵科技部，现任二炮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军衔。曾在罗帅领导下工作过、又对罗进东比较熟悉的同志如是说：罗东进在性格、思想作

风诸方面，继承了罗帅的许多好东西，从他身上可看到当年罗帅的影子。仅从他对婚姻的处理即可窥一斑。罗东进上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不少人热心给他介绍对象，十有八九是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女儿。但罗东进并不看重“门当户对”，父母从小对他进行的“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的教育在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在找对象问题上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他最注重的是女方自身的内在美和外在美，同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同学潘仲文建立了恋爱关系。此后，再有任何豪门“千金”，他都毫不动心。把潘仲文的情况告诉妈妈后，妈妈对儿子的选择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

如今，肩扛金星的罗东进和被授予大校军衔的潘仲文，称得上是一对美满的事业型夫妻。他们都肩负重任，牢记着、并实践着当年入大学时爸爸、妈妈的期望：“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当什么官。”

与共和国同龄的罗北捷（巧巧），现在是解放军三〇四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人常说，女儿是妈妈的“心头肉，即使将门帅府，也多不例外。儿女大了，一般都要各立门户。罗氏子女中，北捷受兄妹的托付，继续和年过八旬的妈妈生活在一起。她说：“我是个医生，多照顾妈妈责无旁贷。”

谈起自己的医生职业，北捷颇为自豪：“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爸爸指导我选择的职业，是妈妈在几个节骨眼上点拨了我。”

十一二岁的时候，罗帅就常问她：“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北捷从小作文好、外语好，不假思索地说：“当个文学家，或者当个外交家也行！”

五六十年代，文学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做“文学梦”的青少年大有人在；外交家能周游列国，自然也颇有吸引力。

罗帅摇了摇头，说：“千万不要奢望当什么文学家，也不要当什么外交家。”

“那我干什么好呢?”北捷有些迷茫了。

“最好当医生,学点有用的实际本领。”罗帅给女儿讲了一番医生职业的特点:这是一种自由职业,任何时代都需要它;人的一生谁不生病?所以谁也离不了医生……

1972年,北捷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三〇四医院,真成了一名医生,实现了爸爸生前的遗愿。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她在大学里并没有打下扎实的基础。毕业后,医院分配的是些有关中草药方面的工作。

一天,林月琴对北捷说:“我看你现在的水平,只能算是赤脚医生,离真正的大夫差距太远了,应该争取进修一下。”

1977年,人们还热心于政治运动,对致力于提高专业水平的“进修”并不重视。罗北捷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参加了“青年医生进修班”。协和医院,是中国医学精英集萃之地,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正规化的训练,使罗北捷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在这里的一年多,她才懂得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夫,深切感到医学是值得为之奋斗毕生的事业。结业时,协和医院几次想留她,但她对部队很留恋,便仍回到三〇四医院。

1974年,罗北捷结婚了,丈夫赖克游是沈阳部队的一名军官。新婚蜜月刚开始16天,便接到医院的通知:立即停止休假,参加总后组织的赴青海医疗队。北捷怎么也不能:丈夫在外地,婚假没有完,干嘛非让我去?

林月琴关心子女的专业进步,更重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见北捷闹情绪,便给她讲起当年妻子送郎当红军的故事,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那时候,结婚三天就上前线,你们结婚16天了,就那么难舍难离?别那么儿女情长的,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一下,对你的一生会有好处。”

听妈妈的话,北捷随医疗队出发了,在青藏高原的格尔木、

当雄等地整整工作了一年。青藏高原被国家定为"特别艰苦地区",人称"生命禁区",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大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这里群山起伏,雪峰相连,属千年永冻地带,滴水成冰,地硬如铁,全年平均气温零下6度。青藏兵站部的万余名官兵住的是帐篷、地窝子、干打垒,靠牛粪生火取暖,一年四季食用脱水干菜、咸菜和罐头。罗北捷和医疗队员们一起奔波于基层连队,为干部战士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受到官兵们的欢迎和信赖。在那里,肝病、心脏异常等高山性系列病发病率极高,几乎人人都是"病号"。从小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罗北捷对笔者说:"你如果不亲自到那里,简直就想象不到世界上还会有如此艰苦的地方,想象不到那里的基层官兵是怎样地能吃苦,能耐劳,能战斗。青藏高原的一年,给我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在那里,多次接到妈妈的来信和电话,她的鼓励和鞭策,使我增强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1978年,罗北捷生了个男孩,正在丈夫所在部队休产假。她接到赴加拿大进修的通知,便立即回北京复习功课,投入了紧张的考前准备,还进行了外语强化训练。第二年,北捷的儿子还不到两岁,扔给妈妈带又担心老人的身体。林月琴对女儿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地去吧,我这身子骨挺到你回来没问题。"

临上飞机,林月琴往女儿的口袋里塞了一大把糖。没想到,这些糖竟成了"应急口粮"。飞机因意外情况在日本停留了一天,吃住无人问津,机上的18名留学生都没有一分外币。北捷把糖分给大家,度过了"难关"。

加拿大的两年学习中,罗北捷掌握了关于心脏内科检查、治疗方面的几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业务能力又上了一层

楼。加拿大方面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他们对这些留学生的家庭背景等方面的情况都一清二楚。校方许以奖学金攻读学位、办正式身份证等优厚条件，希望罗北捷继续留下学习。北捷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妈妈，征求妈妈的意见，林月琴态度非常坚定："一定要按组织规定的时间回国，不能有任何动摇。"她还说："你是一个女孩子，还有家庭责任，不能只想你自己，再让别人为你做更多的牺牲。"这里指的是北捷的丈夫。

罗北捷如期回国了，仍在三〇四医院工作。因院里设备缺乏，北捷在国外学习的技术没有用武之地。不久，三〇四医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增添了超声心电图、心导管检查等先进设备，并任命罗北捷为新成立的心内科主任。那时，她是该院十几个科室中最年轻的科主任，压力可谓不小。

"说得再多，不如干出样子来！"林月琴鼓励女儿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北捷带领全科同志，先后推出心导管检查、电生理检查等九项先进技术，把在国外学习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如今，心内科已成为全院最具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科室之一，医疗水平在部队医院系统中属于上乘。

罗宁从小向往着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1968年春，前来接兵的部队干部特别想带走这个好强争胜、泼辣能干的姑娘，罗宁所在的景山学校和区武装部也都批准了。但上头却来了"指示"：罗宁的母亲有问题，不能入伍。当时还不怎么懂事的罗宁痛苦极了，甚至埋怨起妈妈来。身处逆境的林月琴没有责怪女儿，她第一次给孩子们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郑重地告诉孩子们：妈妈这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目前受到些委屈，但我永远坚信党，事情最终总会真相大白的。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罗宁到粤北山区当了兵，开始在野战医院炊事班当炊事员，后来当护理员、农村医疗队队员。她干得非

常起劲，年年“五好”，不到18岁便入了党，还被评为广州军区学毛著积极分子。

罗宁虽身在医院，但对医学却兴趣不浓，她极富组织才能，不久被调到院政治处任青年干事。正当她一心在“仕途”奋斗时，部队准备推荐她上大学。在“知识无用论”影响颇广的年代，罗宁曾认为，只要苦干实干就能做好工作，上不上大学无所谓。为此，母女俩在信中几番争论。最后，女儿被妈妈说服了。她跨入了北京大学的校园。

1985年，已过而立之年的罗宁，赴美国进修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专业。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优良的学习成绩。为她提供奖学金的香港实业家何东爵士，收到了华盛顿国际学院的一封信，信中称：感谢你为我院送来了这样好的一个中国学生。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罗宁勇敢地“下海”了。从小造就的泼辣性格，多年磨练出的领导才干，“与国际接轨”的知识结构，以及从妈妈的言传身教中继承的诸多优秀品质，使她在“游泳”中得心应手，成绩不凡。如今，罗宁担任北京凯星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被部下称为“罗总”，被同行们誉为“女强人”。这家公司经营有方，经济效益连年大幅度提高。员工们说：我们的罗总贡献最大。

回顾自己以及哥哥、姐姐们的成长道路，罗宁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兄弟姐妹都为有这样一位好妈妈感到幸福。”

（李俊亭）

政治姻缘与人生挚情

政治与姻缘本是两个不相关的词，但在现实中却往往联系在一起，因为姻缘往往成为为政治服务的手段。但是，政治姻缘虽然一时红火，但终究会像蒋介石抹去婚恋日记一样，无法有郭沫若与安娜、许光达与娃娃亲的人生挚情……

蒋介石抹去的婚恋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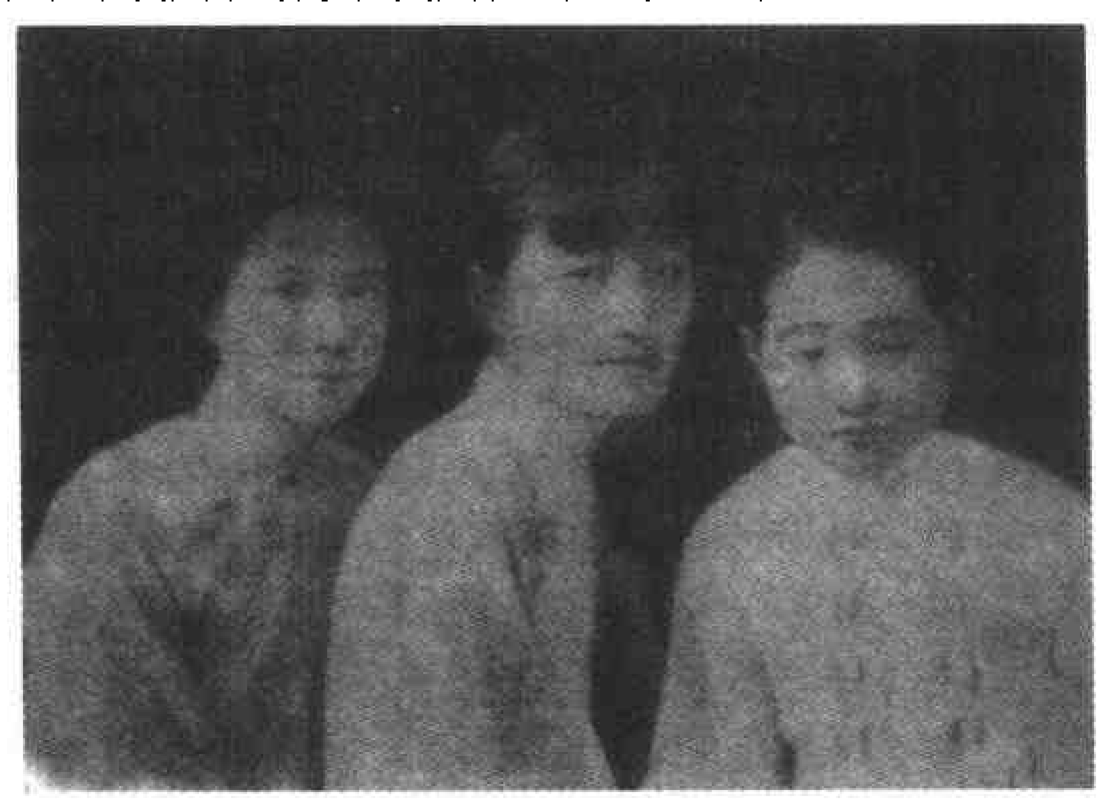
最近，各种版本的《陈洁如回忆录》风靡海内外，有人称为历史的“黑匣子”。本文作者有幸翻阅了蒋介石早年的日记，从那些被删节的未发表的内容中，发现了“真正历史的黑匣子”，他们从中整理出一部分，让广大读者了解蒋介石早年真实的感情世界。

一

1921年，蒋介石与发妻毛福梅的感情日趋冷淡，“甚至不愿同衾”。4月3日，蒋介石在溪口丰镐房内看《通鉴》，“见毛氏与经国擅自城舍(宁波城中的屋舍)归，愈不可遏，与之拼命大闹”。此刻的蒋毛婚姻已到了破裂的边缘。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竟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地离婚，以蠲痛苦。”此时，蒋母王采玉病重，不希望在有生之年，看见家庭破裂，因此主张毛氏回家，结束分居的局面。一向以“孝子”自居的蒋介石，掩饰不住对高堂的怨恨，在日记中写下：“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重圆破镜，适足激我决绝而已。今日拟发最后离婚书。”

尽管蒋介石对母亲包办的婚姻，下定分手的决心，但为了母亲的病，还是暂时维持着婚姻关系。蒋母病故后，蒋介石以沉痛

的笔调,给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写了一封信,请其做毛福梅的工作,同意其离婚的要求。信云:"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定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痛苦。"



陈洁如(中)与张静江夫人朱逸民及其女儿合影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张静江寓所,结识了少女陈璐,一见钟情,感情发展迅猛。

这里需要提及蒋介石与其妾姚冶诚的关系。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期接结了青楼姚冶城,后纳为妾,以弥补与毛氏婚姻之不足。但日子一久,狂热的爱情,好像天天吃山珍海味一样,也有腻的时候。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略择几段,便可说明:

1919年4月13日:"以妾贪,怨怒并集。"

10月18日:"冶诚赌博不休。"

1920年1月1日："早晨未起床，瞟见楼下电灯尚明，(冶城还在打麻将)甚恨冶城不知治家法，痛骂一场，娶妾之为害，实不可胜言。"

蒋介石经常对姚冶城寻衅：

1920年1月18日："中食，以发恼投箸外出。回则见冶妾独自属餍，大骂一顿……"

"中食于静江家，为冶诚事呕气辱，实难为怀也。"

2月8日："近日益忿妾举动之贼劣，心术之狠贪……"

5月10日："近日冶诚嗜赌而不侍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

5月23日："昨日冶诚来(病)院，余见之甚愤恚，病症加剧，因即令回寓，不欲其在旁侍候也。余夙世孽重，遇此冤家也宜哉。"

6月16日："听母亲教训，述及冶诚行之凶狠，令人发指。余再不下决心断绝关系，是诚冷血棵虫也……"

6月24日："冶诚又来讨气，彼妇悍泼，不可言头。得罪于我，又得罪于我母，使我母心疼病重，我置妾之辜大矣。懊悔曷其有极。冶诚去后，忧愁闷忿怫郁牢骚，自坠地以来，来有如此过甚也。晚外出闲散，聊以舒怀。"

6月28日："此次离沪游普陀，非行乐也，乃为冶诚所逼耳。"

从上面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姚冶诚的悍泼、贪婪、赌博、不知治家、不懂孝道，都使蒋介石气恼，况且蒋姚间经常大吵大闹，惹得四邻不安，蒋介石在日记中甚至写下："处置冶诚事，……静江、季陶、觉生诸兄，俱来商量此事。"张静江、戴传贤、居正都是党国要人，都来商议蒋氏与姚氏感情纠葛之事，可见影响之大。但是蒋介石采取冷处理的方法与冶诚分居，主要原因是："盖因

去之……则纬儿(蒋纬国)无人抚养,恐其常有思母之心;一则藕断丝连,虑其终结不解之缘。"这说明姚冶诚手中有张王牌,即她抚养着蒋纬国。蒋介石秖犊情投鼠忌器,只有自己找心理平衡,在日记中写道:"吾谓中国妇女,现在决无解放之可能。诚思多少祸胎,由妇女而起;多少事业,为妇女所败;多少英雄,受妇女所累。自今而后,吾将奉独身主义,不再造此罪孽矣。"家庭矛盾,搞得蒋介石焦头烂额,他竟想出家当和尚:"我为何还恋尘缘而不自解脱耶?"但蒋介石还是有七情六欲,与姚氏不在一起时,也不由自主地生出思念之情。并写下情意绵绵的信。

1921 年 9 月 22 日,蒋介石在香港给远在宁波的姚氏写信云:"冶诚妹鉴:我昨日到香港,现住在浅水湾香港酒店,风景甚好,惜纬儿与你不能同来也。你病如何? 不甚念念。……"

同年 12 月 31 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从广东起程去广西桂林组织军事。行前,遥念亲人,临行,手执羊毫写道:"冶妹鉴:前寄纬儿两函,想已收到。中正定今由香港起程往桂林,路上约须半月工夫,甚寂寞也。贵恙如何? 甚以为念。家乡不知太平否? 如恐危险,可往城中陈先生家住过年(陈志坚,就读奉化新女校时曾与毛福梅同学,后做了蒋纬国的家庭教师,故蒋之为陈先生。笔者注),待明年正月底,再回溪口住家亦可也。人在家无事,请每星期写一封信来,如有要事,可托上海发出电报也。……"

此刻姚氏纸贵,不啻万金。

1922 年 1 月 24 日夜,蒋介石在桂林旧藩署八桂厅院中仰望满天星斗,不由牵肠挂肚地想起故乡的亲人,提笔给姚冶诚写下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冶妹鉴:兄在桂林,日夜想在家过旧历年之心甚切,因之无时不想着你与纬儿也……"

春节前,蒋介石按捺不住缕缕涌出的思绪,又给姚氏写了一

封信："冶诚吾妹爱鉴：我在此地，心里烦闷，恨不得从速回家享福……这一回，总算来得顶不好了。但是已经来了，只得跟着老头子(系指孙中山)做一天算一天就是了。"从蒋介石的几封家书中，笔墨间飘溢着一种爱恋情愫，再也不是怨气冲天，"怨怒交并"的嘴脸了。

蒋姚间的关系，此后一直保持分居状态，姚氏一直与蒋纬国生活在一起，直到60年代在台湾病逝。

二

蒋介石与陈洁如认识的时间，是他在与毛氏的关系降到冰点，与姚氏的关系不冷不热的时候。大致时间是1921年八九月间。

1921年9月9日，蒋介石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陈洁如"的字样，记载如下：

"惠寄璐妹后更名洁如书。"

这年11月17日，蒋介石回家葬母之际，"给讯璐妹"。忙至12月11日，蒋介石告别母墓，第二天回到上海。

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晚，璐妹来省近侍。"

这短短的几个字，包含了多层意思，说明这一夜，二人如胶似漆，缱绻反侧。第二天蒋介石去广东，筹划北伐作战计划。

从1922年1月上旬起至3月下旬，蒋介石在桂林给陈洁如写了8封信。

2月9日，蒋介石筹备在八桂厅的庭园中，"静对明月，每思家乡上灯节之闹热，心辄彷徨"，不由地长发感慨："诚璐与纬儿三人，有一在此，即足以慰寂寥……"

蒋介石此次桂林之行，劳而无功，在讨伐陈炯明的问题上，孙中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蒋便心灰意懒，辞去大本营参谋长之

职。孙中山"恳切慰留",但蒋介石决心做了俗人,于4月23日乘轮北返,28日回到奉化老家。

此阶段,蒋介石的主要任务是监修母墓工程,至5月22日,携纬国离家赴沪。

5月23日,蒋介石迫不及待去找陈洁如。是日日记:"晚,访璐妹。"

此次沪行,前后共8天,蒋又回奉化监修母墓。

1922年6月18日,蒋介石得到汪精卫与孙中山的电报,知道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的电报催蒋"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当即做好"间关赴难"的准备,不久到了上海。

6月22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晚,璐妹来探,即去。"

这几日,蒋介石还向张静江托付后事,心情自然沉痛,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劲头儿。为了解忧,他于6月24日"晚,与璐妹并坐汽车,游览夜景,以粤难无法解救,聊以写我忧耳。"6月24日赶到白龙潭的永丰舰上。孙中山顿觉有了依靠,他对采访的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个来此,不啻增加两万援兵。"陈洁如并未随行。1922年6月30日:"上午,发给冶诚、璐妹讯。"这里,说明《陈洁如回忆录》中伴随孙中山在舱底,并在叛军开炮时,吓得尿水横流的情节,全系伪造。当永丰舰冲过车歪炮台时,只有蒋介石与孙中山同舟共济,于是孙中山表扬蒋"入舰日侍余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余及海军人士共死生。"是年8月14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回到上海。

此时,蒋介石经过一番磨难,又回到歌舞升平的上海滩,再次见到陈洁如,悲喜交集,大有恍如隔世之感。这对鸳鸯的感情一发而不可遏。请看蒋介石日记:

8月15日:"晚,宿于璐妹家。"

8月16日:"傍晚,与璐妹同乘汽车,往北新泾逛玩。"

9月10日:“访璐妹三次。”

9月12日:“下午,寄笺与璐妹。”

10月4日:“晚,璐妹来旅社。”

10月5日:“晚,偕璐妹纬儿往观影戏。”

10月7日:“领璐妹纬儿至极司非而路晚餐。”

同年10月11日,姚冶诚带着满腹妒火,从宁波来到上海,蒋介石“见其面貌凶狠,心甚不快”,而又无法哄得一对佳人都满意。12日晚,外出散心解闷,“携纬国观剧”;他在日记中感慨道:“嗟乎,家族之累人极矣,吾何以摆脱之?”

姚冶诚是旧人,陈洁如却是个十几岁的新人,温故而知新,于是姚氏的忌妒,并不能阻止陈氏之温柔,反而更把老蒋推向陈的一方。有日记为证:

10月16日:“晚,璐妹见过。”

10月17日:“晚,璐妹来访。”

10月18日:“晚,璐妹又来。”

10月19日:“下午,候璐妹。晚,偕璐妹观剧。程艳秋之貌及唱,似皆不及梅兰芳也。”

11月29日:“下午,访洁如。”

12月4日:“下午,璐妹随侍。”

12月5日:“晚,璐妹与纬儿玩耍。”

12月6日:“晚,璐妹来会,十时去。”

从以上日记中对陈洁如的记载来分析,蒋陈的关系已发展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境地。在蒋介石的笔下,是带着一种满足、欣赏、爱怜的心态,对陈洁如进行描述的。他写道:洁如“爱恋我之情,无异孺慕也。”此阶段的陈洁如还是一个不带俗气的,纯洁天真的温情少女,对此“冶诚妒态时现,终欲使人不乐何。”(1922年12月13日日记)可以说,蒋介石与陈洁如的感情

已到亲密无间的程度。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改不了既得陇又望蜀的本性，就在这一时期，他应邀去莫理哀路孙中山宅中参加宋子文举行的一个晚宴，一位风姿绰约、仪态大方的青年女子，使蒋介石一见倾心，宋子文把她介绍给蒋介石，说是他的小妹宋美龄。不久，他迫不及待地向宋子文提婚，被宋子文礼貌回绝。蒋介石并不死心，请孙中山帮忙，并对孙说："你认为可以说服宋小姐接受我吗？"孙中山认为不可能，但还是将此事与宋庆龄商议。据说当时宋庆龄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说："我宁愿看到小妹死去，也不愿她嫁给这么一个人。"

此时，蒋介石还狂恋着陈洁如，宋美龄又另有新属，此事暂告一段落。

三

当时的蒋介石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仅仅是一个小角色，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与陈洁如也仅是一对平常的老少夫妻，陈洁如与姚冶诚的争风吃醋，撒娇使性，恃宠专横，都可以用年幼无知来解释，不但令蒋容忍，相反使蒋感到高兴。如果就这样过下去，也许会夫唱妇随，白头到老。蒋介石写给张静江的一封信，便可以说明，当时蒋在感情上是离不开陈的。1924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蒋介石携姚冶诚、蒋纬国到达广州。陈洁如视蒋中正的举动是既不中又不正，感情的砝码倒向姚氏一方，是令陈洁如不能容忍的。她大发脾气，向蒋介石发出通牒，表示要一刀两段。老蒋吓坏了，急急忙忙给他的义兄，陈洁如的保护人张静江发出快信，请其给陈洁如做做工作，转寰关系。信全文如下：

静兄大鉴：今接璐君函，以纬国冶诚来粤，彼即不与吾相见，并作永远之辞，未知如何？现尚在沪否？其意究竟如何？请电复，敬请近安。

弟中正叩首

蒋介石和张静江间信函很多，但落款处用"叩首"字样并不多见，可见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这是蒋陈感情里出现的第一次危机。这是陈洁如威胁要蹬掉老蒋，而且动了真家伙。蒋介石是如何处理的呢？很多正史都论述，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决定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党军，并在1月24日指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后指定在黄埔岛上旧有的广东陆军军校与海军学校为校舍。蒋手下的筹备共有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7人。2月21日，蒋介石突然具禀孙中山及中央执行委员会，辞筹办军校职，并当即买舟北去。

蒋介石的出走，与财政经费有很大关系。当时孙科为广州市财政厅长，杨西宕为广东省财政厅长，二人拒发军校开办费，搞得老蒋大光其火，以"自维愚陋，不克胜任"为借口，甩袖而去。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其中有不能明言的理由即是："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蒋介石明白，他与陈洁如的爱情不能靠写信的方式来维持，处理爱情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回到陈洁如身边去。

2月2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执行部转蒋介石，催其回粤复职。一时间，廖仲恺、胡汉民、戴传贤、杨庶堪、汪兆铭等人纷纷电蒋。

蒋介石依旧恋着陈洁如，等孙中山让了步，答应了蒋介石"解散财团，刷新政党"的条件，黄埔军校的开办银子也到了位，4

月21日，蒋介石才偕新妇靓姐，燕燕于飞，从上海大模大样地回黄埔军校视事。蒋介石此番闹得很过瘾，孙中山向他低头让步，廖仲恺、许崇智到沪、甬劝奉；胡汉民、汪精卫函电相催，他知道自己已成了举足轻重的"大腕"了。这真是料想不到的神来之笔，功劳的一半，在陈洁如的身上。

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为他日后鸿图大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蒋介石经常身披黑色大氅，身后有四个卫兵陪着进出军校大门，所有的军官、士兵看见他都要立正行礼，他把这些都列在黄埔军校的校训中。最后总结为"亲爱精诚"四个大字。

他的学生，黄埔一期毕业生宋希濂回忆说："傍晚，蒋、陈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孙中山的逝世，给他创造了一个大好机会，在各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纵横捭阖，运用自如地控制了纷乱如丝的政治局面，成了中国最大的政治舞台上闪闪夺目的"新星"。蒋介石与陈洁如的爱情依旧是爱情，但理智已经显现裂变。

请看蒋介石的日记：

1925年4月20日："近日不满意于洁如，亦爱亦憎，情思缭乱。"

4月26日："下午，携洁如赴汕，欠为情魔缠绊，怜耶怜耶，殆无已时。"

4月28日："既不能舍之，又不肯谅之，大丈夫之于一女子，何情乃尔乎？"

4月30日："下午，与洁如游西湖，途中又生气。我为此碧玉，几病神经矣。"

5月22日："昨夜又与洁如吵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而乃一至于此。"

5月28日："夜由汕头搭车船往海丰，睡至三时，浪人舱口，

锦衾尽湿。此为洁如之物，不胜牵念。”

真是爱屋及乌，情思缭乱。当6月6日陈洁如要回上海时，蒋陈在码头上依依惜别，蒋介石倒像个情种：“洁如返沪，终不放心。恨之而又爱之也，恨之而又惜之也。”蒋介石身陷在这情魔之中，他为这巨大的痛苦而无法自拔。陈洁如走后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思念洁如，疼忿交并，留舍莫决。终恐其离我以后，受骗受苦，故又不忍弃之，毋乃太恋乎？不知洁如之意，曾亦想乃将来之受骗受苦，而愿恋此不去否？女子情滴，英雄心醉，何其痴也何其痴也！”这段话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心情是多么矛盾与痛苦。这就是感情与理智的搏杀。他知道，陈洁如这样一位小家碧玉，天真幼稚，没有什么心机与手腕，无论如何不配做一位叱咤风云大人物的终身伴侣的，分手只是时间问题。但此时他与陈洁如的情感又是如醉如痴，他的感情是离不开陈的。

6月8日：“今日心气略舒，然终不能忘怀洁如也。”

6月9日：“早起，百忙中写寄洁如一笺，隐恨无穷。”

6月15日：“今日精神倦疲，时时欲睡。又为洁如事发多移时，特电纬国母子来粤。”

6月16日：“晨六时起床，为洁如事，痴想良久。男女问题，令人不能解决如此，其奈之何？”

蒋介石对陈洁如还是不能忘情，于是要陈洁如回到他身边，陈洁如迟迟不到，“时发暴躁”。蒋介石为何烦躁呢？因为6月23日这一天，广州军民学生为应援上海“五卅惨案”，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进到沙基附近时，遭到英军射击，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一时，广州的气氛异常紧张。就在这个当口，陈洁如只身从上海乘轮返广州，蒋介石担心她的安全，自然乱发脾气。

6月28日：“晨六时起床，想起洁如前情，痛恨又起，几乎晕

绝矣。下午，假眠醒，以瑞昌（蒋的仆人）亦坦鼾，任我叫呼无应者，恨极，罚瑞昌禁闭七日。"为了陈洁如，警卫员也受过。



陈洁如与蒋介石

但是，陈洁如一来，俩人又恢复昔日的吵闹、生气。有时为了一件小事，蒋竟"迁怒洁如，噪闹镇日。"

8月1日："下午，又与洁如纠缠。"

8月13日："晚七时，未见洁如回，心又躁急矣。"

8月15日："今早下床，发火气……洁如耐心侍奉，毫无嗔怒之态，亦可恕其既往矣。"

8月18日："午正，回寓，见器物凌乱无次，大叱洁如，气煞半天……"

蒋介石喜怒无常，"怕躁而僻"，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变态，只好"思读性理书以养之"。

3月20日，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不久，便登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宝座，当时正是他的不惑之年，雄姿英发，气吞万里，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将左右中国命运的时刻，于是陈洁如的爱情悲剧的帷幕拉开了。

四

尽管5年过去，蒋介石对宋美龄始终未能忘怀，而宋家大姊

三妹这时也来黄埔军校参观，蒋介石一见便心荡魂摇，不能自持。

他从心里感到十分矛盾，常对陈洁如“心躁色厉，使洁如难堪”，过后心又“甚悔”。但要与头戴“蒋总司令夫人”桂冠的陈洁如离异，就必须找出些理由。他6月20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洁如仍是一女孩，于不知治家之道。……”

7月10日：“今日以洁如治家无方，教育幼稚，不胜忿恨。”

7月30日：“以洁如不谙家世，心甚懊闷，驰函劝令读书。”

11月12日：“得洁如书，知其迁赁月租七十二元华屋，不胜恚恨。奢靡趋俗，招摇败名，年青妇女，不得放纵也。”

综合陈洁如的“罪状”不是治家教育孩子无方，就是任性、虚荣，奢靡趋俗。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7月2日，蒋介石“上午，往访美龄；下午，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这是最好的注脚，蒋介石移情别处了，心系佳人了。

1926年7月27日，蒋总司令誓师北伐。上午8时，他偕夫人陈洁如、公子蒋纬国和国民政府代主席张静江由广州东山蒋公馆乘轿车至天字码头，转乘大南洋电船直驶粤汉铁路的黄沙车站，再从那里上火车去韶关督师。

在黄沙车站站台上，已聚集了国民党要员谭延闿、吴稚晖、顾孟余、宋子文、何香凝等及送行者二百余人。

蒋介石一行抵达后，与主要送行者站成一排拍照留念。蒋介石与陈洁如中间，站着加伦将军；陈洁如左边依次为何香凝、鲍罗廷夫人、顾孟余、鲍罗廷；右边为谭延闿、吴稚晖、李福林、宋子文、李济深、雷铸寰与白崇禧。前排正中坐着张静江，身旁是蒋纬国。

拍摄完毕后，陈洁如已是泪眼如麻，蒋介石安慰她，并许下

誓言，海誓山盟。但刚一分手，戎马倥偬之际，于7月30日，便给他的义兄张静江写了一封信，为与陈洁如的离异，迈出一大步。信内容如下：

二兄大鉴：洁如之游心比年岁而增大，既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家中事纷乱无状。此次行李应用者皆不检点，而无用者皆携来，徒增担夫之劳。请嘱其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五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何？今日在乐昌休息有怀。

蒋中正

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从蒋介石蓄谋以让陈洁如出国的计划付诸实施开始，到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上海新关码头登上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船止，共1年零19天。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陈洁如奉令出国留洋学5年，但一去便与蒋介石成为永别。

正当美国各地欢迎陈洁如热方兴未艾时，在太平洋另一端的上海大都会，申报在9月28日突刊《蒋中正启事》：

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未有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

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蒋介石翻脸不认人了。“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蒋介石在经济上卡着陈洁如的脖子，生活费只能维持，便没有再多的了，连欲回国的川资也没有。不仅如此，蒋还利用外交手段，使陈洁如长期滞留美国。

蒋介石此时却对宋美龄大献殷勤，绞尽脑汁，写了一封颇为

著名的情书:"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和要领。当时成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真是奇文共欣赏。蒋介石还厚着脸皮风尘仆仆,赶往日本之旅游胜地云仙,向隐居在那里的宋美龄之母倪桂珍处乞婚。

宋美龄却满怀喜悦,她回答《交通日报》记者的提问:

记者:"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女士为其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女士当时作何感想?"

宋美龄笑容可掬地说:"此是五年前的事情,当时我并不太注意。"

记者问:"结婚问题,起于何时?"

宋美龄答:"半年前,但最近始有成议。"

宋美龄说的半年前,是指1927年5月间,蒋介石邀宋美龄幽会于镇江焦山,在明山秀水湖光山色中,二人卿卿我我,海誓山盟,别是一番浪漫情愫。法海和尚已无法阻止一出新白蛇传了。蒋介石当时便向宋美龄发誓,要赶陈洁如下堂,事实发展也正如此。

1927年11月26日,上海各大报登出蒋中正宋美龄结婚启事。5天以后,蒋介石、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举世瞩目的婚礼。

蒋介石举起右手,虔诚地宣誓:"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宋美龄为妻。从此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健康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的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

宋美龄将右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我宋美龄，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嫁你蒋中正，从你为夫。……"

婚礼主持人余日章大声宣布："蒋介石先生与宋美龄女士，今日已在上帝和蒋宋二府的亲友面前交换戒指，互立盟约，结为夫妇。我现在郑重宣告你们二人已正式结为夫妇。"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

五

陈洁如的痛苦是深切而漫长的。1928 年 3 月 20 日，她在纽约的一幢寓所中，于昏黄的孤灯下，给太平洋彼岸的好友朱逸平写下一封信："吾可爱的逸姐姐……我自来美国后，只有写过一封信给介石，因我心中实在不忍作书于他，大半是我恐怕他们爱好似鸳鸯般的夫妻发生冲突，所以我只能忍气吞声的。"写到这里，她伤心欲绝，泪流纸上。她抽抽噎噎，继续写道："一口气只能闷在自己肚子中，我想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人可能知晓我心中的苦痛了。……"写到这里，她大放悲声……

蒋介石在新婚之际，能否想到陈洁如、姚冶诚、毛福梅？因为没有资料，笔者不能再杜撰下去，只知道蒋与陈分手的 35 年后，蒋已是 75 岁高龄的老翁，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托戴传贤的儿子戴安国给时居香港的旧情人陈洁如写了一封充满了真挚感情的信，信中云："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

去怀。”陈洁如在临终前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更是悲悲切切，她说：“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笔者写至此，不禁浩叹。只能用半阙宋词来结束此篇：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琼楼遥殿影，空照秦淮。

（王晓华 陈兴唐）

蒋纬国的仕途与婚恋

去年深秋，曾在台湾军界供职多年，刚刚在美当上寓公的叔父，突然取道日本飞抵枫叶正红的北京。

一别41载，骨肉团聚，欲语泪先流。年逾古稀的老人，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兴奋异常，游名胜古迹，发思古幽情，又返故里，寻觅旧日之梦，兴致很高。秋夜秉烛漫谈。偶尔谈到他曾写过关于蒋氏三代秘闻一书之事。老人惋惜地说，那本书材料翔实，多为外人鲜知。曾在台印好，惜被当局查禁销毁。多年心血，付之一炬，甚为痛心。后来听说此书被稽查人员偷拿出来而辗转流传海外，但至今未幸见到。知我对此书极感兴趣，便对我讲了半个多月，秋夜苦短，常常讲到曙色临窗。后我根据记忆整理，竟有数万言。

——题记

1986年的初夏，位于海滨的台北市，笼罩在连日的绵绵细雨之中。

从高大树丛掩映的别墅里，驶出一辆超豪华黑“奔驰”，剪开雨帘，缓缓地沿着广州街武昌新村的马路行驶。这一带，是台湾当局军政要员居住区。一座座造型别致的洋楼，在细雨中炫耀着它们主人的显赫。

两鬓花白的蒋介石二公子蒋纬国，扶着方向盘，目光怠倦地望着前方。今天，他脱去上将戎装，身着西服，70岁的人，看上

去并不衰老。几天前，他那多病的哥哥蒋经国召他去家里。兄弟俩，过去除公事和家务偶尔聚会，很少来往。这天，蒋经国拉着弟弟的手，免去了家礼和寒暄，不无动情地说："纬国，父亲死后，只剩下你我兄弟俩了。在这国事艰难之秋，我希望你能为党国多做些工作。你也看得出，我虽在其位，无奈身体大不如前。你我从小相依为命，诸多苦衷，你应理解。"



蒋纬国和第一任妻子石静宜

说着，竟泪涌眼眶，弄得蒋纬国无所措手足。最后扯入正题，蒋经国告诉他说："你辞去联训部主任的职务，准备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一职。"

"国安会"是台湾最要害的部门，平日可掌握情治、机要实权，直接监视台岛内外，党、政、军各部；在必要时，可超越宪法，为巩固当局实施最高权力，是为各路诸侯仰见之职。过去一直由蒋经国把持。

蒋纬国早就摸透了蒋经国。他这位兄长之所以授重柄于他，并非出于对他的骨肉之情，而是蒋夫人宋美龄亲自出面，化解他们兄弟俩长年积累的矛盾，逼蒋经国作出的让步。

看着哥哥那张苍白浮肿的脸，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可怜起他来。蒋经国受命于危难之秋，尽管他竭尽全力，苦苦支撑，台湾孤岛也未迎来太平盛世。他更清楚，蒋经国让他东山再起，是想利用他挟制继王升之后，红极一时的一股日益膨胀的势力。

汽车停在海边。他披上风衣，沿着一条通往沙滩的小路，向前走去，穿过树木葱郁的林带，脚下便是浪涛堆雪的海滩。面对茫茫细雨中的大海，他说不出是兴奋还是烦躁，抑或悲哀。

这几日，他就任国安会秘书长后，重又成为新闻人物。消息一经公布，岛上舆论哗然。人们总是摸不透蒋氏次子的变动。1984年人们猜测他可能接任国防部长，或得到参谋长之职，但他却被调到联训部做有职无权的主任去了；同样地，在蒋经国多次否认蒋氏家族再接班时，蒋纬国又出人意料地出掌重权。于是有人说："蒋氏兄弟的和解，反映了蒋经国的忠实伙伴和心腹人数寥寥，可以放心地授以重柄的，实在没有，只好不顾愚弄舆论，在自己的嫡系亲人中寻觅了。"

至于对他蒋纬国，更是议论纷纷，都认为他是蒋家宫廷中的一个极神秘的人物……

大海和细雨溶为一体，面对浩渺的大海，他感到前途险恶。双手拢起飘散的白发，时光倒流，往事如烟，人生如梦……

春雨绵绵　初恋入情网

黄埔军校的黄昏是静谧的。白天的喧闹伴着暑热渐渐退去。从缓缓流淌的珠江，飘来习习凉风。

军校的礼堂，灯火通明。年轻的士官们，端坐在座位上，脸

上浮出平时难得的轻松的微笑。

军校校长蒋介石，全身戎装，容光焕发地就坐在主席台上，一扫往日的冷峻。

一声军号，消失在夜空之后，一位精瘦的少年身着合体的小军服，昂首挺胸，走上主席台。身躯高大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紧随其后，来到台上，向学员们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诸位，我把大家请到这里来，不是以军事顾问的身份，也不是和大家研讨军事，而是以一个普通苏联军人的身份，向蒋将军的二公子蒋纬国表达我美好的感情。蒋纬国九岁随父投身革命熔炉，我谨以这支小手枪，祝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

在学员们热烈的掌声中，何应钦从加伦将军手里接过左轮手枪，又躬身捧到蒋纬国面前，蒋纬国立正行礼，双手接过对他来讲颇为沉重的手枪，那脸上闪着欣喜的光彩……

蒋纬国从小便无母亲，出生上海后，先后寄养亲戚家里。1924年，由三年前和蒋介石在上海结为连理的陈洁如带到广州黄埔军校。据宋希濂、孙元良等人回忆：每到傍晚，蒋介石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有时会牵着天真活泼的蒋纬国一道出游。几个月来，这里的军人生活，使九岁的蒋纬国感到新奇和兴奋。他天资聪颖，很有礼貌，深受师生们的疼爱，加伦将军应邀来这里做军事顾问，身在异邦，常想念自己的儿子，对蒋纬国则格外喜爱。加之当时蒋介石也深受加伦将军的敬重，所以才有授枪之举。

接枪之后，蒋纬国先向加伦深深鞠躬，又向台下深深鞠躬，最后向蒋介石行军礼，颇有军人的风采，更博得一片喝彩之声。

蒋介石更是笑容满面，加伦将军向蒋纬国授枪，正合"经文纬武"的宿愿。他决心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一文一武、治国平天下的人物。

蒋纬国在蒋氏家族中，具有独特的经历和传奇的色彩。早在他五岁时，他的名字就写入孙中山先生的电报中，尔后，那电报成为中华民国档案中的重要资料。

那是1922年6月，伪装革命的军阀陈炯明突然叛变革命，纠集所部，枪口对准孙中山，炮轰广州观音山越望楼总统府。当时形势极为险恶。6月16日，总统府卫队浴血奋战，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安然脱险，来到黄埔岛。孙中山先生为商讨革命大计，立即急电正在奉化老家居住的蒋介石。电文是：

"宁波、江北岸、引仙桥、十号。蒋纬国先生，事有急，盼速来。孙文，巧。"

当时，蒋纬国仅五岁，正由蒋介石的妾姚冶诚抚养。这姚冶诚长得天姿国色，温柔贤淑，是天津卫一大美人，蒋介石搞到手后，成为其半公开的家眷，民间称姚冶诚为"第三任夫人"。蒋纬国由她照料，在奉化县幼稚园就读。

五岁的蒋纬国的名字，成为孙中山和蒋介石联系的代号，一方面说明蒋介石对他十分钟爱，另一方面也说明孙中山先生对蒋纬国也有深刻印象。

后来，蒋纬国又随蒋介石过军旅生活。在外征战，天气冷时，蒋介石就和蒋纬国挤在行军床上。有一次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浑身麻木、嘴唇发紫、手脚冰凉，蒋介石立刻给他捏面颊，搿手搿脚。其舐犊之情，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1925年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老大蒋经国告别故土赴苏留学，蒋纬国随父征战疆场，兄弟俩开始了不同的经历。

北伐之初，蒋介石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出征之前，戴季陶等各界官绅云集车站送行。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手拉着蒋纬国，含泪为他整理行装。那蒋纬国虽然只有10岁，却像一个真正的

军人，军衣略显肥大，皮腰带也显宽松，加伦将军所授的左轮手枪，佩在腰间，有些不成比例，但看上去仍威风凛凛，别有一种英雄气概。无怪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报导说："尤可敬的，是蒋介石带了儿子出征，他的公子蒋纬国，现年 10 岁，随侍他身边，和父亲出入硝烟弹雨之中。"

蒋纬国 15 岁随吴稚晖学文武韬略。17 岁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就读。这是一所贵族子女云集的大学，不少人来这里，为的是学得科学知识，将来服务于国家。他们刻苦攻读，有些人后来成为杰出人才，当然也有到这里镀金的纨绔子弟，时常闹出些风流韵事，惹得社会上议论纷纷。

东吴大学设在苏州，校园不大，但林木茂密，校舍整洁，其间花草点缀，倒也是个环境幽雅的所在。

一天，夕阳西沉，蒋纬国从图书馆借书出来，走到芍圃前的小径上，被丁香树下的一位女生所吸引。那女生正双手捧着书本低头默读，那长长的颈子，在淡红的夕阳里楚楚动人。

他好奇地走近姑娘，轻轻地咳嗽一声，姑娘惊愕地抬起头。那是一张清丽秀美的脸庞，淡淡的细眉下，有一双明澈的大而长的眼睛。姑娘看到前面来了一个陌生人，有些紧张。

此时蒋纬国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从未在校园里见到这样标致的姑娘。"你大概是刚入学的吧?"蒋纬国问。

"是的。"说罢又羞怯地低下头，歉意地一笑，轻轻地走了。从此那白皙的颈子，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

蒋纬国多方打探，得知她是中国银行董事冯幼伟夫人的妹妹，叫施利聆。他几次主动去接近她，却被她冷冷地碰了回来。

对一个热烈的追求者，成功的机会总是有的。

南方的绵绵春雨，总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蒋纬国从苏州码头急匆匆地往学校赶，正巧遇到施利聆独自一人持伞在雨中

散步，那张红得像榴花般的小伞，在路旁碧绿的梧树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她看到蒋纬国光着头在雨中奔跑，思忖一下便说："我们一起走吧！"

蒋纬国受宠若惊，便连连遥头："伞小，你自己打吧，我没关系。"

由苏州码头到校园，道路并不遥远，但这绵绵春雨却滋润了他们心中萌生的爱情幼芽。

他们的爱情是真诚而热烈的。春去秋来，偷偷的爱情结下了秘密的果子。不久，在她父亲的催促下，身怀六甲的施利聆，来不及和蒋纬国商量婚姻养子之事，便被飞机载往加拿大，永远地和蒋纬国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后，一位自称是蒋纬国和施利聆之子的中年人，从遥远的内地来到北京，戏剧性地找到了一位曾和蒋家打过多年交道的老人，表示要到台湾寻父。经老人劝阻，中年人默默回去了。那位年迈的施利聆女士，现在还在大陆。

如醉如痴留怨艾
灰色的海上罗曼史

蒋经国和蒋纬国兄弟二人的生活道路，在其父的精心安排和命运的摆布下，颇有点戏剧性。

蒋经国负笈赴社会主义苏联留学文科，而他的弟弟晚他十年去纳粹德国研习军事，从此跻身戎马生涯。

在西渡大洋的轮船上，西服革履的蒋纬国扶栏远眺，苍茫浩瀚的大海使他心旷神怡。在离他不远处，有位金发碧眼的姑娘，不时向他投来热情而大胆的目光，在情场上虽不是新手的蒋纬国，在异邦姑娘面前，仍感到一阵心慌。那姑娘突然走过来，用英语对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请你喝杯白兰地。"蒋纬

国稳定一下情绪，心中狠狠咒骂自己，“混蛋，怕什么！”他向姑娘很有礼貌地点点头，故作幽默地说：“小姐，我们东方人是讲究礼尚往来的。请您把午餐付费的荣誉让给我。”

轮船的酒吧陈设典雅，微暗的灯光，给这里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情侣们相对酌酒，听着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笼罩战争风云的欧洲似乎异常遥远。

那姑娘是法国人，父亲是传教士，很早就来到中国，此次是她探望父亲后返回法国。在中国短暂的逗留，纯朴正直的中国人给她留下美好的印象。从登上轮船，她就注意到年轻英俊的蒋纬国，她并不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只是出于一种好奇和好感，才主动亲近他的。

他们默默对视。法国姑娘热情奔放的性格和充满活力的青春气息，使他如醉如痴。特别是异国姑娘那鲜红的嘴唇，丰满的胸脯，窈窕体态，唤醒了他熟悉的欲念。此刻在异国姑娘雪白肌肤的诱惑下，失去了施利聆的痛苦，早已被抛进脚下的大海。

他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相依相伴，热烈的拥抱甜蜜的亲吻，使他们年轻的血液汹涌澎湃。躺在豪华的特等客舱里，望着酣睡在身边的法国女郎，他有时感到内疚。和这姑娘邂逅相遇，那不是爱情，只是欲望。这姑娘使他在漫长的旅途中，没有感到寂寞，他很感激她。有时，他感到好笑。哥哥在苏联爱上了一个俄罗斯姑娘，结成了毫无光彩的姻缘，同时还要去经受炼狱的磨难。而他，需要的只是忘情的沉醉，并不想让哪个女郎的温柔成为他远大前程的羁绊。

在轮船驶抵大洋彼岸的时候，他捧起姑娘那白皙的脸，轻轻地一个吻，就结束了这段浪漫曲。当他们分手时，他蓦地发现那姑娘的大眼睛，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怨艾。这使在情场涉足不深的蒋纬国的心灵，受到了不小的震颤。他已经离开姑娘了，不知

是鬼使还是神差，他猛地跑过去，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蒋纬国到了德国，希特勒关照有关方面予以高级待遇。1937年正值中日战争爆发，他被编入德军九十八山地步兵团受训，担任二等兵。因表现突出，先后被提拔为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之后，又被送到德国慕尼黑军校步兵科受训，接受军官基础教育。毕业后，任纳粹德国陆军山地兵少尉，分到德军第八师见习。此时的蒋纬国已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热心追随者。

正当蒋纬国春风得意的时候，和中国交战的日本加入德意轴心国家联盟。中德关系突然恶化。蒋介石比蒋纬国更心急如焚，几次电令蒋纬国火速离德返国。蒋介石知道希特勒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但是，希特勒非但没有加害于蒋纬国，而且还把他保护起来，送他安全回到中国。起初，蒋介石大惑不解。但不久，他品味出，这是希特勒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是为将来和他作交易埋下的伏笔。

德国的盖世太保把蒋纬国送上轮船，小心而周到地保卫着这位客人。但对蒋纬国来讲，却感到不大自在。此刻，他对于年轻貌美的女郎们暗送秋波和大胆调笑，已失去往日的兴趣。战争的阴霾使船上的旅客忧心忡忡，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他的心底涌起另一种渴望，战神在向他呼唤，他想立刻赶回祖国，去疆场征战。

海上的夜是漫长的。他躺在舱里，闭上眼睛。两天前经历的那一幕，顽强而清晰地闯入他的脑际……

那天，柏林飘着初冬的细碎的雪花。他坐在咖啡店，呷着苦涩的咖啡，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匆匆的行人。他的心绪很不好。他所崇拜的希特勒一夜之间成了日本的同盟，也就成了中国的对头。当希特勒和父亲二者必须择其一的时候，纳粹精神在他的思想里开始动摇，因为他最清楚，他的前程不在德国，而是在

父亲统治的中国，但这种抉择是痛苦的。

突然，他的眼睛瞪大了。窗外，一位面色苍白抱着婴儿的少妇闯入他的眼帘，他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忙放下杯子，快步走出咖啡店，追上少妇。当他们的目光相接时，少妇的大眼睛迸发出明亮的光彩。但当她的目光稍向上移动，看到纳粹军人帽徽时，光彩倏地消失了。接着是难堪的沉默。

过了很久，蒋纬国燃上一支烟，猛吸了几口，小声问道："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

少妇抱紧婴儿，像陌生人似地说："是的，我也没有想到……"

"你好吗，从下船分手这么多年……"

"看得出来，你过得不错，对吗？纳粹少尉先生！"少妇说罢向他投去愤懑的一瞥，继续向前走去。他先是怔怔地站在那里。随后想起了什么似的追上少妇，从衣袋里抓出一把大面额钞票，塞到少妇手里，他不敢看她的眼睛，匆匆逃开……

山城异国　情拴石榴裙

蒋纬国返国后，玩了几个月，老蒋即命他赴美，入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受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弥漫欧亚，而位于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却是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仪表堂堂而且显得成熟的蒋纬国，对于浪漫直率的美国姑娘很有吸引力。每当军校周末，他便被姑娘缠住，要么在夜总会和她们调笑，要么驱车到海滨幽会。他发现，德军严格的军纪比起美国的松驰的纪律，简直太乏味了。德军的生活较之美军也过于清苦。他沉湎于温柔之乡，真是乐不思蜀。报效国家、血染沙场的誓言，都熔化在这歌舞升平温馨的绿叶中了。

一天，他和同学去夜总会跳舞，与一位神秘的中国姑娘不期而遇。

在龟皮竹背后，有一双深邃的大而黑的眼睛总是凝视着他。一支曲子奏罢，他极潇洒地谢过舞伴，便来到一直坐在那里的中国姑娘身边。在袒胸露背的美国姑娘中间厮混惯了，偶尔看到一位身着旗袍的中国姑娘，他感到很亲切。

他们相视一笑，算是结识了。她那莞尔一笑很妩媚，东方美人的典雅的妩媚。

悠扬的舞曲又飘荡在舞厅。蒋纬国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弯下腰，请东方美人跳舞。但是姑娘只是歉意地摇摇头，仍旧坐在那里，这使他大为尴尬，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他这才重又端详这位傲慢的美人。她皮肤白皙，俏丽迷人，举止端庄，剪裁合体的旗袍，勾勒出窈窕的身段。特别是那纤纤细指，更勾人心魄。

姑娘见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笑道："蒋公子，贵人多忘事，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吗？"

蒋纬国的脸红了，显得更加尴尬。两个月前，他从德国返回重庆，接受大纺织业主石凤翔的邀请，和各界官绅乘坐一艘漂亮的游艇，观赏山城夜色。那夜，细雨方歇，轻风习习，漫游在有些威尼斯情调的嘉陵江上，自有一番情趣。但蒋纬国对石凤翔之流，在国家危难之时，尚有雅兴夜游山城，颇有些不满。明月升空，江雾渐浓，远看山城一片灯火明灭，他的兴致全消。扶着栏杆，呆呆地想着心事。这时，一曲柔曼的轻歌，轻悠悠地飘散在江面，溶进淡淡的夜雾。他心里愤然骂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其实，歌曲不是来自他处，而是从舱内飞出。

兴致很高的石凤翔和各位官绅，来到厅中。灯光璀灿，美酒佳肴摆满一桌。东道主石凤翔举起酒杯，让大家品尝窖藏二百年的法国红葡萄酒。同时回头冲内舱唤道："静宜，你也来干一

杯!”不多时,一位身着白衣裙的妙龄少女,便飘然而至。经石凤翔介绍,蒋纬国认识了他的女儿石静宜,并握住了她那纤纤细手……

蒋纬国不无抱歉地说:“对不起,半年不见你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

石静宜只是嗔怪地一笑。自嘉陵江上和蒋纬国相识,她便一见倾心,特别是他当时那忧民的伤感,尤使她动情。她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大财阀的千金小姐,她的任性和奢侈是用独特的方式来表达的。她得知蒋纬国赴美,便尾随而至。今天,她为演出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异国重逢好戏,甚为得意。那蒋纬国本是倜傥人物,对这并非意外的相逢,当然也能品出其中的别样滋味。

蒋纬国在美结束受训后,即返重庆,石静宜因要学习钢琴,暂留美国。

他被派到西北潼关,任少尉排长。从富庶和平的美国,到这荒凉的黄土高原,遥望弥漫的烽烟,耳听隆隆的炮声,特别是仓皇而过的批批难民,那衣衫褴褛面呈菜色的老人和孩子,曾激起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责任感,使他一度与日寇疆场奋战,屡立战功,升至连长、副营长。正在这时,在重庆的蒋经国奉父命,邀他去大西北访问调查。尽管西北之行也是风尘仆仆,但能逃离这无边的战争苦海,他还是欣然前往。

“访问”归来,被升为中校营长的蒋纬国,接到石静宜将返重庆的电报,匆匆赶到重庆。

石静宜如一朵桃花,灿然飘下舷梯。她风姿楚楚,仪态方方。比在美国相逢时更有一种风韵。握住她那纤纤细手,闻到她身上的异香,他心旌摇荡,不能自持。从此,在嘉陵江畔,在成都杜甫草堂,常有他们亲昵的身影。在战火纷飞的国土上,这对

恋人却自寻了一块温馨的爱情绿洲,尽情地在爱河中游泳。自称是战神的蒋纬国有时不无自嘲地对石静宜说:“战神败在爱神脚下,也是一种幸福。”石静宜说得更风趣:“征服爱神的明明是战神!”

石静宜出身名门,举止典雅脱俗。也博得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欢心。于是由他们夫妇主婚,这对情侣在重庆结为秦晋之好。

升任上将 借母有余威

蒋经国和蒋纬国的矛盾由来已久。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迁都重庆,住在黄山官邸。一次蒋经国去看望父亲,特意携带几瓶蒋介石爱喝的黄山毛尖。谁料刚到大门,就被警卫营长王瑞钟挡驾。蒋经国讲明情况,王瑞钟仍无动于衷,就是不让蒋经国人门。已作了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蒋经国,忍无可忍,一反平日儒雅风度,勃然大怒道:“我是儿子,来看父亲的!”

王瑞钟仍不让步,只是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大公子,我没接到上峰的指令,爱莫能助。”

事有凑巧,双方正在争执,蒋纬国却驱车驶进官邸大门。蒋经国呼叫不及,老二早已无踪无影。于是,当天的晚报就登出蒋经国被阻黄山官邸的消息。更有甚者,公然在报上称蒋纬国为“小委员长座”。从此,蒋经国和蒋纬国心里,都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也成了以后蒋经国遭嫉诽谤的把柄。

其实呢,蒋经国黄山官邸受阻,与蒋介石宠蒋纬国并无干系。老蒋自西安事变被少帅张学良扣押,一直心有余恼,所住之所,无不戒备森严。黄山官邸是他办公居住之处,又时逢乱世,自然守卫更严,飞鸟难人了。

蒋介石规定，除孔祥熙和戴季陶二人可自由出入、不受检查外，其他任何人，不论亲疏，哪怕是老蒋的小舅子宋子文求见，也要先由侍卫长俞济时命令门卫放行，方能入门，进到第二道警卫处，还须搜身检查一番。蒋纬国刚才在大门长驱直入，是因为侍卫长早已命令门卫放行，大家又都认识他，所以不加盘查。不过到了第二道警卫，他也得乖乖地接受检查，并无例外。

蒋经国在大门受阻，是因为他从江西到达重庆比预定的时间早，老蒋还未来得及向俞济时交待，即使王瑞钟营长认得蒋经国，也不敢贸然放行。

尽管如此，在蒋经国心里，还是深深地埋下了猜忌的种子，等老蒋 1975 年死之后，他以嫡长子继位，蒋纬国一直遭到冷落。后来勉强晋升为二级上将。

随着老蒋作古，台湾原来动乱的政治局面更加紧张，新的权力再分配，使宋美龄的势力严重受挫。于是她眼不见，心不烦，索性躲到美国去疗养，以观事态发展，再作道理。

台北的 8 月，暑气难当。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台北机场，机飞机落，繁忙异常。在为贵宾准备的豪华候机室里，宋美龄在登机前被军政要员簇拥着，愉快地谈笑。

老臣们也知道，蒋家王朝断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但他们只有相倚相傍，借助蒋家势力，才不至在政治斗争中被暗流吞噬。

正当他们强作欢颜，彼此安慰的时间，全身戎装的蒋纬国走进候机室，他平时总是穿便服的，特别是家事活动，如老蒋、宋美龄的生日家宴，祖母王太夫人的寿诞和忌辰，春节元旦，端阳中秋等日，蒋家人都穿便服的，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今日蒋纬国全身披挂，佩戴勋章勋标，元老们莫不惊异。只见他走到宋美龄面前，毕恭毕敬地行军礼，宋美龄有些蹊跷，她端详一下年逾 60 而不失英武的蒋纬国，不解地问："怪事，又不是军事会

议，你穿什么军装?”然后又不无欣赏地说：“不过，你穿军装的确很精神。”

蒋纬国苦笑道：“妈有所不知，我再过些日子，再无资格穿军装了，所以今天给妈送行，想特意给妈留下一个军人的印象。”

宋美龄更加奇怪，忙问何因。蒋纬国便趁机把蒋经国在军中推行强制退龄退役的制度，说了一遍。并说：“孩儿已整 60，按我中将的军阶，已到退役的年龄，怕妈返台时，再也看不到孩儿穿军装了。”

宋美龄从未听蒋经国谈到过军中强令按年龄退役之事，心中便对他有些不满。她问：“那何应钦、薛岳、顾祝同都已逾古稀之年，为何还穿军装呢?”

蒋纬国忙回答说：“那是一级上将，终身任职的。”

宋美龄便不再说话。正巧这时蒋经国带一家老小也来送行。蒋纬国又忙走到哥哥面前，又行军礼。蒋经国一怔：“自家人的活动，为何这副披挂?”

宋美龄对蒋经国不向自己请求军政大事本来就有所不满，再加之他又姗姗来迟，便弦外有音地问道：“作为军人，纬国干得还行吧?”

蒋经国一时还摸不透宋美龄的用意，便说：“禀母亲，弟弟一直干得不错。”

“既然他干得可以，为何要他退役呢?”

蒋经国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蒋纬国在宋美龄面前告了自己的状，又当众将他一军。但他不敢在宋美龄及众人面前表示不满，便十分恭顺地说：“请母亲放心，孩儿已听说纬国报请退役，不过，我即可交待有关部门给他办理升任上将的事体。”

这次谈话，原来是应在家里谈的，宋美龄硬把它端到众人面前，是想杀杀蒋经国的威风，看看她宋美龄尚有余威，还能起到

稳定军心的作用

宽柔并济 富有人情味的将军

蒋纬国带兵一向注重“宽柔并济”,特别是对其所部,常常表现出军人少有的人情味儿。

1964年,台岛的蒋军对蒋家偏安小朝廷失去信心,军心浮动。蒋纬国的部下,在湖口发动了震惊台湾的军事兵变。

为稳定军心,蒋介石在处理“湖口事件”时,只是把兵变首领赵志华判了无期徒刑。身为上级的蒋纬国在“湖口事件”发生之后,他没有去缉捕当事者,而是为部下受过。他含泪走进禁闭室,锁上门,面壁而立。副司令参谋长们闻讯急忙赶来,苦苦哀求不要为部下的过失而自处。那知蒋纬国益发悲痛,泪流满面,说正是自身带兵无方,才使部下误入迷途。他用双手蒙面,然后再不说话。硬是把下属们急得团团转。

深夜降临,蒋纬国仍然面壁直立,神情极度悲哀,部下莫不感动。部下几次端来热饭菜,蒋纬国总摇头长叹。“莫要逼我,我将以死谢天!”说着竟仰天长啸:“是我害了志华!”

副司令、参谋长们见状,再不敢去劝说,都恭恭敬敬地站在禁闭室外。整整过了24小时,待旭日临窗前,蒋纬国才丢出钥匙。等把禁闭室的铁门打开,他整整戎装,昂首挺胸而出,和一直守在那里的部下们一一敬礼握手,便径直走到司令部上班,直到黑幕低垂,他方驱车回家。事有凑巧,车子行出营房千把米,忽见一人拦住汽车,借助灯光,他认出那人正是要缉拿的逃犯,赵志华的副官。

他跪在蒋纬国面前,双手把手枪举过头顶:“蒋将军,我在自首以前,总算见了您一面。部下参予兵变,至今不悔,只是牵连将军,实在不安。请将军受我一拜,也许来世重逢了……”说罢

转身而去，隐没在茂密的林木中。

据说，副官没有去自首，几天以后，在海边岩石上，有人发现了他的军装和手枪。

一天，蒋纬国手持鲜花，来到岩石上，把花瓣撒向大海。

“湖口事件”之后，蒋纬国失去带兵权，但他的部下们，一直想念这位有人情味的长官。

蒋纬国从小不知生母是何人，先后由苏州吴忠信夫妇和蒋介石的妾姚冶诚抚养。他长大之后，总不忘他们的养育之恩。每当养母们寿诞之日，蒋纬国总是邀来挚友和亲近袍泽，一起去祝寿。到了家里，把养母扶到寿堂中央坐下，然后他便跪下，连连磕头，其孝敬之心，使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老人们更是潸然泪下，忙拉起他，紧紧拥抱。

1963年，吴忠信夫人病逝，由台湾最有名的疗养院移灵极乐殡仪馆。当时已出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的蒋纬国闻讯赶到，分开众人，直扑到吴忠信夫人尸体上，抚尸痛苦，其声极为凄切，其情甚是真诚，周围的亲眷莫不弹泪。

吴忠信夫人埋葬之日，亲友致哀之后，陆续离去，唯有蒋纬国手扶墓碑而跪，任秋雨纷纷……

对于蒋纬国的人情味，也不是众口皆碑的。前不久，谋杀刘宜良（江南）命案，就有人指控蒋纬国染指其事。继而从美国购置军用飞机吃回扣的丑闻受到谴责，弄得舆论沸沸扬扬。

生父、爱妻病逝

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场，风卷残云，给蒋家王朝以致命的打击。33岁的蒋纬国被委任装甲兵少将副司令。从淮海战场溃退下来，龟缩上海，奉命戍守。

蒋纬国是蒋介石和纳粹德国培养的军人，精通军事，再加上

装备先进精良，不可一世，根本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但是，在孟良崮、黄泛区与解放军较量之后，这位蒋二公子，才尝到了苦头。



蒋纬国与丘如雪

到台湾还未站稳脚跟，逃离战场的余恼也未消失，他所崇拜的戴季陶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消息传到孤岛，朝野上下，莫不震惊。蒋介石闻得此讯，放声痛哭，蒋纬国早知戴季陶是其生父，自然更不能无动于衷。一日，蒋介石把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和蒋纬国唤去。走进屋里，蒋纬国吃了一惊，几日不见，老蒋面色苍白，形同槁木，神情恍忽，声音嘶哑："季陶追随我多年，情同手足，如今弃我而去……"说到这里，有些哽咽，"请家骅兄代我去四川季陶故居奔丧，纬国也随你前往，也表拳拳之心。"

飞机飞抵动乱不安的重庆。那里笼罩着一种毁灭的恐惧，也透出了一丝新生的曙光。汽车忽匆匆驶在冷落萧条的街市，唤起了蒋纬国对逝去的往事的回忆：

六年前，他和石静宜结婚之后，戴季陶的公子戴安国请他们到重庆大酒店吃酒。他们三人坐定，戴安国为他们夫妻斟上酒："我是代家父祝贺贤弟和弟媳新婚的。他因公事不能亲自祝贺。"

蒋纬国忙道："我与安国兄，情同手足，血浓于水，你的酒我

领了,叔父的酒实在不敢当。"

后来,他碰到戴季陶,表示感谢,戴季陶笑了:"蒋戴视为一家,你们新婚,岂有不贺之理?"蒋纬国自和石静宜结为秦晋之好后,两人感情还算不错。只是那石静宜出身名门,是个广为交际的千金小姐。一次过生日,单从法国购衣物一项就花去黄金790两,使得官财两盛的蒋家,见了也无不咋舌。蒋纬国俸禄不多,怎能满足石静宜的奢侈?原来石静宜嫁到蒋家,自恃石家是中国的首富,她的一切开销均回娘家支付,从未花过蒋家一个铜板。

石静宜随蒋家到台湾后,她父亲石凤翔的大部分产业丢在大陆,只把在上海的"大秦厂"的纺织设备迁到台湾,虽也不愁受用,但较之过去,家境已一落千丈。于是已经荣任装甲兵少将副司令的蒋纬国,便利用装甲兵采购物资的便利条件,从香港偷运大量舶来品入台,使石静宜甚为惊喜,对她认为只是带兵打仗的丈夫,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到了1952年,久未怀孕的石静宜,突然身怀六甲,这时蒋纬国已是三十有六,宏图大志,早已化为乌有,如今中年得子,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神圣的责任感。于是对石静宜格外关心体贴。此外,他还努力完成装甲部队整编工作,与于豪章等人,编写《装甲部队作战准则》,受到军内外的赞赏。蒋介石见次子有所建树,自然是很高兴,特意唤到身边夸奖一番。

农历九月初,在石静宜接近预产期的前几天,蒋纬国又奉命赴美考察,临行前把妻子送到台北唯一的一座贵族医院,设在广州街的中心诊所,安慰一番,便走上赴美的飞机。

石静宜的预产期是9月15日,这一天恰巧是公公蒋介石的70大寿。作儿媳的想讨公婆欢欣,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在这日给蒋家生个公子,为老头子祝寿。

她住院以后，多次嘱咐医师控制产期。14日深夜，尚无阵痛。石静宜便把医师唤来，要求注射催生剂。医师仔细观察之后，劝石静宜不要着急。但一惯任性出名的石静宜，岂能听从医师劝阻，强迫其立刻注射。医师深知蒋纬国夫人的骄横，不敢违命，可又怕出现问题，神色慌张，不知如何是好。在石静宜多次催促下，医师只好战战兢兢为其注射。过了不久，石静宜感到不适，继而呈痛苦难忍状。主治大夫们急忙赶来会诊，发现石静宜心跳加骤，于是立刻进行抢救并通知家属。

蒋纬国身在大洋彼岸，无法即刻飞回。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也外出难觅，几经辗转，好容易找到蒋经国。待他闻讯赶到中心诊所时，那石静宜虽经千方百计抢救，但终因回天乏术，永远闭上了眼睛。胎儿也死于腹中，可怜那石静宜，在闭眼之前还梦想把自己的儿子奉献到蒋介石的寿宴之上，洗刷因多年不育所遭受的冷落……

原本是蒋家子孙聚会的喜庆之日，不料被这飞来的噩耗，搅得大家心神不宁，蒋家人的心头都笼上了浓重的阴云。寿星老蒋，身着工衫，呆坐太师椅上，众家眷敛声屏息垂立一旁。生日蛋糕上那无数燃亮的红烛，幽幽地闪烁，照着一张张哭丧的脸。

蒋纬国收到电报，急匆匆从美返台。走进庭院，只见黑纱在秋风中抖动。赶到过厅，灵堂中的鲜花丛中，摆着石静宜那俊俏美丽的遗像。他的心头突然涌出一股难以控制的悲怆，泪水夺眶而涌。

石凤翔已是老态龙钟了。几年前，重庆游艇上那个富足而潇洒的企业家的影子一点也找不到了。他声音嘶哑地劝慰一番之后，悄然离去，只在离开庭院之前，回头向小楼留下凄然的一瞥。

住在隔壁的阎锡山扶着拐杖前来吊唁。蒋纬国忙拭泪搀

扶。阎锡山只说了声:“望公子节哀。”再不言语。他能揣摩出蒋纬国内心的痛苦。年近四十,膝下无子,好不容易妻子梦熊有兆,却不料天有不测,妻子双亡!那蒋纬国岂有不伤心之理,作为邻居,不得不出来吊唁一番。

天色将晚,老蒋和宋美龄在家人的簇拥之下,赶到这里,蒋纬国又忙迎上前去……

石静宜逝世之后,蒋纬国倾其积蓄,创办了“静心小学”和“静宜女子英专”两座现代化的学校,亲任两校董事长,以资纪念亡妻。当时报界都同来捧场,一时蒋纬国口碑甚好。

又堕情网

1953年料理完石静宜丧事之后,蒋纬国又随国防部作战次长徐培根中将再度赴美,入美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及防空学校飞弹班受训。

在美受训期间,由他的好友戴安国介绍,和中德混血儿的美人邱爱伦认识。那是在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蒋纬国正在这里度周末,下榻中华酒店。一天,先他而来的戴安国兴冲冲地跑来拉他便走。他们走进一家极豪华的饭店,宴会厅里坐满了各界名流,这是旧金山市长举行的一次大型宴会。

戴安国拉蒋纬国坐在一位漂亮小姐的前面,蒋纬国简直呆住了,他根本没听清戴安国的介绍。这位小姐既具有西方人白皙的肤色和深邃的大眼睛,又有东方人端庄的仪态和典雅的举止。

看到蒋纬国怔怔地看着自己,连握手的礼仪都忘记了。邱爱伦灿然一笑,收回早已伸出去的手。怔了一会儿,蒋纬国猛地意识到自己忘乎于礼,忙搓着手,歉意地笑道:“对不起小姐,你的美貌使我失礼了。”

邱爱伦依然是灿然一笑，落落大方地重又伸出手。

邱爱伦的手是温软的，比起石静宜那不凉的细手别有风韵。

戴安国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宴会之后推托有事先告辞了。

蒋纬国早已过了容易激动和钟情的年龄，可不知为什么，在这位漂亮的女性面前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请邱爱伦去喝咖啡。

邱家伦非常得体地一笑："对不起蒋公子，我还有一个约会，不能奉陪了。认识你很高兴，再见。"说罢款款而去，直到目送她消失在璀灿的灯光之中，蒋纬国才怅然叹了口气。邱爱伦灿然一笑，使他激动不已……

回到军校之后，他一连给邱爱伦写了几封充满感情的长信，但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弄得年近四十的他，坐卧不安，饮食无味。他在思恋熬煎中度过十几天之后，给在旧金山的戴安国写信询问情况。那戴安国见信不由窃笑。这位仁兄还真动了感情，便到邱爱伦家。邱爱伦的父亲是位华裔巨商，娶了一位德国夫人。听女儿说在宴会上遇到蒋介石的次子，便劝女儿少与其来往："我们世信为商，从不参预政治，况且蒋介石现已偏安孤岛，政局险恶，自身难保……"女儿听了有些不乐，娇嗔地说："我又不去台湾作大总统，您何必瞻前顾后?"

待戴安国登门来访，邱老先生颇感不快。那戴季陶的臭名远扬海外。自己也曾受其威胁，现在其儿子造次来访，他决定不予理睬，只让女儿去接待。

邱爱伦在客厅和戴安国谈了片刻，戴安国便话入正题，说蒋纬国如何一片痴情。邱爱伦那时已过二十，虽不乏追求者，但她却看不上。上次宴会上与蒋纬国一见，便有几分好感，只是她不知这位公子的人品究竟如何，便没有贸然应允去喝咖啡。今日听戴安国这么一说，她相信蒋纬国那几封信是出于真情，便对戴

安国说:"戴将军,请您转告我对蒋公子的歉意,我因正在学画,无暇分心回信,请他谅解。"

戴安国也摸不清虚实,只好告辞,来到蒋纬国那里讲明情况,那蒋纬国着实痛苦了一阵子。

蒋纬国于1954年毕业回到台北,就任"国防部"侍从高参。第二年又升任"国防部"第三厅少将副厅长。这两年,他尽管忙于公务,他写信给大洋彼岸的邱爱伦,从不间断。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突然有一天,他刚下汽车,侍从便呈上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件。他打开一看,差点昏过去。那信极简约:"纬国,如晤。樱花盛开的三月,我将飞往东京。爱伦。"

蒋纬国如获至宝,激动得不能自已。

翌年春,他飞抵日本富士山,在如霞似锦的樱花下,他与邱爱伦梦幻般地会面了。这一切都带有神秘的色彩,使蒋纬国简直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

东方的环境,东方式的恋爱,也使奔涌着一半西方血液的邱爱伦感到狂喜和新鲜。

1957年3月4日,41岁的蒋纬国和邱爱伦征得双方家长的同意,在日本东京举行婚礼。由戴安国主婚。

四年之后,邱爱伦为蒋纬国生得一子。79岁的蒋介石大喜,赐名蒋孝刚,排在蒋经国的儿子孝文、孝武之后。

这几年,蒋纬国先后出任过"国防部"第五厅厅长等职。1958年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台时,担任荣誉侍卫长,非凡的仪表,军人的气度,深得巴列维的赞赏。不久荣升装甲兵司令,后晋升陆军中将,成立两个装甲旅,任装甲部队指挥官。到了47岁,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从事军事教育工作。

邱爱伦已习惯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现在家里做起养尊处优的太太,特别是繁文缛节,尤使她不能忍受。在生了孝刚之

后，便移居美国。

对蒋纬国和邱爱伦的私人生活，当时有各种传闻，有人说蒋纬国夫人在美另有新欢，有人说蒋纬国又有了红粉知己，冷落了太太。弄得蒋纬国甚是尴尬。

他经常搭上飞机，往来于台美之间，被人戏称“太空人”。

是蒋门之后还是戴的骨血

1975年，蒋介石一死，蒋经国继承父业，之后，台湾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近来，逐渐掌握权柄的蒋纬国，成了人们瞩目的人物，早就传闻“蒋经国不是蒋家骨肉”的话题，又重新成为被人热烈谈论的热门话题。

更令人不解的是，台湾的《政治家》周刊突然披露蒋纬国著文说自己不是姓蒋而是姓戴的新闻，令舆论界哗然。上自庙堂，下至市井，无不对这一旧话重提大感兴趣，弄得整个台岛风风雨雨。

据台湾《政治家》周刊透露，香港女作家孙淡宁根据蒋纬国口述，整理了一本叫《蒋纬国报到》的书。整理好之后，送交蒋纬国审阅。他认为没有问题并授权孙淡宁出版。

据说此书分两大部分。前两章是蒋纬国自述他为什么要潜心研究战略，后几章则是重点谈战略。其间加入了一段自己的身世之谜，既不是军事战略，又不是正经自传，显得不伦不类。但正是这些内容，成为奇货，几家报刊为抢夺发表权而明争暗斗，大动干戈。正当抢夺到白热化的时候，忽又传出《蒋纬国报到》一书不许出版和刊载的消息。于是这又引起人们的兴趣，到处询问其中的原因。奇怪的是蒋纬国和出版社却缄口不语，保持沉默。人们纷纷猜测，莫非是因该书披露了蒋家的隐私，犯了

禁忌？或是蒋纬国的部下亲信，怕此书一出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全力劝谏，使蒋纬国改变初衷？都只是揣测而已。

其实，有关蒋纬国姓蒋还是姓戴抑或他姓的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读者大约记得，前面已经交待，蒋纬国一出世，便寄养别家，不知其生母是谁。

要弄清蒋纬国的生母是谁，这要追溯到1913年。

袁世凯窃夺大总统职务之后，便复辟帝制，革命宣告失败。袁在全国悬赏缉拿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被迫亡命日本，准备再积蓄力量，待机东山再起。这时，陈英士、蒋介石和戴季陶便到了日本。蒋戴共租一屋，陈另择他处。

蒋戴经常出外活动，又不会料理家务，便请求房东代找佣人。一天，房东领来一位妙龄少女，说是刚刚从日本服务学校毕业，年方17，可以替他们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蒋戴二人见其面孔姣好，欣然同意。从此，他们和女佣人朝夕相伴，非常融洽。

那女佣人叫芳子，家境贫寒，为养一家人，只能出来做工。她性情温柔，聪明敏慧，手脚勤快，深得蒋戴喜爱。

那时，他们二人也正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英姿勃发，也博得了芳子的好感。三人在一起，年轻的热血总要澎湃奔涌。先是芳子接受了蒋介石的求爱，有时偷偷与他同居，而后又以温热的身躯去伴戴季陶共枕，为他生得二子。蒋戴既是生死与共的朋友，当然不会为一个女佣人撕破面皮。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在日本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回国，蒋戴也告别芳子赋归。蒋戴二人各携一子。大的归戴季陶，取名戴安国，小的属蒋介石，即蒋纬国。

有人说，上述情况并不准确。戴安国是风流倜傥的戴季陶与一位中国女子所生，后交原配夫人纽有恒抚养。蒋纬国才是戴东渡日本之后，与一位日本情人结下的爱情之果，这情人当然

不是芳子。芳子乃是蒋介石的情人,戴季陶安敢夺他的兄长之美!现在看来,蒋纬国究竟是日本还是中国女子所生,无关紧要,有一点是清楚的,他的生父是戴季陶。

到了台湾之后,有人发现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血型同是O型血,而蒋纬国则是A型,于是早就对蒋纬国耿耿于怀的蒋经国,便抓住血型问题大作文章,说"O型血是英雄血",表示只有自己才是蒋介石的嫡传。这一攻势果然奏效,蒋介石死后,蒋经国操掌权柄,自然顺理成章。

其实,早在老蒋晚年,蒋经国掌握实权之后,特别是掌握情报权之后,便对其弟进行严密监视了。他的情报人员,天天暗中窥视蒋纬国,多方搜查材料,待整理好之后,便呈送到老蒋和蒋经国的办公桌上,弄得蒋纬国异常困惑和恼火,他曾仰天长啸:"我如果不姓蒋而姓戴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综观蒋纬国的70年历史,真可谓多姿多彩,享尽了人间尊荣权势,也饱受了各种困扰。往事如江河东去,年逾70而又重掌权柄,对他来说是福是祸,只好等待历史作出判断……

(汪兆骞)

陈香梅在初恋时

一

那是在1943年初冬的昆明。

那天一早，陈香梅到驻昆明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采访。她年方19岁，是岭南大学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女记者。

虽说是新手，陈香梅早已很快适应了采访生涯，习惯于跟其他报社记者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气氛。

本来，她完全可以依靠在中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馆当领事的父亲，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她却偏要自强自立，靠自己的本事闯天下。小姐不做，她要当记者。

她工作得非常刻苦，新闻报道自不待言，副刊还不时发表她的散文和随笔。细心的读者，偶尔还能在刊物上见到她写的一两首小诗。文章虽不起眼，陈香梅却非常自豪，那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自食其力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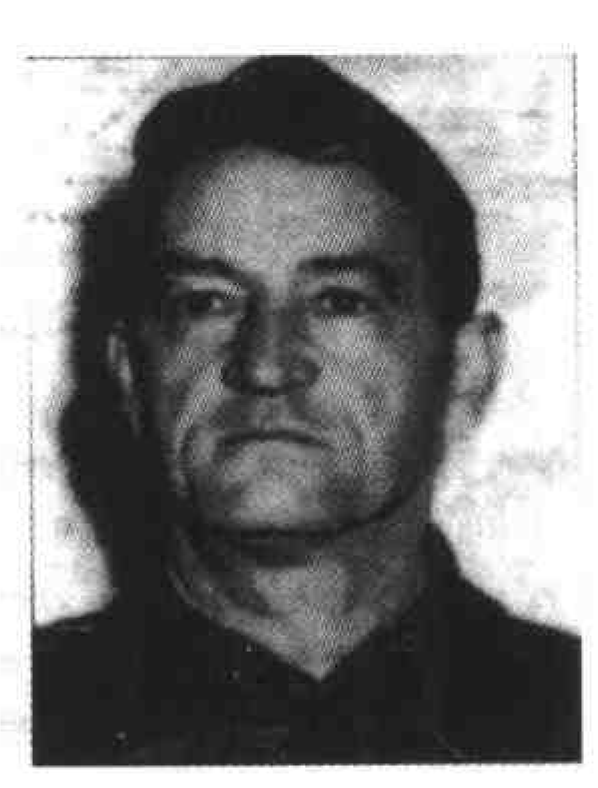
这一天的采访对陈香梅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在整个昆明城里，陈纳德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协防滇缅路期间，击落击伤日机数百架，近年昆明免遭空袭，也得益于他指挥的美军航空队。陈纳德航空队威名远扬，曾被中国新闻界誉以“飞虎队”的美称。陈香梅早就想见识一下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二

陈香梅来到了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被允许进人接待室。几分钟以后，陈纳德穿过边门，出现在记者们面前。

以前，陈香梅听见别的记者在私下里称呼陈纳德为"老头子"，她便把他想象成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结果她完全想错了。站在她面前的陈纳德身板笔挺，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他那结实的身躯，紧束在收了腰的毛料军服里，好像是从油画里走出来的骠骑兵，充分显示出将帅风度和军人的魅力。两颗银色的星徽，佩戴在他平直的肩头，与他胸前佩戴的几排勋章交相辉映，耀眼夺目。

陈纳德露出真诚的微笑，他向记者们透露了好消息：连接中印两国的"驼峰航线"，每月的空运量已接近5000吨。



美国空军退役军官莱尔·李·陈纳德

陈纳德说："跟太平洋战区的辉煌战果相比，这或许算不上什么突出的成绩，诸位记者。但对于四面受敌的中国战区来说，它相当于一根动脉血管，片刻缺少不得。"

在详细介绍"驼峰航线"的其他一些情况后，陈纳德又说："我想我讲得够清楚了，第十四航空队的工作，就在于全面保护这条航线，并不断出击日军。"

因事关军事机密，谁也不能写报道。

陈香梅很失望，其他记者都匆匆走掉了，她还独自坐在那

里。她父亲跟陈纳德有点交情，她今天得接上这个关系，便于下次采访。

“是安娜小姐吗？”陈纳德迈着大步走过来。

“安娜”是陈香梅的英文姓名，她听了又惊又喜，赶紧答应。她是在香港长大的，说起英语来，跟汉语一样流利。

陈纳德说：“你的父亲最近有信给我，问及你姐姐的情况，并提到小姐你也在昆明任职。”

陈纳德的和善态度，打消了陈香梅的紧张，说话也轻松多了。“见到您真高兴，将军，静宜姐曾告诉我不少关于您和第十四航空队的故事。”

陈纳德温和地点了点头，客气地问道：“如果小姐不急于赶回去写稿，能赏光跟我们一道喝杯咖啡吗？”

陈香梅欣然首肯。

她那时还无从知道，今日的相会竟是她新生活的起点。

三

陈氏姊妹的住宅，是一所租赁的雅静中式庭院，环境不错，上街也方便。

陈香梅的大姐陈静宜，说是来昆明小住，实际上是来当妹妹的监护人。陈老先生对陈香梅的任性颇有了解，不希望她一个人到处瞎闯。另外，老人家也弄不明白，女儿大学毕业后怎么没找到好一点的差使，没到陪都重庆的大衙门里做事。他放心不下，要她也去美国。

两姊妹一见面，又是谈这话题。

陈香梅笑着摇头道：“我不会去美国的，我在采访时结识了陈纳德将军，你们将会看到关于他的连续报道。”

“是吗？”陈静宜问道，“你对他印象如何，还不错吧？”

"他应该得到一个比'不错'还要好的形容词。"陈香梅说,"陈纳德是一位最优秀的美国军人。"

陈静宜的笑容是意味深长的。她点燃一支美国香烟,吸了一口含在嘴里问:"你是什么时候他的,怎么认识的?"

"听你的口气,像是在审问我。陈纳德这种人,每个记者都想跟他认识。"陈香梅撇撇嘴,拿起梳子去梳她的头。

静宜含笑盯着妹妹说:"香梅,我看你像是有点迷上他了。"

"大姐,你说些什么呀!"陈香梅猛一震,梳子扭住了头发,半天取不下来。

快20岁的人了,陈香梅仍把对异性的爱慕闷在肚里,从不对外人提及。有朝一日,她说不定会嫁给黄毕尔,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她从前在香港跟他认识。他们谈过恋爱,但远远不能称之为亲密。

"听我说,香梅。陈纳德已是个有家室的人了,你不要常去找他,免得招人非议。你也知道,新闻界的那帮人是很敏感的。"

陈香梅又急又躁,冲着姐姐嚷道:"我跟这个人真的刚认识,我想写关于他的采访手记,这对我的前途至关重要。他是随和的人,你一接触他就会知道。"

几天以后,陈静宜搭乘美军运输机离开了昆明,她未能说服妹妹一道去美国。

四

风从南方吹来,吹过昆明市,带来郊外泥土的芬芳,闻上去很香。长途迁徙的候鸟,爬上翠绿色的琉璃瓦,悄悄谛听圆通寺的暮鼓晨钟。

中央通讯社的吉普车,把陈香梅送到第十四航空队驻地,她又一次来这里采访。

陈纳德不在。作为指挥官，他一会儿飞重庆，一会儿飞德里，出席各种军事会议。

出面接待的是新闻官霍顿中校，他负责发布所有的新闻和战报，而关于陈纳德，此人又是最可靠的知情人。

陈香梅提出的，全是关于陈纳德的种种问题。

“啊，安娜小姐的胃口真大！换了别人，我会断然拒绝，可是对你，却是一种例外。”霍顿殷勤地笑着，打开抽屉，把一大叠打印材料递给陈香梅：“这是本人写的一些有关将军的报道，现在全归你了。”

陈香梅急急翻看材料，耳边，又传来霍顿的话语：“除了这些书面材料，假如你有兴趣笔录，我还可以口头替你补充一部分。”

“简直不知道如何感激你！”陈香梅喜出望外，马上摊开笔记本，用英文进行速记。

夜里，邻居都入睡了，只有陈香梅的灯还在黑暗中亮着。霍顿送来的材料把她迷住了，她贪婪地阅读，毫无睡意。陈纳德其人太有意思了，为什么她以前没听说过他呢？

她现在知道了，陈纳德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在路易斯安那州度过了童年，1917 年 8 月加入美国陆军，随后转入空军。后来，当了空军中校的陈纳德因患耳疾，提前退役。中国抗战爆发他最先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旋即组织美军志愿航空队，参加滇缅路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召回美军现役，提升为上校，指挥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印缅战区作战，卓著勋劳。

陈纳德不远万里，援华作战，使陈香梅敬佩不已。现在，她期待与他直接晤谈，以求更深的了解。

陈香梅又去求助霍顿，新闻官答应给安排一个时间。自不待言，他也希望时常见到陈香梅。

五

约见比陈香梅预料的来得快。

一个周末的上午，霍顿打来电话，说是将军愿意见她。半个小时后，陈香梅已如约赶到。

她进门便看见了他。陈纳德的军服军裤都熨出了笔挺的折线，领带的颜色跟他眼睛的颜色相近，皮靴擦得光可鉴人。他领口露出的雪白衫衣也是浆过的，挥发出男用香水淡淡的香味。

"请坐，安娜小姐，咱们是老熟人了。"如同前次那样，陈纳德用和蔼的语调，驱除了陈香梅的紧张。

陈香梅很想知道，这位从小沉湎于打猎、钓鱼的野孩子，怎样成为年轻的飞行教官？他所写的《驱逐机的防御使用》一书，为何竟成了美国陆军航空学校的教材？他那曲折的经历中，还有哪些传奇故事？

她想问及许多，然而一开口，却是新闻记者典型的提问："将军，有什么新的消息？"

"有的，但说来让人沮丧。"陈纳德说，"我派了一架飞机去印度接运邮件，但它载回来的却是一批给中国士兵穿的球鞋，不知是谁办的这种荒唐事。我的部下起码三周没接到邮件了。"

陈纳德想表现得幽默些，但陈香梅听了却不是滋味。有人曾告诉她，将军正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日本人以及驻印度德里的空运司令部里的官僚主义者。

"不提它了，不提它了，提起就让人头痛。"陈纳德说，"我们还是谈点开心的事吧。"

陈香梅立即转移了话题："将军，您能告诉我一点有关警报系统的情报吗？"

陈纳德容光焕发，因为那个警报系统是他的杰作。它遍及中国西南诸省，由电台和电话联系在一起，一方有警，八方周知。

虽然谈的是些极普通的话题,从陈纳德口中说出来却绘声绘色,很有吸引力。

这次采访定下了以后的格式:采访后总要一道进餐。每次访前,霍顿中校照例限定不得超出10分钟。但这个限定总是被陈纳德打破,有意延长晤谈。

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家宴上,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社交场合,陈纳德尤为健谈,他的学识和见解,给陈香梅留下深刻的印象。职业性的关系,日渐发展成私人间的友谊。

六

新春到来的时候,他们仍然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仍然只是在公开场合见面。不过,见面时已不再需要客套或寒暄,坐到一起便是自然的交谈,甚至是继续上次的话题,好像没有一点间隔。

他喜欢从侧面欣赏她那洁净的面容,欣赏她那微微翕动的鼻孔,欣赏那只不停地往笔记本上写东西的灵巧的小手。她是他见过的感情最为纯真的姑娘。

陈纳德渐渐爱上了陈香梅,尽管他很难承认。经常性的往来,使他心里发生的微妙的变化,一刻也不能平静。他竭力想否定这感情的纠结,然而徒劳无益。要不,当他派飞机去轰炸汉口、南京的日军机场,当他召开严肃的军事会议,当他闭门研究敌机的性能时,为什么总会想起陈香梅,甚至听到她那悦耳的声音呢?

1944年4月,侵华日军发动了密谋已久的“一号作战”,先后进攻河南、湖南和广西,国民党军仓促应战,丢城失地,全线震动。蒋介石电召陈纳德去重庆,商讨陆空军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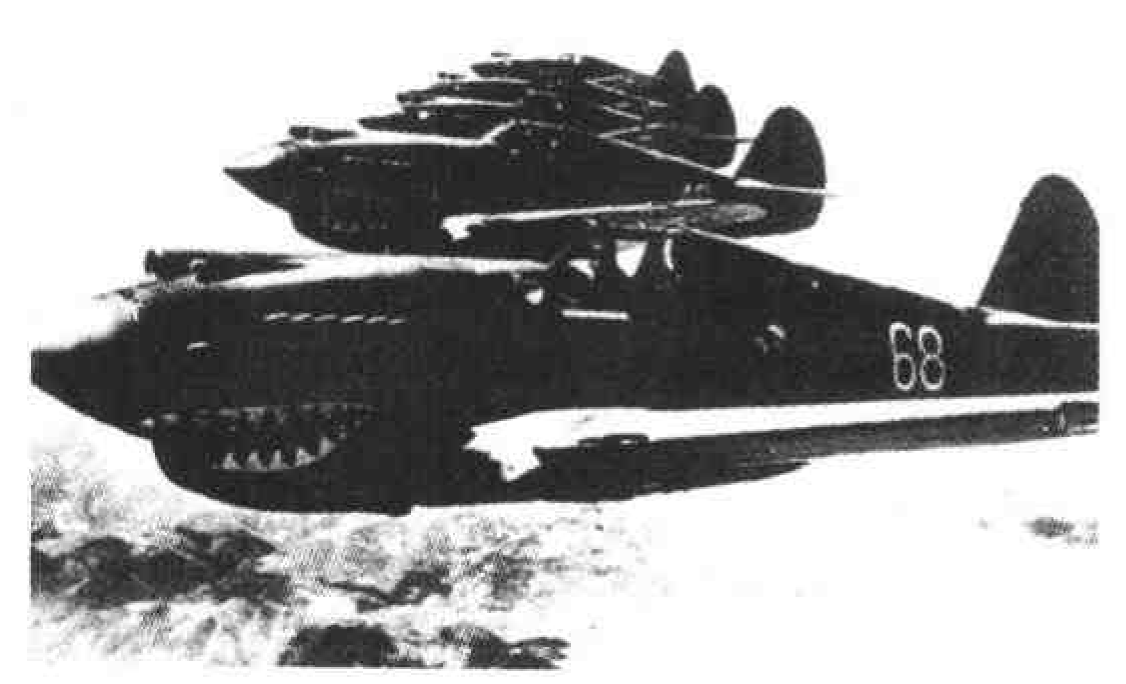
衡阳失陷之夜,陈香梅辗转卧榻,难以入眠。她有四个妹妹

正在桂林上学，近来下落不明。据说，日军先头部队正沿衡阳到桂林的铁路推进，成千上万的难民不断逃离那个地区。

如今，她只能求助于陈纳德了，人们不是说，他是"最接近神的人"吗？

一天早上，霍顿打来电话，说陈纳德已返昆明。陈香梅放下手头的工作，急忙赶到巫家坝机场。

"上周你父亲拍来电报，请我协助寻找你的妹妹们，我已派出特别搜索队去金城江车站，在那儿接应她们。这消息或许能让你愉快，我们会找到她们的。"陈纳德说。



美国志愿飞行员们驾驶形状古怪的战斗机整队出发，袭击日军

泪水大量涌上陈香梅眼眶，她一点头，泪珠就成串往下掉。

陈纳德那瘦削的脸上满带倦容，嘴角却浮现着亲切的微笑。他在百忙之中，撇开自己的忧虑和困难，为几个无告的女孩奔走，他的心是仁慈的。

陈香梅心里担心：美军搜索队能从潮水般的难民中找到她

们吗?

过些日子,有个电话突然打到通讯社里来。简短的通话之后,听筒里响起嘟嘟声,对方把电话挂断了。可是陈香梅却泪流满面,忘了放下电话筒。

同事们都一下围过来,向她说着安慰的话:"是坏消息?香梅,我们都替你难过。想开点,这是战争。"

陈香梅破涕为笑:"是好消息,搜索队找到了我的妹妹们。因为太快乐,我才流的泪。"

她是天主徒。她皈依天主,笃信天主,永远赞美天主。此刻,她以同样虔诚的心情,赞美着另一个人: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

七

女儿们俱已脱险,远在旧金山的父亲却心有余悸,他接连来电,要女儿们全部去美国。那个国家位于大洋彼岸,远离战火,是一块安静的绿洲。

订好机票那天下午,陈纳德请陈香梅到他办公室去喝茶。天上下着毛毛雨,阴郁的寒气蠕动在地图和卷宗之间,蠕动在他们心里。红茶是滚烫的,却驱不走这股无形的寒气。

"听说你们已预订了机票?"陈纳德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陈香梅。"这么说,咱们就要分别了?"

"是的。"陈香梅小声答道,用手捂着茶杯,颤抖得厉害。"我不知道怎样感激您,我会想念您的。"

美军航空队司令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尊化石。然而,他那宽阔的胸脯却一起一伏,心潮难平。他期待的不是感激,而是别的。他那深陷在眼眶里的双眼,直愣愣地望着纷飞的细雨。

"听着,安娜。"陈纳德头也不回地说,"如果你有任何不想走

的理由,我可以取消你的签证。不过目前办理签证十分困难,你要考虑一下吗?"

陈香梅一时无法回答。

她抬眼从背后望着窗前的陈纳德,明眸中流露出的那种敬慕神色,是许多男人一生中根本见不到的。她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确想留下来,而他是她想留下来的唯一原因。而陈纳德所说的话,所作的暗示,也明白无误地说明他希望她留下。

他在等着她的回答。

几分钟的时间,像是有几年那样长。

陈香梅的嘴唇动了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那是她必然的回答:"将军,我并不认为我真的要走。我打算留在昆明。"

陈纳德慢慢转过身来,发亮的眼睛里隐藏着满怀的喜悦。"那就这样吧。"他说,"可是我还是在想,我是不是干了一件蠢事?"

"这只能由时间来回答了,将军。"陈香梅莞尔一笑,又赶紧低下头去。她凭第六感觉,明白陈纳德喜欢她留下,对她来说,这便是一切了。她还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八

抗战胜利后,陈香梅从昆明调往上海工作,干的还是老本行。1945 年 12 月下旬,在办妥离婚手续后,陈纳德从美国启程,前往上海来找陈香梅。

在他宽阔的怀抱里,她觉得自己软弱得出奇,像个小女孩似的。不知为什么,她还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

"我真想你,小东西。"陈纳德说。他头一回这样称呼陈香梅,这个爱称专属于她。

这看似水到渠成的东西,却还得经过几许曲折。

最大的阻力,来自陈香梅的长辈。

陈香梅此时的监护人,是她那定居上海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两位老人都表示反对。

外祖母对陈香梅说:"以你的品貌和条件,肯定有不少门当户对的男人愿意娶你,为何偏要去找一个比你大33岁的外国小老头?"

外祖父认为年龄无关紧要,但是他同样反对陈香梅嫁给外国人。"我翻过家谱,在我们的家族中从来没人跟外国人结婚。跟洋人结婚没好处,他会把你从中国带走。"

陈香梅只能软缠硬磨。

陈纳德则经常上门陪外祖父打桥牌,最终感动了老头子,表示同意。

至于宗教信仰上的问题,他们是通过协商解决的。陈纳德信仰新教,陈香梅信仰天主教,为了不得罪各自的主神,他们干脆决定不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1947年10月,在多次来信干涉无效的情况下,陈香梅的父母从美国飞到上海,亲自出马劝阻女儿的婚事。他们觉得让陈纳德做朋友可以,做女婿却不合适。

陈香梅的父亲即将改任驻沙捞越总领事,生拉活扯要女儿随他赴任,担任他的秘书。继母则旁敲侧击,说是等她年纪大些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年龄差距太大,是他们不赞成这桩婚事的主要原因。

"我知道二老都是好意,"陈香梅说,"但我宁愿跟一个中意者共度五年或十年的日子,而不愿跟一个凑凑合合的人厮守终身。"

眼看这事儿要黄,陈纳德也横下一条心,指名要找岳父大人谈判。

“陈博士，您可能忘了。”陈纳德陪着笑脸说，“想当初我在桂林替您搭救了好几位千金，如今我指望娶一位做妻子，难道算是过分的要求吗？”

就这一句话定了胜负。

1947年底，陈纳德与陈香梅在上海结婚，轰动一时。

40年代末，他们先去台湾，后到美国定居，共度了10年美好时光。

1958年7月，陈纳德病逝于美国，终年68岁。其创办的“飞虎”航空公司，由陈香梅出任董事长。她积极参政议政，历任美国共和党财委会主任、总统府出口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共和党亚裔委员会主席、总统学者委员会主任等要职，活跃于美国政坛。她还出书40余种，是美国的知名作家。

（杨耀健）

郭沫若与安娜的异国之恋

初识佐藤富子

郭沫若从冈山来到东京。在这之前，1914年1月，他从北京出发，经朝鲜到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在东京住了一年半。预科毕业后分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科继续学习。

他这次到东京来，是为不久前去世的友人陈龙骥料理后事的。他来到了陈龙骥曾经住过的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在洁白而又宁静的走廊里，他无意之中见到了一位年纪很轻的护士。她的身高约一米六七，在身材较矮的日本女子中算是佼佼者了。体态丰润，皮肤白嫩，圆圆的脸庞上闪耀着一双灵活的眼睛，脸颊上泛着淡红晕，显示出一股特有的处子风韵。

这就是佐藤富子。是年22岁。

"你好！"

她主动招呼起他来了，脸上笑微微的，又用双手按着膝盖鞠了一躬。这是日本女人见人时的一种礼节。

在这位年轻的护士面前，郭沫若不知怎的竟有些脸红起来了。一种欣喜加艳羡的异样的感觉掠过了心头。他镇定了一下自己，向佐藤富子说明了来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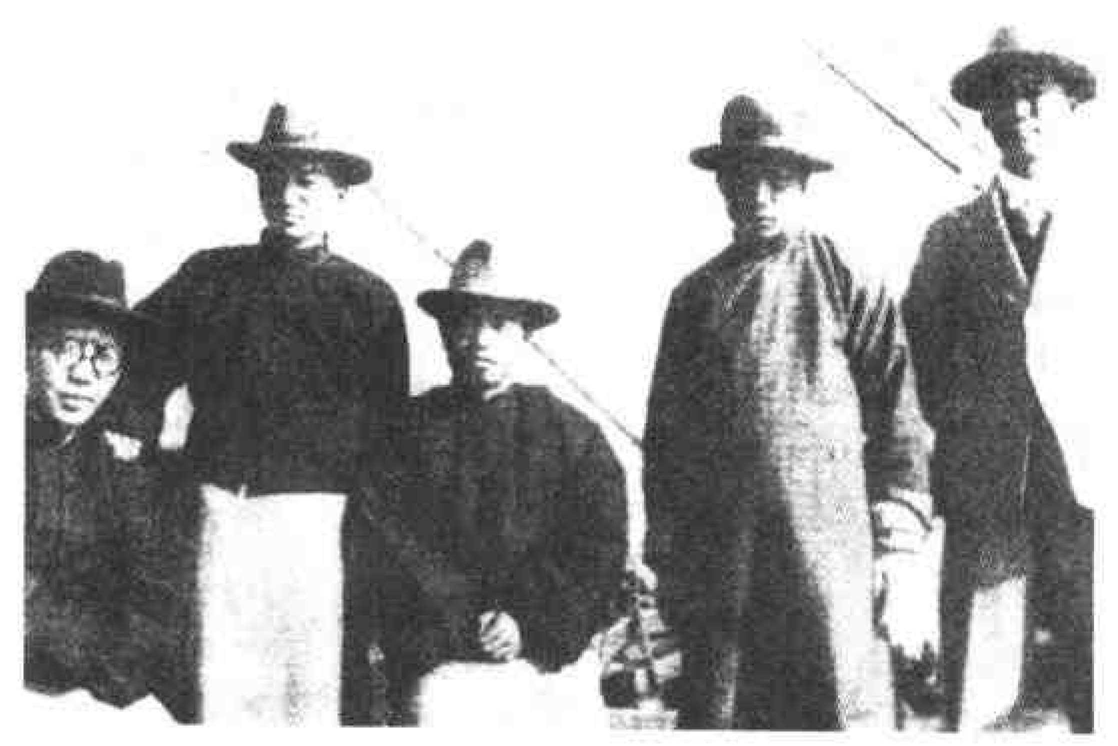
"陈龙骥君有X光线的摄影放在病院里，我今天特地来索取。"

"陈君？是你的友人么?"佐藤富子态度友善地问道。

"嗯嗯。他进了一高之后，得了肺病，从杏云堂转到圣路加，又从圣路加转到了养生院。"

郭沫若伤感地说。佐藤富子是极富有同情心的女子，一听说他的友人已逝，眼睛顿时溢出了悲伤的泪花。接着又安慰郭沫若道：

"陈君是到上帝身边去了。我们以后都要到上帝那里去，天国才是归宿呀!"



从日本回国后参加北伐时的郭沫若(左一)

她说话的时候，爱把头偏在一边，又时时爱把眉头皱成"八"字。郭沫若注视着她的眼睛，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圣洁光辉。

与此同时，佐藤富子也在注视着郭沫若：苍白的面孔，紧紧闭着微微翘着的嘴唇，眉间、额上如不十分注意时还不能看出的皱纹，忧郁凝滞的眼光……这一切都表示出这位年轻人正蒙受

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思虑与煎熬。

“看来他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啊!”佐藤富子心里暗暗想着。于是又说道:“X 光影片寻出后,我会给你邮去的。请问寄到哪里呢?”

“请寄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我在那里读书,明天就回去。”

“哦,你是未来的 doctor!(医生)”佐藤富子欣喜地说道,黑晶晶的眼仁放出了光彩。“我真喜欢学医的人,你们学医的人真好!”

郭沫若笑了一笑,诙谐地说:“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杀人偿命罢了。”

“嗳呀!”佐藤富子惊叫了一声,随即又好像注意到她的声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说:“哪有……哪有那样的事情呢?”

郭沫若脸上微微红,心里漾起了一阵莫名的骚动,比刚才初见时又强烈了几分。

“他是一个好男子”

郭沫若回冈山不久,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的 X 光照片寄来了。她还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安慰郭沫若,信中说了许多宗教上的 Resignation(认命)的教训:

“作为一名看护,人到属纩(病人临死时的代称)时的惨状我凝视过的回数很多。在那样的时候我总不知不觉地要流眼泪。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总有无上的悲哀潮涌上来,竟至不能不哭。我这样每被小姐们嘲笑。许多的同辈看着人的临终也能漠然不动,我真不了解。我自己也晓得死也并不是生的反对,并且有许多圣者是死以求生的,如像耶稣更是为使他人活而自

己就死。……上帝是裁判众生的,宽赦众生的。无论是善人,恶人,智者,贤者,君子,愚人,小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上帝是一视同仁的……"

原来佐藤富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她1894年10月3日生于仙台,父亲是位牧师。她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铜女校毕业后,就立志献身于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了看护。

郭沫若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佐藤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着了bitterishSweetness(带着苦味的甜蜜)。既在国内客观存在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邦备受受欺侮之痛,这时的郭沫若得到了这样一位日本女子的尊重、同情与爱怜,惟如在苦难中遇着了圣母玛利亚一样,怎能不叫他万分感动呢?

"啊啊,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位契己的良朋,便又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偿我的失缺么!"

他这么激动地想着。再看那信时,字里行间分明又闪现出佐藤富子特有的圣洁光辉来。他的心灯被拨亮了,智光被点燃了,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我忘不了同您的那次谈话,我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在异乡非常寂寞。"

几天以后,佐藤富子便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读罢之后她禁不住笑起来了,心想:

"这是情书啊!爱上了我真是奇怪。不过,他是一个可爱的学生,好男子。"

当富子这么想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未曾经验过的异样的感

觉，她的白嫩的脸颊渐渐地潮红了。这是一位少女被爱神敲响心扉时心里产生的那种惊喜交织的感觉，她并不十分认真地又回了信……

情义绵绵无尽期

东京——冈山。虽相隔千里之遥，但隔不断一位中国学子和一位日本姑娘的绵绵情思。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书信往返十分频繁，一个星期之中每每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了，相爱了，两人认作异国的兄妹。

这次，佐藤富子接到的信札，觉得比往常的信要厚一些。赶快回到宿舍拆开来一看，里面夹着一帧郭沫若新近照的相片，背面上并写着"贤妹惠存"几个字。佐藤富子十分欣喜。——只要是郭沫若的来信，无论写着什么，她都感到幸福与欣慰。我平常是怎样地怎样地渴望着我哥哥的信的哟！哥哥，我有一个祈愿：请你把一切的心事都直率地说给我听罢，这是我第一项的要求。……"

这样祈愿着，她把郭沫若的相片供在案上，又摘了些迟开的蔷薇花来，插在一个小小的花瓶里。她让蔷薇花儿伴着相片，让相片伴着她。这样静静地守对着，守对着，一种无上的幸福之感便充溢在她的全身心。

夜境森森地深沉下去，月亮显得更美，更皎洁。佐藤富子一个人倚在案上，从窗外吹人的凉风抚着潮红的两颊。她把郭沫若的来信又深深思索了一番，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展望信笺复信道：

"哥哥，你为什么不单称我是妹子呢？世间上有称自己的妹子叫作'贤妹'的吗？你对于国内的爱妹是这样称呼的吗？我对

于我的妹子一次也没有这样称呼过，只有我的哥哥……我真是不爱呢。你为什么不叫着'我的妹子哟我的妹子哟'呢？哥哥，那样的称呼请你以后再不要用了(谨申严禁)。……"

"我替你缝了一件'羽织'(和服的袍子)，一条'袴子'(和服的裙子)，费了一个月的工夫才缝好了。在外边托人缝原是可以早办到的，但我想要你穿我自己手制的衣裳，所以偷些时间来缝，竟至费了这么久的时候。真是害羞得很，送也不好送得。但已经操了一番心，缝好了又不能不送，我只好给你送去。你怕不喜欢罢。但请宽怀地穿用罢。甚么也不知道，只是凭空做的，怕不一定合身。你能领受我的心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是怎样地幸福哟！……"

第二天，她把这封信连同"羽织"和"袴子"，一并寄往千里之外的冈山。

她寄的是一片深情，他收到的是一片厚意。

冈山，位于内海的西北岸。这里田畴畅茂，风景悠然，清风时来，溪流有声，完全是一派乡村的景象。六高校园内的操山上长满了青翠的树木，尤以松林居多，山形的轮廓骤看颇似峨眉山麓。一处名叫"后乐园"的公园更是清丽宜人，清清的池水中鹤鸟戏嬉，其丹冠素羽竟与淡日争鲜。置身在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心灵里又为勃发的新生的爱情所涨满，郭沫若"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他先先后后写了好些诗，来抒发对佐藤富子火一样的爱恋。

这种恋情实在是太强烈了，它使得郭沫若心焦难耐。

一把小刀倚在窗边。好像她在向他笑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你快来亲我的嘴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窗外，青青的海水不住地叫号。好像她在向他叫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你快来入我的怀儿，我好替你除去许多烦恼。"

爱情总是和健旺的生命、蓬蓬勃勃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郭沫若不愿意用刀子割破自己的嘴，他也不愿投身于大海的怀抱。他摒弃了这些死的诱惑，转而求助于新月与白云：

月儿呀！你好像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你是不是解渴的凌冰？
我怎得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新月弯弯无语，白云悠悠而过。它们都不能满足郭沫若对纯真爱情的渴慕。

这是真正的爱情。既不同于年少时看见堂嫂粉红柔嫩的手掌而萌发了性意识的最初征兆；也不同于成年后被强迫着入洞房完婚，那一幕至今仍给他带来烦恼与痛苦的"木偶戏"。总之，这一次和以往的情况都不同，他第一次真正爱上一个女人了。这个年青的女人也许不如花工美姬那么艳丽，不如百合幽兰那么清香，但她却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圣洁。

在渴慕中，他又不能不同时暗含着焦虑：因为他爱上的是一位异性的女子，又发生在异国的土地上。爱情之树能不能生长？爱情之花能不能结果呢？

情火炽热溶春魂

转眼到了12月，年假又到了。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而又有

些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来到了东京。他要和佐藤富子商量一件大事，这对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圣路加病院里的工作十分忙碌，佐藤富子素来尽职尽责，更是忙得几乎没有片刻闲暇，有时甚至于连着三四个晚上不能睡觉。但郭沫若的到来显然给她带来了最大的快乐，她那圆圆的脸庞上洋溢着笑容。

佐藤富子把郭沫若领到下宿处。他的那一帧照片仍立在案上，只是花瓶里的蔷薇花儿早已经枯萎了。待来年春花发时，她要重新摘几朵鲜艳的花儿插在花瓶里。

他们已经在书信中相爱并认作异国的兄妹了，所以见面之后也就无话不谈。郭沫若首先郑重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对佐藤富子说：

“我以为你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目的。我劝你改进女医学校，我可以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

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五所高等学校订有契约，凡考取的中国留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郭沫若自愿把自己的官费拿出来帮助藤富子进市谷的女医学校深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一个月的官费起初仅有33元，医科费用又大，买参考书就贵得吓人，所以并不富裕。但他认为爱情的美丽的花园需要两个人共同来建造，替自己所爱的人尽微薄之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佐藤富子对郭沫若的建议很感动，同时又有些犹豫。凝眸想了一想，她对郭沫若说道：

“假如我真能够进去的话，那是太高兴啦。我将来能够稍微帮助我的哥哥，那真是幸福呢。但这事假如在我哥哥身上稍微加上些苦痛的话，我都不愿意去。哥哥假如支持不起的时候，我就留在这儿等到哥哥毕业罢。哥哥回国的时候，假如我一点也

不能帮助，对于哥哥的祖国一点也不能帮助，对于哥哥的祖国一点也不能贡献什么，这是最没意思的。只顾自己的私图，不顾哥哥的甘苦，这样的事情我是不忍做的……"

佐藤富子说得又诚恳又深情，眉目之间荡澜着圣洁光辉。郭沫若注视着佐藤富子，把他心中蕴蓄已久的话鼓足勇气说了出来：

"市谷的女医学校每年3月招生，时间紧迫，病院里整天忙碌不休，没有准备的余暇。我看你索性把病院生活早早结束了，同我到冈山去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好不好？"

"主啊……"佐藤富子叫了一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又慢慢地垂下了眼帘。两颊上的红晕变得更深了。

郭沫若见此情状，很有些惭愧了。他觉得他的要求未免过于唐突：佐藤富子毕竟是圣洁的处女，而他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了呀！

"也许我不应提这样的要求，"他红着脸对佐藤富子说，"我在民国二年时，父母已替我结过一次婚……"

他如实地向佐藤富子讲了他那不如意的婚姻，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痛苦。

心里祈求着上帝，佐藤富子的脸上重又布满了圣洁的光辉。她用一双黑晶石般的眼睛望着郭沫若，激动地说：

"哥哥，请你不要怀想着过去的一切，请你通通把它忘记，请把我，请把我当做你真正的妹子看待罢——这是我最大祈愿。我们相互协力，相互安慰，无论是乐是忧，你一切都分给我罢！……"

佐藤富子毅然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辞了圣路加病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

他们住在冈山市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时间虽然是寒冷的冬

天，可他们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爱情，多年来他心中的最大缺憾，终于得到补偿。几年前他是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似的来到日本的，如今正是佐藤富子给他赋予了新的生命。佐藤富子对他来说犹如圣母玛利亚。所以，他又给她取了一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这一天，12 月 25 日，是圣诞节。

虔诚的安娜早早就起来了。她神情端庄地立在耶稣的圣像前，双手合十作着祈祷：

"主哟，寄居我的心……请把我这受污秽染了的身躯，洁化来比雪还要白净……"

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并不专一信仰上帝，但他熟谙基督的教义，认为其中的精髓在于一个"爱"字。安娜正是出于爱，出于同情，才不顾帝国的偏见和家庭的阻拦，从东京来到冈山，和他这样一位已经结过婚的中国留学生同居的。安娜有一颗伟大的爱心，安娜的灵魂比白雪还要洁净！

这么想着，葱茏的诗兴突然向郭沫若袭来了。他伏在案上写了一首英文的散文诗（郭沫若后来把它译成了中文，用作《辛夷集》前的小引）。待安娜作完早祷后，他就兴致勃勃地对她说道：

"安娜，这是我献给你的！"

"啊啦，献给我的？"安娜笑着接了过去，饶有兴趣地读着：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如明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砂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蒙着一张白绢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石洼穴中，睡着一条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

晚潮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装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俗称木兰）。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会，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下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条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它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的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真是优美得很哪！”安娜读完后，由衷地赞美道。

这是一篇象征的作品。郭沫若满怀感激地说：“安娜，你就是那诗中的少女，我是那一条小小的鱼儿，是你用爱情的泪池使我苏活了过来……”

巷子里唱起了赞美诗。教堂的钟声庄严悦耳。

“这一切怕都是上帝安排的罢！”安娜沉思片刻，说道：“以往我或者往乡下去旅行，或者留在城里读书，或者往海边上去，在那儿和许多旧友或者新友一同游戏过，一同用过功，但是我的心

里一回也没有起过那样的感触，怎么独只有这回，并且对于不同国度的你，起了这样恋爱的心意呢？在我自己，无论是怎么想来，也不知道甚么缘故。并且你还是……这我也是晓得的，但我怎么起了这样的心呢？啊，你恕我，请你恕我，把我容纳到你宽大的爱情之下罢！”

耶稣的圣像微笑着，好像在为这一对年轻的异国恋人深深祝福。而安娜把郭沫若献给她的这首散文诗，看做是自己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

郭沫若把安娜称之为Venus(爱神)，爱极情浓，他紧紧拥抱着安娜，深情地吟道：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那“酒杯”盛满了爱的蜜汁，那“墓”是温暖而富有弹性的。青春的血液沸腾了，两个火热的灵魂于是溶化在了一起……

他又告诉安娜：小时候他爬竹杆玩耍，用两只脚把竹杆紧紧地夹着，竟很怪异地感觉到了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以后偷读《西厢记》，受了“莺莺不语科”、“红娘云小姐，去来，去来”、“莺莺行且止科”等等富有挑拨性的暗示，尤其是其中“软玉温香抱满怀”、“嫩芷娇香蝶恣採”之类，使得他的指头儿又忙碌起来。往

后，又是在花园里想扪触三嫂的粉红柔嫩的手掌……末了，他总括似地说了一句："总之，我是早熟的。"

安娜听了格格笑个不止："多么有趣啊！你怎么不写出来呢？"

"以后我是要写自传的。安娜，我尤其要把我们的恋爱经过写出来，写成小说作为永恒的纪念。"

次年3月，安娜去东京读书。郭沫若送她回来的路上，走到旭川桥上，旭川系冈山市中的一条小河，水清宜浴，有如故乡沙湾之茶溪。此时一弯残月仍高挂在天上，一轮圆圆的红日早已出自东方。天上日月并存，地上恋人离分。桥下的流水奏着哀音，呜呜咽咽如像一曲送别的骊歌。郭沫若立在桥上浮想联翩：他想要爬上天，把那同其金梳儿一样的月儿取来，亲自用手插在安娜的头上；他想爬上天去，把那同月桂冠儿一样的太阳取来，借着安娜的手戴在他自己的头上。可是天这样高，他怎能爬得上？纵使爬得上，他所爱的人儿已经走了，不知如今又到了哪方？……

这样想呀，想呀，对安娜的思念之情使他倍感惆怅。于是一首《别离》就在他心中孕育出来了：

残月黄金梳，
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
桥下流泉声如滋。

晓日月桂冠，
掇之欲上青天难。
青天犹可上，
生离令我情惆怅。

其时安娜已经怀孕了,因此过了两个月便不得不辍学返回冈山。年底时生了一个儿子,纯洁无垢像个天使。郭沫若的长兄郭橙坞给婴儿取名"和生",取和气致祥之义,又以生在日本意在双关。郭沫若则希望他像诗一般自自然然地生长。

被非难的结合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断断乎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佐藤右卫门——安娜(佐藤富子)的父亲——原来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来由于他对残酷的战争十分憎恶,因而转向了基督教,当上了牧师。佐藤富子是他的爱女,他待她一向极端严格又极端温和。然而这次他脸上被悲哀锁着了,声音里含着怒意问女儿道:

"你终没有回去的心肠吗?"

富子连头也不敢抬起来看父亲。

父亲生起气来了:"为什么不回话呢?你虽然是我的女儿,但我也决不是束缚个人自由的父亲!甚么都好,只把你自己的决心正确地对我说罢!好,快说罢!你到现在还在踌躇着什么呢?一点也不要迷惑,把你已经决定了的心事说出来罢!再不然还是跟着你的父亲回去。"

作为父亲的佐藤,最初的话中虽然有猛烈的怒意,但在最后话中却十分温婉地充溢着无量的恩情。

"父亲,我无论如何也不回去。"

富子把这一句刚好答完,便埋头哭起来了。这时在她心中

只有上帝和郭沫若。

“不孝的女儿!”

佐藤虎栗地这样怒骂着女儿。隔了好一会儿,他又用沉浸在悲哀里面的幽暗的声音说道:

“终竟无望吗? ……”

富子只是哭,只是哭,父亲又说了好些话,她都没有听进耳朵里。她的命运她自己已经造就了,那就是对郭沫若的至死不渝的爱。“我要求上帝的许可使我得以爱我哥哥,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他而外我永远不爱别人! 我这样对着上帝发誓。我要求上帝的许可使我得以爱我哥哥,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时候都在对着上帝祈祷。我祈祷我们两人在上帝的祝福中能同得幸福……”

可是她又觉得非常悲哀:“听父亲的教训这回怕要算是最后一次了吧,从此……”佐藤终于孤寂地一个人回去了,富子目送着父亲的包藏在可怜的悲哀里面的背影,竟不由自主地倒下去了……

尽管从此和父母断绝了关系,但安娜的决心是下定了的。她态度决绝地对郭沫若说道:

“我把父母也弃了,弟妹也弃了,国家也弃了,只来跟着你去。自己想来这决不会是幸福的事情,但虽是不幸,我也不管。我甘愿倒下去跟着你去。”

她的脸上满布着圣洁的光辉,神情坚毅,好像在爱情的道路上要一往直前,义无反顾似的。郭沫若十分感动地望着她,眼泪禁不住滂沱起来了:

“安娜,安娜,你真是我的圣母玛利亚!”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和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

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自杀，父母也会因而气病。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当时他想：

“纵横我是不愿仰仗家庭，我是不愿分受家庭中丝毫的产业的，我何苦要为这些许形式，再去牺牲别人！父母不愿离她，尽可以把她养在家中做个老女；她也乐得做一世的贞姑。照人道上来说，她现在的境遇，只是少一个男子陪伴罢了，我更不能逼她去死，使我自己担负杀戮无辜的罪名。”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生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出门求死去，孤月流中天。
寒风冷我魂，巷恨摧吾肝。
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叱。
画虎今不成，刍狗天地间。
偷生实所苦，决死复何难。
痴心念家国，忍复就入寰。
归来入门首，吾爱泪汎澜。

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时候，每每和着眼泪在无人处呼号，但是他的苦情，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人知道……

（桑逢康）

大将许光达和他的娃娃亲

“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崭新的道德风尚。

——许光达

“救命”的婚姻

许光达生在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父亲为了儿子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给他起名德华。

1921年，许德华考入长沙师范。邹希鲁先生特别喜爱德华好学上进，想要他做上门婿。1922年，他正式托人来到萝卜冲，为女儿邹靖华提亲，当时那女孩只有9岁。

邹希鲁是一位具有初期民主思想的开明之士，本知包办婚姻之苦，为何急于为小女觅婆家呢？说来确有一段不愿表白的隐情。

邹家是一穷困不堪的大家族，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家里种一些薄田。邹希鲁当教书匠赚的几个钱，除主食之费，所剩尚不能奉养父母。邹希鲁的兄长愁得上吊自尽，叔父逼希鲁卖掉二女儿桃妹子（邹靖华）和正在吃奶的小女儿杏妹子。邹妻悲痛欲绝，不忍割舍两个幼小的生命，半夜含泪自尽。邹希鲁把小女儿托付给已出嫁的长女，还要把二女儿9岁的桃妹送出去当童养媳求生。

德华的父亲许子贯十分同情邹家的不幸，为了救人一命，同意了这门亲事。父亲事后征求德华意见。德华说："邹先生是我的恩师，不能见死不救，桃妹到我们家来，是您的女儿，也是我的亲妹子，长大了，只要她乐意，我愿意同她结婚；如果到时她不愿意，我也一定尊重她的愿意，绝不强求！"

1925年5月，许德华在长沙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投考孙中山办的黄埔军官学校。

爱的规范

1927年9月，许德华随南昌暴动的起义军，南下潮汕一带，在三河坝受阻。他当时担任连长，因英勇拼杀、冲锋在前，不幸被炮弹击中，负了重伤。

他被安置在茂之前村一家农户秘密养伤。主人姓孙，是全村党龄最长的一位共产党员。他有个如花似玉的好女儿，叫翠花，是赤卫队员。

孙家对许德华最疼爱，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他，找郎中治疗外伤，杀鸡煲汤补养德华的身体。孙翠花更是殷勤备至，她除了煎汤熬药，还常常让德华讲革命的道理、战斗故事。她问："什么是农民运动？怎样搞革命暴动？共产主义是谁的主义？"

听了德华的解释，她觉得很满意，说他有知识、有学问。时间久了，她愈加喜欢他，感情也愈来愈热列。孙大妈也喜欢许德华。

许德华早已窥知母女俩内心的秘密。翠花那对会说话的眼睛，早已把内心的想头告诉了他。但家中桃妹的影子和她母亲自杀身死的往事，不断出现在脑海里，他不能做负心汉，他要对得起桃妹和她的父亲，他自己不能见异思迁、制造苦难；七尺男

儿如果被田园生活压倒了远大抱负，违背革命的初衷，还是有理想的青年吗？

当孙大妈开口要提亲的时候，许德华立刻说："您老人家不知道，我在家已经订亲了，是我老师的女儿。"

翠花后来难过地说："恨我认识你太晚了！迟早你要离开这儿，我留不住你，希望走后常常想起我，想起这个小村一个叫翠花的姑娘惦着你的冷暖！"

"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你家对我的恩情。我生活在充满惊险、容易死亡的轨道上，为工农、为大众谋利益，我是不后悔的，因为这是出于自愿、情愿、意志驱使。在我还不懂'婚姻'两个字的时候，一个童养媳已经进入我的家门，我同意了，她规范着我们生活秩序，我不能制造一个悲剧，也不能去演一出闹剧……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爱得蹊跷，有的人爱得唐突；有的人爱得疯狂，有的人爱得邪乎；有的人爱得颠倒，有的人爱得胡涂；有的人爱得对路，有的人爱得知足。但愿我们爱得清醒，爱得正经，爱得不偏不倚，爱得都享幸福。"

一席话说得翠花忧怨全消，兄妹之情更加亲近自然。

许德华身体康复了，他要寻找关系，寻找组织。

一天早上，德华在梦中被人喊醒，是翠花惊慌地跑到床前把他推醒。

"不好，村里出了叛徒，国民党抓人来了！"翠花说着帮他穿好衣服，拉起就走。在孙大妈的帮助下，德华转移到密林深处，赤卫队员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开枪反击敌人的搜捕。

谁也不曾料到，叛徒竟是翠花的父亲。当敌人走近伏击圈时，翠花咬着牙，狠狠地说："队长，我不认这个父亲，要亲手打死这个叛徒！"

队长信任地点了一下头。

翠花扣着扳机,把枪口瞄准爹爹,但手开始颤抖。她镇定一下,横下一条心,再次瞄准:"叭"地一声,叛徒被击中栽倒,翠花也瘫软地伏在地上。

德华更加敬佩大义灭亲的翠花。为了一个外姓人,她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的埋怨、世俗的白眼,她的痛楚……都是因为自己才出现呵!在爱的天平上,她为喜爱的一个男人方面倾斜,倾斜……他怕她的热烈的爱,他仍决心去寻找起义部队,他告别了翠花,告别了这价值千金万金的爱!

爱浪中的沉浮

许德华只身一人徒步来到潮洲。又辗转赴上海,最后在安徽寿县找到了党组织。

经上级批准,许德华先回湖南老家探亲。

久别重逢,桃妹子已经长大成大姑娘了,眼睛水灵灵的,酒窝深深的,笑起来甜甜的,一招一式楚楚动人。两人都特别激动,各自掏尽肺腑把情话都说出来,把艰难的经历也都诉出来。

这时,邹希鲁已去清河县当县长,他给亲家许子贵捎来一封信,提到如果德华回来,马上为他俩完婚。

"你是县长的女儿啦!恭喜桃妹。"

"你是黄埔生、金字招牌带回来了。"

俩人说笑着,桃妹问德华:"愿意马上结婚吗?"

"你呢?"德华反问。

"我愿意,人家不会说我是童养媳了!"

"我这样想,"德华说:"现在没有安定日子,我不能在你身边保护你,我得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做敌军的工作,是在虎狼窝里做事,如有不测,岂不害了你呢!"

"不,我什么都不怕,结了婚遇上风浪也是两个人遮风挡雨,

心就铁了。"

许子贵不想让儿子离家远去，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要儿子马上结婚。德华同意。

结婚刚十天，由于叛徒告密，德华逃出湖南，投奔岳父。找到了当县长的邹希鲁。邹尚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推荐他当了县警察局长。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预料。长沙警备司令部的文书、通告很快传到了清河县，岳父不肯抓德华，劝他赶快逃走。

女婿说："我走了，你不是要受株连吗？"

"株连不怕，总不会有杀身之祸。"岳父说，"你不走，抓住就没命了！"

"走是要走的，得走得轻巧，后遗症要少。"德华说，"不如演一出坏人诈开监狱，我畏罪潜逃的戏，使你牵连小一结。"

说是"诈狱"，实际是放了一批被捕的农会干部和坚贞的共产党。"诈狱"后畏罪潜逃的公安局长许德华，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逃之夭夭，倒楣的是岳父邹希鲁，他以"渎职罪"被革职回乡，丢掉了饭碗。

许德华逃到北平，不但没找到党的关系，反倒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竟至卧床不起，天天发烧。

旅店老板姓隋，山东人，他有个女儿在北平女子师范读书，为人热情，思想进步。他们见德华病重，就延医买药，给他治病。隋小姐敬重德华，觉得他洒脱倜傥、有学问，她关心地问德华：

"啥事缠身，在北平住了这么久？"

"寻友不遇，事未办成。"

"有困难吧！"

"不瞒你，囊空如洗。"

"店费免了，治病的钱由我爹先垫上。要找的朋友，告诉我

姓名、地点，我去联系。你安心养病。”

在隋小姐的帮助下，德华不但养好病，还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廖运周同志。

廖是地下党员，看到隋小姐常在许的身边料理各样事务，赞叹不已。他对德华说：“这姑娘长得好，跟你一样是师范生，对你特别好，说不定爱上你了，要不要我当大媒，两人结秦晋之好啊！”

虽是脱口而出的话语，却激起德华的心潮。隋小姐有较高的文化，妩媚多情，善书爱画，她那紧身衣衫、蓝士林长裙，给人以娴雅大方之感。她有次故意试探地露出那滑润的大腿，写四个楷书大字：风雨同舟。萌动了少女的春情。她是多么可爱的小舟啊，对于一个疲惫已极、多灾多难的人，提供一时休歇的锚地，太可贵了……然而，自己是一个已承担了丈夫义务的男人，虽是包办婚姻，但是自己乐意的；虽是出于同情和救急，但是，已经在对方身上扎下了爱根，她把忠诚而稚嫩的贞洁给了自己，以白头到老盟誓，她已经万分不幸，再加万分不幸给她，不会压垮她吗？如果生活只是为了“我”好，那么共产党员的初衷，岂不化成泡影了!?

德华把圆房的事向运周说了一遍，婉谢了他的美意。廖运周给他筹措了一笔钱，还清了店老板的债款和医疗费用。他对隋家父女以“恩人”相称，告别了避风港上的小舟。

1929年3月，遵照党的安排，许德华到无锡来做地下工作。他把名字改成许光达（必达光明彼岸之义），在国民党的独立旅开展兵运工作。他接上了党的关系，和警卫营的两个共产党员编为一个小组。

1930年，在湖北公安县陡湖堤成立红五军团，许光达调至该部工作，贺龙宣布任命许光达为二军十七师师长。

一天晚上，贺龙与许光达在湖边散步，正遇一家渔民办喜事。贺老笑吟吟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洪湖妹子吧，不能总打光棍呀！"

光达告诉他已有妻室时，贺老总关切地问："她在哪儿，现在怎么样？"

"不清楚，结婚刚十天，敌人就发出了拘捕令，我逃离家乡，已两年多未见面了。生死未卜，心上悬念。"一丝淡淡的哀愁，掠过脑际。

"打听一下，有可能时替你接出来！"

爱的可怕代价

自许光达走后，他家遭了特大劫难，长沙警备司令部隔三差五到许家坐堂要人。交不出人，就把子贵一家人等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受尽百般凌辱。有时官府上门勒索，吵闹不休。桃妹子连做恶梦，梦见丈夫被人抓去砍了头，鲜血淋淋。泪水多次淌湿了枕头。

为了谋生，桃妹到一袜厂去做工。她白天织袜，晚上伺候老板娘。长沙国民党特务机关查到她的落脚点，便和老板沆瀣一气逼桃妹和丈夫离婚。说只要在报上登一个离婚启事，便不再找她的麻烦。桃妹说："我写不来！"老板说："找人替你写，你抄一下就行。"桃妹说："我没钱登报！"老板说："我们替你出！"桃妹子质问："你不怕通'匪属'犯罪吗！？半夜小鬼会来叫你房门的！"

老板劝说无效，给桃妹挂上"共产婆"的牌子，罚她站门。上下班时人来人往，老板指着她的鼻子叫嚣："通共匪的，就是她这样的下场！"

由于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她得了肺结核，经常咳嗽、吐血。

一次眩晕，她跌倒在织机旁。为了不让老人难过，她没敢告诉父亲，默默地忍受着肺病的折磨。

一天，报上登了一批共产党员被杀害的名单，许德华的名字，赫然列在中间。她一阵晕天黑地，手足无措。噩耗摧垮了她的精神支柱，她拖着瘦弱不堪的病体，把裤带挂在树上，做环上吊。幸好邹希鲁发现及时，把她从死亡的边缘上抢救下来。

1932年4月，许子贵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怪信。信中这样写道：

德华兄：

安徽寿县一别，无恙？你说回家成亲，婚后即归，至今两年有余，不见音讯，是爱妻扯你后腿？还是自己激流勇退？望来信告之

顺致

敬安

廖运周

许子贵看信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廖运周”这个名字，他从未听说过。还是桃妹心细，她从字体上看出像德华的笔迹。她认为：八成是丈夫怕人检查，以暗示的方法，让家里给按地点通信。

原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许光达在一次恶战中在心脏附近中了一颗子弹，弹伤发炎，危及心包，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三次手术都没有取出弹丸。贺龙请求中央分局，把他送入上海的一家医院。

家里全然不知他的境况，面对着这封投石问路的短信，惊喜异常。桃妹代表全家立刻写了回信：

运周：

来信收悉。感谢你的挂念。其实，德华自1928年秋天离家，一直未归。他如今生在何方，死在何处，望来信告知。

又及：他的妻子桃妹现在工厂做工，苦得很，一心在等他；全家人一如往常，恕不赘述。

盼望回音

许子贵

许光达接到这封信，使伤病之躯凭添许多欣慰的力量，多年悬在心头的忐忑石落了地，他立刻修书一封，把在医院节省下来的200元银洋寄回家乡。

当丈夫的第二封信寄到桃妹手中时，她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哇哇大哭一场。他的确活着，她得到他身边去照顾他。她又写了要去上海的内容的信，等待着对方的同意。

几个月没有消息。正当桃妹焦虑、失望的时候，从苏联寄来了许光达的信。

他怎么到苏联去了？原来又是一场惊险。上海的大夫正准备给他作手术的时候，突然，叛徒告密，供出这家医院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组织上得知消息，将许光达迅速转移。十分钟后，一位正在接受手术治疗的红军指挥员，因无法撤离，被敌人杀害在手术台上。许光达装扮成商人模样，被送往苏联。

许光达知道妻子不懂俄文，为了寄信便当，他寄来十多张俄文写就的收信地址，只要往信封上一贴，再贴足邮票对方就可以收到。

十多张字条很快用光了，由于国民党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边境封锁，以后的六年当中，双方都不能通信。牛郎织女失去了

银河上的鹊雀，再难得到只言片纸。

毛泽东迎师妹

1938年，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徐特立回到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邹希鲁与徐特立是同窗好友，两人常在一起下象棋。桃妹常随父亲到办事处听徐老讲革命故事。她越听越喜欢延安，经徐老介绍，她带着许光达的小妹——许启亮，一同投奔延安。

至西安，桃妹子遇上要好的同学——林明伟，她是林伯渠的孙女，也准备去抗大受教，她们一起找到八路军办事处。

当晚，十分疲劳的桃妹正欲解乏睡觉的时候，突然闯进一个小战士，大声喊嚷：

"这儿住着邹靖华吗?"说话的像个警卫员。

"有！谁找我?"

"我们教育长。"

"教育长？姓什么?"

"许光达！"

一位高大魁梧的军人悄悄走进来，借着微弱的麻油灯光，寻找着发出乡音的女子。

邹靖华一眼看出这是自己多年来朝思暮想的亲人。她擦一擦眼睛，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一瞬间，两个人泪眼模糊……万缕情丝，牵心挂肺……恍如梦境一般。

许光达的窑洞里，挤满了许多平日不来的男宾女客，不少人是来看教育长的夫人的。因为许光达风华正茂，又是吃过洋面包，会转洋文的高干，是抗大正在心许抗日的姑娘们瞩目的高级对象，其中也不乏勇敢者，向他求爱，留下托付终身的诗词艳句，

但都被许光达婉言谢绝了。严肃拒绝之后，招来的是一些人的非议："是块不懂感情的木头！"

一天傍晚，邹靖华和许光达应邀到毛泽东家去作客。

卫士长一报告，毛泽东马上到窑洞门边，他握住邹靖华的手，称她是"家乡来的稀客"，祝贺她"千里寻夫，如今团圆"。毛泽东是邹希鲁的学生，按辈分跟她是师哥、师妹之谊，所以靖华并不拘束。她多次听父亲和徐特立谈起他们的得意门生。毛泽东问："邹老师一向可好？"

靖华叙述了他的近况，说："许光达搞'诈狱潜逃'后，家父邹希鲁罢官归里，如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归隐得好，正直的人为蒋介石之流所不容，在职更容易丢掉脑壳了。"他又问："徐特立——徐老到长沙办事处后，身体可好？"

靖华说："老人家很好，年事已高，一顿还能吃一碗多大米饭。"

"他多年没吃大米了，我这个学生对他不起，只能供应小米、红薯。家乡的米好吃哟！哎，过几天你们夫妇两口到我这儿吃顿饭，我尽量找点大米、腊肉、红辣子，招待我的师妹子、妹夫。"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靖华是抿着嘴笑，许光达是仰着头笑，大家都笑得十分快活。

毛泽东对长沙的各种情况，包括街上贴什么标语都问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向邹靖华简单介绍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鼓励她学文化、学马列、学语言。他拿出几本小册子送给靖华，其中有马列主义，也有他自己的著作油印本《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风趣地说："光达信了马列主义，你也学马列。信仰一致，语言、思想才能接近一致，不然你信佛祖，他信马列，将来说不到一

块，要吵架的；可别因为认识、水平不一致，到延安来打离婚哟！”他听靖华说自己曾跟爹爹吃斋信佛，故有意作了这些嘱咐。

许光达和邹靖华的婚姻是幸福的、美满的。直到“文革”期间，许光达大将被迫害致死，他们之间一直过着恩恩爱爱的夫妻生活。

（纪　流）

文人墨客的悠悠岁月情

抒发情怀是文人墨客的特点，因而在悠悠岁月中，文人墨客就有了可资把玩的情怀：夏衍与潘汉年的友情、一代名士林语堂的人生情怀……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

文坛巨子、革命前辈、与世纪同龄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写着的第二部《回忆录》，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内容的他与潘汉年的交往……未能写出就离开我们而去了，这真是一大憾事。

既然是憾事，那当是无法挽回的。

笔者曾经接触到有关夏衍与潘汉年交往的若干资料，并曾为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友深情所感动。我想把它们记述下来，虽然根本无法和当事人的直接回忆相比，但也可以窥见其中若干“精彩”的历史风貌。

二十年代末，在左翼文学战线上共商团结大计

夏衍和潘汉年相识，是在他从日本回国后，到创造社出版部给《洪水》编辑部送稿，潘汉年当年在《洪水》当编辑。不过，这只是匆匆的一次会晤而已。还算不上真正相识。

夏衍与潘汉年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的秋天，左联开始筹备的前夕。这时，夏衍从日本回国已经两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不久回国，并且从一个国民党左派党员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入党后，夏衍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开始了以翻译为主的著述生涯。到

1928年冬，他就已经成为上海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员并当选为执委，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文学翻译家。潘汉年入党的时间比夏衍只早半年多一点。但他经过北伐战斗的洗礼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这时已经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成长为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战士，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夏衍在会见潘汉年之后，已经听了洪灵菲传达的中央精神，应解决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纷争，停止由创造社、太阳社挑起的和鲁迅、茅盾之间有关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潘汉年作为文委书记，原先也是创造社成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消除隔阂，筹备左联的重任。他一面拜访鲁迅，虚心听取鲁迅的意见；一面在他主编的《现代小说》上著文，带头自我批评，以消除歧见，促进团结。与此同时，他约见夏衍谈话，要求夏衍和冯雪峰、柔石等党员作家在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隔阂方面多做工作，让这位从未写过文章卷入争论的党员作家，充分发挥沟通对立双方促进团结的作用。

潘汉年约见夏衍的这次谈话，成了他们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成了他们后来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点。当时，29岁的夏衍虽然在学历和社会经验方面都胜于23岁的潘汉年，但因潘汉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级领导，夏衍对潘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并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积极推动左联筹备工作的进程。

数月之后，在潘汉年、夏衍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战线终于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大好局面，组成了鲁迅为旗帜，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正是在左翼文化战线上共谋团结大计这一历史性的活动中，夏衍和潘汉年之间不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

看到了潘汉年的朝气蓬勃、精明强干和勇于负责的革命精神;潘汉年则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稳、博学多才和献身革命的宝贵品质。这两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战士之间的战斗情谊便由此而建立、发展,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升华。

三十年代初,在隐蔽战线上的心灵沟通

左联成立后不久,夏衍和潘汉年就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战斗。夏衍继续在左翼文化阵地上担负组织领导工作,为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左翼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着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我国左翼戏剧与电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汉年则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岗位,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1930年夏开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艺工作范围和代表党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社会团体,包括"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反帝大同盟"等。还参加了以救援受难者及其家属为主旨的"中国革命互济会"的领导工作。1931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从此进人了党的领导层的工作。不久,即1931年5月初,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长职务,并参加整个特科的领导工作。

现在的人们大概知道中央特科是个怎样的机构及其性质与任务。但在当年,它的一切活动,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极为机密的,因而也是极为神秘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数主要领导人掌握特科的情况。为了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发挥作用,特科干部都必须减少至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亲属在内。在一般情况下,特科干部不仅要严守机密,而且

要求把自己的身分隐蔽起来，让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现得灰色一些。潘汉年到特科工作后，就像他的老朋友之一楼适夷后来形容的那样，这位原先十分活跃的文化人，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再也难见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场合碰见他，他也只是稍稍点个头，就算招呼过了，马上就避开去。

潘汉年的这种异常态度及其有时表现出来的灰色面目，曾经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误解。但夏衍在潘汉年销声匿迹之后，不仅没有对他产生误解，而且依然是那样的完全给予信任和真诚地无保留地支持。

潘汉年离开左翼文化战线后，按说可以不必再过问文化工作问题的。但他在思想上仍然关注文化战线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关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况。有一天，他忽然例外地通过一家书店，约夏衍在爵禄饭店见面。这时，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一开始夏衍便忙着问潘汉年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潘回答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夏衍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就避而不谈。夏衍对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么误解，仍像过去一样向潘谈了许多文艺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潘汉年也仍像过去一样仔细倾听着，随后便关切地告诉夏衍两件事：一是要他转告主编《文艺新闻》的袁殊，对国民党社会局长吴醒亚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测；二是告知中央已决定由瞿秋白来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今后这方面的事将会好办些的。

1931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又一次约夏衍见面。见面后，潘汉年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夏衍带到薛立华路的一座小洋楼里去见一位 50 岁出头的绅士模样的人物。潘汉年对这位绅士说，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然后就将夏衍介绍给这位绅士："今后由他和你单独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我们是老

朋友。"潘汉年既不向夏衍说明这位绅士的姓名和身分，也不说明为什么要和他单独联系。离开小洋楼之后，潘汉年也只向夏衍简单交代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潘汉年仍未将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诉夏衍。直到后来夏衍和这位绅士熟悉时，这位绅士自己告诉夏衍，他就是当年袁世凯搞复辟运动的大将之一杨度。

原来潘汉年主持特科情报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专职情报干部外，还通过各种关系建立情报网络。杨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师和食客，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经常从杜月笙那里为特科搜集一些有关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这些特殊情报当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也不是特科干部，潘汉年要他和杨度联系，从杨那里接受情报，只是一种临时调用性质。因此，潘汉年向他交代任务时才显得那么简单、那么神秘。但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位战友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心灵沟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释一句，夏也决不多问一句。彼此都确信对方能够理解。这或许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了。

抗战爆发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同开创新局面

潘汉年1933年夏离开特科前往江西苏区，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代表的身分到了上海，并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忙于和国民党当权派陈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时又要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联

系与合作。经过西安事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国共谈判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共合作的局面即将形成。这时，大约在6月的一天，潘汉年便设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向他分析形势，传达党在上海即将实行的工作方针的转变，要他并通过他转告一些党内外的朋友做好思想准备。同时又询问了他个人的许多情况。

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已有的战友情谊，而且事实上决定了夏衍后来数十年的工作方向与生活。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扩大，党需要调集一批得力的适宜担负统战工作任务的干部去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过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党委和组织部长，认识许多国民党要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他的才干，他的对党的事业的热诚，以及他在文化界已具有的声望，更为潘汉年所看重。果然在这次谈话不久后的一天，即1937年7月10日，潘汉年便又约夏衍见面。见面后便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究竟见谁也不明说。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规矩，不多问一句，老老实实跟着潘汉年坐上出租汽车上路。等到走进一座石库门房屋的二楼，才知道是周恩来要见他。周恩来是在前往庐山和蒋介石谈判的途中临时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紧迫。正是潘汉年事先已经向周谈了夏衍的情况，并向周作了推荐，周才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决定亲自向夏衍交待今后的工作任务。夏衍这是第一次见周恩来，也是第一次见党内这样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虽然他在拘谨中向周表示自己的性格内向，不愿意也不善于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点，但周恩来已做了决定，一向组织观念很强的夏衍当然只有服从。周恩来又对夏衍说，他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以后的一切“就由汉年和你联系”。这就意味着，以后夏衍的工作将由潘汉年直接领导。如果说，左联时期和特科时期潘

汉年虽在党内职务比夏衍高，但他们之间基本上还是某种横向联系与合作，是战友之间的理解与支持。现在又加上了一层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上下级关系丝毫也没有影响或妨碍他们已经固有的友情，而且是继续不断地加深和升华。

和周恩来见面之后不久，潘汉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统战工作的第一线。先是派他去给刚刚回国的郭沫若当"参谋"和"顾问"，向离国十年对国内情况已经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绍各方面情况，帮助郭沫若处理某些难题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汉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总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询问，也决不轻易透露具体情况，不提前多说一句。这虽然是潘汉年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慎重和机警，但从另一侧面也恰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高度信任与理解。

接着，潘汉年又派夏衍参加由郭沫若领衔主持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工作，担任中共方面派出的总编一职。不言而喻，既是统战性质报纸，夏衍就必须和国民党主管文宣的潘公等人打交道，诚心诚意地和人家"联合办报"，同时也必须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主导与核心作用。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制定者之一，并且是这个领域内的杰出帅才。潘汉年是贯彻执行统战策略的高手，是周恩来在这一领域内的得力干将之一。夏衍在进入这一领域后，很快也就显示了他的出色才干，把一张四开的《救亡日报》办得十分红火，销路与影响与日俱增。夏衍没有辜负周恩来和潘汉年的重托。这同时也反映了潘汉年对夏衍的真正了解与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后，上海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从上海撤退和转移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政有权的国民党人士尚且争先恐后各找

门路，在野无权的共产党及其进步的朋友们自然更是困难重重。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按照长江局的指示，紧张而有秩序地组织指挥了整个撤退和转移工作。首先是将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内地去；又指挥夏衍派先遣队去广州，准备在那里恢复《救亡日报》的出版。直到12月中旬，上海已经沦陷了一个月之后，潘汉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让人给他送去一张船票。等到夏衍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才在船上发现潘汉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又是事先不加说明地安排夏衍和他差不多已是最后一批的撤离。这一对革命战友真正是患难与共，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虽然这是党的工作，但确实反映了这两位革命战士的可贵情怀。

抵达香港后，夏衍前往广州主持《救亡日报》，潘汉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被召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扩大的)全会，后又被留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这两位战友一别竟达九年之久。虽然在1941年间，他们两个都在香港活动一段时间，但因夏衍是公开的文化人身分，而潘汉年则是中央社会部(后改情报部)派往敌后主持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行踪飘忽，不时奔走于港沪之间，非常隐蔽，因而再没有机会和夏衍往来叙旧。

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的全面合作

岁月如流，转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从大后方重庆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战线上从事艰难曲折的斗争。潘汉年又以中情部代表的身分受周恩来的调遣来到上海。他肩负双重任务：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前者隐蔽，后者公开或半公开。在这两条有分有合的战线上，潘汉年轻车熟路，驾驭自如。这时，他和夏衍又恢复了密切联系。

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不得不撤离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机构及其成员也只能分别撤离，转移或转入地下完全隐蔽。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潘汉年和夏衍都属于转移到香港去开展工作的干部。而且潘汉年又担负起了组织指挥撤离和转移的重任。这一次潘汉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时撤离。不过这次乘的是飞机，8 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从上海直飞香港。

在香港，潘汉年的身分很特殊：他是中央情报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员。中共华南分局成立后，组织上则由上海局兼管，潘汉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员的身分参加华南分局的领导工作。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两个方面：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主持情报工作。夏衍是华南分局的成员，并主持分管所属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以文化宣传为其主要职责。从组织关系上，潘汉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间接领导。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分工范围而需要通力协作。潘汉年的特殊身分，使他实际上成了协作的总调度和总指挥式的人物。用夏衍的话来说，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汉年来"牵头"办理。当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时，各方面的人士都要来找共产党，向共产党咨询方针政策，打听人事和各种信息，他们最想见到的也是潘汉年，从潘汉年那里得到权威的答复。因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始终保持着和中央的直接联系。于是，潘汉年便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承担起仿佛是不管部部长似的职责。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夏衍成了潘汉年的重要帮手之一。又正是在这新的频繁的接触与密切的合作中，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战友情谊，从而成为莫逆之交。

1948年,为迎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驻香港机构要设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国统区各地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300多人一一邀请到解放区去。这些人士又大都是国民党特工机关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旦发现他们将去解放区"投共",必将加以阻挠甚至谋害。这无疑是一项难度很大并且是充满着危险的任务。潘汉年调集了许多得力干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无一意外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这过程中,分管文化宣传的夏衍也被调去积极参与其事,全力以赴协助潘汉年一批又一批地将中央指名要邀请的人士通过海运送往已经解放了的大连、烟台等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除了要不断搜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向中央领导机关及时提供外,还要负责开展策反工作,以加快胜利步伐。国统区不断有人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关系,打听或联络有关起义投诚一类事情;各地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报告他们已经策反或联系到的敌伪人员准备起义的情况。潘汉年行踪不定,住所难寻,于是许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办的公开报纸《华商报》,通过在《华商报》办公的夏衍再找潘汉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从上海到香港,要向党报告章士钊策动杜月笙参加和平谈判的情况,并请示处置意见,金山原是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的真实身分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知道。李克农曾向他交代,无法和李直接联系时,可去香港找潘汉年。金山无法知道潘汉年的行踪,只好先找到《华商报》的夏衍,通过夏衍才和潘汉年联系上。又如在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给夏衍写信,密报当时担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妻子正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马上将蔡信转交给

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了解具体情况，参与策反活动。

夏衍以满腔热情积极支持和参与潘汉年的工作，潘汉年自己也同样地关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华商报》，1948年冬因亏损而陷入某种困境时，不得不进行募捐活动。潘汉年便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拢的实业界人士，积极帮助募捐并带头捐助，从而使《华商报》摆脱了困境。夏衍因此十分高兴。他知道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在这件事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还特地和潘汉年一起邀请那位实业家吃了一顿饭，以表示谢意。

解放初期，
在上海甘苦与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为了加强对即将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农亲自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都分别和他们会见了谈话，听取汇报，指示工作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对他们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对去上海工作的重视。根据中央决定，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衍负责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许涤新负责工商统战工作。

夏衍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赶到江苏丹阳，在丹阳仅仅停留数日，便开赴上海履行新职。

潘汉年作为陈毅的重要助手，为接管和治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陈毅的领导下，他先后主管政法、统战、财经和市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世人公认成绩。他和陈毅还在新四军时期就已相识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

作中，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无论在开始的接管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也是取得了显著成绩的。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上海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别处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个人作为一介书生，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已经多年养成了自由职业者的诸多习惯。当他进入上海当了执政党的高官后，有一个时期很不适应解放区的某些制度、习惯和作风，包括互相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称谓等等。不过，只要夏衍一踏进潘汉年家的门槛，那一切制度、习惯和作风便不复存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称谓而论，当面或直称"汉年"，或和过去一样戏称"小夏"。夏衍有时离开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国访问，在给潘汉年写信时，那称呼就更随便而显得更亲切了："汉年兄"、"开兄"或"凯兄"等等。有一次从国外访问归来，途经广州时给上海潘汉年夫妇写信，大约是在国外呆久了，思乡心切，信的开头便这样称呼"慧姊转开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跃然纸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传的领导。谁都知道，解放后不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阶级斗争的弦便逐步绷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都使夏衍这个宣传部长难辞其咎。夏衍的老战友，直拉主管电影的于伶所受压力更大。夏、于二位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口头检讨和在报刊上公开自我批判。潘汉年自己虽然也并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为朋友和作为上级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给夏衍和于伶以真诚的宽慰与鼓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受到舆论批判的同时，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门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谓的问题。虽然他不是直接责任者，

但上海和北京的有关主管单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战友杨帆作为直接责任者已经作了多次检讨后仍不能过关。对此，潘汉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压力和忧虑。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依旧。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们促膝谈心，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们的艰巨努力与心血。他们同时也为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不安。自然，也为他们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问题而困惑。他们在思想上经常互勉互励，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程度。夏衍有什么心事，或是遇上了什么难题，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有什么心事，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常常有助于夏衍的理解与帮助。例如，有一段时间，中央考虑要调动潘汉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时便到李克农那里去打听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写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汉年。又如，潘汉年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便和夏衍商谈。1955 年 3 月 31 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为自己的一个历史情况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时，就主动去找夏衍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与苦恼。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的深厚友情。

在历史的大灾难中，始终不渝的忠诚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显得很和谐亲密，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严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时，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避之惟恐不及忙着划清界线者有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汉年

之间的情谊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始终不渝、忠贞不二，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对这位突然"失踪"的战友至为关切，到处打电话打听下落。直到上级领导出面通报情况为止。

钦命不可违和日益猖獗的极左思潮，很快就给潘汉年案件定性。潘汉年这位革命老战士被强加上了"内奸"、"反革命"罪名。并且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机关按高层指示精神，将潘汉年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即又采取"假释"措施，将潘汉年夫妇从秦城监狱转到团河农场监管改造。按当时的某种宽松政策，潘汉年夫妇被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包括进城购物和探访亲友的自由。潘汉年深知自己身分特殊，只想利用进城购书购物的自由，而不准备使用探访亲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已经"天天讲"的年月里，再给别人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有一天，潘汉年夫妇在东安市场书店里，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这位侠肝义胆的唐瑜坚持要求下，潘氏夫妇到了唐家作客，并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孙师毅。劫后余生，依然能够受到老朋友的欢迎和善待，对潘氏夫妇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后的两三年间，潘汉年夫妇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唐瑜和孙师毅家作客小叙。但当唐瑜问及可否将潘的近况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之时，潘汉年坚持没有同意。潘汉年对唐瑜说，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级干部，不同于普通平头百姓。和他们往来对他们实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给朋友添麻烦呢？这样，从

1963年夏到1967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潘汉年始终没有利用给予他的“访友”自由去见夏衍一面。虽然他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能像过去那样和夏衍这位挚友一叙衷肠啊！

文化革命风暴掀起后，夏衍也遭遇了几乎同潘汉年一样的恶运。“搞修正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围攻鲁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这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头上，身陷囹圄，惨遭批斗，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汉年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汉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监审查，也同样受到了文革期间那种对“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毕竟已是一只所为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折腾了十多年；无论专案人员的政治嗅觉有多么灵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然而潘汉年从20年代中期就参加革命参加党，又在好几条战线上奋斗过，经历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找他外调和要他写揭发某人某事材料的专案人员便络绎不绝，访问、审问、追逼，一心想要从潘汉年这里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了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

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转动。夏衍和潘汉年的命运也在不断地变迁。1975年,潘汉年在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区的一个劳改茶场去监督改造。1977年春,当历史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而天空的乌云还远没散尽的时候,潘汉年终因多种疾病缠磨又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含冤去世、遗恨终身。夏衍则在1977年的同一历史时空获得了"解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

1979年后,潘汉年一案在陈云、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动下才得以复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中央下达文件通知到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这和当年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潘汉年的情况相比,一份党内文件显然不足以完全恢复潘汉年的真实面目。于是又在陈云的关注督促下,由夏衍带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从而引发了1982年至1983年间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和资料,终于使这位卓越的革命老战士,在革命文艺战线,在党的隐蔽战线和党的统一战线领域内,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人物的一生光辉业绩为世人所知。

为了进一步颂扬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在荧屏上重塑一个潘汉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经92岁高龄的夏衍又牵头和阳翰笙、罗青长两位潘汉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建议拍摄一部反映潘汉年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迅即批复同意。虽然这部电视剧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预测在1996年潘汉年的90诞辰之际正式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阳翰笙这两位老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们的建议完全实现时,便也先后与世长辞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汉年这两位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而长眠于地下。但是他们的革命业绩以及他们之间可贵的经受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友情，却是值得人们深深怀念并发扬光大的。

（尹　骐）

我丁玲就是丁玲

一

1980年春天，丁玲在北京协和医院作了乳腺癌的切除手术。夏天，她应江西省有关部门的邀请到庐山疗养。这时候，我为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教学学术讨论会，也上了庐山。她知道我要上庐山，便让女儿和女婿托我把家里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捎去。送去电视机的时候，我告诉她："我的同学当中有人读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你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很有意见，说你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强调自己对毛主席的那种感情，如说这本小说也是为他老人家写的呀，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是怀着战士冲锋时的那种感情，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等等。人家说了，现在是80年代了，还强调这些干啥？"我还告诉她："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让我转告你：现在你应该写揭露毛主席的缺点和错误的文章，这将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利于你丁老太太自己的。"

我说完之后，丁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位同学根本没有理解我在《重印前言》里那样写的意思！我写的是自己当年的真情实感。这是历史。我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思想感情。我不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我一贯相信读者，他们能读懂我所写的本意。"

我情不自禁地和她叨叨起来："你之所以要这样写，就是要


丁玲在延安留影

让人们理解：你对毛主席那样虔诚，那样热爱，而他还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了你的名，使某些人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她却说：“毛主席有缺点，晚年更有大错误，当然可以写，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写的。有人想全盘否定毛主席，甚至想打倒他，这是不能允许的！我受的冤屈再大，也决不能在这时候去揭露毛主席的缺点和错误，不能给妄图全盘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提供把柄。等到适当的时候，我当然是要写的。今天不妨讲两个故事给你听听。”

她说：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手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笔，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

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二

1981年春末，茅盾同志去世，丁玲特地从鼓浪屿飞回北京送别恩师。早在庐山的时候，应我要求陈明为我去北大荒画一张联络图，丁玲便决定1981年夏天回北大荒探望，要我跟她去。我趁她回北京，便去询问什么时候动身。刚按响她家的门铃，给我开门的竟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位60多岁风韵犹存的老太太。后来，我才知道甘露，是丁玲在延安结识的一个好朋友。丁玲告诉我：萧三从苏联回延安，甘露才20多岁出头，毅然和萧三结合。后来，萧三在苏联娶的妻子来到中国了，甘露只好和萧三分手。她还告诉我：她在北大荒期间，有时回北京看病或办事，都请甘露帮忙，才不怕别人指责她同我这个“大右派”划不清界限呢！需要她帮忙的时候，她是绝不推辞和马虎的。

我和甘露交谈了起来。她说她年轻的时候非常崇拜丁玲；在西柏坡时，她和丁玲一起陪毛主席散步；毛主席得知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勉励她到基层去锻炼，最好能去当一个时

期县委书记，等等。她还告诉我："1979年丁玲刚回北京，身体不怎么好，还要到医院去看望周扬同志，那一次，是陈明约我陪丁玲去的。周扬的态度冷淡得令人意外，叫我这个旁观者也看不下去！"不久周扬突然回访丁玲。那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天下午，丁玲到政协开会去了。周扬突然来了。陈明接待了他。后来，陈明告诉我："他对我解释，为什么没让我当四次文代会的代表，还说他的老婆苏灵扬30年代在上海也参加过左翼戏剧工作，这次也没有当上代表，名额有限，咱们两家，每家都有一个代表，这就很好了啊！他这次来，还给我带来了文代会的列席证，还有一个纪念册，好像是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我记不确切了，大概是为了安慰我吧。"



丁玲去北大荒探望时在松花江畅游

我和陈明正在高声大嗓地发感慨，丁玲便从对门那间屋子里走过来，她说道："他哪里是来看我呀！要是真心来，事前可以

打个电话，无论如何我也会在家里迎候他。说不定他是知道我要去政协开会才来的呢！他来这里要干的事，他所讲的那些话，也说明了他是专门来向你陈明作解释的，不是来看我的。"陈明立即批评她："别那么太敏感、太多心好不好？他来了总比不来要好嘛！"

待丁玲回到她自己房间，陈明把自己室门关了起来继续对我说："真是一个老小孩，一提起这类事就激动，怎么劝也改不了。其实，这也难怪她。给江丰平反的时候，陆定一亲自到江丰家里赔礼道歉，说江丰错划为右派，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江丰把这件事告诉我，非常感动。要是周扬对丁玲也能像陆定一对江丰一样，哪怕不赔礼道歉，而只来看看她，那么她的情绪也会更加稳定和愉快。"

我从陈明屋子里出来，丁玲坐在客厅里。一见她，我暗暗后悔刚才不该大发感慨弄得老太太激动不已。几十年的疙瘩到了该解开的时候了，文艺界是需要大团结啊！老太太见我站着发愣，便叫我再坐一会儿。她说："我还在山西等着平反，我女儿蒋祖慧凭着和周扬的女儿是同学、朋友的关系，到周扬那里打听我的平反问题。不料，他竟在我女儿心上捅了一刀，说什么你妈妈的右派问题是可以平反的，但在南京那一段的历史，还是有污点的。什么污点！在我女儿面前讲这个话，就是他所奉行的人道主义……"周扬对她女儿说那话，确实是不够人道的。即使真有污点，也只能由党组织来宣布，而不应该由某个人擅自论定。

三

1981 年 7 月中，丁玲重返北大荒。行前，给我讲起划成右派之后于 1958 年刚到北大荒时的一些事情，如作协派的监护人所用的软卧火车票竟由她付钱……农垦总局政治部的李主任看

了她所持的介绍信如何不平等等。

到达农垦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第二天上午,丁玲坚持到农垦局机关去看望。丁玲到达之前,李主任早就坐在会议室里。他们在会见交谈中,我迫不及待地请他给我讲讲当年接受丁玲报到的情景。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从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几十年间从未见到过丁玲交给我的那种介绍信,什么不给工资,不给生活费,靠自己的稿费过日子,这哪里是我们党的政策呀?!我们党对人的处理,从来都是坚持给出路的政策的。过去,连俘虏要回家还给路费呢!丁玲过去是共产党员,是著名作家,不管犯了什么大错误,只要不杀头,也应当给生活费呀!实际上是要从生活上置丁玲于死地。文艺界的事,我们农垦部门管不了,但丁玲既然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农垦局是有权办理的。"说到这里,他的脸都红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丁玲后来在她那篇回忆录《风雪人间》中,把当年同我说过的写了一些,只是太简略,现不妨抄录一段:

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旧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引者注:陈明因为替丁玲申辩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于1958年春夏之交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

外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

我从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坠入云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么，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和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留在北京工作，还是在政协小组会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纪律规定放在眼里。……看来，我比所有右派都罪大恶极！……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也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性。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

丁玲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和评述某个人，不但有根有据，而且也情有可原了。

四

在延安时期和毛主席交往较多。那时她和毛主席谈什么干

什么都很随便，在毛主席面前第一次失礼是他同江青结婚的时候。当时，她接到了参加婚礼的请柬。可是，正是在这前两天，保育院通知她：女儿蒋祖慧病了，眼睛红肿，都快看不见了。她心急如焚！这是她1934年秋天在南京生下的女儿，后来她回忆说："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和丁玲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幽禁，曾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分；于1991年在台湾去世)，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保育院在延安城外很远的山沟里，丁玲得知女儿得病的消息便张罗着借马。好不容易，任弼时同志帮她借来了一匹，她顾不上对毛主席失礼，便骑着马看女儿去了。她说："从这时候开始到建国初期，毛主席似乎没有计较我的失礼，但谁知道江青知道我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会是个什么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几十年之后，她对我谈起这件事，还流露出后悔不已的情绪。

"……最让我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是，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一听便拉下脸来：'哼，你以为是我要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

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毛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诬蔑我,是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丁玲刚刚复出,我当时是她的《生活·创作·修养》一书的责任编辑,在是否把《三八节有感》收到这本书中去的问题上,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她告诉我:"当年在延安的一次高干学习会上,文艺界只有周扬和我两个人出席,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发难,批起《三八节有感》来了。那时毛主席不是保了我一下,说《三八节有感》有批评也有建议,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后来,毛主席对我过: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些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毛主席的这些话,说得我很信服。以后我再批评人时,就学着先估计到人家的优点、长处,然后再说缺点。"

五

1984年8月中，我因要去西北便到丁玲那里打个招呼。告辞时，丁玲说："你等等，让你看一个东西。"说完，便到她自己的屋里拿出报纸包的东西放在餐桌上，叫我坐到那里去看。原来是党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发来的文件，为丁玲彻底平反、彻底恢复名誉的！文件重申了1941年在延安审查丁玲同志是一位为革命事业做了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读完以后，我高兴极了，很想在她面前发点感慨，不料，丁老太太却抢着说："现在，我可以死了呵！"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琢磨着，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待我从西北回来，听说她要办刊物。我说："你要干的事多着呢！《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写完，像《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这样重要的回忆录，还应该继续写下去，越多越好！还有，还有……"这时候，她不再做声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劝她："这几年，人们都说你保守、僵化，是一个'左'派……"不等我说完，她便说："人家早有一定之规嘛！需要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斥的保守呀，僵化呀，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看着老太太的这股倔劲，我坚持告诉她："这样说你的人，在我的同学和朋友中也有，他们还要求我劝你呢！我的这些同学和朋友，同你所指的持一定之规的人，是没有什么联系和来往的呀！"

丁玲不禁笑了起来，说："杨桂欣，你还太嫩了一些呵！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同他们没联系，没有来往，这对他们不是更好吗？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是群众说你丁玲僵化、保守，'左'于我何干？他们还可以炫耀他们是尊重群众意见的呢！"说到这里她从藤椅上起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好呵！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就是好呵！不许再搞政治运动，现在，他们再狠毒，也只能在非公开的舆论上下功夫，拼命说我丁玲是'左'派僵化、保守。再想和当年那样，趁我主动要求去北大荒的机会，盗用中宣部的名义，开出那样不讲人道、不要党的政策、连对待俘虏都不如的介绍信，他们是绝对办不到了！"

六

1985年7月中旬，丁玲正准备去河北省蔚县疗养和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一到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大夫便命令她：必须立即住到医院里来！从此，她除了在9月间回家看《莎菲女士的日记》电视剧，并和剧组主要成员谈该剧之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木樨地22号楼5门18号。她在这里住了六年。当她坐着轮椅下楼回医院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大概是再也回不来了啊！"1985年11月间，协和医院第一次发出丁玲病危的消息。第二天下午，我便去医院向她汇报工作。一进门，便见她盘坐在床上，陈明则坐在沙发上。她一见我，便满脸笑容，大声地说："杨桂欣，你猜前些日子哪些人来看我了？"我说这没法猜，反正关心你，爱护你的人知道情况都会来看你。我还未说完，她便高声大气地嚷道："陈登科来了。我说，'你来干什么？我死不了！'这不又恢复过来了吗？现在，我正在争取医生同意，让我回家过春节。到时候，把你们的家属都请到我们家里去。"

我怕她太兴奋，劝她休息，但她仍说个没完。我真怕她是回光返照！好在这时护士进来了，我正准备回家，她却又说起来："杨桂欣，你刚才说关心我、爱护我的人都会来看我的，这倒是不错。不过，有的人对我的关心并不是什么爱护，他来这里看我，是搞火力侦察，看我丁玲还能活几天。其实，他是巴不得早死的。"陈明听了，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坚决制止她继续说下去，

并把她扶下床来，让她在沙发上坐着。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解释为什么说是“火力侦察”，又为什么说“他是巴不得我早死的”。其实，她的解释对我来说显得多余。

丁玲住进协和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去看她。有一次，她激动地告诉我：“你知道有谁来这里看我吗？”不等我回答，她便说：“默涵和白羽都来看我了，向我赔礼道歉，检讨他们在我的案子上的错误；白羽还说，他是来向我赔罪的。我说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嘛！再说，责任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呀！”

丁玲逝世的第二个月，即 1986 年 4 月，刘白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散文《丁玲在继续前进》，其中说：“新中国诞生后，丁玲一生中更巨大的坎坷降临到她头上。如果说前半生的坎坷，来自敌人阵营，而后半生的坎坷，却来自自己阵营，这是不能不令人唏嘘惋惜的。想到这里，我心情沉重，思之疼心，因为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白纸黑字，公诸世间，比起在丁玲病房向丁玲赔罪，更显得真诚，显得庄重。如果丁玲九泉有知，我想她会欣慰不已的。

（杨桂欣）

沈钧儒和他的女婿范长江

沈钧儒生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著名的法学家。

范长江生前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著名的记者。

这是人们熟知的。但人们却并不一定知道范长江就是沈钧儒的女婿。

沈钧儒的爱女、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女士，近日披露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先说沈钧儒

沈钧儒经历了几次改朝换代，每一次他都是站在人民这一边，因此屡遭通缉。他受过戊戌维新的影响，办过地下印刷，专门印刷维新的东西。沈钧儒胸怀救国壮志，决定到日本去专攻政治法律。因为搞立宪活动，回国刚一上岸就差点被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在浙江活动起义。后又积极倒袁，袁世凯也要抓他。后又反对曹锟贿选，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南下，孙传芳也要抓他。“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将他扣押，拟加枪杀。1936年11月，沈钧儒因抗日救亡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后扩大至全国各界，他任执委兼常委，进行各种抗日活动，声势浩大，被蒋介石抓了起来，与他同时被捕

的还有“救国会”的邹韬奋、李公仆、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时称“七君子”。宋庆龄专程从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进行营救，她说：“七君子”是提倡抗日救国的，如果他们有罪，那我们都有罪。不把“七君子”放出来，我也要去住监狱。“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得不放了他们。



沈钧儒

沈钧儒是个十分爱国的人，他专门写过一段关于自己抗战的决心：“我爱世界，我爱一切。我爱我国，我爱我家。我爱我的朋友，我尤爱我自己。我爱和平，我不明白在这文明进步的时代中，为什么有这样无故侵略的战争。因此，凡世界含有侵略性之主义、理论及其设施行为，我应当反对之。”

日本侵略中国，沈钧儒愤怒地说：“分明是一群强盗到了我的家里，为什么不许我们说一声‘赶他出去’！”

在法庭上，法官问他：“你知道你们是被共产党利用么？”

沈钧儒干脆地说：“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为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

一次又一次生死的考验，沈钧儒已经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出狱后，他继续搞抗日救亡运动。

对抚养子女的问题，他痛感旧中国之所以被列强欺凌，与科学技术落后不无关系。国家需要建设人才，他希望儿女学习科学技术。在他很困难的情况下，宁肯数月间几次断炊，不论典当、借贷，也要供他们读书。

沈钧儒有5个子女，沈谱是最小的女儿，上面4个哥哥。大哥学医；二哥学土木建筑；三哥因得过脑膜炎学了美术，以后又学了商；四哥学电。沈谱学的是应用化学专业。大哥、二哥和四哥都是留学德国，三哥留学日本。本来沈谱也要留学欧美的，因为日本侵略没有成行。沈钧儒担心自己的小女儿在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中，不时有生命危险，没想到自己最最疼爱的小女儿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没出校门就背着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话要说回来，要是女儿没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恐怕也不会有范长江这么一个女婿，这就是志同道合的缘分。

再说范长江

那时是在抗战的武汉，范长江是新闻界救国会的会员，常常到沈钧儒家中与他商谈。沈钧儒对他印象不错。沈谱也就认识了范长江。和沈钧儒同是“七君子”的邹韬奋，是范长江的朋友，也是沈老的朋友。由他牵红线，向沈老推荐范长江给沈谱。

沈钧儒是很喜欢范长江的。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思想上他们都很一致。

沈谱有一篇回忆范长江的文章，说长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具有强烈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勇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第二，他热爱祖国和人民，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主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讲真话、做真事。

第四，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比如，为了追求真理，范长江宁可在文凭到手的情况下，毅然脱离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而去街上卖豆浆油条，经过

一段艰苦的工读生活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且选修了好几个系的课程。1935年7月，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历行经年，行程万余里，采访了大西北。他是第一个报道长征的记者，比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报道早一年多。他抢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时发表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蒋介石大骂他，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则给范长江写信表示深致谢意。以后，当《大公报》老板用优厚条件来收买他，让他放弃“民主、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时，他又坚决脱离《大公报》，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范长江和沈谱结婚时留影（左二为沈钧儒，右一是王炳南）

范长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日本如此逼迫，逼成我们全民族的万众一心；日本人如此残暴，逼出许多鸡鸣起舞的杰士。看吧！倒霉将近百年的中国，一定能在日本凶横的侵略下翻身。”正像范长江准确预言了红军长征的结局一样，他也准确预言了新中国的诞生。

沈老仅仅凭自己的接触，就已经确认范长江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了。

邹韬奋一当红娘，沈钧儒就同意了。但是，他说他做不了女儿的主，这事还得问女儿。

这时，沈谱正在金陵女子大学，她说她还小，学习还没有完，不想谈这事。虽然范长江已经是名记者了，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已轰动全国，沈谱当时却没有答应，当然也没有拒绝。

一晃两年，沈钧儒已经到重庆，范长江还是照常来沈家，照常谈论时事政治。这时，沈谱已经大学毕业，回到父亲身边。沈谱说她个人并没有推动这段感情，不知道大家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沈谱和范长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逐渐产生了感情。这样，皆大欢喜，一对新人终于结合。

后来，沈谱说："当时还征求了邓颖超大姐的意见。"这时沈谱已经入党，她最大的担心就是不知道范长江是不是党员？

邓大姐笑了，说：感情可以发展，没问题。

沈谱这才放心与范长江谈恋爱。正像范长江不知道她是党员一样，她也不知道范长江是党员。很有意思的是，她是与邓大姐单线联系。本来范长江1933年在武汉时就向周恩来提出要入党的，但周恩来认为他当时是《大公报》记者，先留在党外，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对党更有利。后来在1939年5月，在重庆曾家岩50号由周恩来介绍、延安批准，范长江成为秘密党员。对外还是民主人士的面目。沈谱也是那一年入党的秘密党员。婚礼那一天，鲜花堆满了新房和院子。很多同志来祝贺，周恩来也来了，并带来了一个用苏联乌拉山石制成的相架和一块漂亮的红花台布，还有一封邓大姐在乡下治病时写的一封贺信。

对于范长江和沈谱的婚礼，最高兴的还是沈钧儒，他胸佩大红花，满面笑容，对邹韬奋夫妇说："沈谱的婚姻大事办好了，终

身有伴,我也放心了。"并即兴写了一首诗:题在女儿与范君长江结婚纪念册上。

1940年10月于重庆

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
祝吾婿与女,黾勉同心结。
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
愿吾婿与女,善葆金石质。
挽手赴前路艰巨如山积。
鸡鸣怀古训,毋恋衾枕热。
河山共举目,战鼓犹如雷。
行俟胜利日,囊饮合欢杯。

范长江和沈谱结婚还不到10天,就去了桂林参加国际新闻社的年会。这时,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手签了逮捕范长江的命令,周恩来让他转移到了香港。

不久,党组织也通知沈谱转移香港。

沈钧儒实在不想让唯一的爱女离开自己。自从几年前他夫人病逝后,他就与女儿相依为命了,平时日常起居,都是由女儿照顾。但是,女儿不走怎么行?环境这么险恶,还是应该让她去和女婿团聚。女儿走后,他含泪写了一首诗,名为《铺被词》。

1941年3月之末,女儿有远行,于其行之三日,作此词以自遣:

朝铺被,夜铺被,对了两头叠四角。手叠被,泪暗落,心想车轮转辘辘。转辘辘,行何速,岂有鞭笞随其后,持比鞭笞情更酷。大江水,无情绿,我欲登高望见远,知汝今宵何处宿。江上有雾

雾外山，青山多于蜈蚣脚。

往时事，尽思索，驱不尽，断还续。每出门，伫路曲，下坡背影记犹熟。忽地归来蹑椅后，似感温软掩吾目，仰面纵笑手双握，此景一瞥等摧屋，人生如梦亦复乐，推被起坐祝汝福。

女儿离去的那些日子，是沈钧儒最伤心的日子，只是他想到女儿跟着女婿范长江，心里才略略有些安慰。以后，沈谱又数次离开父亲，直到沈钧儒去世前一年，沈谱才经组织决定给父亲当政治秘书。而这时，沈钧儒正在住院，范长江从广东出差回来，给老人带了一头石湾的陶牛，老人很是喜爱。老人望着女儿女婿和四个外孙，高兴地笑了。

（舒　云）

一代名士:我的父亲林语堂

本文主人公的名字,年轻读者比较陌生,然而他也是与鲁迅、郭沫若等同辈的中国名人。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可一笔抹煞的。读者将从他女儿的这篇回忆录中,了解他的经历、业绩和风貌品德。

1911年的一天早晨,生活于中国福建省乡村的林氏家庭乘船离家,送20岁的梅昆出嫁。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把16岁的林语堂送往上海读书。这是对林家有着重大意义的一天。

梅昆也想上大学,但她做牧师的父亲不答应。对当时的女子来说,受教育是一种奢侈。所以,当梅昆意识到上学无望时,只好同意出嫁。



林 语 堂

结婚那天,梅昆掏出40文钱给了语堂,说:"我们家很穷,我只能给你这么多。我是个姑娘,不能上大学。弟弟,你要珍惜这次机会,努力学习,要有出息,光宗耀祖。"

这些话使语堂觉得他似乎将代表姐姐去上学,而且一定要

实现她的希望。但她未等到实现的这一天，结婚的第二年，梅昆就因鼠疫死去。

当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坐在他的书房里，周围环绕着他的著作。我知道，梅昆的话一直在影响着他。

在世八十年，父亲著有（翻译）五十多本书，是世界著名作家。他去世时，《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作为翻译家，林语堂对西方的思想、习俗、愿望及人们心理的理解可谓独一无二。"父亲集小说家、散文家、哲学家、语言家、字典编纂学家于一身，还发明了中文打字机。

父亲出生于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他兄妹八个，在六个儿子中排行第五。他的童年幸福快乐，充满了乡村的鸟语花香。他曾对离开这田园风光之地的人感到迷惑不解，但他又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祖父对他讲过世上第一架飞机的故事。"我读过有关它的一切，"祖父说，"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相信。"祖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敏捷、幽默、富于想象。他把从国外传进的现代思想灌输给孩子们。中国正受到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威胁，她必须迎头赶上，通过科学进步使自己强大。所以，祖父决定，他的孩子必须接受西方教育。

父亲8岁时，就宣布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他的一个小学老师曾这样评价他的文章，"像一只正在穿越稻田的蛇。"意思是拐弯抹角，含意不清。父亲反批道："是一只穿越沙漠的地虫。"意指他是一个小人物在探求知识。对林氏家庭来说，求知的欲望如饥似渴。祖父给他的孩子们上课，孩子们一起学习，编造故事。当父亲经过书铺时，他总是希望能买下每一册书。他觉得自己与那些对人生无多渴求，能够结婚、生儿育女，有一个好职业就心满意足的人格格不入。

父亲做好了上大学的一切准备。那年夏天，家乡突然变得很小。世界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长，他渴望去听、去看，去体验人生的一切。

“没有钱无所谓”

上海圣约翰大学重视英语，父亲人学后，将第一学年中的一半时间用于掌握语言，并开始研究语言学。

第二学年快结束时，父亲因学习上成就获得了四项嘉奖。消息传到家乡，也传到邻校——圣玛丽女子学校。在那里，父亲遇到一个来自厦门，学艺术的漂亮姑娘。然而，当她的父亲，一个富有的医生，得知一个牧师的穷孩子在追求他的女儿时，他感到不高兴。医生已经决定将女儿嫁给另一富家的儿子。因此，他试图把邻居廖家的女儿介绍给父亲。这个姑娘叫翠凤。

得知这一消息，父亲很生气，觉得蒙受了耻辱。但当他把自己对医生的女儿的爱情告诉他大姐时，她叫道：“你疯了！你怎么养活她?！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明白自己的目标毫无希望。回到上海时，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第二年夏天，父亲去廖家吃了一次晚饭。翠凤在屏风后偷偷地观察他。她知道将与他订婚。翠凤的父亲拥有一爿商店和一个货栈，而且经营得不错。翠凤喜欢眼前这个活泼的年轻人，他无所顾忌地打着手势，充满自信。他不修边幅，胃口也不错。她渴望嫁给他。

她母亲问她：“你怎么看这桩婚事？林语堂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林牧师很穷。”翠凤的回答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有没有钱无所谓。”

父亲的大姐全力推荐翠凤。她是个标准的中国姑娘，而且肯定是一个贤妻良母。她颇具魅力：大眼睛，高鼻梁，动人的嘴

唇和一双大耳垂——幸福长寿的象征。父亲同意了这桩婚事。

但他们没有马上结婚。父亲于1916年毕业后，应聘去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在那里，他苦读中国历史，参观那里的楼堂殿宇、长城和十三陵。此时，他感到先前所受的基督教育实在不够。他知道来自北方的号角吹倒了长城，却不明白孟姜女哭倒长城并埋葬自己的故事。

父亲决心补上所缺的课。他赶到书店，问询要读的最重要的书有哪些——因为他实在不好意思去问别人。他犹如传说中的猴王回归森林，采集祖先遗产中的鲜花与果实。

在阅读的时候，父亲试图发明一种更易查阅中文字典的方法。23岁时，他出版了《汉语索引系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著作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并成为进一步变革的催化剂。但父亲很快就对自己的方法感到不满意，一生都在继续修订，最后形成了不朽的著作：《现代汉英词典》，在77岁高龄时出版发行。

在北京，父亲与著名学者胡适相识，并为其所吸引。早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胡就倡议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回北大执教前，胡已经以文学革命领袖而闻名。他认为，中国必须西方化，否则就不能赶上时代的发展。他的追随者在后来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向文言文、包括婚姻及妇女缠足等发起了挑战。这正处社会骤变之时。

父亲在清华执教三年，随后取得去美国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生院留学的资格，享受半额奖学金，以近代语言为自己的研究专业。这时他认识到不能再推迟婚事了。翠凤已24岁，如果不与她结婚并一起赴美，那对她就不太公平了。

廖家给女儿1000元钱作嫁妆——这是一个不错的解脱。两人购买了赴美的单程船票。廖家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向家里

讨回程的盘缠。

祖父体验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儿子将去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他感到非常高兴，他的梦想开始实现。

国外求学

新婚夫妇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租了两间房子安顿下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很活跃，而她却喜欢安静地坐着；他能言善辩，而她却不知怎样把自己的情感变成美妙的语言；他喜欢肉，而她却喜欢鱼；他情绪高昂，而她却忧郁悲伤；他喜欢阅读，有时甚至听不到她在对他说话，而当听到他说不喜欢《圣经》时，她会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父亲有时独自一人坐在窗前，吸着烟，沉思到天明。他似乎不需要多少睡眠，次日醒来仍然充满活力。

翠凤决心做一个好妻子。当父亲把读到的东西讲给她听时，她会费力但认真地倾听。年底，父亲的经济来源中断，翠凤又拒绝向她家里要钱。绝望中，他给胡适发电报，请求从北大贷款，因为赴美前曾答应学完后去北大任教。胡教授寄来 1000 美元，但这不足以使父亲维持到在哈佛完成学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已经结束，中国派了 15 万劳工去法国。父亲接受了教授这些人用英语写与说的职位。父母俩移居法国。

不久他们去了德国耶拿大学，那里的生活费用较低。父亲在那里上课并把学分转到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接着，他又让胡适在北大给他寄了 1000 美元，并去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时他可以集中精力钻研中国语言学。他给祖父写信，祖父很自豪，但他未活着看到自己的儿子从海外回来，于 1922 年在家乡去世。

翠凤在渴望。他们不得不返回祖国，因为孩子就要出世。父亲对获得博士学位充满了自信。他买了船票跑回家时，翠凤正在门口焦虑地迎接他。

“怎么样？”她问。

“没问题。”他回答说。

她如此高兴，以至于在街上就吻了他。

1923年，一回到北京，父亲就跑去向校长表示感谢，感谢学校借给他的2000美元。

“什么钱？”校长问。

这时父亲才明白胡适是把自己腰包里的钱借给了他——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们回到祖国时，局势混乱，封建军阀之间相互混战，担任北大英语系教授的父亲开始写文章批评腐败、低效率的政府。

1926年3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一天早晨，父亲接到他的一个得意门生的电话，询问能否请一天假去参加游行。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父亲当时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导主任。

当天下午两点，他听说打电话的学生死了，是段祺瑞军阀政府派军队镇压了学生，死伤有二百多人。对父亲来说，他们的死就像国家的灭亡。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父亲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状况，敦促各党派联合起来，推翻军阀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

自回到中国，已成为母亲的翠凤就一直为丈夫的安全担忧，她不止一次地劝他致力教学，不要批评政府，招惹是非。可他听不进去。

"批评犯错误的人是一个学者的责任。"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独立的思想,如果他是真诚的,那他必须批评(错误)。"

他不仅写文章,还参加示威游行,用竹杆和砖头与警察战斗。一次,他的前额被刺破,留下了个永久的伤疤。他说他扔砖头很在行,因为小时候常学着往水面上扔漂石。

封建军阀继续镇压。屠杀学生后,段祺瑞下令逮捕50名批评政府的教授和报人,父亲也名列其中。两位编辑被逮捕后,当天晚上就遭枪杀。

"这次你可做到头了!"母亲哭着说。母亲有些愤怒,她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当她从医院回到家时,发现父亲正在准备绳梯,一旦警察来了,可以越墙逃走。

"要跑,就一起跑。"母亲叫道。全家人开始逃往一家法国医院,然后又藏在朋友家里。三个星期后,我们回到厦门,父亲在厦门大学任教并担任文学院教务主任。许多北大教授,包括著名作家鲁迅也在那里。但是,校园政治使父亲难以继续呆下去。一年后,由于敬仰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他到武汉政府外交部任职。1927年,蒋介石推翻了武汉政府,立南京为首都,父亲辞职,举家迁往上海。

在上海,父亲开始编纂《开明英语课本》,并取得成功,被采用为中学教材。

如果我不出声,父亲允许我在他书房里玩耍。我经常见他在打字机上用英文打字,我喜欢他的机器。我记得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台同样容易操作的中文打字机就太棒了!"

我喜欢在父亲工作时呆在他的书房里,我愿意亲近他。屋子里装满了书,但散发着香烟味。我常帮他削铅笔或灌墨水。当我不耐烦时,就爬到他的膝盖上问他在做什么。

"写作。"他总是说。

“我也想成为一名作家。”我说。

“要成为一名作家，你必须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好奇，深深地感觉，对事情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理解。”他教导我说。

他把书房叫做“未完成的影棚”，并解释说：“我从未实现孙中山的愿望，没有阻止自己在做礼拜时心不在焉；我从未翻过跟头——无论是体力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我甚至不知道风是怎样吹的；我从未说过任何话去取悦别人，也从未有这样做的企图；在探讨国家政治时，我从不冷静，也不圆滑。”

弄潮儿

1932年，随着《论语》期刊的创办，父亲在中国获得声誉。杂志以幽默和讽刺见长，他的文章吸引了大量读者。他曾这样嘲讽腐败的政府官员：“虽然你是一名官员，但看起来不像个人。”每一期，学生们最先要读的便是父亲的短文。

父亲打动人心的诙谐语言使他声誉大振，人们称他为“弄潮儿”和“幽默大师”。1934年至1935年，他又创办了半月刊《人世间》和《宇宙风》。与此同时他在《中国评论》杂志上主持英文专栏短评。他还着手编纂具有《牛津词典》风格的中文字典。

对父亲来说，生活就是获取知识的旅程。他学习中文、希腊文、法文并研究英国哲学家。每天上午他工作完走出书房，犹如他刚去世界旅游了一趟。接着又埋头工作。

父亲把持家的事完全交给母亲。他把母亲从严厉的儿时教育中解放出来，告诉她应该享受生活。她并非对他说的全都相信，依然去教堂做礼拜，以她独特的方式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

母亲身高五英尺，腰板挺直。她戴着一副无框夹鼻眼镜，一边用细链钩住耳朵。她对在德国购买的这副眼镜感到自豪，因

为很少有人长着足够高的鼻梁来戴这样的眼镜。

母亲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父亲并不介意。他不迷信传宗接代,尽管这在中国十分重要。“生活犹如一场梦,人类如时间长河中的旅行者。”他写道,“在此地装船,而在彼地卸船,以此为候者腾出空间。”

父亲浪漫,而母亲现实。一次,我们去无锡旅行。行前,我们告诉佣人第二天才能回来。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当天晚上就赶了回去,发现厨师与佣人正在父母的床上睡觉!母亲甚感气愤。“把床单换掉!”她喊道,并说翌日就要把这两人解雇。

我年少而天真。“为什么一定要解雇他们呢,妈妈?”“把床单换掉,把一切都整理好。”

父亲失声大笑,并为厨师求情。厨师留了下来。父母亲配合得很好。“婚姻中追求浪漫的人终将失去它。”父亲写道,“而忘记浪漫,安分守己,乐观向上的人终将得到它。”父亲是个矮个子,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身体健壮,前额微突,两眼深邃,他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精力充沛。记得一天晚上,他叫我去花园,从书房透出的灯光照着一只蜘蛛,正在玫瑰枝上结网。“看看,”他叫道,“一个蜘蛛竟然知道结构如此了不起的网,而且在上面爬行,真是不可思议!”

我学过的知识说明蜘蛛网很脏,但爸爸解释说,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它就是美丽的。

山之子

父亲发表在“短评”上的短文,引起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注意,她当时正在中国,她的小说《大地》获得过普利策奖。“这个栏目对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作了新颖、敏锐和准确的评论。”她写道,“使我钦佩的是它的无所畏惧。”

两位作家在一天晚上相遇。他们正在议论在中国的外国作家，父亲突然说，“我很想写一本书，谈谈我对中国的确切感受。”

“你正是做这种事的人。”赛珍珠热情洋溢地回答。

父亲于1935年完成了这本书，叫做《吾国吾民》。它剖析了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赞扬了她的美德。这本书使他在西方成为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黑暗的年代。在书中，父亲分析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观念及理想。“中国太大了，她的国民生活有许多方方面面，”他写道。“我剖析她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失望。”

“如果一个人必须是一位作家，”他说，“他应该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成为一个好作家相比，成为一个好人更重要。”

父亲已经41岁，从他离开家乡，所见所闻常使他怀念故乡的高山、简朴而快乐的童年，以及祖父对他的期望。“如果你住在山村，你在内心里永远是一个乡娃，不会改变。”他说，“家乡的山峦影响了我一生。它们使我变得勇敢，也教我谦逊。它们使一切，金钱、政治、名利，变得渺小。这些山峦给我以无限的内在力量和独立，谁也拿不去。”

1936年，在赛珍珠的建议下，我们举家迁往美国，原来只准备呆一年，可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只能滞留在海外。上海成为战场，当那里的战斗结束后，父亲得知他未带往美国的52册中国字典的手稿被毁，悲痛万分。

在纽约，父亲开始着手写《生活的艺术》，这是他最出名的著作之一，为他的哲学思想构筑了框架，成为1938年美国最畅销的书，并被译成12种语言。

谈到家庭的重要性，父亲写道，“在我看来，任何文明的最终检验是，丈夫们、妻子们、父亲们及母亲们将成为各种类型的人。

除此之外，文明的每一个成就——艺术、哲学、文字和物质生存都会黯然无色。”

成功并未改变父亲。“我仍然是个婴儿，睁大眼睛观察这变化无穷的世界，”他说：“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任何事情都引起我的好奇。我只有一个兴趣，即更多地了解人生，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并把它写出来。我不喜欢名利，即使它闯入我的生活。”

创造性的发明

战争结束后，父亲参加了一次探险活动，这花费了他的毕生积蓄，并负了债。但我仍深深地敬仰他的勇气和忠诚。

父亲决定发明一台中文打字机，以便任何人不经训练就可以使用。由于他写作并编辑了一本很受欢迎的著作集，其中包括 1942 年写成的《中印名言录》，他觉得可以担负这笔费用。事实上，早在 20 年代一到北京，他就一直试验发明一台打字机。他认为他可以完成，尽管中文有成千上万的表意文字，而英语只有 26 个。

当时有一种中文打字机，是根据《康熙字典》系统发明的，但很复杂，要学会怎样使用需要六个月的时间，而且打字并不比手写快多少。

为了能早日完成发明，父亲黎明即起，直到半夜才入睡。在纽约中国城，他发现有一印刷工可以铸造汉字，接着，他帮助购置了机器和车间，开始生产零件。

我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常陪父亲去车间视察进展情况。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预算也在不断增加。随着父亲的积蓄在消失，母亲开始不安。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他在生活上无所谓，在其它事情上却倔得很。发明打字机正是其中之一。

父亲的一个朋友卢清才闻讯后，慷慨解囊，使试验得以继续进行。终于，在1947年5月，父亲完成了自己的发明，把它带回家，起名为“明快打字机”。打字机有72键，屏幕也相当好。

我开始练习打字。机器也绝非完美无缺：声音大，而且跳字。但它确实令人感到惊奇。我能够找到需要的字。逐渐提高了打字速度。

一个雨天的早晨，父亲与我携带打字机来到曼哈坦区中心的莱明顿打字机公司，屋里的人正翘首以待。我们把机器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我在桌前坐下。

“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在使用汉语。”父亲开始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实用的中文打字机，中文里表意文字多而复杂。我刚发明了一种打字机，只有72个键，任何人都能使用，甚至不需查看屏幕。”

父亲示意我开始操作。在工作人员的注视下，我按下打字机键盘，没有反应。再试另一个键，仍无动静。父亲过来又试一次。机器仍不工作。我们又试了几分钟，最终父亲只好对工作人员表示抱歉。死一般的沉默。我们把打字机装进箱子，离开了。我能够想象那些美国人正在想什么：“林语堂疯了？”

外面大雨倾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一辆出租车。发生了什么？我疑惑不解。在家里，打字机干得很漂亮。第二天将有一个新闻发布会，父亲将向世界宣告他的发明，我们应取消发布会吗？

父亲立即给车间的机械师打电话。人很快就赶来，几分钟内，打字机就恢复完好如初。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打字机工作得相当顺利，赢得广泛的好评，我们收到大量贺电和鲜花。我为自己能给父亲一些帮助而感到骄傲。

但父亲负债累累。一天,我回家后发现母亲正在哭泣。父亲与许多打字机公司取得联系,但没有结果。中国正在内战,对这个最大的潜在市场丝毫无把握。

1948年,美国林诺打字机分公司同意生产中文打字机,期限为六个月至两年,每半年给父亲5000美元。数目不大,但我们很受鼓舞。后来父亲以25000美元的价格将专利卖出,另有百分之一的专利使用费。但明快打字机终因成本太高而未能生产。

1965年,我担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后,试图把专利再买回来。我找到多年前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他对我说:"你晚来了三个月。打字机在我们公司躺了近20年,公司搬家时,我把它扔了。"

1985年,台湾美太克机械公司购买了父亲的《快速索引系统》,并使之成为计算机输入系统。"这是我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父亲说。

生命的意义

1948年,父亲应邀担任巴黎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艺术文学组组长一职。父亲卖掉公寓来还债,就在起程的前几天,美国国家税务署突然来了一封信:赴法前,父亲必须交纳30000美元的个人所得税。父亲单手抚前额喊道:"噢,上帝!"

他再一次求救于好友卢清才,然后加一些版权收入,总算交足了税。父亲及妹妹香橘带着三十多箱书离美去法。刚结婚的姐姐菊梓和我留在纽约。

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里,父亲撰写回忆录,起草报告,参加会议。他发现自己的计划被打乱,并显得焦躁不安。"世上有两

种动物，"他曾写道，"一种只管自己的事情，另一种却在管别人的事情。前一种为食草者，如牛、羊及脑力劳动者；后一种为食肉者，如虎、鹰及体力劳动者。我经常羡慕同事们的管理能力，然而我从来就对此不感兴趣。"

哥伦比亚大学为外国学生准备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叫做国际小屋。在那里，我遇到了黎明。我们决定结婚。遵从父母的意见，我们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再次见到父亲，我感到很吃惊，他体重下降，头发脱落，而他只有54岁。

1949年，父亲辞职并迁于法国坎内，在卢清才的别墅借居。那是一座漂亮的住宅。一天下午，我们坐在阳台上欣赏花园风光。突然，我问父亲："死后还会有生命吗？"

"死后不会有生命。"他回答说，"有生必有亡，这是自然规律。在这一点上，人与蜜蜂之间没有差别。"

我记起他所写的："没人能说生命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不是一个好的安排。一年有春夏秋冬，一天有早晨、中午和黄昏。如果采取生物学的人生观，只有傻瓜和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否认人生犹如一首诗。"

看着他变白的头发和那双深邃的眼睛，我突然感到悲哀，甚至害怕。我不愿时间流走，不愿人们变老，我要永远把握住现在，然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甚至感到自己腹中的胎儿在成长。

父亲在《生活的艺术》里这样写道："信仰自然规律，就像意识到我们最终会像一支蜡烛一样逝去，是一个好事情。它使我们镇定，虽有一点悲哀，它会使我们中的大部分充满诗情画意；它使我们下定决心去虔诚而有意识地生活，对自己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它也带来和平，因为心灵真正的和平来自对最坏事情的接受。"

父亲热爱法国的南方，他渴望简朴的生活——坐在屋里观望回归的渔船。这里的生活比在纽约更能使人接受。他还想租套房子，恢复写作，做一名自由自在的人。他攥着母亲的手说："翠凤，不要紧，一切从头开始。我的这支笔还能赚点美元。"

在坎内生产后，黎明和我带着新生女儿回到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家。妹妹到纽约读大学。姐姐离了婚，心情忧郁。母亲太想念我们姐妹，所以父母也回到纽约。

南洋往事

1954年10月，父母亲、妹妹、黎明、我以及我们的两个孩子乘机前往新加坡。迎接父亲的是南洋大学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及当地华人界的二百多名代表。对那些在这块殖民地上组建了第一所中文大学的人来说，这确实是重要的一天。林语堂，大学的首任校长乘机到达。

当地华侨界领袖此前给父亲写信时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文化，从现在起十年，我们这里的教育根基就会颤抖；二十到三十年，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将会消逝；四十至五十年内，我们就不会再叫我们自己是中国人。"

父亲认为，一个人很少会再有比这更振奋的职业。但他仍然坚持他要有绝对的行政权力。学校要有严格的、纯正的、无政治色彩的宗旨，学校教师要有绝对的思想自由。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南洋应是一流的大学。

父亲要黎明担任学校的常务秘书。此前，黎明在联合国翻译署当翻译。但我们还是决定去南洋，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学习过。而且这正是他学有所用的机会。

然而，校园里仍然充满了政治气氛，这与父亲的愿望不符。最后，父亲终于辞去校长的职务。

"显然,我只能辞职,除非我抛弃我所坚持的一切。"父亲后来在《生活》杂志里写道:"我的职位难以保住。世人认为我和我的同仁可以牺牲,这办不到。根据常理,我下令撤。"

父亲并未因为在南洋大学的这段不愉快经历而改变自己。离开新加坡后,他和母亲回到法国坎内。黎明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找到一份工作。我与他迁移到伦敦。父亲又开始写作,母亲在阳台上栽种土豆。虽然已年届六十,但父亲并不觉老。"我不渴望春天,但在秋天里也不感到悲哀,"他说,"因为我妻子不觉得我老。"

父母亲生活简朴,犹如儿童。他们相依为命,幸福快乐。每吃到一次新鲜的饭菜也会感到高兴。他们还一起散步、逛街。"只有成为一个心胸豁达的哲人,一个人才能聪明。他首先感受到生活的悲剧,然后才是喜剧。所以,笑之前,我们必须哭。超越悲哀才会觉醒,超越觉醒才会豁达。"

他应该写写他自己。

父亲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但我觉得在他心灵深处有我们谁也不能触碰的东西。他是个天才,或许需要别的天才来陪伴。"人类的特点之一就是对理想的永恒追求,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却梦想另外一个世界。"他说,"联想越丰富,越难以得到满足。"

满圈

重返美国两年后,父亲又恢复信仰基督教。在此之前,他脱离基督教有三十多年。1959年出版的《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文,叙述了父亲的转变。

"三十年来,我唯一的信仰是人道主义:理智指导下的人类对自己会感到很充足,知识进步的本身将自发地带来一个更好

的世界。然而,在我生活的深层产生了一种因事物的反映和经验带来的不安。我意识到人类本身不断增长的信仰并未使自己似神如仙。他变得越来越聪明,但在上帝面前,镇定和谦逊却越来越少。教条主义使我很难听到信仰的内在声音。"

"因此,正当我处在十字路口之时,一个星期一,妻子说服我陪她去教堂,这是一个转折点。连着几个星期,我回到教堂。我在那里很快乐。几乎是自然,我重新信仰了基督教。"

但是,在父亲到达转折点时,姐姐却难以从离婚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她感到沮丧。无论父母说什么也不能把她拉出来。父亲因此而压力很大。

1962 年,黎明在香港政府情报服务部就职,父亲来港,准备与我们住几个月。他好像在寻找什么。

我们带他观光。我说香港因山水而显得非常漂亮。但父亲说这些山不够好,不如他家乡的山。哦,他在寻找孩提时代的天真与幸福。

"在你母亲身上,我造就了一个好女人。"父亲喃喃地说,"而你姐姐却在慢慢地灭亡自己。"

母亲从纽约来电说姐姐生病,所以,父亲只呆了几个星期就飞回美国。

1965 年,父亲 70 岁。他认为是该回东方的时候了。在访问台湾时,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说的是父亲家乡的方言,就好像他又回到了故乡。尽管并非如此。他觉得与他们有着自然的直接联系,因而决定以台湾为家。

蒋介石许诺为父亲建造一幢房子,他接受了。这幢父亲亲自设计的房子建在台北郊区的阳明山上,面向群山,下面是一个花园。

父亲为此写一首诗:

家里有花园,
园里有院落,
院里有大树,
树上有蓝天,
天上有月亮,
哦,我多么幸福!

在此地,父亲撰写《无所不谈》专栏,全球中文报纸争相转载,读者达五百多万人。

1969年,父母亲庆祝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当被问到婚姻成功的秘诀时,他们只说了一个字:"让。"

父亲回忆起母亲在其经济来源中断后不向家里要钱的情景,并说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母亲则回想起父亲第一次在廖家吃饭时,她怎样在屏风后偷看的情景,她承认当时她正在数他吃几碗米饭。

父亲为自己的女儿而感到自豪。香橘是生物化学家,在香港大学任教;菊梓在台北博物院工作;我刚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但事实上,姐姐并未痊愈,有时她会感到莫名的恐惧,焦躁不安,看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

父母为此焦急。但父亲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笑迎人生"。他似乎在逆境中也能看到光明。他认为他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普通人却在痛苦面前退却。

"难道他不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吗?"

1969年,父亲被推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两次——1972

年和1973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那时，他正在编纂《当代汉英词典》。社会与技术的发展急需一本新的汉英字典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像以往一样，父亲长时间、努力地工作。完成最后一页的那天，他两眼模糊，看不清他写的是什么。第二天早晨，母亲发现他面颊绯红，双唇扭曲。在医院里，医生说他有中风的前兆。

我飞往台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谢天谢地，父亲像以往一样，并与我们开玩笑。医生说，几天后他就可以出院，但需要至少两个月的彻底休息。他的思想没有受到损害，我如释重负，返回香港。

一天下午，我刚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电话铃响了。是父亲。

“你姐姐今天上午自杀身亡。不要着急，我会照看好你母亲。”他说。

“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正在与博物院院长吃午饭，这时有人来找我，”他说，“清洁女工发现她吊在自己屋用的屏风梁上。”

大地在我脚下颤抖。妹妹、黎明和我赶往台北。一进家门。父亲扑向我大哭起来，母亲倒在妹妹的怀里。此时我明白，我们的位置与父母换过来了。以前他们照顾我们，从现在起我们要照顾他们。父亲76岁，母亲年轻一岁。

葬礼后，我们把他们带到香港。我每天去妹妹公寓看望他们。“我活着为什么呢？”母亲自问。她变得很少说话，忘记了微笑，即便是孩子们去看望她，也是如此。她非常警惕，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害怕他会中风。她面色灰白，双唇紧闭。他们俩似乎一夜之间上了年纪。

父亲紧张地校对字典。一天晚上，我们带父母去一家著名饭店吃烤鹅。餐后，父亲突然吐血不止。

医生说他因过度劳累而引起肠下垂。当我去看他时，他侧卧在床，沉睡着。我盯住他那稀少的白发，淡红色的额头，他只剩下一把骨头、神经、血管、肌肉和器官了。难道他不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吗？我问自己。他的光辉精神真的藏的那里吗？我听到他在深深的喘息。睡吧，爸爸。我想，连梦都不要做。然后，我离开了，心被一种从不知晓的伤感扭曲着。

从医院回到家，父亲的体力开始恢复，本性回归。我听到他对母亲说："女儿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只要我们能做的事，就不麻烦他们。"但母亲只想依靠孩子。父亲不愿放弃他非常喜欢的台北房子，但他最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香港度过。

镶满珠宝的花冠

被父亲称为一生中最辉煌成就的《现代汉英词典》，于 1972 年隆重出版发行。这是第一本由中国学者编纂的汉英词典。《纽约时报》称之为"世界两大语系联合体的里程碑"。

1975 年 10 月 10 日，香港的朋友们隆重庆祝父亲 80 大寿。父亲穿上西服，打上领带——他好久没这样了——母亲给他梳了头。我身着长服，沉浸在父亲成功的荣誉海洋里。

台北为父亲举行了更隆重的庆祝活动。

父母归来时，我去机场迎接他们。父亲的双眼泛着兴奋之光。他的杯子是满的。他想到而未得到的唯一荣誉是诺贝尔奖。但对此，他又回到自己的哲学本性。"让我们现实些，"他说，"我们应该持这样的态度：对生活不要索取太多，也不要太少。"

父亲曾就变老和不可避免的生活规律写道："我喜欢春天，但它太年轻；我喜欢夏天，但它太傲慢。所以，我最喜欢秋天。它知道生活的局限并且满足现状。早秋的风吹落银色的树叶，

在大地上欢快地跳跃。你不知道这落叶的歌曲是笑声之歌，还是分别的眼泪之歌。”

我以为我对生活知道得很多，但我还有一堂课要上。位于波士顿的西蒙斯大学教授A·J·安德逊编辑了一本书，名为《林语堂：最好的老朋友》。父亲在前言里写道：“我喜欢的一位老作家说过：‘古人不会被迫开口，但他们突然完全自愿地谈论。他们有时所说的是事件，有时是他们自己的感情。说完了他们要说的，他们就告别而去。’同样，我完全自愿地写作，说完了我要说的，人也要告别而去。”我感到震惊。他是在预卜自己的死期吗？

父亲变得非常容易流泪。一天，我为他做了一条鲜美的鲤鱼时，他哭了起来。圣诞节，我带他去百货商店。在一个柜台前，他拿起一些装饰物一个一个地看，洒下两行热泪。我有些生气。原谅他吧。我想对售货员说。这个人太热爱生活了。他曾说过，如果不快乐而只求活着便心满意足，那就是忘恩负义。读了他写的书，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哭了。

不久，父亲不得不使用轮椅，即使在家里也一样。晚上，他有时从床上掉下，不能爬起来，就躺在地板上直到天亮。

“你为什么不喊我呢？”妹妹问。

“我不想叫醒你，”他回答，“早晨你还得去上班。”

即使看着父亲的身体衰落下去，我也不能接受这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我没有先知，我只是不知道如果他不在将发生什么。

一天早晨，妹妹打来电话，“快来！爸爸患心脏病。情况不妙。”

我开始发抖，手脚冰凉。在去医院的出租车里，一切都变得奇怪，似乎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建筑和街道。

赶到医院时,父亲已被送进急救室。妹妹和我换上罩衣,也跟着进去。他们正在往父亲头上套氧气罩,被父亲推到一边。他喊我的名字,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个字。

母亲和黎明来了。从下午到晚上,我们一直坐在真诚廊里。一次门开了,我看到七八个人围在父亲的床前。

最后,我们被允许进去看他。他平躺着,心脏停止了,但又跳了最后几下。这时是1976年3月16日晚10时10分。

安德逊教授称父亲是"人类文明的楷模"。父亲作品的一位评论家把他的英语描绘成"中国人所写的东西中最好的"。

父亲接到的最热烈的赞扬来自美国《读者文摘》的奠基人德威特·活沦斯:"林把他的字典看成是自己一生的'花冠'。对任何读过他的著作的人来说,他的花冠上镶满了珠宝。"

我们把他的遗体运往台北,葬在自己家的花园里。晚上吃饭时,我企望他微笑着走,要我们做他最爱吃的羊排……

名门之后的命运

历史造就了名人，因而名人后代的命运也更多地与历史交织在一起：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随其功过而沉浮；宋家姐弟依政见而分合；张家兄弟虽手足情深，但也为一条海峡所阻隔……



末代皇帝“寓居”天津始末

溥仪“寓居”天津的七年间，是其思想意识发生巨变的重要阶段。本文以翔实的笔触记述了溥仪如何在封建帝王思想的支配下，不惜卖国求荣，开始自觉从事复辟清王朝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昭示人们，这样一个卖国投敌的大汉奸在解放后居然被改造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新人，说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英明和伟大！

张彪愚忠 逊帝倚重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在北府暂住几天后，于同年12月18日跑进了日本公使馆。在这里的三个月中，溥仪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1925年2月23日，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从北京前门车站上了一辆三等兵车，溥仪把平素决不轻易摘下的眼镜摘了下来，把他那顶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这节车箱每到一站都要上来几个穿黑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时，一车箱几乎全是穿黑衣服的人。出站时，溥仪被他们团团包围着裹了出去，就这样溥仪在日本人的特殊保护下，来到了天津。

当夜溥仪等人直奔日租界内宫岛街的张园。张园的主人张彪，清末曾任湖北省提督兼陆军第八镇统制官。武昌起义时，张



溥仪夫妇

彪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张园占地面积12000多平方米，修建精巧、环境幽雅、设景别致，垒石洞山、池桥亭榭齐备。园中央的水亭颇具巧思，由亭柱内暗藏自来水管到顶，尖端有珠另配双龙，拧开水龙头推动球成"二龙吸珠"之状。园内的主体建筑"平远楼"，是一座三层壮观大楼，张彪于1917年建成。

溥仪突如其来，张彪受宠若惊，马上亲自去准备一切，在英商经营的惠罗公司购买上好的铜床三张和全套的外国被褥，又令家人赶制上百件床上用品。在津的遗老遗少闻讯前来进奉各种用品。

张彪对于溥仪的到来，极尽供奉之能，逢年过节，特别是溥仪的"万寿"之日，婉容的"千秋"之时，都要供入各种贡品。有新奇的国外表演到津，张彪都要专召作"御前"献技。为了确保溥仪的安全，张彪不许园丁靠近平远楼。当时张彪虽已年近七旬，但为了表示对溥仪的忠心，还坚持每天清晨亲自打扫院子，整剪枯枝。

溥仪来到张园后，立即下了两道"谕旨"：第一，改北京紫禁城时的内务府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办事处内设军机处。第二，任命郑孝胥、胡嗣瑗等人为驻天津顾问。军机处下设四个处，总务处由郑孝胥任事；庶务处由佟济煦任事；收支处由景方昶任事；交涉处由刘骧业任事。这些遗老遗少们，加之溥仪带来

的随侍仆役们一起涌进了张园。园内的房舍无法承纳，张彪又筹资在园内右侧动工兴建了相连的木舍四间，专供军机处使用。又专辟一间作为候见室，竭力要把这里装扮成皇帝出巡时传旨转奏的“行在”之地。

溥仪为了讲究逊帝的排场，购置了大量高档消费品。首先，他买进了三辆高级轿车，一辆是淡青色的轿车，专供出游兜风使用；一辆是蓝色的大轿车，专供冬、春两季使用；一辆是黄色的轿车，专供夏季出访迎宾使用。其次，“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整个平远楼的房间也不够溥仪使用。张彪为了使这位“蒙尘皇帝”增加起居空间，又在平远楼加筑了第四层，以便放置台球案子、钢琴、大餐桌等。为了防止建楼工程惊了“御驾”，每天开工晚，收工早，又不许发出大的响动，只许悄悄地慢慢进行，所以工程日期拖延了好长时间。

溥仪对于张彪的忠心，深加赞许，张彪病重之时，闻讯亲临探视，并令他的御医参与医治。张彪死后，溥仪特派宗室公爵前去祭奠，并赐祭一坛，赏盖“陀罗经被”，并颁给“心如金石”匾额。出殡之日抬出 24 座黄色彩亭，都是溥仪所赏赐的物品。

溥仪自从来到天津之后，受到了日本极为特殊的保护，日本人在溥仪心中的位置变得更加重要了，认为日本人是助其恢复祖业的最有力的力量。同时溥仪和美、英、法、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驻津司令官、总领事、领事等也都保持着频繁的交际往来。

幻想破灭　依靠列强

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1925 年 6 月，张作霖在天津他的行馆派人去请溥仪，希望和他见一见。如果不是为了复辟大计去拉拢这个实

力雄厚的大军阀，对这样的要求溥仪是无法容忍的，更谈不上“御架”亲行了。溥仪降尊冒险第一次走出了日租界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不但在大门口亲自迎接溥仪，还跪在砖地上给他磕了头。这不但把溥仪从“降贵纡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而且使溥仪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这对溥仪的复辟野心是最好的安慰。从此开始，溥仪和奉系将领之间也进行了紧张的接触，“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我或多或少的幻想。”溥仪到天津后不久，当时任直隶督办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即来拜访他，不但大骂冯玉祥“逼宫”，还特别表示对溥仪的同情和支持，手拍胸膛说：“到了天津，您便可一切放心，我将尽保护之责。”这固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些中国将军们的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但溥仪听的却十分受用，犹如久旱逢甘雨一样。

只要是拿着联系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特别是1926年起，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而盯在溥仪手中文物珍宝、金钱古玩上。一个叫刘凤池的失业小军阀，曾向溥仪建议让其拿出一些古玩、玉器和金表之类交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一些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地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希望。

东陵事件发生后，打破了溥仪依靠军阀政军实现复辟的幻

想，从而加速溥仪靠外力图谋复辟的步伐。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1928年，军阀孙殿英将乾隆和慈禧太后的陵寝盗掘一空。这件事给溥仪极大的刺激，认为这是一件和他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溥仪在张园摆上了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就像办丧事一样，每天举行三次祭奠，把整个张园都笼罩在悲哀凄惨的气氛之中。溥仪悲痛已极，冲着先祖的灵位发誓“祖茔被掘，此乃是我身为后世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溥仪的心中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军阀、政客实不可用，对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从以往的“依赖”和“利用”，转向于“敌视”和“抛弃”。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溥仪与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天津领事、驻军司令官，开始了频繁的往来和巴结，加强“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卖国投敌道路。

在天津时期，溥仪十分信任郑孝胥，郑的思想、言行对溥仪有较大的影响。郑孝胥认为：复辟清王朝必须走“共管”的道路，也就是把帝国主义列强请到中国来，组成“共管中国委员会”，解决国内的政治分争，共同掌握中国的政权。

在郑孝胥“共管”的思想影响下，溥仪起初也并没有把“图谋恢复”的希望单一地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他曾一度将“借助外力”的幻想寄托于英帝国主义，和英国驻津历任司令官有过交往，彼此之间互相宴请，用溥仪的话来讲交流情感、增进了解”，每年的“第一次欧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公祭无名战士纪念碑和阅兵式时，溥仪都应邀前往参加。英国王乔治五世的三皇子来中国时，还特意访问了溥仪，并表示“大英帝国把未来清王室的希望，寄托在陛下身上”。英王的“关怀”和“鼓励”，使溥仪受宠若惊，感恩之余，无所相报，溥仪亲自在他的照片上签名，请英皇子转交英王，以表他的谢意。

在与英帝国主义勾结的同时，他又与意大利驻津司令官取得联系，把闻名于世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政治谋略和才能"奉若神明。意大利驻津司令官离任回国之际，溥仪抓住这一谄媚的机会，亲笔书写一块"举世无双"的匾额，请其转交给墨索里尼，以表他的崇敬之意。


在张园的溥仪与婉容

由于溥仪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频繁接触，美、英、法、德、意等国的驻津司令官，经常往来于张园，举行盛大的酒会、宴会等。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称溥仪为"皇帝"或"陛下"。溥仪正是想通过这种浸透着肮脏政治交易的社交活动，取得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扶植，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此时，西方各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失去了独占中国的可能，他们为了保住仅有的在华利益，对于溥仪的境遇，只是在表面上给予"关心"和"同情"，实际上却是"敬而远之"。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称霸的野心，在加紧筹划军事侵略的同时，正在煞费苦心的寻找他们在中国实行殖民主义统治的代理人，他们早已把注意力集中在溥仪身上。从溥仪被赶出北京故宫，日本方面就表示出了异常的"热心"。到了天津之后，一方面给予溥仪以优厚的生活待遇，一方面又严密监视溥仪的一切活动。日本人精心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场面，满足溥仪的复辟欲望。无论是日本的军人、外交官，还是政客，都对溥仪极其"关心"和"尊敬"。

溥仪参观日本侨民学校,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溥仪欢呼万岁。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天津的边缘,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特意来到张园对溥仪讲:"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溥仪在海河边游逛,日本海军将校列队向他致敬。日本人导演的这一切收到了成效,使溥仪感到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对他表示尊敬。

溥仪认为日本是中国的邻邦,两国在民族心理和地理环境上十分接近。他特别羡慕日本"忠君亲上"的"天皇制",认为这是日本成为亚洲的强国,拥有强大武装力量在制度上的根本保证。中国军阀混战的连绵不断,就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实行"帝制"。而日本正是复辟大清的第一"借用力量",这样绝好的外援,不依靠它还能依靠谁呢?溥仪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选择,终于把"借助外力,恢复大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

潜出天津　卖国求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溥仪这时已迁到租界内协昌里的"静园",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借助日本的武装力量,实现"恢复祖业"政治主张的时机已经到来。

日本方面此时在确定殖民统治代理人的心情更为迫切,已经确定了侵占东北后殖民统治的方式即"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同年的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请溥仪到他的司令部去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溥仪兴冲冲地前去会见了日本关东军高参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和遗老罗振玉。上角谈了事变后东北的局势,并向溥仪提出请其去往东北的意思。罗振玉拿出了熙

洽给溥仪的信，信中劝溥仪速去东北主持大计，如其愿意前往东北，日本可派军舰来接，可保万无一失。尽管溥仪有即刻返回东北的强烈愿望，这又是他梦寐以求尚且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又怎能不愿意去干呢？但此事关系到溥仪的前途命运，溥仪表示容他回去考虑考虑再作决定。

1931年11月6日《天津益世报》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土肥原威迫溥仪赴辽，鼓惑日侨与华人寻衅。土肥原秘密来津，匿居日租界常盘旅馆，记者昨日向各方调查，据可靠消息，土肥原确已来津数日，行踪诡秘，除少数日人外鲜有知者，闻其来津任务，系奉该国陆军省之命令，到津煽惑隐居津门之清废帝溥仪赴东北组织独立政府，并鼓动在津日侨与华人寻衅，造成不撤兵之藉口。已与溥仪晤面数次，……用尽种种强迫手段威吓，逼其前往有非去不可之事。"这篇报道基本属实。11月2日，土肥原确实前往"静园"与溥仪会面。土肥原为了实现溥仪前往东北的计划，施展出他的惯用伎俩，表现出异常的恭顺，他满口"皇帝陛下"，请溥仪先赴东北，将要在东北建立独立自主的帝国，可由溥仪主持一切，并保证说："日本会尊重这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一切都可由你自主，如果有任何外来力量胆敢对于这个新国家进行干涉，或是使用武力时，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积极援助，而和它作共同防御"。溥仪认为土肥原是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完全相信了他所说的。

为了敦促溥仪按计划速离天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溥仪住宅发现炸弹，装于鲜果筐内，与复辟运动有关。"恐吓信、威胁的电话接踵而至。土肥原会见溥仪后，于11月8日晚亲自策划了"天津骚乱事件"。土肥原指使日本浪人和汉奸，在临近日本租界的中国管区制造事端，勾引中国驻津部队出动平息骚乱。借此时机，日本驻屯军也调动部队，占领

了日本租界以外沿线，并全部实行戒严，土肥原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告此事的目的："天津暴乱实为溥仪出走的一幕。"

溥仪会见土肥原后，便悄悄地做好了潜行前的准备。11月10日下午，溥仪唤来亲信的随侍李国雄吩咐道："我今晚要走，晚上不让开车的佟公勇进车房，让他在车房外等着，按照我想的办法，我藏在汽车的后箱里，到时你把车后箱盖盖上。"

夜幕刚刚降临，溥仪从楼上走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到了车房后，李国雄正准备扶溥仪上车，这位"皇上"却异常灵巧地自己跳上了车，钻进了车后箱里，紧跟着后面那个人也上来往里钻，李国雄这才看清，原来是另一名随侍祁继忠。两个人钻进狭小的汽车后箱内，大半个身子仍露在外面，溥仪见状十分着急，命令李国雄赶快盖好后箱盖，李国雄使出了全身力气，终于盖上了后箱盖。

李国雄关上后车箱盖后，马上让佟公勇进车房，把这辆"空车"开出去。这辆天蓝色的敞篷小汽车刚开出静园，早就等在那里的两辆黑色轿车便一前一后将装着溥仪的跑车夹在中间，直奔日本人经营的"敷岛料理店"，把司机佟公勇先轰到一边，打开后箱盖，这位昔日养尊处优已极的"皇帝陛下"面色铁青，非常狼狈地钻了出来。溥仪在痴心妄想了即将坐上的"皇帝宝座"，又对他此后的前途命运危惧不安的思绪中换上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日本军帽和军大衣，换日本军车到了约定的码头，同早已等在那里的郑孝胥等人一起，上了"比治山丸"号汽船，闯过了中国驻军哨卡，偷渡过海河，半夜时分抵达大沽港外，登上了早已停泊在那里的"淡路丸"号日本商船，溥仪离开了他的"寓居"七年的天津。

（王文锋）

民初五大总统后裔今何在

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先后任过大总统。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的后裔的生活状况如何，仍为人们所关注。有人揣测：他们的后裔多凭借祖上的财产，是不学无术？还是纨绔子弟？也有人分析，三四十年代，这些人的家丁兴旺，只是到六七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始衰败。还有人设想，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后裔依仗着诸多海外关系重新发达起来。带着诸多疑问，我们到五大总统久居天津的后裔们家中走访，这才有了部分的了解。

袁世凯家族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1898 年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戊戌变法期间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1911 年辛亥革命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任内阁总理大臣，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建立北洋军阀政权。1915 年 5 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 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 25 日蔡锷等在云南省发动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1916 年 3 月 22 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 月 6 日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而死。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之四子袁家楫与女儿袁静合影

袁世凯有9位夫人,17个儿子,15个女儿。这里采写的是居住于天津的两个儿子家族的近况。六子袁心武一支——袁心武名克桓,1956年逝世。曾任启新洋灰公司协理、总理,耀华玻璃公司董事、总董。创办江南水泥厂于南京担任董事长,还兼任过开滦煤矿的常务董事。其夫人陈征是江苏巡抚陈启泰的独生女儿,1973年去美国,1986年回国探亲,1991年6月去世,终年92岁。袁心武、陈征夫妇生5女2男。大女儿袁家英1949年去美国,丈夫李国沅为宗教界知名人士,生长子李立中,1973年随外祖母陈征去美国,现于纽约曼哈顿开珠宝公司。次子李立林,美国现代派画家。三子李立扬,美国著名诗人,1990年来天津受到文艺界热情接待。四子李立恩在纽约某广告公司工作。女儿李菲菲为芝加哥华人代表,其丈夫迈克是芝加哥核发电站高级工程师。袁心武的二女儿袁家茝独身在美定居。三女儿袁家蕖住纽约已入美籍。四女儿袁家莪,天津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服装街、食品街、旅馆街的设计者。五女儿

袁家芯和丈夫柏金和皆为天津一中数学高级教师。柏为民盟天津市委常委，生一子，于天津理工学院无线电系上学。袁心武的长子袁家宸(又名袁复)，原天津实验中学高级教师，已退休，现为天津市河西区政协委员。二子袁卫，现已退休，居上海。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逝世于1931年，曾长居天津，善书法填词，为其父的得力秘书，又是著名京剧票友。生前对其父称帝一事与其兄袁克定意见相左，遗著有《寒云日记》等。袁克文有4男2女。长子袁家嘏早已去世。次子袁家彰居华盛顿，原台湾驻美使馆工作，现已退休。三子袁家骝，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美国布洛克海门国家研究所美籍华裔高级物理研究员，夫人吴健雄，世界著名女物理学家，他们被誉为当代的居里夫妇。袁家骝夫妇平均每二三年回国一次，1992年6月曾来天津讲学。生子袁纬承，继承父业于新墨西哥州从事物理研究，与美籍露茜结婚。袁克文四子袁家楫，现为天津市政协委员，1951年回国，现已退休。生1子1女。儿子袁勇，第四半导体器件厂助理工程师。女儿袁静，现在天津市政协统一祖国办公室工作。袁克文的两个女儿，袁家祉，在津居住无工作；袁家华原在香港经商，现在津居住，有一男一女分别去美国、香港。

在采访袁家芯和柏金和夫妇时，他们说："我家在海外的人很多，他们都眷恋祖国，常来常往。母亲陈征，家人皆呼五奶奶，90高龄寿诞之日，在国内外的家人皆来团聚，天津市委统战部、政协皆来为老太太祝寿。我家留在国内的皆尽责子本职工作，居于海外的不忘祖国建设大业和统一祖国事业。"

黎元洪家族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后升任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多次破

坏湖北革命党人活动,1911 年武昌起义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1914 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设参政院,被任为院(议)长。袁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他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22 年受直系军阀支使复任总统。次年被直系军阀驱走,后死于天津。

在五大总统中,黎元洪的后裔要算较少的。他生有 2 子 2 女,两个女儿和长子现已不在人世,唯一健在的后人就是次子黎仲修。



黎元洪次子黎仲修近影

在天津和平区马场道安乐村的一幢洋房内,我们见到了这位年迈的老人,83 岁的黎仲修老人是全国政协委员和天津市文史馆员。老人说:"我的哥哥 1983 年去世,他的 3 子 1 女现都在国外。我有 2 子 2 女,但长子"文革"中在新疆当知青时叫人给打死了,长女因病于十几年前去世,我现在和次女与次子一起生活。"老人前些年不慎摔断了股骨,他坐在轮椅上,双手不停地颤

抖，但思维敏捷，十分健谈，对往事记忆犹新。谈起黎元洪的一些事时，他说："父亲是在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的，那时我刚刚记事。张勋复辟时父亲被撵下台，来到天津办起了实业，任中美实业公司董事长。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后，父亲又复任大总统，转年曹锟贿选总统，父亲又回到天津，从此一心干事业，投巨资建立山东枣庄中兴煤矿，任董事长，又在天津的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投有大量资金。当时父亲不让我参与政事，只让我读书，我是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完成学业的。家里人有意让我出国深造，我不想离开祖国，想办实业施展才干。那是1928年，父亲去世，哥哥和我接了父亲的产业。30年代我有了小家庭，长子长女和次女就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

谈起自己的家庭，黎仲修老人脸上泛起慈祥的笑容。对于荣华富贵，他似乎看得很淡。他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公私合营后，他基本上靠吃定息生活。不过"文革"中，他的家庭也在劫难逃，老人吃尽了老年丧子之苦。不过黎仲修老人晚年堪称幸福，享受了天伦之乐。次女黎昌履已从天津理工学院讲师的岗位上退休，照顾父亲生活。次子在天津市环保局做秘书工作，儿媳在市府工作。黎仲修晚年又得一孙子为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尽管老人身体不能动，但在女儿和儿子的精心照料下，身上没生一处褥疮。在这个家庭中，已看不出大总统后裔的迹象，它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平民百姓家庭之一。只是黎元洪威武的标准像，只挂在墙壁不起眼的角落。

冯国璋家庭

冯国璋（1857～1919），河北省河间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辛亥革命爆发后率领北洋军至湖

北镇压革命，1913 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时奉袁命攻下南京，任江苏总督。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冯为直系首领。皖系首领段祺瑞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冯又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对抗皖系，1916 年当选副总统，1917 年代理总统，1918 年被段祺瑞威迫下台，1919 年在北京病死。

在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 50 号，有一座端庄素雅的奥地利式小楼，曾在 1917 年担任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下野后，就居住在这里。如今，这座小楼的主人是冯国璋的孙子冯海岗。这位 76 岁的老人膝下有 2 女 3 子。长女冯幸耘，现是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河北区海外联谊会副主任，在河北区房管局供职。次女在天津五十七中当教员。长子冯信，天津河北区五金交电公司经理，中共党员。次子冯达，中共党员，天津石粉厂厂长助理。三子是著名相声演员冯巩。

谈起冯国璋，冯海岗感慨颇多："祖父出身贫农，小时候家境很惨，大年三十全家只能熬粥度除夕。祖父未成年就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后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从军后当过伙夫。中日甲午之战曾转战东北，因编写兵书而得到袁世凯赏识，民国后在北洋政府充任要职，1917 年担任了代理大总统。祖父有严格的家训，就是勤俭持家、个人奋斗。这可能是因为祖父是这样发家的。"

冯国璋生有 5 子 1 女。三子冯家遇的家丁兴旺，冯家遇生有 13 个子女，冯海岗是其三子。采访中，冯海岗将其长子冯信介绍给我们。冯信人高马大，有 1.85 米的个头，相貌与其弟相声演员冯巩酷似。冯信说话声若洪钟："自打记事起，我的家庭生活同中国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补丁衣服，再加上父亲曾是国民党员，所以我们做子女的无论是上学还是参加工作，始终都是谨小慎微。我家的亲戚不下一二

百人,20%的人都在海外。'文革'期间的遭遇在大陆的亲属无一幸免。更确切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这个家族的成员们才真正开始轻装生活。我弟弟冯巩也是在这以后努力奋斗从而成名的。"

回忆起成才之路,著名相声演员冯巩说:"关键是把握自我,把握好今天。我从上初中开始就着迷说相声,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和刘伟去报考中央广播说唱团,但由于我的政审不合格,曾被拒之门外。我当时还说,曾祖父是曾祖父,我是我,但没有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播说唱团才为我敞开大门,但是此前我从未中断对艺术的追求。"

冯巩除表演相声外,多忙于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的拍摄。他的家安在北京,爱妻爱子都在身边。尽管北京与天津仅百公里之距,但冯巩很少有空回津看望父母,然而冯巩在冯氏家族中却是有名的孝子,只要父母身体有恙,无论多忙他也要赶回故里床前尽孝,今年初夏他得知父亲住院的信儿后,星夜从西安的拍摄场地赶了回来,见父亲并无大恙后才放心返回。

冯氏家族后人当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且多是在建筑领域施展才干,很少有从政者,冯容算是一个例外。她是冯国璋四子的长女,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现任天津市规划局副局长,同时还担任天津市九三学社副主委。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建筑专业高级工程师。冯容现生有一子一女,都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冯容说:"我们国家现在更需要干实业的人才,经济兴国,实业兴国,只要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多做工作,此生足矣。"

作为家庭或家族观念极强的中国人,无论是冯海岗或是冯容以及冯巩等,都有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这就是冯国璋在祖籍河北省河间的陵墓,"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至今尚未修复。其

实，冯国璋后裔们所考虑更多的还是为发展国民经济出力的问题，因为目前散居于美国、加拿大、台湾、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冯家后人，基本上都是经商搞实业的，其中多数人都有来大陆投资的愿望，但每当听到祖坟已荡然无存的消息后，便迟迟难下投资的决心，似乎在感情上有说不清的难言之隐。据了解，河北省河间县（现已改为河间市）对修复冯国璋陵墓曾有过考虑，但终因财力不及而未能成真。

冯国璋的后裔们牢记勤俭持家、个人奋斗的家训，把握自我，把握今天为国家、小家奋斗不息！

徐世昌家族

徐世昌（1855—1939），天津人。北洋军阀政客，光绪进士。清末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等职。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的国务卿，1918年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系军阀赶下台，1939年在天津病死。徐世昌曾被法国巴黎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著述有《东三省策略》、《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工山水松竹画，书法宗苏轼。

徐世昌无子，两个女儿早亡。其二弟徐世光的长子徐绪直过继为徐世昌之子。徐世光为光绪壬午举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命其为濮阳河工督办，袁死后徐世光寓天津，皈依道院，办"道德社"，曾为天津世界红万字会会长。徐绪直早亡，生子徐延东、徐延同，皆已故世。唯徐延东留子徐保慈，现在天津市河北区第三职工中学任教，夫人于二十五塑料厂退休，生两女，一于南开毕业，现在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工作；一在外资企业工作。据徐保慈介绍，徐世昌和夫人王雅茹生有两女皆已故世。女婿许大谆现在河南任省政协委员。徐世昌近支显然衰落了。

另一支在天津久居的是徐世昌十弟徐世璋的后人。徐世璋曾任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交通银行副总裁，又曾兼任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饥饿救济会会长，币制局局长。1922 年随徐世昌下台而去职，在天津做寓公，后曾任铁路学院名誉校董，天津跃华中学董事，工商学院董事长，东亚毛织公司董事。拥有大量房产，收藏文物字画，尤以集玉著称，是天津市知名人士。1954 年逝世，遗嘱将全部古玉、砚、玺印等捐给国家。其后人有女儿徐绪年（天津人民医院退休）；徐绪如（一中心医院退休）；徐绪玲现在天津人民图书馆工作，其丈夫朱文榘现任天津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徐绪璐现居北京，其丈夫是我国驻泰国大使。

接受采访的徐延丰已年过花甲，退休在家，原在天津驻阳道中学工作，夫人在天津财经学院任教，生 2 子，一在解放汽车贸易公司工作，一在房管局职大教书。徐延丰追述往事："'文革'期间，我们这些家族难免不受冲击。有人说徐世光任濮阳河工督办赚了大批的钱，其实祖母在世时说，当年祖父赚钱不多，曾说也就是留给兄弟们喝粥吧。"面对生活几经变迁，他感慨地说："安安稳稳、老老实实当个老百姓最好，我家这一支和太祖父徐世昌最近，那一代是亲兄弟关系，后代多在教育界，这也许与太祖父曾自称'文治总统'有些渊源吧！"

曹锟家族

曹锟（1862—1938），天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北洋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吴佩孚同为直系军阀首领。1923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奉系后，曹锟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1924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被囚禁，

后直奉两系联合方获释。1938年在天津病死。

五大总统发迹后一个比一个富，曹锟更是富中之富。可是在三四十年代，这个家族就开始没落。曹锟的第二代唯一健在者，曹的侄儿曹士藩说："唉，巨万积资大都毁于挥霍。"

曹锟系天津人，祖上是平民百姓，他兄弟五人，排行老三，青年时曾当过售布小贩，20岁时投新建陆军当兵，后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深造，1914年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直皖战争后继冯国璋而直系首领，1923年通过贿选当上总统。曹发迹后家族成员多弃商而仕。其中曹锟四弟曹锐由天津清乡局长官至直隶省长。其七弟也官至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和讨奉第四军总司令。北伐战争以后，曹锟隐居天津，但由于曹氏历居显要，其家族积资巨万，在天津曾投资各项企业，诸如，北方航业公司、恒源纱厂、同福饼干公司、大华火油公司和数家米面庄及当铺，在大沽、军粮城置有大片田地，市内建有曹家花园，并在旧英、意租界置有多处房产。

曹士藩是曹锟长兄曹镇之子，在曹氏家族士字辈中排行十四，现已年逾七旬。他在40年代就离家独自谋生，所以现在是国家干部，已退休，但由于家庭生活拮据，只好外出补差，在天津古文化街聚宝斋担任业务经理。谈起三叔曹锟，曹士藩说："曹锟有2子1女，现已不在人世。但曹锟的孙子和孙女都健在，现在香港和台湾经商，目前在大陆还有一些投资。现在曹氏家族成员少说也有二三百人，但彼此来往很少。三四十年代家族成员中我是纨绔子弟，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所以没有多少财产留下。只知享受，不知奋斗，当然早晚要败家的。"

说起曹士藩的家庭，他大有一言难尽之状。他说，1950年他考入东北盐务总局文工团，1951年来到河西区文化馆工作，求学心切的曹士藩于1956年考入河南师范学院，但仅上了一年

学就被生活所迫辍学回来，而1957年干部下放他又去了天津南郊区，60年代回文化馆工作了几年，“文革”后期又被下放到造纸四厂当工人。一子一女现已成家单过，他和老伴与孙女一起生活，但由于老伴没有工作，他的退休金不敷生活开销，所以不得不出来“打工”。

说起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时，曹士藩说：“小时候当然享了不少福，但成年后我便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得靠自己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分给我的房产我不要，房产股息我不领，我那时觉得作为一名国家干部不应有什么私有财产，要和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尽管现在的生活不富有，但精神生活很是充实，家庭生活也很和美，我想这比什么都重要。”

（柴德森　鲍国之）

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在中国独领风骚。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连任五届总书记,后来被开除出党,接着成了中国"托派"首领,再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坐了4年多监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提前释放,辗转入川,贫病乡居,1942年5月27日病逝。

陈独秀发妻高大众生3男3女。随后又与高大众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结合,生1男1女。陈独秀还有14个孙儿孙女,7个外孙外孙女。

陈独秀的一生及其逝世后的岁月,中国大地苦历沧桑,对他个人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因时而异,褒贬不一,他的一些儿孙不能不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那么,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两烈士英名长存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都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15年,陈独秀创办在中国开一代风气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兄弟俩来上海读书。当时延年17岁,乔年13岁,他们克承庭训,天资又高,读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因学业很有根底,到上海后即入震旦大学,并在法国巡捕房间学法文。他们兄弟在上海受的是新式教育,其中就有陈独秀所主张

的“兽性主义”。陈独秀对“兽性主义”的解释是：意志顽强，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直，不饰伪自文。他提倡“兽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状况。陈独秀不仅说说，而是在自己子女身上付诸实现。

陈延年兄弟，一面打工，一面读书，每月每人到亚东图书馆领取父亲规定的5元钱生活补贴，晚上就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一件夹衣一年四季不离身，常常啃冷烧饼喝自来水以解饥渴。



陈　延　年

1919年深秋的一天夜里，北风大作，天气奇寒。当时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也学法文，法文班散课他走出来，只见昏昏的路灯下有一团寒气向他袭来，走近一看是陈延年。潘赞化摸他的肩，原来还穿着夹衣。

“延年，你不冷吗？”

陈延年拱手站立路旁说：“还可以。”

“走，到我家去，给你找一件棉衣。”“不需要。多谢潘老叔！”

“听说你父亲因为五四学潮在北京被捕，你知道吗？”“听说了。”

“你怎么想的，不害怕吗？”

“既做不怕，怕则不做。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

意义，危险乃意中之事。何怕之有？”

“如果同人援救无效，你如何想？”

“中国失去一有学识之人，当然可惜！”

他们议论的是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高潮中，亲自散发他们起草的反对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一事。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影响极大，震动全国。他这次被捕，经全国各方营救，监禁三个月后被保释。陈延年如此冷静谈论自己父亲被捕，不能不令人惊异。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吃住，感情上最过意不去的还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高君曼是延年、乔年的姨母，也是继母，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他们兄弟住在家里，与她自己生的两个孩子陈子美、陈鹤年一样。当时李达、王会悟住在陈家，张国焘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也住在陈家，何以非把自己的亲骨肉摒之门外呢？高君曼苦说多次也说服不了陈独秀，就找到潘赞化说：“望你以老朋友的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我在名义上和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会好于我自己所生。”

她说着说着悲泣不止。潘赞化与陈独秀强争数次，陈独秀还是不同意，并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1919年底，陈延年、陈乔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春，他们兄弟与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等12人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1924年和1925年先后被派回国内工作。

他们兄弟堪称是我党早期革命家中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们在法国一面做工一面读书。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老先生看到中国名流的儿子如此吃苦耐劳，不由大发感慨说：“陈独秀的两个

儿子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沾酱油吃!"陈氏兄弟确实是勤工俭学学生中的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他们到莫斯科后,吃饭、穿衣、住房、理发、洗澡、洗衣都是学校供给,每月还发给少许零用钱,虽然开始时吃的是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勉强吃下去,三四天大便不通,陈延年却对人说:"我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陈延年所谓"一生",当然是指他们兄弟离开安庆老家之后。陈延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南方区委书记。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是革命的中心,许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政军中任职,领着不薄的薪金,一些人身着军装,吃得起大菜。陈延年还是穿一身半旧的粗哔叽学生服,脚上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钉底翻毛皮鞋,卧室里只有一张木床,一领席子,一条粗毛毯,一床被子,黄色皮包当枕头,床下还有只小皮箱。他在广东工作三年,一直穿这套衣服,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领、袖破烂,油迹斑斑,同志们劝他做一套新衣服换一下,他只点头微笑。由于饮食无定,有什么吃什么,他从不挑剔。他当时二十六七岁,有的女同志很羡慕他,有人对他提婚姻问题,他总是推说工作忙。

他们兄弟间的感情绝非一般兄弟可比。小时延年内向、沉静,性格倔强,与人落落寡合。乔年却活泼好动,他常常教同自己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唱戏,唱伍子胥过关时,先戴黑胡子后换上白胡子。唱完后他告诉小朋友,伍子胥过不去关,一夜之间愁白了胡子。到上海后,每月到亚东图书馆领取那5元钱。延年总是等在外面,乔年进屋到柜台去拿。乔年善于说故事,延年却很腼腆,只同很熟的人才说笑。

陈氏兄弟最初相信无政府主义,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很研究,对当时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均深恶痛绝。兄弟俩与其父也存芥蒂。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名重一时,可陈延

年却对人说："吾父亦不过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不能为万民立命，与文盲何异？"言辞虽偏激，但也说明他们少时已能独立思考。兄弟俩对陈独秀在中国筹组中国共产党并不赞许，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和斗争也令他们反感。1920年秋，陈公培等人到法国，华法教育会派延年到码头来迎接，陈公培向延年出示陈独秀的介绍信时，他却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他们兄弟终于跳出了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泥淖，走到马克思主义队伍来，与父亲的隔阂也就消除了。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氏兄弟同时加入，延年还担任"少共"宣传部长，负责编辑出版《少年》月刊，还负责刻蜡板。他写的字规范秀美，使这个油印刊物竟能与铅印的媲美。延年回国后任中共南方区委书记，后到上海接替罗亦农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央将江浙区委改成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委后，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乔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八七会议"后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他们兄弟二人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延年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延年任南方区委书记期间，使广东的党组织从几十人发展为几千名党员，并领导着近百万工农群众。1925年6月19日，在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延年亲自参加并指挥了6月23日在广州举行的10万群众的大示威。英帝国主义侦知我党在南方的领导人是陈延年，因延年脸有细微的疙瘩，就以麻子称之，并写成传奇小说对他大加诋毁。1927年6月，延年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逮捕，吴稚晖去电祝贺称："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可见反动派对延年畏之如虎，恨之入骨。乔年在中共北方区委工作时，亲自参加了1926年党所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就在奋争的人群之中，胸膛上挨了军警一枪柄，被人扶走了。他们兄弟人生短暂，但都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延年于1927年7月4日，乔年于1928年6月6日，都被蒋介石杀害了。



陈乔年

两位先烈的弟弟陈松年家中有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1月份颁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道：“查陈延年、陈乔年两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不朽，家属当受社会之尊崇。”落款系手写的“主席毛泽东”，并钤有：“中央人民政府”大印。延年壮烈捐躯时29岁，还是个童男子。乔年壮烈捐躯时仅28岁，有子一岁，夭折。

陈松年历尽沧桑

陈松年是陈独秀第三子，与陈延年、陈乔年为同母所生。他的前半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老子革命，儿子遭殃。

陈松年生于1910年，小于两个哥哥十来岁，长于同父异母的弟弟陈鹤年三岁，当他呱呱落地时，陈独秀已与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此后陈独秀再没有回过安庆，松年出世后很少见到自已的

父亲，直到多年以后陈独秀被关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他去探视，父子才得以相见。陈松年没有像哥哥弟弟那样外出到北京、上海等地读过书，仅在安徽大学肄业，但因家学渊源之故，他的文化修养也很高。松年3岁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任倪嗣冲为安徽都督，他曾大肆通缉搜捕陈独秀等人。当时陈独秀嗣父陈昔凡刚去世，还停棺家中，安庆统领马连甲就带兵查抄了陈家，把陈昔凡珍藏的字画抢去大半，声言要斩草除根，非抓住陈独秀的儿子不可。延年、乔年从房上跳下逃走。松年太小，跌落在邻家澡盆里。陈家待人厚道，乐善好施，邻里关系非常融洽。邻家的夫人就势给松年洗澡，如同给自己儿子洗澡一样，才算掩护过去。陈独秀长兄陈孟吉之子陈永年与陈延年年龄相仿，被误抓，坐了4年牢，还陪斩过，吓得精神失常。松年17岁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安庆的国民党党徒、地痞、流氓拥进陈独秀的家，要霸占这所宅第，后经陈独秀嗣母谢氏电请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出面说情才了事。可是，大哥、二哥死难的噩耗又相继向他袭来。松年28岁那样，日本侵略者即将攻占安庆，不得已由谢氏做主卖掉了"大洋房子"。松年又托乡下亲戚弄了9只小船把家中的财物运往乡下祠堂里，并封上了祠堂大门。日本人来后，还是撬开祠堂大门，两次洗劫，好东西都被抢光。抗日战争胜利后松年携妻儿回来时，仅用一只船装回几件家具。陈独秀用过的两只罗汉椅和一个立柜被一位本家留下，1978年，松年又动员这位本家将其交给安庆市博物馆。

松年经历了一个大家庭从鼎盛到衰微，从衰微到贫穷的过程，这其中几多苦难，几多惊吓，几多愤懑和辛酸，他感受得最深。

松年的祖母最担心死时不能同儿子抱头送终，为了克尽孝道，也为了避开日本人铁蹄的践踏，经陈独秀先后来信催促，松

年乃携祖母、妻子和刚 1 岁的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从武汉乘船到重庆，辗转投奔陈独秀。可此时的陈独秀已穷困潦倒，事事靠朋友。松年却不得不接受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继母潘兰珍。

陈独秀刚从重庆搬到江津县时，曾被他的至交邓仲纯的夫人闭门谢客，后来陈独秀一家还是住进了邓仲纯开的延年医院后宅，但也常有口舌之争。纷争之起，当然因素很多。如邓仲纯一家，他弟弟一家，还有陈独秀一家，三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主要是邓氏兄弟负担；再如大热的天，男人多赤背穿裤头，三家人在一起，也多有不便；但很大的因素还是邓仲纯夫人最看不惯陈独秀与潘兰珍这样的老夫少妻。后来陈松年到江津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工作，举家迁往江北，陈独秀与潘兰珍也迁到鹤山坪石墙院（即江津的五举乡石墙村）居住。陈独秀一生颇少“儿女情长”，此时却不同，他常把松年夫妇及两个孙女和一个侄孙找来团聚，这给他寂寞的晚年平添了不少欢乐。可儿孙们一来，潘兰珍就不高兴，有时当着众人面前，就同陈独秀吵嘴。陈独秀为不使大家不愉快，就辗转嘱咐松年夫妇尽量少去。陈独秀的嗣母终于得由陈独秀抱头送终。松年非常尊重父亲，也尊重潘兰珍，他称潘兰珍为母，他的儿辈则称为二奶奶。松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对陈独秀身后诸事，如各方致送的奠仪、手稿、书籍等，都尽量托付何之瑜操办处理。在清理陈独秀的遗物时，松年想留下父亲的两枚印章作纪念，也被潘兰珍所拒绝。在这种种人际关系中，松年是苦水自吞，最能委曲求全的。

松年遵父亲的遗嘱，于 1947 年在陈独秀友人帮助下，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安葬，怕国民党人士见到“陈独秀”三字捣乱，在陈独秀的棺木上标写的是其科举时的官名“陈乾生”。

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陈家也到了清寒之境。松年当

过会计，教过书，后任窑厂技师。他们夫妇已有1男3女，一家6口，生活拮据，不得已把北京的房子也卖掉了。鉴于家境，他的长女陈长玮、次女陈长玙都曾提出不考大学。松年却支持自己的女儿上大学。松年夫人窦珩光，也坚持要保住陈家世代书香。她说："我就是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要供你们上学。"她说到做到，曾同小女儿去抬土、修路、糊火柴盒、绞手套等来贴补家用。她太辛劳了，患有多种疾病，过早去世。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庆时，曾对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陈独秀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有过功劳，如有后人应予照顾。此后政府每月给陈松年补助30元，帮助他们一家克服了临时困难。陈松年退休后，被选为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又被选为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松年的长女陈长玮大学毕业后在一钢铁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担任工程师，因工作努力，积劳成疾，1984年病故。次女陈长玙大学毕业后在一军工厂从事技术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儿子陈长琦大学毕业后，在一工科大学任教，现在是讲师。小女儿陈长璞因文化大革命没能上正规大学，但文辞秀丽，文字端庄古朴，现在安徽省某图书馆工作。

松年生于清末长于民初，经历了军阀混战，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也曾在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下举家逃难，兄弟捐躯，父亲祖母病丧，他的夫人也先他而去，更深深地感受了"陈独秀"三字给一家生活罩上的阴影和带来的欣慰。他历尽沧桑，深知人生的艰辛，当然也就能够豁达乐观。他爱哼京剧，常到市工人文化宫自敲板鼓的演出。他去世前不久，在医院里动手术时，还在病房里唱京剧。他终于活到80岁高龄。

虽属偶然，但也有趣：陈独秀的发妻高大众是霍丘县名门之女；陈松年的夫人窦珩光也是霍丘名门之女；陈松年的儿子陈长

琦娶妻还是霍丘之女。

陈鹤年独居香港

陈鹤年是陈独秀4个儿子中最小的,也是唯一健在的一位。

1991年8月,陈鹤年在大陆的长女,在北京某高等学校任教的陈祯祥,去香港探望父亲。

祯祥说:"爸,我今天陪您去看电影吧!"

陈鹤年老先生非常惊奇地说:"看电影?我三十来年不看电影了,为什么今天要去看电影呢?"

"这是一部大陆拍的片子,写的是我爷爷。"

"大陆过去都说你爷爷的坏话,拍的电影也是糟踏他,有什么可看的?"

"这部电影不同,是新拍的,您还是去看看吧!"

鹤年经不住女儿的劝说,终于在祯祥的陪伴下,走进了在香港很出名的星光电影院。大概全世界的电影业都处于萧条阶段,这天算上鹤年父女全场只有7位观众,上映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描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片《开天辟地》。这是一部上下集的长片,放映时间近3个小时。可从影片开演,80高龄的鹤年老先生没有靠过一下椅背,聚精会神到极点,直到把影片全看完,看之后他好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

究竟是什么这样强烈吸引着他呢?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了母亲的艺术形象,或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父亲没有被歪曲的艺术形象?还是影片使他想起了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代走过的火热坎坷的人生道路?最主要的大概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纠正过去宣传中"左"的偏颇的极大勇气吧?

陈鹤年终于说了话:"你爷爷不太像,丑了点,脸没有那么宽,鬓角还要高一些。你奶奶一点都不像,她比那个演员小巧秀

气，也漂亮。她性格好，古诗词好，也很善良。”

鹤年生于1913年，他与比他大一岁的姐姐陈子美对陈独秀的感情也存在着某些芥蒂，这是因为在他们十来岁的时候，陈独秀同他们的生母分居，高君曼带着他们姐弟二人去了南京。

或者是高君曼的主张，或者是他们姐弟自己的主意，或者是友人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更重要的大概也因为生活不充裕，总之，他们姐弟受的教育也是陈独秀所主张的教育方针之一，即“职业主义”。他们姐弟二人很早就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子美学的妇女科，鹤年学的电讯。

鹤年学完电讯后又在扬州上高中，到高中三年时转到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政法系，并加入了地下共产党，是预备党员。他积极参加了由党所领导的有数千学生参加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他就是在学生运动中认识了许桂馨女士，并同她恋爱结婚。许桂馨当时是民先队队员。陈鹤年刚读到大学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同时他与许桂馨爱情的结晶，他们的长女祯祥诞生，所以他们夫妇未能像不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那样奔赴延安，而是去了北京西山游击队。鹤年在西山负责收发电报并培养收发报人员，许桂馨则组织妇女做国用手套。1938年底，鹤年一家去香港，他先后在《光明日报》、《立报》作编辑、记者并兼收发报，以“哲民”之名发表许多文章，后又回国到桂林，也是编报、教书、收发报。抗日战争胜利后，遭到国民党通缉，全家又到香港，他进《星岛日报》工作，并定居香港。

鹤年后来升为译电室主任，工资提高了，又顶一层楼，开始办少年出版社，先出《学生文丛》月刊，是社会科学性的，后改为《青少年》月刊，1978年底改为《科学模型》月刊，内容也改为自然科学，该刊已到100期。这个刊物是个严肃的科普读物，不登广告，也没有一点花里胡哨的东西，在香港当然是赔本生意。

鹤年在香港40多年，对政治不予闻问，但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这从他办的刊物就可以看出来。1949年12月广州解放不久，他就把长女祯祥和次女祯荣送回祖国。1952年，他与夫人许桂馨商量后，决定由许桂馨带着他们的3个女儿和1个儿子回大陆定居，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大陆受教育，在新中国长大成人。他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是30年没有再相聚首，他更没有想到，他在大陆的夫人和子女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

鹤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让他的夫人和子女回大陆，可他自己何以没回大陆呢？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30年代以前，斯大林在苏联清洗和镇压托派，躲在墨西哥城郊区考约阿康的托洛茨基本人也未能幸免，中国也于1952年末把大陆的中国"托派"全部逮捕。陈独秀虽然在1937年出狱后，曾申明他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对"托派"反对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非常不满，但他毕竟曾是中国"托派"的首领。所以，在建国之初，陈独秀还是政治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为了避开这个问题，可能是鹤年当初没回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鹤年也是可以回来的，可他至今未归来，那原因可能更复杂些。

鹤年除了在大陆的4个子女外，在香港还有6个子女。

陈鹤年在大陆的子女噩梦醒来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在北京读初中的陈祯祥刚3岁，她既未征得父母同意，也没有听从师友的劝阻，毅然报名参军，要去朝鲜前线，当然不能被批准。过了不到一个月，11月23日，她被接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此后她每年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五一"、"十一"庆祝游行，特别是1957年五一节的庆祝游行，更令她不能忘记。她

身着盛装，手捧鲜花，作为游行队伍的仪仗队员，站在天安门东侧的华表下，热烈欢呼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细心聆听彭真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整风决定。

五一节过后不久，祯祥读书的北京某大学学院党委召开动员大会，发动全院师生给党提意见。天真幼稚的祯祥同别人一样，在会上提了些学院图书资料少，新教师多，教学质量不高等意见。她万没有想到，很快就贴满了围剿她的大字报。

"陈祯祥给教学质量提意见，就是否定党的教育事业！"

"否定党的教育事业，就是在教育战线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

"陈祯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陈祯祥向党进攻是有阶级根源的！"

学院成立了陈祯祥专案组，班上党支部帮助她提高认识，大会促、小会帮。

"陈祯祥，你首先应该端正态度！"

"你与别人不一样，你祖父是陈独秀，如果党不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你父亲至少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可你现在只好上这个学院。因此，你必然对党不满，对党怨恨！"

"陈祯祥，你必须承认事实，你是陈独秀的孙女，你父亲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祯祥惊呆了。她是陈独孙的孙女，父亲是在香港，这都是事实。但她连陈独秀是个什么模祥也不知道。难道陈独秀有问题，后代就一定会反党？老子在香港，子女就不是好人？

这个"天生的右派"，最后当然被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以观后效。

许桂馨在北京某职工医院任药剂师，已感到陈独秀问题对

她有些压力，但万没想到陈独秀还牵连到他的孙辈子女。她为了使大陆的另外3个子女不再遭到祯祥那样的厄运，毅然提出要和陈独秀的儿子陈鹤年离婚，与陈家断绝亲情。后经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和香港代办处联系，于1958年批准协议离婚，规定陈鹤年每月给其子女60元生活费。

许桂馨虽然与陈鹤年脱离了夫妻关系，可她的子女仍然因陈独秀问题入不了团。她的三女儿陈祯庆1964年在北京某师范学校毕业后，因为她批判陈独秀的材料写得少，迟迟不给分配工作，让她到植物园去劳动锻炼。为了表示彻底同陈独秀划清界限，全家又决定，由二女儿祯荣写信通知在香港的陈鹤年，每月60元的生活费也不要了。他们全家长长吐了一口气，以为彻底划清了界限，可以安生了。他们太天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照样受诛连，全家无一人能幸免。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祯祥所在中学的造反派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陈祯祥是陈独秀的孙女，要她交出陈独秀的照片。

陈祯祥从来没有陈独秀的照片，也从没见过爷爷的照片，她第一次看见陈独秀的照片，还是13年后，在北京党史展览馆的大厅里，她同众多人一样伫立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肖像前，只是她比别人更动感情，两眼湿润，激动万分，直到展览馆关门她才离去。

因为祯祥工作努力，教学质量好，曾受过校长的表扬，造反派就把她、她爱人和校长打成反党"三家村"，还在报纸上发表攻击污蔑她的文章。她至爱的丈夫竟被迫害致死。

她大妹祯荣被扣上为陈独秀翻案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定为"五一六"分子，关进学习班，拷打审问半年多。她小妹祯庆，因为买毛主席像章时说6角钱一个太贵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在学校批斗，在全区游斗。当时她是第一次怀孕临产，她和丈夫及孩子的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至今留有严重的后遗症。祯祥的小弟祯祺，文化大革命开始刚 8 岁，他积极参加红卫兵，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孙子，被剥夺了参加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但他并不灰心泄气，写了血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结果被分配到内蒙古。他谨言慎行，吃苦耐劳，可还是不准他参加贫下中农会议。他难过得哭了，但仍然发奋努力，白天劳动，晚上加班，第一年就干了 460 个劳动日。但他怎样拼命劳动，刻苦努力也不行。他快满 25 周岁时，怕超过年龄，又最后一次写了入团申请书，仍未被理睬。1974 年北京派人去内蒙古知识青年插队的县社招工、招考教师，尽管县社一致推荐陈祯祺，但招考的人却说，他这号人不适合当教师，也不适应回北京。到 1976 年时，与他同去插队的 300 多知识青年中，只有他一个人还是靠挣工分吃饭。他前后三次参加高考，都因为是陈独秀的孙子而不予录取。

陈鹤年在大陆的子女终于噩梦醒来。1979 年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怀下，北京市委组织部派人调查，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终于在 1979 年 7 月给陈祯祺一家落实了政策。现在，陈氏三姊妹都在北京工作，其中有两位是副教授。她们的弟弟陈祯祥已全家去香港，正在他父亲主办的《科学模型》月刊上连载他自己关于电子计算机的科普著作。

陈子美天涯何处？

陈独秀有 4 个女儿，除两个早殇外，长女陈玉莹只活到 28 岁，病逝上海。陈独秀的次女陈子美，乳名“蟢子”（一种蜘蛛名），“喜子”，有时也写成“洗子”，她如果健在，今年刚好是 80 周岁。

原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已 90 多岁高龄的郑超麟先生，知道陈子美，但从未见过她。郑老先生与子美的父亲陈独秀交谊很深，也见过陈独秀发妻高大众。但同鹤年只见过一面，同松年青年时和老年时都见过面，他同延年、乔年都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同时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一起去苏联，又差不多同时回国工作，可谓情同手足。但郑老先生对子美的人生经历却不详知。这大概因为子美的一生有些神秘，有些奇特，也有着太多的酸甜苦辣，才鲜为人知。郑老先生审阅此文初稿后，来信说："我从你的文章第一次知道陈子美有子女留在国内已经长大成人，这样看来，陈子美已经不在人世，否则她会设法与子女联系的呢！"可子美的一部分子女从 1960 年就与母亲失去联系。30 多年过去，仍然没有接上这种联系，他们不知道自已的母亲天涯何处，也不知道她是死还是生。子美的长子张肇山 1933 年出生，1951 年在上海念高中二年时参加军事干校，后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学习，他后来被人陷害，进了监狱，1960 年病死于狱中。20 多年后这起冤案才得以平反，组织上给了 120 元抚恤金，张肇山没有结婚，这笔钱应交给父母，可父亲已经故去，母亲又在何方？

子美生于 1912 年，在她十二三岁时，她的父母陈独秀与高君曼协议分居。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紧张阶段，陈独秀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子美很少能见到父亲。子美同她的第一个丈夫张国祥相识、定亲、结婚时，高君曼已经病逝，她的婚事由外婆（高君曼生母娅亓氏夫人）做主定下来的。1932 年 10 月 15 日夜，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押往南京。子美曾带着她的"白马王子"张国祥到狱中去探望陈独秀。张国祥生于 1902 年，比子美大 10 岁，出身于菜农家庭，后来念书，此时正在银行和旅行社供职，家境不错。不知为什么，陈独秀对女儿的这

桩婚事并不十分赞许，为此父女俩还在狱中争吵起来。子美的性格很像父亲，刚烈、倔强。此后，子美的行踪就很少有人知道，都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已死。后来笔者从可靠的渠道得知，子美并没有死，被人用汽车轮胎偷渡到香港，又从香港去了加拿大。后来又得知她的医道很高明，在加拿大开的妇产科医院很受欢迎。又20多年过去，她如果健在亦是一老妪，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张国祥认识子美前已经结婚，但他对子美隐瞒了。1936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即二女儿张树德诞生后，家庭经济拮据，子美始知丈夫已有妻室子女了。子美对此不能容忍，于是张国祥与原配蔡氏离婚，但蔡氏离婚不离家。从此，他们的家庭生活笼罩上一层阴影。抗日战争爆发后，子美与张国祥已有2子3女，他们举家逃难到重庆。子美在重庆进一步学习深造妇产科。1939年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时，他们全家差点遭难。他们一家匆忙逃离重庆时，未来得及从友人家领回刚两岁的三女儿张树范，从此失散。子美一家终于取道香港回到上海，不久子美与张国祥分居，她带着4个子女租房另过，这期间她的长女张树仪摔坏了右腿，子美更加怨恨张国祥。后来子美带着子女迁往南京下关居住。抗日战争胜利后，子美终于和张国祥正式离婚，由于张国祥不愿意给抚养费，子美又养不起4个儿女，无可奈何，只得孤身离去。

子美也好，张国祥也好，都不对子女谈他们的外祖父，他们的子女也不知道外祖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

子美后来认识了李照焕先生，并同他结婚，他们有了两个儿子李宝堃、李莹堃后，子美就做了绝育手术。

50年代初，子美和张国祥生的长子、长女张肇山、张树仪参军离开上海，在上海只有他们二女儿张树德。母子情是人间至

情,子美找到了张树德,张树德也曾偷着去看母亲,被父亲知道还挨了顿揍。1953年张树德初中毕业时要填履历表,父亲才告诉她外祖父是陈独秀。张树德念高中的三年是寄宿,这三年中她常偷着去看母亲,还帮助母亲做些家务活和照看宝宝和毛毛(李宝堃、李莹堃乳名)。这期间张树德为了证实外祖父是否是陈独秀,曾问过母亲,结果受到了斥责。1956年张树德高中毕业,考上了山东大学,即将离开上海。这时陈子美才给他看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外祖父陈独秀,另一张是她四舅夫妇(陈鹤年和许桂馨)及3个女儿的合影。陈子美指着照片上的陈祯祥对她说:"她和你年仿。"不久子美和李照焕全家迁居广州。1957年暑假,张树德曾到广州母亲处小住。可二三年后,她同母亲彻底失去了联系。

笔者只知道李照焕先生现居广州,对他本人或对他与陈子美生的两个儿子的近况都不确知。只听说子美在文化大革命时惨遭迫害,被游斗游街,丈夫照焕也被抓关牢,不然子美也不会冒险出走海外。

子美与张国祥的5个子女中,长子屈死狱中。三女儿在重庆失散,后来知道音讯时已病殁。其他3个:长女张树仪、次女张树德、次子张肇山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被人尊重的职业,其中两位是教授学者,也有着美满家庭和自己的子女。

子美的丈夫、子女、弟弟及侄儿侄女,都可以去寻访她的下落,但这是很困难的,如果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出面寻访,就方便些。子美是值得去寻访的,因为她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唯一存活下来的女儿。

陈独秀和子女间的感情世界

电影《开天辟地》中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陈独秀悄悄去看

自己的两个儿子，他看见陈延年、陈乔年小小年纪在拉大锯，很受感动，热泪盈眶，他把卖茶蛋的老太太的茶蛋全买了下来，叫老太太给儿子送过去，自己转身走开。编导者的心意是好的，但这并非事实。

尽管和子女们有某些隔膜，陈独秀是很爱自己的子女的，但不娇惯，更不溺爱。陈独秀在北大时，陈延年从上海来找他，照一般人看来，儿子见老子，跑到身边去就是了。陈延年却不同，先递上一张片子，写上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当时北大有人开玩笑说，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了。

陈独秀是不想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八旗子弟，是希望任何环境下都能自谋生路，自创生活。陈松年是以会计为职业养家的，陈鹤年是靠收发电报的技术起家的，陈子美是靠妇产科自创生活的。

延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大革命时期，以延年为代表的我党在广东的领导人赞成北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上海中央对北伐不积极，陈独秀还写过一反对北伐的文章。广东方面除陈延年而外，没有一个敢于直接反对陈独秀的主张，多是唯唯喏喏，只是陈延年敢于直接反对，敢于说对总书记不满的话。1925年春，廖仲恺被刺后，延年来上海，但他找不到中央。俄国领事馆已通知中央，延年到上海几天了，于是大家恐慌起来，害怕国民党右派在船上或岸上谋害他。后来《国民日报》上登了一个小广告，是林木找马道甫的。林木是延年在法国时起的化名，马道甫是郑超麟在《响导》上写读者来信用的假名。张伯简先看到这个广告，就去旅馆找到陈延年，把他送到郑超麟家。郑超麟就带着他去闸北中央秘书处见陈独秀。父子二人就在天井中坐下谈起来，似乎同陈独秀接见其他干部没有什么不同。郑超麟当时的感受是，父子二人见面的那种感情是很难形

容的，他就避开了。如果说陈独秀对自己的子女也有偏爱的话，他最钟爱的就是延年和乔年，在他们兄弟身上寄托着他自己莫大期望。他常说，蒋介石杀害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陈氏兄弟壮烈捐躯，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和感情，没见诸任何文字记载，也没听谁谈起过。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杨扣在西安时，陈独秀在狱中非常兴奋，叫人买来酒和菜，先祭奠大革命以来死难的烈士，然后他说："延年啊，乔年啊！为父的为你们俩酹此一杯！"他说完将酒洒在地上，老泪纵横，痛哭失声。从没有人见他如此痛哭过。陈独秀的子女也很爱他们的父亲。延年有一次从广东到上海来向中央汇报工作，可陈独秀却同中央失去联系好多天，大家以为陈独秀一定被秘密逮捕暗杀了。延年找到陈独秀老友汪孟邹，汪孟邹也不知其下落，延年当时就哭了。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鹤年去探望并告诉父亲，准备组织人劫狱救他出去，被陈独秀斥为胡闹。松年对父亲更是极为孝顺。

（靳树鹏）

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的分分合合

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自1927年武汉分手后，一个是为寻求新的革命道路而继续奋斗，一个则是为蒋介石也为宋家而“奔波劳碌”。虽然在孙中山安葬典礼之日，姐弟俩再次重逢，之后又在宋母去世的日子里，姐弟俩共同守灵发丧，但是，政治上的分歧却无法弥合。一个是要“宋家为中国而存在”；一个是要“中国为宋家而存在”。这个裂痕太大、太深。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民族大敌冰释了姐弟的积怨，他们又携手合作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遭到国人反对，连为蒋介石效劳的宋子文也反对。此时，宋庆龄正在进行着营救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的工作。宋子文对二姐所为非但不埋怨，反而表示理解和同情。他认为，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作法太过分了。对于在抗战问题上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和，宋庆龄也深为知晓，她对弟弟没有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感到些许欣慰。

当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时，宋庆龄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行为深表钦佩，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阵地慰劳十九路军广大将士，鼓励他们奋勇杀敌。宋子文也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调出自己组建的缉私卫队3万人，参加十九路军的抗战；当蒋介石

要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以示惩罚时，宋子文成为国民党政府诸多官员中反对最烈的一个。

1934年8月，上海发现了《为对日作战宣言》的印刷宣传品，主张国民党对日作战，署名是"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处"。在发起人中，有宋庆龄的签名。8月5日，日文报纸《日日新闻》为此致函宋庆龄询问此事，宋回信说："余不但列名宣言，且对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团诸同志的观点，亦予以完全赞同……吾人并未忘记1932年……日军在沪肆行屠杀之事……"当这一消息传到南京政府时，宋子文猜想这个"自卫委员会"肯定与中共有关，可他却装聋作哑，默不做声。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这段时间里，宋氏姐弟虽然没有过多地接触，然而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却心照不宣。宋子文深信二姐的人品，她绝不会在恶势力面前低头。而宋庆龄则了解她的弟弟所崇拜的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文明与民主，不喜欢日本封建法西斯主义。所以，宋氏姐弟相信在反对日本侵略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可以重新站在一起的。

对于宋庆龄与中共的往来，宋子文心里明镜一般。所以，当蒋介石在"剿共"不得手才迫于国人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时，正是宋子文向蒋介石提议，"派出几路人马"去"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宋子文还主动承担了请宋庆龄帮助与中共联系的任务。这时，姐弟二人频繁接触，宋子文有求于二姐，宋庆龄则为宋子文终于走出这一步，主动来找她而高兴。她仍然像当初那样和蔼可亲地对待宋子文，想方设法帮助他完成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

随之而来的是"西安事变"。姐弟俩都主张和平解决，不容许亲日派插足其间。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宋庆龄把对蒋介石的种种怨恨置于次要地位，准备亲赴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尽一点力量，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她得知宋子文在南京政府内力排亲日派的阻拦，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件”时，宋庆龄再次为他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正确解决办法而感到满意。



宋庆龄与弟弟宋子文

“西安事迹”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问题上尽管还三心二意，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他不得不履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所承担的诺言。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抗战的态度逐步坚决起来，全国终于有了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全民族的抗战气氛。宋庆龄以她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积极进行抗战的宣传、组织和救济等一系列工作。宋子文为了牢牢拉住蒋介石一心一意抗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1937 年 12 月上海沦陷后，宋庆龄转移到香港。在这里，她同宋子文接触更加频繁，姐弟俩似乎忘记了一切歧见，沉浸于抗日工作的忙碌之中。

国内的团结抗战局面基本实现，但是国际上的反战气氛还不尽人意。“九·一八”事变后，从“国联调查团”调查报告公布之日起，宋子文就对英、美等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上所持的态度极为不满。“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这些国家对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行为只进行了不疼不痒的指责，或者干脆装聋作哑。德国和意大利就是如此。而英、美等国采取了“中立”立场；法国则表示“无能为力”。更有甚者，这些国家不仅

仍然同日本进行贸易来往，而且供应其战时军用物资。宋子文面对他一贯仰慕的英、美国家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如此态度和作法，十分气愤。可想而知，这样的国际环境如何能拉住蒋介石抗日呢？

1938年2月，世界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举行，宋庆龄与宋子文都曾准备前去参加，因时间紧迫未能成行，只好请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代表出席会议。宋子文当时是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邵力子是副会长。他们联合致电大会："巩固世界和平力量，反对国际侵略与无人道之残暴行为。"宋子文为了表明他对这次大会的支持，还特意写了一篇对大会的致辞，这篇致辞道出了宋子文自"九·一八"后，对英、美、德、意、法等一系列国家的不满，同时也提出了对这些国家的希望。宋子文在致辞中说，大家在电影和报刊上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残暴行为不过是万分之一小部分，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一些国家"助纣为虐"之结果。宋子文还对一些国家向日本出售军用物资提出抗议。最后提醒这些国家，如果继续纵容日本的侵略行为，那么总有一天，战争也会祸及到他们的头上。宋子文的话后来果真言中，英、美、法等国都被拖进了战争的旋涡。

宋子文在国际上为反战而呼吁，宋庆龄在国内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她邀请了国内外著名人士，如贾·尼赫鲁、保罗·罗伯逊、冯玉祥等，并团结在政治上长期分道扬镳的宋子文、孙科等，作为发起人，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宋庆龄任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克拉克任书记、法朗士任司库、艾培(爱泼斯坦)任宣传干事。"保盟"支持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揭露各种降日活动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保盟"通过《保卫中国同盟通

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广泛争取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援助，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整个抗战期间，“保盟”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它援助物资，运送给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根据地人民。它还介绍颇多的国际主义战士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木克华、仇克华等大夫。从1938年6月到1939年6月，国际友人通过“保盟”捐款共约港币25万元，合美元8万元，大多以医疗物资的形式运往内地，还发动了募捐20万条毛毯运动。“保盟”在争取国外援助抗日战争方面，无论是道义上还是物质上的援助，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子文在“保盟”成立初期，就极其重视“保盟”的工作，认为它是向国际上传递中国抗日战争信息的一个重要组织，这与宋积极寻求英、美援助的步调是合拍的。所以，当1939年1月，宋庆龄倡导组织“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合”），由于资金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宋子文时，宋子文欣然替“工合”筹到了初建时的资金。国际友人艾黎和艾德加·斯诺等人，都是“工合”的筹办人。他们提起此事都说宋子文帮了不少忙。

宋子文在香港期间，常出面参加由宋庆龄以“保盟”名义组织的救亡活动。譬如1940年2月，宋庆龄为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前身）在香港皇家剧院举行募捐典礼，宋子文、孙科夫人以及香港总督等社会名流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募捐仪式完毕后，大家一起观看了墨西哥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电影。

香港沦陷以前，宋庆龄工作需要偶尔到重庆去，宋美龄则经常由重庆到香港来。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宋氏兄弟姐妹大团聚的日子，也是政治上分道以后首次出现的彼此之间和睦融洽的日子。1940年4月，宋氏三姐妹一同从香港到重庆考察妇女工

作。当时大姐宋霭龄是“伤兵之友”总会会长，宋庆龄在香港领导组织一般抗日救亡工作，宋美龄也协助蒋介石进行抗日工作，宋氏三姐妹都有引导更多的中国妇女走上抗日救亡道路的愿望。她们一到重庆，宋美龄就兴奋地告诉记者：“我三姐妹此次同来，知否？”4月7日，在蒋介石为宋庆龄、宋霭龄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宋氏三姐妹都很高兴，作了热情的讲话。宋美龄更是兴奋异常。她对与会者说：“今天大家不是来听我演说的，而是来欢迎我两位姐姐，我以妹妹的资格作个介绍人，心里非常愉快，由我脸上你们也可以看出我是多么快活。孙夫人自抗战后做的工作是极重要的，她写文章向国外宣传，使友邦知道我们为什么抵抗敌人。孔夫人也曾在上海抗战时做了不少伤兵工作，她曾捐助四十辆卡车运送伤员，现在她是香港‘伤兵之友’总会会长。这次到重庆来，想必大家盼望她们领导妇女工作的，是吗？”接下来，宋庆龄说道：“孔夫人和我来重庆后，视察过敌人轰炸的灾区以及同胞的哀吟情形，心里十分难过。可是看到复兴建设工作，又十分高兴。我们妇女不要只从事书面文章的工作，要切切实实地去教育一般妇女，民主政治是和妇女非常有关系的，国民代表大会妇女一定要参加，希望我们大家努力实现民主政治和坚持抗战的工作。”宋霭龄在讲话中说：“……来重庆，见些旧友，认识些新知。其实我们的精神和心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要合作，因为合作才能团结，团结才能使工作进行顺利……”

面对此情此景，宋子文感叹不已。他怎么也没想到，自从他的二姐离开宋氏姐妹另辟革命新途后，今日还会回到他们当中来！凝视着三姐妹亲密和谐的笑貌，宋子文双眼湿润了。那么坐在一旁的蒋介石此时是何种滋味？多年来，他一直想控制住宋庆龄，为其政治服务。今天，宋庆龄欣然参加了他的茶会，并

且同他一起照了相。这是蒋介石企望已久的。当初宋庆龄拒绝同他一起拍照的情景，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但是宋庆龄今后会被利用吗？从宋庆龄口口声声讲民主政治的话语中，蒋介石心中预感到：他是无法驾驭宋庆龄的。

在重庆的那些日子里，宋庆龄同她的大姐和小妹一起视察了伤兵医院、难民区、保育院、学校等等，还参加了各界妇女的集会。4月18日，她们姐妹三人一同对美国发表广播演说。她们所作的“中国强大乃是世界之福，民主国朋友勿助纣为虐”的演



右起：宋庆龄、宋美龄在重庆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员

说，使宋子文非常满意。

宋氏兄弟姐妹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携手合作，使他们之间又恢复了一母同胞的情谊，尤其是宋庆龄与宋子文之间。他们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合作是比较和谐顺利的，而且工作颇具成效，从“保盟”成立一年多来的工作成果就可略见一斑。宋庆龄一直是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而忠实的朋友，无论是在十年内乱时期的白色恐怖中，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条件下，宋庆龄力所能及地给了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宋子文在抗战初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精神多次表示钦佩。1937年10月，宋子文与外国访问人员谈话时，提到了八路军的抗战。“宋氏述及第八路军在晋北抵抗武器精备之敌军已叠获胜利。继谓往日共党在华南维持长期之抵抗，足为中国人民有以弱胜强以寡胜多能力之明证。共党仅以江西半省为根据地，能与政府军五十万周旋，此足征全国动员，共赴一的，其能力为何如矣……”宋子文说此番话正值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之后。平型关战斗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全国军民都为之欢欣鼓舞，宋子文自然也不例外。

从宋子文的上述谈话中不难看出，他虽然与中共的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十年内乱时期又处于敌对位置。但是，他对中共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却实为叹服，他说倘若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都有了中共这种意志和精神，就不怕战胜不了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宋子文怕的也正是中共这种为理想和主义而奋斗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因为他是不能与之共存的。这也就是宋子文在抗日战争后期乃至胜利以后，为什么支持和帮助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

宋子文的这种“怕”已经在他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中有所流露，突出表现在他与宋庆龄的分歧上。宋子文担心中共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认为宋庆龄给中共的支持和帮助太大太多。因此，他想限制宋庆龄的言论和行动，企图把“保盟”变成单一的寻求国际支援的机构。至于这个机构如何客观、公正地为国内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军民提供援助，宋子文

则带上了极大的主观随意性，他站在一群一党的私利上来看待“保盟”，以便让“保盟”按照他的意图行事，却反过来指责宋庆龄等人是在为个别党派服务。

宋庆龄主张，既然寻求国际援助，那么就应该把援助之所得公平合理地交到任何进行抗战的党派和军队手里。同时“保盟”应该主持公道，对有利于抗日的言论和行为应该予以支持和拥护，否则应予反对和抵制。不这样做，就会使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破裂和倒退的危险。

应该说，宋子文与宋庆龄的上述分歧，在抗日战争之初并不十分明显。宋庆龄也说：“宋氏与‘保盟’原无基本分歧”。但是，随着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全国民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宋子文也日益担心起来。当然，宋子文的这种担心与蒋介石有所不同。蒋介石在整个抗日一直没有忘记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采用种种方式对中共是能消灭一点就消灭一点，能削弱一部分就削弱一部分，待战后再全部消灭之。宋子文则打算在战后把中共融进国民党政府之内。他曾对美国记者摩勒说：“在我们战胜了日本之后，你也许可以见到共产党成为自由政府中间的急进的一翼呢！”如果中共的力量和影响盖过了国民党，那么战后国民党政府就不好办了，中共将要按照他们的方式改变中国。这是宋子文绝对反对的。所以，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以及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力量，宋子文与宋庆龄的分歧也日益明显。

1940年6月，宋子文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去要“抗战经费”和军火。宋子文以他独特的能力取得美国朝野上下支持中国抗战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美国政府答应向中国贷款。就在这时，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加强了诱降活动。蒋介石颇费心机地让亲日派与日方秘密联络谈判，又让朱家骅、桂永清同德国套近乎，还让孙科、冯玉实对苏联表示友好，再让何应钦、白崇禧出面反共。

周恩来生动形象地说蒋介石是在与各方面讨价还价，好便于居中选择。他既想使日本让步，又想敲英美的竹杠，还想讨好苏联求得援助，在他脚踏几只船的同时，却以反共为轴心。震惊中外，以消灭中共力量为目的的“皖南事变”，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宋庆龄与“保盟”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坚决支持团结进步、反对一切分裂倒退，指责蒋介石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对中共进行突然袭击的卑劣行为，指出今后不允许这种破坏团结抗战的事情发生。宋庆龄和“保盟”的抗议电报以及谴责制造“皖南事变”责任者的文章，陆续发表在《保盟通讯》上。使国内外广大读者从这个影响面极广的刊物上了解到“皖南事变”真相。

那么，宋子文对蒋介石以武力攻击新四军是怎么看的呢？当他在美国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又不甚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为蒋介石辩解道：“新四军缴械，是因为不服从，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蒋介石以“箕豆之煎”对付抗日的友党友军，使9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几乎处于灭顶之灾，这完全是蒋介石有预谋、有步骤地“灭共”行为之一部分。在抑制中共的力量和影响方面，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心是相通的。当然，宋子文并不赞成国共两党之间有摩擦，并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要把共产党置于死地，而是把中共看成是一群爱国、诚挚的人，所以，他才有把中共容纳进国民党政府的打算。

中国共产党再次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同蒋介石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继续领导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宋子文深感欣慰的。从当时美国一般的舆论来看，“皖南事变”可能会引起内战。宋子文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在美国纽约发表演说，坚持认为蒋介石与中共不会发生内战。这点果然言

中，他自然高兴。但是宋子文想抑制中共影响和力量的打算并未取消。1941年5月30日，他从华盛顿打电报给英国驻中国大使、宋庆龄邀请的“保盟”发起人之一克拉克，让其把电报转给“保盟”。电报声明退出“保盟”，并辞去该盟会长职务。电报说：“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侵略蹂躏平民。我认为，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变的工具。既然同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讯上刊登这类文章，我很遗憾我必须脱离它，并请你们发表这个电报的全文。”

宋子文的切身利益及其所处地位，使他不容许“保盟”站在公正立场上替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所受到的冤屈鸣不平。正同美国政府打得火热的宋子文，唯恐沾上“亲共”嫌疑而无法跟美国打交道。作为“保盟”会长的宋子文认为，《保盟通讯》上一系列不点名地指责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文章是给他惹了麻烦。宋子文自以为他是最公正的自由民主派，以力主团结抗战的主要代表者而自居，所以他认为“保盟”替中共讲话是助长了中共的力量。为了洗刷自己，让国内外都知道他宋子文与中共无关，所以他让“保盟”公布他要求退出和辞职的电文。

宋庆龄看到宋子文这一电报后，除了深深的遗憾外，更多的是难过。没想到他们姐弟俩重新携手合作刚刚开始，就又要分手了。但是，她并没有把宋子文与蒋介石同等看待，她了解她的弟弟毕竟同蒋介石不一样，所以她仍然以理晓之、以情感之，在接到宋子文电报的第三天，发表了“关于宋子文退出‘保盟”的声明的声明”。“声明”指出：“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对于宋博士采取了这样一个步骤，只有表示遗憾。由于宋博士一向支持中国的统一民主和抗战，这些也正是同盟的主要宗旨，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保盟""不应变成国内政党的工具"的指责，宋庆龄指出："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真正的政策：一是集中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妥协、投降和屈服。'保盟'全力拥护第一种政策。如果这样做，便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党派的。"她还严正指出："我们支持中国的统一从不动摇。我们对任何危害中国统一的事物坚决反对。"

对于"保盟"把国内外人士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八路军、新四军，宋子文认为"保盟"在救济工作中加进了政治观点。当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代表海外侨胞，把抗战物资送回国内，并提出要赴延安，分给中国共产党一部分时，首先出来阻拦的就是蒋介石，宋子文则是以另一种方式配合蒋介石罢了。针对此种情况，宋庆龄于 6 月 14 日在《救济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一文中，明确指出"保盟"的工作是有政治立场的，"我们的立场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的救济工作是建立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的，"救济工作脱离政治不可能，正是国民党千方百计阻挠'保盟'把救济物资运给最需要救济的抗日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才是出于'政治原因'。"

为了进行伟大的抗战工作，宋庆龄原本不愿把她与宋子文的分歧公开化，但是宋子文坚决要求公布他脱离"保盟"的电报，并在美国讲了一些对团结抗战不利的话，这就使宋庆龄不得不表明自己的观点。上述分歧导致了姐弟二人由抗战初期的携手合作到抗战中期在抗战救亡工作上分手。这期间，宋子文在美国为抗战寻求美援，一呆就是两年半，他与"保盟"没有了任何关系；宋庆龄则在"保盟"默默地、辛劳地做着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保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做出贡献。今天，宋庆龄已离开人世，而她所创建的组织经过不断发展、壮大，又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着力量。

我们不能把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二人在抗日战争中期的分手,同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分手相提并论。因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姐弟俩大目标还是一致的,即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而努力奋斗。所以,宋庆龄对于宋于文努力寻求国际援助还是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中国是个弱国,面对强国的侵略,当然需要外援。每当宋子文取得一项国际援助后,宋庆龄都表示由衷的高兴。但是,她主张这种援助必须是平等的,不附加任何条件。1943年,美国和英国表示愿意放弃在华特权,由宋子文主持与这两个国家分别签订了"新约"。宋子文称"新约""在中国外交史上系属首次"。国民党政府为此大事张扬,举行大小庆祝会,以示中国外交的胜利。宋庆龄虽对"新约"签订表示高兴,但是,她认为:"不平等条约者,乃指一切的不平等现象而言。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要使政治、军事、政治、文化一切皆归平等",现在谈不平等条约废除还为时过早,因为还没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宋庆龄还说,既然欣赏英、美民主精神,那就应该召开国民大会,把民主精神体现于国内。

宋子文完成了在美国的任务回国后,与宋庆龄虽偶尔接触,但他们似乎都感觉到,彼此间的思想鸿沟是无法弥合的了。愈是接近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就愈加明显,那本来就没有消失的分歧不过是被抗日战争掩盖住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旧有的分歧再次突出地显露出来。

1945年8月,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宋庆龄与宋子文迎来了他们共同盼望并为之付出心血的时刻,他们同全中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喜悦之后便是真正分手的时候了。宋子文坚定不移地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他要求宋庆龄留在重庆,继续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当时,蒋介石准备召开由国民党一

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为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制造舆论。宋庆龄断然拒绝了宋子文和孙科劝说她务必要参加这次大会的要求。但是，她得知中共领袖毛泽东即将赴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是"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决定留下来参加欢迎中共代表团的活动。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宋庆龄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联合政府上，盼望结束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实现民主政治。但是实现情况与宋庆龄的期望相反，民主政治的实现遥遥无期，她失望了。

这时，她收到了何香凝给她与宋子文、孙科的信。信中说："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临终嘱言的人，我们不忍看在其国外压迫解除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何香凝信中的字字句句正说到了宋庆龄的心坎上，她毅然离开重庆赴香港。当蒋介石终于不顾国人的反对，于 1946 年 6 月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时，宋庆龄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彻底绝望了，也对宋子文绝望了。她于 1948 年 1 月 1 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示脱离蒋介石的国民党。

自此，宋庆龄与宋子文从再度携手走向了再度彻底分手，宋庆龄已经看到了一个崭新天地的曙光，她将为之而奋斗。宋子文则继续挣扎在为蒋介石政权和他自己的事业而效力的道路上。当然，宋子文也没有跟蒋介石走到底，当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行将完结时，宋子文先于蒋介石离开了大陆，去美国当了寓公。

（连若雪）

宋霭龄给孙中山当秘书的日子

宋霭龄在美国度过了6年的留学生涯，1910年初回到上海。她参加了同盟会，担任父亲查理——同盟会司库的秘书，协助父亲同海外的孙中山联系。在她幼年的时候，孙中山就是她家的常客。经过这两年的工作，她对孙中山的主义和为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11年12月25日，沪军都督陈其美为迎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作了精心安排，他专派了一艘“建威”号军舰到吴淞口迎接，宋霭龄和父亲查理一早就来到码头，翘首以待。

当孙中山一眼瞧见留一溜黑密胡子的查理时，他早已忘记了要有领袖风度的劝告，呼叫了一声“查理”就奔过去，两人热烈地拥抱到了一起。

孙中山向随行的人扼要介绍道：“查理，我的老朋友，同盟会的理财人。”宋霭龄一直羞怯地站在一旁，她低声地叫了一声“孙叔叔……”孙中山惊愕地望着这位一身西服，身上还别着一朵漂亮的红玉石胸花的年轻姑娘，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

查理急急地向孙中山介绍说：“这就是我的大女儿霭龄……”

孙中山热情地向霭龄伸出手：“这么大了，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在我的印象里，你还是那个扎羊角辫、穿灯笼裤的小姑娘呢！”

建威号载着孙中山一行向码头驶去。途中，孙中山忽然向

查理说："这一回来，必然事务繁冗，能否为我推荐一位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

查理略一思索："现在就有一位"，用手一指蔼龄，"她已经给我作了两年秘书了，我相信她能干好。"



孙中山与至港迎接人员在归国船上合影

虽然孙中山刚刚和蔼龄见面，但已经从这两年她协助查理同自己联系中了解到她确是思维敏捷，办事认真。他满意地一挥手："那，那就挖你的墙脚啦！"蔼龄听到他们谈话，马上站到孙中山的面前："先生，我现在听您吩咐！"

孙中山想了一下："上岸以后，国内同志给我汇报的情况，你先认真记录下来。"

查理插一句："先生的谈话也要认真记录。"

码头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军乐齐奏，气球飘飞。孙中山在陈其美致欢迎辞后发表了讲话，他高度赞扬了10月10日武汉军民首义的功勋和大无畏革命精神，高度评价了上海光复

重要意义，接着话锋一转，对革命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坚决反对与清廷议和，主张巩固光复地区，组织军队，以革命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后语调铿锵："愿我将士少希望于和谈之可成，急整军旅，北扫鞑虏，以国民之热望！"

一批新闻记者拥上来，有的选取各种角度，对孙中山拍照，一时间，镁光闪闪，咔嚓成一片；有的向孙中山提出各种问题，问题提得急迫、尖刻，让孙中山应接不暇。忽然一名英国记者挤上前来，大声问道："孙先生，您一直在海外筹款，国内同志已光复了半壁河山您才回来，想必带回一笔巨款作为补偿吧？请问能不能讲一下，您究竟带回来多少钱？"

陈其美感到这样的问题会让孙中山难堪，他开始指示卫兵挡开记者保护孙中山离开，没想到孙中山对这个问题倒很有兴趣，因为国内不少同志肯定也有这种想法。他微微一笑，说声："OK，我来回答你。"接着拿起了台上的话筒，向着全场大声说：

"刚才英国记者问我这次从海外带来多少钱，我可以公开地告诉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我这次回来是一文不名。带回来的只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蔼龄为孙中山坦荡巧妙的回答所激动，禁不住挥手喊了一句："革命精神万岁！"顿时，全场上响起了连天的口号声……

欢迎仪式结束后，孙中山回到了住处，蔼龄就分外忙碌起来。同盟会的重要人物黄兴、汪精卫、李平书、陈其美，一个个来向孙中山汇报情况，蔼龄静静地坐在一边，飞快地作着记录。稍有间歇，她就去翻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分门别类归拢好，然后摘录要点，把最重要的事情整理清楚，送交孙中山过目，再按他的指示拟出回电，交人发出。除了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和听取他的指示，蔼龄对其他人大都一言不发，即使党内的重要干部，也只是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仅仅过了几个钟头，孙中山刚回国时

那种百事挠心、忙乱无序的心情就有了好转，感到事情虽然繁杂，但经霭龄协调，已经可以提纲挈领，抓其大要了。晚上休息之前，查理来安排警卫事宜，孙中山向着查理由衷地赞扬霭龄："您推荐的秘书我非常满意，可以说是美国式的高效率！"

1911年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集会南京，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接近全票当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以后，霭龄的工作更加繁忙。电报、函件、请示、报告，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落到她桌上，半天就堆起个小山来。虽然又添了秘书，但是她是最受孙中山信任的，也是自以为责任最重大的，最重要、最机密的事情总是自己处理。她记性好，遇事果断，再多的事情，她也处理得有条不紊。渐渐地摸着了规律，她露出了一种敢作敢当的劲头，一些向总统请示的函件，如果她认为申述不够明确，就毫不留情地退回去。尤其是一些旧官僚当总长的部门，她常常在文电上挑一些毛病，弄得那些人颇为头疼。渐渐地有些人开始怵她了。她心中的确是为总统着想，想减轻他的一些负担，当然心底里有时也是有意搞点恶作剧，故意出一出与总统意见不一的人的洋相。

霭龄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12年2月13日，就是7虚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签署退位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

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他鼓动手下的48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表示要对南京政府大动武力，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既不要孙中山做总统，也不要溥仪做，就是要自己总揽全国大权。他把大总统看做一块肉，必欲自己吞之而后快。孙中山则恰恰相反，他把总统看做替人民办事的仆役，得之不喜，弃之不忧。

早在孙中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奔赴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求支持革命的时候，就有一封国内拍往英国的电报。这封电报没有发报人的地址姓名，也没有收报人详细地址，收报栏里只有“伦敦孙文”。英国邮电局无法传递，就把电报转给了中国驻英使馆。使馆也不知道孙中山在哪里，又把电报交给了他的一位英国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当年孙中山被清政府诱捕后，积极营救他脱险的康德黎。孙中山从康德黎手中接过电报后，含着微笑在眼前晃了一下就揣进了衣兜。康德黎不懂中文，对电报内容不甚放心，第二天憋不住还是问了孙中山：“电报中有什么秘密事情吗？”孙中山淡淡地说：“国内要我回去担任总统。”说这话的时候，竟没有任何激动和愉悦之情。别说官本位观念极重的一般人，就是这位英国朋友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应该大大高兴才是。看孙中山无意再谈此事，康德黎不得不再发问：“请问你打算就职吗？”孙中山说：“如果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则由我承担也未尝不可……”

动身回国之前，孙中山给上海《民立报》发回一封电报，电文说：“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自当推定黎君(元洪)，闻黎有拥袁(世凯)之说，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这封电报也可看出孙中山对总统职位的态度。

袁世凯则是一开始就瞄准了时机，打算利用这场革命实现他的独裁野心。当初革命党推选孙中山任总统的时候，袁世凯使人在同盟会内部散布：“论功应推黄兴，论才应推宋教仁，论德应推汪精卫。”企图使革命党内部形不成统一意见。这一着不灵，又以处于他掌握之中的清帝为筹码，与南京方面交涉：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孙中山不让位，则清朝不退位。革命力量的

软弱和一些人的天真，加上孙中山对总统职位清淡，袁世凯终于如愿了。

但是真正的革命党人却不愿意大权旁落，使革命成果让人轻易取走。霭龄反对孙中山辞职，但是她说服不了孙中山，也阻止不了袁世凯的夺权阴谋，憋了满肚子哀怨和火气。

霭龄提醒孙中山防范袁世凯。孙中山大度地笑笑说："不怕他，我们已经制定了《临时约法》，一可以以国会的多数限制他滥用总统权力；二来我们已经公布南京为民国首都，他必须到南京就职，离开了他的老巢，到了南京这个革命大本营，他想胡作非为也没有基础了。"

2月14日，参议院接受了孙中山的辞呈。但是要等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孙中山及各国务员乃行解职。

霭龄的担心又一次被验证，袁世凯玩弄花招，唆使曹锟在北京发动所谓"兵变"，抢劫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并冲击南京代表在北京的下榻处。蔡元培等专使只好逃到美国友人住宅避难。袁世凯还策动各地都督、巡抚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南京方面相信了袁世凯说的他如果到南京就职，北京就会大乱起来。因而作出妥协，同意袁世凯荒唐的"电报宣誓"，在北京履任总统。

霭龄度过了无精打采的一段时光。3月20日，孙中山与袁世凯最后敲定了内阁成员名单，唐绍仪为总理，9名总长中，同盟会员占了4席，分别是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4月1日，孙中山在参议院举行解职礼。他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待实现民生主义。"他念念不忘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图，表示十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一心完成铁路建设计划，使中国在经济上富强起来。

孙中山卸下总统重担，顿觉一身轻松。他与黄兴约定，自己搞铁路，黄兴去搞大西北的开发，共同把民生主义推向一个实际实施的新阶段。

4月14日，孙中山从南京出发，准备南下广东，开始考察铁路建设。霭龄犹豫不定自己是继续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还是回到父亲那里，她想和查理仔细谈谈这个问题，孙中山也想见见查理，他们乘坐的"联鲸"号军舰悄悄停在了制造局码头。

查理事先接到通知，已在码头等候。船靠岸后，他登上了军舰。两个老朋友一见面，就对铁路问题谈上了瘾。查理非常支持孙中山的弃政修路方针，他说，美国的富强，就是从兴修铁路开始的，铁路一通，沉睡地下的资源很快被开发，国民经济就迈开了大步。他完全赞成孙中山的计划，着手在资金上想办法。孙中山更是兴致勃勃，两个人越谈越来劲，两个小时过去了，都还意犹未尽。霭龄在一旁根本插不上话，也没有机会同父亲谈自己的事。天色已晚，孙中山欣然接受邀请，住进了查理家中。

吃过晚饭，孙中山又站在了1894年的那幅全国地图前，他兴奋地对着查理全家说："从第一次勾出全国的铁路线，我就为它激动不已。可是那时候不首先进行革命，铁路根本无法修复。现在好了。共和革命已经完成。我可以专心致志地来实现它了！"

孙中山边说边在地图上用红笔划着：铁路建设的第一步是勾通全国三大干线。第一条，从广东南海起，经广西、上贵州、进云南、出四川、入西藏、最后北上新疆天山；第二条，从上海出发，过江苏、安徽、河南，经陕西、甘肃，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到达伊犁；第三条，起于秦皇岛，穿越山海关进入辽宁，再向西折入内蒙，北穿外蒙古，到达乌拉海。他说，这些铁路完全修起来，每年仅运输收入就可以达到十万万元，很快就可使中国进入世界最

强国之列……

查理一家听得情绪激动，为孙中山的宏伟蓝图所鼓舞，他们为孙中山描绘的光明前景所陶醉，忘情地鼓起掌来。尤其是霭龄听到铁路也能发挥这么大作用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多少天来少见的光芒，她已经对这项工作大有好感了。

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来的宋子文，这时正在上海都督府当一名不领薪饷的文书，他对那份工作没有兴趣，这时赶紧缠住孙中山，坚决要求跟随他一起从事铁路建设。

孙中山对查理说："你的两个孩子我不能都带走，你的身边也需要人，姐弟俩谁去谁不去由你决定。"

查理说："子文不要争了，还是你大姐去。"宋子文来了个美国式的耸肩："在我们家呀，重女轻男！"

孙中山被逗乐了："中国呀，几千年来都是重男轻女，只有杨贵妃时代有过重女轻男的说法，不过那大概也只存于诗人的浪漫笔下。你倒说说，你们家是怎么重女轻男？"

子文手插裤兜，望着天花板不出声。

查理对子文说："修铁路现在最需要的是钱！二十万里铁路共需要六十亿元，没有钱连一寸铁路也修不起来。我们来个分工，孙先生和你大姐负责铁路规划和设计施工，我们两个负责筹措资金，这个不重要吗？我倒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家，最好是做国家银行行长，干什么也离不开财政金融的支持呀！"

霭龄赶紧说："对呀，一切之中钱是最重要的！"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了4天，换上制造局帮办牛尚周预备的客轮，开赴广东。

霭龄一扫孙中山辞职初期的沮丧情绪，对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不凡举动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解，尤其对孙中山兴修铁路的

雄心和这一计划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感到由衷赞赏。她把查理父亲准备的一大批有关铁路建设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适时送给孙中山参阅。

船到广州，他们受到广东都督胡汉民的盛情接待。军乐队吹吹打打，还有天真烂漫的儿童献花，当晚又举行了盛大宴会。霭龄感到很惬意，孙中山却有些不以为然，他对胡汉民说："兄弟现在不是总统视察，而是个在野人士考察铁路，搞这阵仗干啥嘛！"胡汉民笑笑说："革命成功了，我们也该开开心，您现在也不在朝中，没有人能说什么。他袁世凯别看当了总统，他来我还不一定伺候呢！"

离开广州，孙中山按照自己划定的铁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遇水行船，旱路乘车。凡有铁路的地方，孙中山到南京就任总统时的专用列车早在等候。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对孙中山表现出无比的热情，欢迎、宴请、安排游览、赠送礼品，有时老百姓还自发地夹道迎送，为的是看一眼这位把皇帝老儿赶下台的人物究竟是几个头几只手。这多少有些妨碍工作，孙中山一再要求官员们简化接待，以便腾出时间多做些实际考察。对赠送的礼品，价值贵重的他一概不收，宴请除非是党内相熟的同志小范围的小饮浅酌，其他统统谢绝。

这年的7月22日，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8月，他来到北京，袁世凯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节接待了孙中山。袁世凯对孙中山竭力恭维奉承，几乎是言听计从。袁世凯挺着大肚子在孙中山面前低三下四的卑顺，使霭龄转变了对他的一贯印象。她对孙中山说："我原来还以为袁世凯是个猴精猴精的奸诈鬼，没想到是这样一位厚道慈祥的大头翁。"孙中山问何以见得，霭龄说："人太奸诈了老用心思琢磨别人，就不可能长胖，必定是尖嘴猴腮；只有心眼厚道的人才能心宽体胖，长出

大肚子来。这样的人即使想使坏，也必定不难斗！”孙中山听得大笑，故意说：“听口气你还是个相面专家。我比袁世凯瘦得多，你看看是不是不如他心眼好啊？”霭龄说不出理，就撒娇地扑向孙中山，用手去捂他的嘴。孙中山只得连连后退。

孙中山也对袁世凯失去了警惕，接受了他“全国铁路督办”的委任。孙中山诚恳地对袁世凯说：“今后我们二人分工合作，十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二十万里，共同使中国走向富强。”

霭龄随孙中山继续考察，他们一起拜访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向他请教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又参观了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

10月，孙中山在上海开办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自任公司总理，霭龄又成了总理秘书。

1913年2月，查理也随孙中山东渡日本考察铁路并筹措资金。一年多来他第一次和女儿朝夕相伴，看到霭龄在铁路方面的知识大有长进，她已不再只是给孙中山准备资料，在和日本铁路专家谈话时，她往往能抓住实质，提出最需要了解的情况，还不时插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正日本专家的建议。查理很为此感到满意。

“霭龄，看到你这一年多来的进步，我非常高兴。现在你都快成半个铁路专家了。”

“是吗？谢谢爸爸的夸奖！”

“爱这项事业吧？”

“爸爸，我愿意为孙先生的铁路宏图献出我的一切！”

霭龄和父亲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国内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大获全胜，取得多数席位，就在踌躇满志的宋教仁从上海出发，准备到北京组织内阁与袁世

凯分庭抗礼的时候，袁世凯派出刺客于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向宋教仁连发两枪，一代革命精英在经历了整整两天的巨大痛苦之余，含恨辞世。

孙中山经历了铭心刻骨的悲怆。但是他还不相信谋刺宋教仁是袁世凯下的手，袁世凯在他面前的卑顺表演还历历在目，他把这件事交给“法律”去解决，自己仍潜心于铁路建设。但直到几年后他彻底放下这项工作，仍像在革命中的遭遇一样，没有一个外国资本会真心实意为他朝思暮想的铁路提供资金。唯一同他签订了合同的是一家英国公司，而这家公司自始自终履行的也没有超出过勘测阶段。

当袁世凯动手一个一个解除国民党占据的各省都督职务时，孙中山终于醒悟了。他重新披挂上阵，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3年7月，由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宣布该省独立，接着黄兴在江苏、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等，都宣布独立。他们发布了讨袁檄文，组成讨袁军，与袁世凯展开了对抗。早已部署好大军的袁世凯乘机进攻，匆忙起事，内部涣散的讨袁军不到两个月就土崩瓦解。孙中山只好再度流亡，跑到了日本。

革命后跟孙中山公开在一起活动的宋查理，再也无法充当秘密党了，巨大的危险降临到全家头上。

查理全家在日本神户上岸。为离东京的孙中山近一些，后移居横滨，租了海滨山上的一幢楼房。从这里可以俯瞰东京湾，是外侨中上流人士居住的地区。孙中山摈弃了“十年不过问政治”的宣言，查理恢复了昔日和孙中山的密谋，他们共商反袁大计，制定新的建党纲领。孙中山的寓所成了当然的流亡者总部，每日来聚会的革命者络绎不绝。但这时蔼龄因为身体不适，未能到孙中山身边工作。

庆龄参加了流亡者总部的工作，她思路清楚，眼光敏锐，剖析事理直中鹄心，不为表面现象所迷。她没有个人企图，一心一意做好流亡者的组织工作。她文静、谦和，善与人处，很快博得众口一致的称赞。

孙中山亲手写一张条子，对霭龄的身体健康表示慰问，并请她康复以后，能尽快回到自己那里工作，他需要她协商处理那些繁杂的具体事务。

两天以后，霭龄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孙中山面前，孙中山热情同她握手，表示在她离开的日子里，许多事情都显得乱糟糟的，希望她能帮助他尽快恢复以往有条不紊的工作秩序。

霭龄满怀信心，在孙中山办公室一角安下了她的小桌子。并以她的干练很快把孙中山从文牍纸堆中解放了出来，使他有时间和精力专门考虑比较重要的事情。

孙中山顿显轻松。

转眼到了1914年春天。

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也到了日本。查理见到他之后，认为他是一位有实干精神的青年，把他带到家里共进晚餐。霭龄和孔祥熙在美国留学时曾有过一面之交，这时霭龄已经24岁，该考虑婚姻问题了。两人谈得很投机，很快订下了婚约。

几天后，霭龄正式向孙中山提出了辞职。孙中山舍不得失去这样一位好助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他语调沉缓，高度评价了霭龄几年来的工作，赞扬了她的工作精神、办事能力和负责态度，并对霭龄作了诚恳挽留。孙中山说，如果准备结婚，以后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处理家务，每天只要能来两三个小时帮他处理一下最重要的事务，都将非常感激。为孙中山的至诚感染，霭龄几乎要答应留下了。但她忍住了，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决心彻底离开。她向孙中山推荐了妹妹庆龄来接替秘书工作。她介

绍说，庆龄非常崇拜先生，热情高，意志坚定，是一位凡事务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她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强，肯定能干得更好。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

蔼龄离开的时候，孙中山亲自送出门外。握手道别后，又一直目送她的车子远去。蔼龄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日子，成为她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名　芳）

张学思与张学良的手足情

1936年12月28日下午，南京太平门外，长期无人居住的孔祥熙公馆四周，突然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如临大敌。豪华雅静的洋楼里，窗户被黑纱遮严了，门厅旁、走廊上、楼梯口、房间内到处是流动的军统局便衣特务。两小时之前，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审讯”后，被秘密关押在二楼的一间屋子里。

这时，戒备森严的孔公馆大门外，急匆匆奔来一位身穿国民党军校服装的青年。“咔嚓嚓”，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挡在他的胸前。青年目光如电，扫视了一下密密层层的门岗，按下心头的怒火，从容地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允许我进去见见我大哥！”宪兵虎着脸生硬地回答：“这里无此人！”这个青年恳求说：“我刚从宋公馆来，宋子文先生说他就关在这里，求你们给个方便吧！”宪兵更蛮横了：“告诉你，无此人！”青年的眼里喷火，拳头攥得紧紧的，他竭力克制着自己，没有发作，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长久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幢华丽的楼房，渐渐地，眼眶溢出悲愤的泪水……

这位身着军装的青年，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四弟张学思。

张学思与长兄张学良同父异母，年龄相差15岁，在大帅府的八兄弟、六姐妹中，这兄弟俩的情谊最笃，关系最为特殊。话还是从头说起。

一

赫赫有名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大元帅，平生最喜欢三个孩子。一个是大女儿张首芳，为原配夫人赵氏所生，是张家的老大。她小时在张作霖的马背上突过围，尝过高粱米掺野菜的滋味，在患难之中长大，因而最受父亲的疼爱。



张学思(左)和大哥张学良(中)二哥张学曾(右)合影

另一个为张作霖喜欢和器重的是长子张学良。他与父亲好像有一种奇缘，他出生于1901年6月4日，那天，张作霖平生第一次打了个大胜仗，从此飞黄腾达。由于张作霖与冯德麟拜了磕头兄弟，那时冯德麟已有五个儿子，因此，张作霖把张学良排行第六，叫做“小六子”，以后一直未改口。张学良青少年即随父鞍前马后，东征西杀，并参与大帅府的军政大计，成为名声显赫、举足轻重的“少帅”。

除了长女和长子之外，张作霖再一个喜欢的就是四公子张学思了。他从小聪明伶俐，十分惹人喜爱。4岁，张作霖就带他参加每年的奉军阅兵式。6岁，就为他与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六小姐定了婚。张作霖虽是草莽出身，却十分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他请来一位前清的举人，命他严格管教子女，“谁不听话就

用烟锅子打!"于是,大公子张学良小时候不听管束,脑袋上留下了一块永远去不掉的大疤痕。轮到老先生管教四公子时,生性活泼的小公子养了一条德国种的大狼狗,老先生的烟袋锅还没有落下,就被它扑上去凌空叼走,吓得老先生魂飞魄散,跌坐在地,从此而辞别大帅府。张作霖并未责怪张学思:"这小子,像我,有股灵气!"

张学思12岁那年,大帅府发生了一件天大的惨案——张作霖大元帅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在吊唁的日子里,张学良以大帅府新掌门人的身份问三位弟弟:"父帅遇害,你们有什么打算?"二弟张学铭涕泪俱下,嘶哑着嗓子喊:"我要是你,就把沈阳的小日本鬼子统统杀了!"三弟张学曾回答:"可惜我是个文弱书生,只有把书念好,以慰父帅在天之灵!"四弟张学思的回答却有些特别,他说:"父仇要报,国仇也要报,但报仇先要自强!我们听大哥的!"

张学良感到四弟不凡,他拍着张学思的肩膀叹道:"小小年纪,竟能如此虑事,难得啊!"

大帅府易主。28岁的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了东三省军政大权。当时东北军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日趋激烈。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势力多为40岁以下的少壮派,呼之为"一二三",他们反对旧派的昏庸腐朽,主张推行欧美化革新;以杨宇霆、常荫槐为核心的旧派势力,多为40岁以上的元老派,呼之为"四五六",他们加紧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实行"满蒙独立",颠覆张学良的统治。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力挽狂澜,采取两项断然措施。首先,实行东北易帜,将东北的五色旗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促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接着,先发制人,在大帅府老虎厅内,除掉了杨宇霆和常荫槐,从而巩固了张学良新派的统治地位,使军威整肃,令行禁止。

张学良励精图治，声望骤增。他积极推行欧美式改革，整编东北军，修筑葫芦岛军港，开发满铁并行线，扩建东北大学，力图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东北。帅府里也出现了自由、开放、欧美式的新家规。

这一番新的变化，给张学思带来了兴奋和喜悦，他从大哥的身上看到他们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的火花不久就消失了。张学良在政治上开始向右转，参与国民党军阀内战；在生活上染上打咖啡针的嗜好。帅府又恢复了昔日死的沉寂。张学思对这位曾经奋发有为的大哥失望了。

二

1930年的端午节到了，帅府又热闹起来。按照惯例，张学良作为帅府的掌门人，要到各房走走。他走进四弟的书房。“嗬，你书房里的书，比我的还多啊，不愧是咱们张家的读书人!”张学思这一阶段，在启蒙老师王西徵和进步同学王金镜的影响下，读了许多进步书报，他对家庭的看法变了，对人生的看法也变了，心中萌发了争自由、争民主的思想。

张学良似乎从四弟忧郁、深沉的目光中，发现了什么。他关心地询问起四弟的学业和读书情况。他一边问着，一边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翻翻。突然，他眼睛瞪大了。原来，这本书是丁玲著的《在黑暗中》。

“这书是从哪里来的?!”张学良板起面孔厉声问道。

“是我从书店买的。”张学思回答。

“你知道吗？这是共产党写的!”

“我看写的没什么不好呀!”

“岂有此理!”张学良火了：“以后不准看这种书。烧掉!”说罢，他扔下书，气呼呼地走了。

一时，平静的帅府掀起了轩然大波。各房里都传开了："四爷赤化了，学共产共妻哩！"学思的母亲吓坏了，在她看来，张学良手掌生杀大权，如同过去的皇帝一般，虽说是一家兄弟，可要真是当了共产党，也会惹下杀头之祸的！她向张学思哭劝道："你们几个，是我守活寡，遭人家白眼，好不容易才拉扯大的。你是我最小的孩子，我也最疼你，你可千万不能走歪路，学共产共妻啊！"张学思那时还搞不清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只觉得书上写的全是好话，并无"共产共妻"之说。但他不愿使母亲过于担心，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只好拣出几本书烧掉了。

这便是当时哄动帅府的"烧书事件"。帅府的老人们说，这件事是促使四公子出走的一个原因。三个月后，他便随一位古怪的先生去了北平，从此一去而不复返……

三

"九·一八"事变爆发。正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的张学思痛感于国恨家仇，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可是，同学们在大骂张学良"不抵抗主义"的同时，对张学思也怒目而视，加以指责。"瞧，他就是张学良的弟弟！"更有些激进的同学，用墨汁在他的衬衣上写了 7 个大字："不抵抗将军之弟"……

张学思感到羞辱难忍，便冲进北平顺承王府，当面指责大哥为什么丢弃东北？为什么要背上千古骂名！张学良一言不发，憔悴的脸上带着隐约可见的泪痕。当他看见四弟内衣上那 7 个大字的时候，他痛苦地闭上眼睛，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头。张学思看得出大哥有难言之苦衷，不禁声泪俱下，劝他立戒毒瘾，振作精神，率东北军抗日复土。张学思虽然言辞激烈，但张学良毫无反感，他被四弟的爱国激情所震动，他真诚地说："四弟，请你相信大哥，我不是那种卖国之人，总有一天，我会向世人证明，我

是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对得起祖先和同胞的！”

1933年初，热河沦陷，民怨沸腾。蒋介石又像丢失东北一样，把失土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张学良将军身上。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出国。张学思更加愤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4月，他在共产党员王金镜和关成章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张学思受党之命，打入国民党军队之中，从事“兵运”工作，以便将来为党拉出一支抗日武装。

1934年春，张学良旅欧结束，回到上海，住在宋子文公馆里。张学思前去会晤。他一走进大门，张学良就热情地迎上前，拉着他的手笑着说：“嗬，真快呀，四弟都长成大小伙子了！”张学良回国前戒掉了毒瘾，张学思惊喜地发现，此时站在他面前的大哥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和出国前判若两人。

兄弟俩在客厅坐定，张学良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出国的见闻与感受：他非常羡慕西欧各国强盛的景象，特别是在德国希特勒的登台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对他的款待，使他格外感奋。他表示，对法西斯主义甚为欣赏，认为中国要抗日御侮走向强盛，也得像德、意等国那样，走法西斯主义的路，绝对拥护领袖实行独裁。张学良一反过去反对自家兄弟从军的主张，赞同张学思投笔从戎，他希望张家兄弟醒悟起来，为抗日复土而奋斗。接着，张学良又劝说四弟入中央军校学习，他说：“中央军校就是以前的黄埔军校，由蒋先生当校长，办得很好，将来我们东北军的干部也要从那里派，你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将来才好做事情。”

张学思从大哥的言谈话语中，知道他是决心抗日的，只可惜他对蒋介石还抱着天真的幻想，但此时有些话是不便向他挑明的，只有先答应他的要求，“大哥我听你的，先上中央军校！”

“好啊，四弟果然有出息！”张学良见四弟如此干脆，非常高兴。

这时，门突然开了，一个被绳索五花大绑的人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大哥！求您快快发落！”

张学良和张学思都吃了一惊，此人竟是三公子张学曾！

原来，张学曾在天津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被母亲知道了。“混帐东西，一个堂堂的中国人，竟要娶一个外国女人当老婆，你给我跪下！”许夫人怒不可遏，用鞭子将儿子痛打一顿，又命家里人将张学曾捆起来，送给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张学铭处理。张学铭很为难，他是自己的三弟啊；再说，交外国女朋友犯什么法啊？因此请求宽恕了他。但老太太不依，又派人把他送给张学良发落。

张学良哈哈大笑，给张学曾解了绑。他对来人说：“给老太太回个话，就说我依照国法家规，很严厉地处理过了，请她放心好了！”

来人走了，张学良还不住地感叹：“老太太虽然有失偏颇，但她的一片爱国之心真是可贵啊！”他转向张学曾说：“三弟，你怎么不向四弟学学，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呢！”

张学曾笑笑，摇摇头：“光是军队也救不了国，还得要文化要科学，我喜欢自由自在地搞学问，受不了军队的那一套。为了一个外国女人，妈捆了我好几天，哥你就饶了我吧，别让我到军队去没完没了的立正、稍息了！”

“哈哈哈……”兄弟三人一同大笑起来。

笔者至今还珍藏着一幅兄弟三个当年摄于宋公馆的合影照片。将近60年过去，照片中最年轻的一位英年早逝！另两位健在者，一位在台湾刚刚结束漫长的幽禁生涯，一位侨居美国搞了一辈子学问……

四

1934年7月，张学思在张学良的积极保荐下，插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期二总队预科班学习。他刻苦训练，后来居上，成绩超过了先入校的学员，成为军校出类拔萃的高材生。

在中央军校学习期间，张学良来看过张学思两次，均由军校的教育长张治中陪同。张治中夸奖张学思是个出色的人材，很能吃苦，很有培养前途，建议让他升入中央军校本科。张学良非常高兴，感到四弟为自己增了光。因为和张学思同期的还有何健的儿子和朱培德的弟弟，他们的纨绔之风很盛，又不听管束，而张学思则与其完全不同。张学良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喜欢、最器重的就是这个老四。我们张氏八兄弟之中，将来大概只有他会有些出息！"

十期学员毕业前夕，在西安任"剿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特派他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久来南京看望张学思。孙铭久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这时期张学良思想发生了变化，准备联共抗日，他在王曲镇办了军官训练团，正在积极改革东北军，他准备吸收军校毕业的学员到东北军任军事干部，招募东北大学和平津一带的进步学生任政工干部，把东北军改造成一支新式的抗日武装，准备打回老家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上空，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的利益，毅然拘捕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将军电告张学思火速去西安，电报送到中央军校，可是张学思并未收到，当时，他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参加毕业前的大演习。"西安事变"的当夜，宣城野外万籁俱寂，军校学员均已进入梦乡。突然，有几条黑影窜到张学思

铺前,他尚未弄清怎么回事,嘴已被什么东西堵住,手臂也被捆了起来……

张学思被押回南京中央军校,已是翌日早晨。一进军校大门,他就感到气氛异常紧张,军校正在开誓师大会,进行"讨逆动员",墙壁各处贴满了"打倒张匪学良"的标语。一会儿,他被带到政训处,上校处长满脸凶相,暴跳如雷:"你哥哥张学良当了共产党,已经叛变了!他竟敢把蒋校长拘捕了,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从他的吼声中,张学思大致弄清了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也晓得了他们是奉何应钦的手谕逮捕自己的。张学思的心里坦然起来,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审讯毫无结果,张学思被带到练习营秘密幽禁起来。

"人们只知道'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幽禁,其实,最先被幽禁的是他的四弟张学思……"1985年夏,当年张学思在中央军校发展的进步骨干之一,现为铁道部顾问的宁志远(原名宁金波)和笔者谈起往事:"学思被软禁的次日中午,我得到消息,赶到练习营后面的小砖房去看望他,但卫兵把守很严,根本不许靠近,更不准给他带东西,我们只是远远地隔着木栅门,彼此招招手,没讲一句话……"

关于张学思被囚后的情况,他本人的《自传》中记载得较为详细:

"我被扣在军校练习营,食宿、拉屎均不准出屋,亦未进行任何审讯。这时我回想孙铭久所讲的话,已知道西安事变大体是怎么回事,张学良的进步看起来是真的了。我很佩服他的勇敢和果断,但他这种方式真出我意外。我希望他真能由此而掀起抗日战争,我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相信张学良一定与我党有联合,但如果打起内战,中国就不堪设想了。我对自己也做了思想准备,我想抗日战争如能发动,我就有自由的可能;如打起内战,

蒋介石活不成,我也好不了。我便以一切听之任之的态度,等着两种可能的来临。过了五六天,练习营长突然找我和他一起吃饭,他说蒋夫人、宋子文均到了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让我写信劝张学良放回蒋来。我觉得写信是可以的,反正放不放由他,只要不打内战就好。我便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双十二事变,举国震惊,日寇更觉有机可乘,对政治问题我不懂,唯觉破碎的祖国已不堪再起内战,请他送蒋回京,以抗暴日。这封信是否送到我不知。25 日,张学良和蒋介石突然一起到了南京,我也恢复了自由,被送回队上学习。校中打倒张学良等标语均撕下来,同学们以惊奇的眼光看我,以为我已死掉,队上军官对我非常客气,弄得我莫名其妙。第二天我去看张学良,他住在宋子文家,很多人去看他,他说很忙,几天即回西安,要我明天再去与我详谈,次日去时张已被扣……"

1937 年 1 月 30 日,国民党中央军校大礼堂里,军乐齐奏,第十期学员毕业典礼正在举行。1700 多名毕业学员,身着一式的军装,整齐地排列在大礼堂里,目光集聚在台上。今天,不知是什么原因,校长蒋介石破例没有出面,毕业典礼由冯玉祥将军主持。此刻,他庄重地将一面银盾赠予本期毕业生成绩第一名的张学思。这是一件小巧精致的银盾,它的正面刻有张学思的名字,背面刻有东三省地图。张学思心里明白,这是冯将军在鼓励他,要他不忘大哥的志愿,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思激动地向冯将军立正行礼。

可是,随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登台训话,会场气氛急转直下。汪精卫捶胸顿足,大骂"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串通张、杨胡作非为,大骂东北军不抗日,在国内捣乱,劫持领袖,违反国家纲纪……

张学思站头一排,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气愤得流出眼

泪，被台上的张治中将军看到了。散会后，张治中把张学思叫到办公室，好生安慰了一番。他说："我与张将军的私交很好，不是他们那样看法。张将军的功过，历史自有公正的评价。眼下时局未定，外面情况很复杂，我看你哪里也不要去了，我已决定把你留校见习，将来你想出国留学，我可以保送，你看如何？"

张学思心里暗忖：这会不会是军校当局对自己实行的变相软禁呢？也许，你张治中将军是一片好心，可你不想想，这儿是我呆的地方吗？现在这种情况，我还留在蒋介石的身边，会有好果子吃吗？不行，我一定要设法远走高飞！张学思灵机一动，决定将计就计。"好吧，我同意留校见习。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按惯例，毕业学员都有个探亲假，我想先回天津探望一下母亲。不知教育长肯不肯准假？"

张治中表示同意，但他再三嘱咐张学思："悄悄离校，快去快回！"

然而，张学思一去不复返。他搭上北去的列车，千里找党。他与北平地下党接上关系之后，又受命赴保定东北军五十三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五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开始向中国腹地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就此开始了！

抗战的枪声打响后，社会上风传张学良将出来继续领导东北军。在这种情况下，心怀叵测的蒋介石也放出可以释放张学良的风声。

张学思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他想，大哥若能获释，不仅兄弟可以团圆，而且会大大有利于中国抗战。经过"西安事

变”之后，大哥一定会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从而积极和共产党合作，全力以赴率东北军抗日复土。张学思决定亲自去奉化溪口，探望被幽禁的张学良。

7月中旬，张学思经过一番周折，从北平回到天津，又从塘沽经海路前往上海。

在上海，张学思与大嫂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见了面。自从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被解到奉化溪口看押后，两位女眷均回到上海，每周轮流或同去溪口陪伴张学良将军。一天，蒋介石派来一位名叫黄仁霖的代表到上海，约赵四小姐同去溪口见张学良将军。他会见了张学思，说蒋委员长早有释放张将军出来之意，此次派他与张将军谈话，就是为张将军出来做准备。张学思向黄仁霖诉说了自己探望大哥的迫切愿望，经他电请蒋介石获得了批准。于是，张学思、赵四小姐，还有黄仁霖一行3人，一同乘由上海开往宁波的客轮，再换乘汽车去往溪口。

在距溪口镇西北约10公里处，有一座巍峨秀丽、峰峦叠嶂的雪窦山。山上有座雪窦寺，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大名刹之一。在寺的西隅山麓500米处，是水基岩风景区，建有中国旅行社的十几间房屋，张学良将军就住在这里。从此，“中国旅行社”的牌子改成了张学良将军的“招待所”，然而“招待”他的却是30多名便衣特务和一个连的武装宪兵。

第二天早饭后，黄代表找张学良将军在客厅里单独谈话。张学良将军从客厅里出来时，张学思发现大哥面色不悦，心里感到蹊跷：不是说蒋介石要释放大哥吗？难道蒋介石又打大哥什么鬼主意了。他想问问大哥，但周围尽是特务监视，除了谈吃、喝、玩、乐外，不能说别的。

午饭后，张学良将军兴致勃勃地邀张学思和赵四小姐去游览雪窦山名胜。在特务们前后簇拥下，张学良将军游兴十足地

上路了，他一路指指点点，谈笑风生。张学思则心情沉重，不声不响，他多么想和大哥说说心里话啊！哪有心思游山赏景呢？莫非大哥忘却了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大志？张学思望着闲情逸致十足的大哥，心不住地在往下沉。

好容易盼到了张学良回去吃晚饭。张学思心想，晚上一定要找个机会和大哥说几句话。然而，饭桌一撤，大哥却拉着他打起乒乓球，下起国际象棋……张学思暗暗叫苦：大哥啊大哥，你玩起来，把什么都忘了！

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在玩乐中消磨掉了。

第四天，也就是张学思临走的前一天。天空突然雷雨大作。吃完早饭后，张学良对四弟说："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书房里看看画报去。"这时，赵四小姐留下来，张罗着和特务们玩牌。

张学良把四弟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个书架和一个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思顿时明白了，原来大哥已选好了谈话的场所啦！然而大哥示意张学思别吱声，他指了指墙壁（暗示装有窃听器），然后拿出纸和铅笔，兄弟俩进行着无声的"谈话"。

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飞写着：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将军看完后，用橡皮擦去铅笔字，又在纸上写起来……他们的"谈话"虽是无声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似翻江倒海，电闪雷鸣！

这次雪窦山秘密笔谈的内容，除张氏二兄弟外，旁人无从知晓。然而，在张学思逝世几年后，笔者在档案馆所藏的《张学思自传》中，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一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张学思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的："张学良告诉我，他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蒋回信不允，叫他好好读书。此次蒋派姓黄的来，是要他写信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嘱咐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一致抗日，

不可乱闹。他渴望奔赴抗日疆场,急于知道东北军的现状,要我经常设法报告他。他说他是在宋子文保证之下跟蒋介石来南京的,未想到被扣。他认为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他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让我把此话传达给东北军各军长。他坚信中国将来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蒋介石绝不是抗日的人。要我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张学思接过大哥递来的一张张字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腮边滚下,把字条淋湿了。灼热的文字,火一般的激情,燃烧着张学思的心。他心里想:多少年来,我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却因为政见不一,从没有谈过一次心。这一次是大哥在被看押的情况下,头一次和我谈心里话,可是,此时此刻用的却是这种方式,张学思感到非常难过。想好言安慰一下大哥,可他自己却忍不住鼻酸泪流。他真想扑过去和大哥抱头大哭一场,把积郁在胸中的感情倾吐个痛快。可是,此时此地,哪里能倾述兄弟之情呢?! 对大哥的最好安慰,就是把他未竟的抗战事业进行到底。他在心里默念着:大哥啊,您放心吧,我已经找到伟大的共产党,您的愿望一定会变为现实的。想到此处,张学思揩泪挥笔,给大哥写下几个赫然大字:"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兄弟俩紧紧抱在一起。

突然,门外传来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声音:"张先生,下棋呀!"边说边破门而入。张学良将军早已收好纸笔:"好啊,画报看腻了,换换脑子。"边说边笑呵呵地迎上前去……

六

由上海至北平的列车,开到济南就无法前行了,前面正在打仗。在济南,张学思巧遇东北大学地下党员冯静安,接上了组织关系。几天后,他与东北抗日救亡党团书记刘澜波见了面。

"唔,你跟你大哥长得一模一样啊!"一见面,刘澜波就紧紧握着张学思的手,热情地说:"你们张家出了一位抗日的功臣,还出一位共产党员,可喜可贺呀!"刘澜波告诉张学思,当前在东北军上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上层军官参加抗战救亡,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集中使用,反对蒋介石拆散、瓦解东北军的阴谋;争取恢复张学良将军的自由,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反对蒋介石妥协、退让。他认真听了张学思在溪口探兄的汇报后,指示张学思:"当务之急是争取释放张学良。张将军若能放出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他深情地告诉张学思:"周副主席对你们兄弟二人非常关心,派你去做'释张'工作就是他的意见。"

"您说的就是周恩来?"张学思激动不已,"请转告周副主席,我一定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

不久,刘澜波向张学思引见了东北知名进步人士高崇民和黄显声,他俩都热情鼓励和支持张学思做"释张"工作。

当时蒋介石利用东北军内讧,已将东北军各军拆散,调往四面八方。张学思决定跑遍全国,找遍各军军长,吁请他们参加"释张"工作。他首先由济南搭车奔往沧州,找到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将军,向他述说了张学良将军在溪口的嘱托。吴克仁很激动,拍着胸脯表示:"六十七军保证无问题!"张学思请他给蒋介石写信,要求放张学良将军出来领导东北军抗战。吴克仁却犹豫起来。他是"西安事变"后被南京政府由师长提升为军长的,不敢得罪南京政府。他皱眉思索说:"要求恢复副司令的自由可以,但是,要他领导东北军的话不好提,这会引起蒋委员长的疑心,反而对副司令不利。"过了两天,吴克仁把一封措词温和的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信交给了张学思。

张学思带着吴克仁的信回到济南,次日,与黄显声同去河

间，找到五十三军长万福麟，讲述了溪口之行的经过。万福麟听了张学良的嘱托，唯唯点头称是。他不禁又叹息起来："汉卿啊汉卿，你在西安时怎么尽听些小孩子的话，也不和我商量，做出如此冒失之举！"

万福麟是张作霖时期的老人，属东北军旧派，曾被张学良列入撤换人员之列。张学思知道他脑筋陈旧，对"西安事变"不满，也不同他争辩，只是请他给蒋介石写封信，要求释放张学良。万福麟表示同意，他说："我也早有此意，不过以我之愚见，东北军愈老实听蒋先生的话，蒋先生放心了，你兄长就愈有获释的可能；东北军愈闹，蒋先生愈怕，你兄长就愈难出来。"说罢，他用婉转的辞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然后，又将张学思由五十三军的见习排长提升为军部上尉参谋。

张学思携信与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同往南京，在五十三军驻京办事处下榻。不久，刘澜波也来这里聚会。以后，张学思又找到了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及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等，他们都表示听从张学良将军的嘱托，并一一写了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亲笔信。

9月末，张学思与黄显声到庐山，请东北政界元老、张作霖时期的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王树翰出山，同去南京政府活动释放张学良。途经安庆时，张学思找到原辽宁省长、现任安徽省主席刘尚清，他照例也写了一封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信。

到了南京，张学思请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出面协助。莫德惠是东北元老，张作霖时期任过奉天省省长。由于他积极支持东北易帜，南京政府也很赏识他。不久前，他到溪口探视过张学良，他说："汉卿，你太忠厚了！难道你对蒋介石的为人还不知道吗？"一语引起张学良将军的无限悔恨。他想到自己真心拥蒋，却落得如此下场，不禁叹道："唉，人以德待我，我以德报之，怎奈

人又以怨待我也!"

莫德惠感慨地对张学思:"汉卿为人,的确称得上'忠厚'二字了! 只要能尽微力,使他获释,老夫万死不辞!"张学思请他和王树翰出面,持东北军各军军长及刘尚清等人的亲笔信,呈送蒋介石。莫德惠爽快地答应了:"好,我们明天就去!"

蒋介石听侍从说,莫德惠和王树翰为请求释放张学良而来,还带着东北军各军军长和东北名流的亲笔信,气得他差点砸了喝水的杯子!"娘稀匹! 东北小赤佬只知道胡闹,去告诉他们,我不见,不见,就是不见!"



张学思受到毛主席接见时情景(右为肖劲光)

两位东北元老受到凌辱,羞愤而归。张学思虽然也有思想准备,估计蒋介石不会很痛快地接受"释张"的要求,但没料到他连莫德惠也不肯见。莫德惠愧疚地把那叠信还给张学思,叹息道:"小四啊,不是我不尽力,而是无能为力呀! 你还是去上海,找宋子文先生帮忙吧!"

张学思又马不停蹄地赶赴上海。为了大哥获释,哪怕把鞋底磨穿! 刘澜波也一路随行。张学思通过大姐家的亲属鲍文樾的关系,见到了宋子文先生。宋子文态度坦诚,他告诉张学思:"当初汉卿亲陪蒋先生回南京,我

做过担保人，原想汉卿负荆请罪，可以给蒋先生挽回面子，同时南京方面也保证不会为难汉卿。没有想到，蒋先生突然变了卦，弄得汉卿有来无回，有家难归！弄得我也对不起朋友，无颜见人！"宋子文苦笑摇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为了对得起良心，我决定在上海过隐居的生活，他们不把汉卿放出来，我就不出去做事！"张学思深为宋子文的诚意所感动，恳请他出面，将东北军将领们的信亲呈蒋介石。宋子文表示愿意尽力，如有消息立即通知张学思。

11月，上海沦陷，张学思和刘澜波回到南京。中共领导人博古和李克农接见了张学思，勉励他继续抓紧做好"释张"工作。这时，南京吃紧，国民党政府准备迁都武汉。几天后，张学思与刘澜波、黄显声、万国宾等随五十三军办事处转移到武汉。

一到汉口，张学思就听说张学良已从溪口被押到衡阳，却未见丝毫释放的迹象。张学思忍耐不住，又去找宋子文打听消息。宋子文安慰他："此事不能心急，我正在设法办理，你耐心等着听信儿吧。"

又过了一段日子，还是没有动静。张学思决定亲自去衡阳探望大哥，他约万国宾一同去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请他准行。戴笠曾与人说过，"东北军的将领和公子哥中，只有一人我尚未控制，就是张汉卿的弟弟张学思。"今见张学思主动登门，他立即满脸堆笑，设宴款待。他说蒋先生一直很关心张将军，保证汉卿的安全无问题。但当张学思提出到衡阳探视的请求时，他却以"衡阳战事紧张，常遭日军飞机轰炸"为由，一口拒绝了。

张学思只得再次去找宋子文，不料他的家人说："宋先生已去香港隐居，他说从此以后不理政事了。"张学思的头"嗡"地一声，他明白了，宋子文的一系列活动也失败了！

张学思拿出破斧沉舟的最后一招。他与黄显声一同去找宋

美龄，提出以他们两人做人质，去换取张学良将军的自由！结果仍然是失败。

关于"释张"活动失败的原因，史学界已做过一些探讨。这里，笔者只想引用张学思在《自传》中的看法："我感到释张问题，不是我奔走所能办到的。蒋介石有利用抗战消灭异己的方针。他不杀张是为了拢络东北军与一些中上层；不放张是怕出来后带东北军与我党靠近；所以在不杀不放中，以收买利诱，利用抗战瓦解、消灭东北军。'双十二'前，张学良想急速改革东北军，军、师长多数均拟调换，计划传出了，事情并未办，下层无力量，军、师长对张多数有离心，这也使蒋有机可乘。"

"释张"希望的破灭，促使张学思坚定了发展敌后抗日武装的决心。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亲切地接见了张学思。

张学思久已敬慕周副主席，然而初次见面，却显得很拘束。后来，他和朋友们谈起这次见面的情景时，还懊悔地说："我真羡慕澜波，他在周副主席面前随便的很，像学生见老师那样自然；而我却不能，只知道立正、敬礼、挺胸，硬邦邦的，像士兵见了长官……"

"报告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任务，请求处分！"这是张学思见到周副主席的第一句话。周副主席呵呵笑着，热情地握住张学思的手说："学思同志，你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找遍了东北军界和政界的上层人物，为党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虽然张学良将军没有如愿获释，但却彻底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在政治上我们是胜利者！"周副主席感慨地说："张汉卿是抗日的有功之臣，将来定会青史垂名大书特书的。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真诚的朋友，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有功于民族的爱国将领！"

张学思的双眸湿润了。他为大哥获得这样高的评价而激动，为大哥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高兴！

七

1949年9月21日，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分，进入了庄严神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与来自全国各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和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600多名代表一起，共议组建新中国的大计。

次日，各单位代表发言。下午，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学思健步走上讲台。镁光灯在眼前不停地闪着。他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陈云等党的杰出领导人，在第一排就座。此时此刻，他感到有数道熟悉的、殷切的、灼热的目光一起聚集在他的身上，他的胸口一阵猛跳，他想起了远在台湾孤岛的大哥，如果他能亲眼目睹他久已盼望的新中国的诞生，亲自参加今天这个历史性的盛会，该有多高兴啊！

怀仁堂大厅里，週响着张学思的坚定自信的声音："诸位代表，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及一切爱国志士为着中国的新生，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有的已经光荣牺牲，有的至今仍被残余的反动势力所羁押，如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讲到这里，张学思停顿了一下，这瞬间，引发人们对这两位民族英雄、爱国功臣的无限缅怀。张学思的声音激昂起来："今天，他们虽然未能亲身参加这个盛典，但是他们已经得到最大的安慰！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愿望实现了！……"

会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张学思在心里默念着："大哥，你听见了吗？……"

人民政协开幕的前夕，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张学思。他提起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张将

军、杨将军今天在的话,他们一定会坐在重要的席位上,即使这一次他们不能亲自参加盛会了,但下一次还可能参加,我们会长期永久地保留这两位爱国将军的席位!"

可是,周恩来和张学思都没有料到,就在他们会面之前,1949年9月17日,杨虎城将军一家四人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三个月后,中共中央才得到确实消息,发了唁电。

1961年,台湾当局发表了经歪曲和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思看过后,情绪激愤,彻夜难眠。他是了解大哥的,他根本不相信这是大哥的原作,这不符合大哥的所为。但他也不免为大哥的声誉而有所担忧。

几天后,适逢12月12日,周总理办公室发来请柬,邀请张学思夫妇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总理亲自主持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晚上,与张学思夫妇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及妻子。周总理亲切地拉着张学思和杨拯民两对夫妇,坐在自己的一左一右。席间,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此情此景,使张学思异常激动,他在给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许多人还是头一回看到周总理流泪,都深为感动。周总理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四人牺牲了,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不落泪呢?"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高崇民先生激动地即席作诗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读罢说:"'憔悴'二字消极,不符合张学良将军的性格,我看应改写'一人奋斗在东南'!"大家热烈鼓掌叫好!

张学思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今天的场面，使他过度激动和感伤，未能终席。散席时，周总理还特意到休息室看望了张学思，安慰再三。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张氏三兄弟关怀备至，评价甚高。他赞张学良将军是"抗日的千古功臣"；赞张学思是"海军的好参谋长"！

（刘永路）